

FEMININE
PSYCHOLOGY

[美] 卡伦·霍尔奈著 窦卫霖译

女性心理学



上海文艺出版社

FEMININE PSYCHOLOGY

女性心理学

卡伦·霍尔奈是分析心理学的先驱，她对弗洛伊德关于性心理发展、尤其是女性性心理发展的一些学说提出了异议。在这本文集中，许多文章以前没有英文版本，在女性气质问题上，她注入了敏锐的临床观察，她对自己的假设以及弗洛伊德系统阐述的假设进行了严密的验证。她所讨论的问题包括性冷淡、婚姻问题、一夫一妻制理想的问题、两性之间的不信任、月经前的紧张、女性机能紊乱的心理因素、母亲的冲突、女性受虐狂问题、对爱情的神经质需要等。书中卡伦·霍尔奈始终把她的经历贯穿于治疗之中，同时，贯穿了从文化力量的背景对心理因素的评价。

卡伦·霍尔奈(1885—1952)出生于德国的汉堡，就读于柏林大学，1913年获医学学位，从1914年到1918年她在德国柏林—兰克维茨大学学习精神病学，1918年至1932年教授于柏林精神分析学院。她参加过众多国际会议，其中包括由弗洛伊德主持的对非专业分析家所做的心理分析的历史讨论。

卡伦·霍尔奈于1932年来到美国，担任了两年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的副院长。1934年，她来到纽约，直到1941年一直是纽约精神分析学院的一名教员，其间，她成为精神分析促进协会和美国心理分析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卡伦·霍尔奈的其他著作包括《我们的内心冲突》、《当代的神经质人格》、《精神分析新法》、《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自我分析》、《最后的讲座》及她编辑的《你在思考心理分析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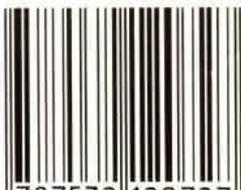
评论

这本论文集反映了霍尔奈的女性心理学的思想以及与弗洛伊德不同的观点。用她自己所谓的女性心理学反对弗洛伊德的男性取向心理学，从此，她为哲学、心理学以及生活和周旋在变化着的环境中的全人类的精神分析做好了铺垫。

在阅读霍尔奈的这些早期论文时，我们看到了一位女士的智慧和在寻找减轻人类痛苦更佳途径中的经验。

——哈罗德·凯尔曼

ISBN 7-5321-2072-4



9 787532 120727 >

定价：18.00元

38
2H

[美] 卡伦·霍尔奈著 窦卫霖译

B844.5

2H872

FEMININE
PSYCHOLOGY

女性心理学



A0842299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权)图字: 09-1999-32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心理学/(美)卡伦·霍尔奈著; 窦卫霖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10 重印

ISBN 7-5321-2072-4

I. 女… II. ①卡… ②窦… III. 妇女心理学 IV. B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4443 号

Feminine Psychology

Copyright © 1967 by Karen Horne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夏青根

封面设计: 王志伟

女性心理学

[美]卡伦·霍尔奈 著

窦卫霖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km.com

总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72,000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501—7,000 册

ISBN 7-5321-2072-4/B·16 定价: 18.00 元

鸣 谢

本书由精神分析促进协会赞助。感谢霍尔奈博士的女儿 BRIGITTE SWARZENSKI、MARIANNE ECKARDT 医生以及 RENATE MINTZ，他们允许本书的出版，并慷慨放弃了全部经济报酬。

特别感谢负责出版本书委员会成员 EDWARD R. CLEMMENS 医生、JOHN M. METH 医生、EDWARD SCHATTNER 医生以及 GERDA F. WILLNER 医生。论文经他们的相互同意后选出，并由他们的合作努力从德语译成英语。每个人都怀着合作和负责的精神完成了各自参与的工作，这一精神为顺利地完成和合作的愉快创造了条件。

我们都深深受惠于我们的文字编辑 LEE METCALFE 小姐，这本书是她提议出版的，并为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前 言

弗洛伊德曾于 1935 年说 他的精神分析工作在 1912 年就达到了鼎盛时期^① 他又补充说：“自从我提出存在着两种本能的设想（恋爱本能和死亡本能）以及提议将人格划分成自我、超我和本我 1923 年以来 再没有对精神分析做出过决定性的贡献。”

卡伦·霍尔奈于 1913 年在柏林获得医学学位 并在那儿接受了精神病学和 精神分析训练。1917 年 她撰写了第一篇精神分析文章。^② 到 1920 年 她已经成为新成立的柏林精神分析学院的一位重要教学人员。1923 年 她发表了有关女性心理学系列论文的第一篇 即收集在本书里的《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

西 格 蒙 德 · 弗 洛 伊 德 《 自 传 研 究 》 载 《 论 文 集 》 第 10 卷 伦 敦 贺 加 斯 出 版 社 ， 1936 年 纽 约 ， W. W. 诺 顿 出 版 社 ， 1952 年 。

② 卡 伦 · 霍 尔 奈 《 精 神 分 析 治 疗 的 技 巧 》 ， 载 《 性 科 学 杂 志 》 第 4 期 （ 1917 ） 。

以 下 卡 伦 · 霍 尔 奈 关 于 女 性 心 理 学 的 论 文 没 被 收 录 在 这 卷 里 ： 《 女 人 的 男 子 气 质 情 结 》 载 《 古 代 妇 科 学 》 第 7 期 （ 1927 ） ， 第 141-154 页 ； 《 婚 姻 的 心 理 适 应 与 不 适 应 》 、 《 选 择 婚 姻 伴 侣 的 心 理 条 件 》 、 《 婚 姻 中 典 型 冲 突 的 心 理 根 源 》 载 《 生 物 心 理 学 》 马 克 斯 · 马 卡 斯 著 柏 林 ， 1927 ； 《 两 性 之 间 的 不 信 任 》 载 《 精 神 分 析 》 第 2 期 （ 1930 ） ， 第 521—537 页 。

弗洛伊德比霍尔奈年长几乎 30 岁。当霍尔奈在走向她一生中最多产阶段前接受训练时 弗洛伊德的创造力巅峰已经过去了 他在 1935 年所作的自我评价中说 部分原因是一场“致命的疾病”开始影响他的生活和工作。1923 年以后 弗洛伊德的兴趣向全方位发展 以最后一部名为《摩西与一神论》的著作 1939 年 达到极点。“在经历了一生漫长的自然科学、医学和精神疗法的迂回道路以后 我的兴趣最终回到了文化问题上 这一问题早在我年轻时就使我迷惑 可那时我太小 还不会思考。”¹

科学和文化理论就像人类一样有自己的节奏 其周期和变化着的兴趣反映在起作用的连续几代人身上。同样 在回顾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时 我们看到 有多种解释行为的不同方法。^② 在此我着重介绍弗洛伊德和霍尔奈女性心理学观点的出现。

一位天才超越自己已建立的世界观的能力是有限的 要花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根本跃进科学新范例^③、形成新的统一的宇宙观。

弗洛伊德是十九世纪的产物。启蒙运动培育了个人尊严和崇尚理性 科学观的方法论造就了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当西方人仍在难以接受日心宇宙观的时候 又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冲击 不久 又要面临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的思想挑战。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传研究》载《论文集》第 10 卷 伦敦 贺加斯出版社，1936 年 纽约 W.W. 诺顿出版社，1952 年。
哈罗德·凯尔曼和 J.W. 瓦尔麦霍森《论霍尔奈的精神分析技巧、发展与展望》载《心理分析技巧》，B.B. 沃曼编辑 纽约 基础书社，1967 年。
汤玛斯·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 159 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第一凤凰版，1964 年。

个人背景的某些方面更直接影响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他出生在奥地利摩拉维亚的小都市——弗赖堡——的一个被放逐的少数人群体，成长在传统的犹太家庭，男人是君主和主人，而女人则是次要的，母亲对他的明显恩宠无疑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父权制的重要性。奥匈帝国和基督教维也纳的衰落，如同他所成长的维多利亚时期那些假正经、清教徒的、虚伪的性道德一样，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作为男性天才，他发展了男性取向的心理学，建立在解剖特征不可变——“解剖构造即命运”的基础之上，十九世纪科学的教规和方法论支持着他的思想。

弗洛伊德说：“精神分析是科学的一个分支，可看作是科学世界观。”事实被视为与科学实验有关的数据，事实可以被观察、测量和具体化，可在有预期结果的反复实验中被控制。这些实验被公开鉴定时，可以检验也许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假设。

十九世纪科学关注的是建立在严格决定论观念之上的孤立封闭系统，在这一体系影响下的精神分析治疗情景中，精神分析家和病人生活的环境被看作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在弗洛伊德实验观察结构中，病人被视为惟一的变量、孤立的客观体，并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一致。

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变得结构宽松多了，允许决定论有不同的情形。同样，在精神分析情景中，环境和病人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相

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新导论》第 181 页，纽约，W.W. 诺顿出版社，1965 年。

互依靠的因素 而且 美学、道德和精神价值在二十世纪科学中占据了中心位置 而在十九世纪科学中这些是不受关注的 因而那时也不参与观察的精神分析方法论之中。

卡伦·霍尔奈出生于汉堡一个中上层阶级基督教家庭 她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圣经读者 母亲是位自由思想家 在她十多岁的时候，卡伦·霍尔奈经历了一段基督狂热阶段 这在当时少女中是很常见的现象。她父亲是挪威海船长 成为德国公民 后来当上了北德罗意德船舶公司的资深船长。霍尔奈年轻时随父远海航行 因此开始了她终身热爱旅游、对新奇和遥远的地方产生好奇的兴趣。她母亲是荷兰人。

弗洛伊德和霍尔奈出生的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弗洛伊德出生时 他的父母生活在受限制的环境里 由于兴起的捷克民主主义反对奥地利统治、捷克人敌视说德语的犹太少数民族 他们的社会地位变得更糟。他的父亲是羊毛商人 当弗洛伊德三岁时 因所依靠的纺织工业的衰退 全家被迫转移到维也纳。他只有十二岁 就体验到他父亲蒙受犹太人屈辱时的 沮丧忍受和缺乏勇气”^①。这种情景一直困扰着弗洛伊德 直到中年他才长大成熟不再需要重复在他头脑中已经破灭了的理想父亲形象。

尽管霍尔奈的很多时间是和父亲在漫长的航海中度过的 但母亲对她的影响更大。因为父亲经常长时间不在家 她更多的时间是和

^① F.G. 亚历山大和塞莱斯尼克《精神病治疗历史》第 186—187 页 纽约，哈珀和罗出版社，1966 年。

精悍、聪明而漂亮的母亲在一起。母亲偏袒她哥哥伯恩特·霍尔奈，尊敬并爱戴他，但在她十五岁以后的生活中他哥哥起的作用却很有限。

霍尔奈在母亲的鼓励下决定当医生。直到十九世纪末女性从医仍然是罕见的。她去柏林接受医学、神经病学及精神分析训练。她选择精神分析家作为终身职业的原因在她作品中只字未提。她是优等生，在班上总是位居榜首。她的能力和人格赢得了教授们和男性同事们的尊敬。

1909年她二十四岁时嫁给了一位柏林律师奥斯卡·霍尔奈，和他生了三个女儿。由于他俩兴趣不和，以及霍尔奈博士越来越投身于精神分析运动，1937年与丈夫离婚。既当母亲又当职业妇女及解决在她看来已毫无意义的婚姻这两个问题，也许促使她对女性心理学越来越感兴趣。然而我觉得，她从事精神分析，对探索的热情以及对临床观察的敏锐更坚定了她的兴趣。作为临床医生，她发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与这些理论运用的治疗结果之间有矛盾，这也激励了她。

霍尔奈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柏林度过的。当时正值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恺撒主权兴衰之际。虽然她肯定受了这些事件的影响，但她对政治的兴趣却很有限。尽管她也一定意识到妇女的不平等地位，但我感到她对女性心理学的兴趣并不是受她对妇女社会地位的观察的很大影响。希特勒的兴起也不是她1932年去美国的决定因素。尽管卡伦·霍尔奈没有转向社会行动是事实，但她对社会事件和

世界形势却了如指掌 并慷慨支持救济组织和自由主义事业。1941 年她清楚地表明了反法西斯的立场 坚信 民主原则与法西斯意识形态截然相反 它坚持个人的独立和力量 并确保个人幸福的权利。”^①

最早分析霍尔奈的 是被弗洛伊德视为最能干的学生之一的卡尔·亚伯拉罕 随后是弗洛伊德的虔诚跟随者汉斯·塞齐思。被这样的忠诚弟子分析似乎更容易坚持弗洛伊德的观点 而不是与此相偏离。

然而 霍尔奈的出身和早期生活经历使她具备了更广阔的视野，她对二十世纪科学的出现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这种兴趣肯定是她成为医生和精神分析家的原因 在柏林学习期间的全球气氛 尤其是剧院的生命力和马克斯·雷哈德导演的作品也激励了她。

她成为精神分析学生的时候 精神分析的基础已经建立 并逐渐被全世界所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聚集到柏林来的男男女女们充满着朝气和才能 随着柏林精神分析学院于 1920 年的成立 精神分析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时期。在那儿接受教育和训练的许多人创立了随后五十年精神分析遵循的基本信条。

到 1923 年“古典精神分析方法”已形成纲要 即以“五个标志性的观点”为特征的心理学。首先是层次论的观点 它断言“精神分析是深层心理学 赋予前意识和无意识心理活动以特别意义。”第二 只能用过去年来理解当前行为。这种起源取向意味着心理现象是“环境经验

卡 伦·霍尔奈《传记》载《现代传记》第 2 卷第 8 期，第 27—29 页，纽约，H.W. 威尔森公司，1941 年。

和生物发展'以及心理一性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三“,动力观点,主张人类行为可理解为本能冲动和反本能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第四“,经济观点 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 即生物被给予一定数量的能量供其随意使用……。”

第五 结构观点 是为这一理论所构造的假说 即把心理器官分成三个独立的结构……本我是人类的本能储存 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基础。……本我被控制在主要程序之下 即与快乐准则同步作用。自我是心理结构的控制装置 起组织和综合作用……。自我和本我意识功能在第二个过程的影响之下。超我是心理装置发展的最新结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结果。所以 在自我中设立了一个新机构 包括对父母的品质和价值的奖励和惩罚 自我理想和良心是超我的不同方面。

“所有神经质现象都是自我正常控制功能不足的结果 导致病症的形成或性格变化或两者兼有。神经质冲突从结构上最好被解释为自我和本我两力之间的冲突……。决定性的神经质冲突发生在童年早期。精神分析治疗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幼稚神经质 这是驱除成人神经质和治疗神经质冲突的核心。’”

1917年 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技巧的原则形成以及《自我与本我》出版前六年,卡伦·霍尔奈就在她的精神分析技巧论文中阐述道:“精神分析能解脱手脚被绑的人类 给予他新臂膀和新腿。不管怎

① R.R. 格林森《古典精神分析方法》载《美国精神病治疗手册》,S. 阿里提编辑,纽约,基础书社,1959年。这篇论文可靠而简明地最新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样 精神分析家已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事实 许多我们认为是生来的东西仅代表成长的阻碍 这一阻碍是可以去除的。” 她的这种成长取向、驱除确信和自由寻求的哲学已经显而易见 本质对她来说并不是生来固定、一生不能改变的 而是具有通过组织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可塑性。所以 到 1917 年 与弗洛伊德的机械冲突的观点截然相反 卡伦·霍尔奈就提出了阻碍的整体论观点^②。

她早年的文章注定会引起那些支持弗洛伊德心理神经质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家们的反对。尽管霍尔奈意识到无意识力量的意义 但她相信 无意识力量的范畴和意义是相当不同的 比如 她认为 动力 这一术语不是指本能与反本能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是把成长的自发力与健康能量的性欲反常之间的冲突看作是疾病。有机体中的能量有一个固定数量这一经济学观点 是十九世纪科学的设想 弗洛伊德认为它也适用于精神分析理论。在牛顿的机械宇宙论中 这一观点运用于孤立、封闭的系统。霍尔奈的思想具有开放系统的多样性 类似于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场论。不管弗洛伊德怎样坚持 他的取向不是生物学 而是基于物质主义的哲学。霍尔奈的取向根源于整体论的有机体哲学 用场关系的观点来看 是环境和有机体相互作用的整体过程。

霍尔奈 1917 年对分成三部分的精神结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解剖学和生物学出发 她提出了人类自发性的设想 对本我的首要性

霍尔奈《精神分析治疗的技巧》，在前面所引用的书中。
凯尔曼和瓦尔麦霍森，在前面所引用的书中。

和破坏性本能提出了责问 她的寻求自由的哲学也对建立在绝对决定论观点之上的快乐—痛苦原则提出疑问。霍尔奈坚信 人变得具有破坏性是因为成长中受阻碍的缘故。弗洛伊德把升华看作是第二个过程 而霍尔奈视之为天生不受阻碍的成长表现 因而 弗洛伊德包括在自我和超我下的功能在霍尔奈的理论结构中获得了新意。

霍尔奈的‘实际情境’观念^① 对只有通过过去才能理解某一特定行为起源的观点提出了疑问 涉及到‘实际存在的冲突和解决冲突的神经质尝试’以及‘他实际存在的忧虑和已建立的对付忧虑的防卫’。^④“实际情境’对加重或减轻正在发生的现实的影响给予了地盘和空间 而起源论忽视了现实影响。

霍尔奈的早期观点包含了许多与弗洛伊德基本理论背道而驰的地方 但这一分歧只有在她后来的系统陈述中才变得明显起来。霍尔奈最早所关心的是弗洛伊德力比多理论和精神性欲发展理论。这本书收集的论文中有反对这些理论的详细阐述。正如我们只能推测 1917 年指导她思维的自身发展的因素一样 我们只能概括那些引导她开始审视弗洛伊德理论 尤其是反映在力比多理论中的起源观点的事件。

在 1917 年的论文发表后 霍尔奈可能决定 在发展论文中与弗洛

哈罗德·凯尔曼和 J. W. 瓦尔麦霍森，在前面所引用的书中。

卡伦·霍尔奈《当代的神经质人格》第 7 章。纽约，W. W. 诺顿出版社，1939 年。

卡伦·霍尔奈《精神分析新法》第 10 章。纽约，W. W. 诺顿出版社，1939 年。

同上，第 7 章。

伊德哲学相距甚远的观点以前先等待一下 她毕竟还是精神分析领域的新手 她的观点还需要几年时间使其逐渐成熟。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当时受到许多精神分析家的批评研究；1923年弗洛伊德进一步发展了力比多理论 包含了双重本能理论。

“在弗洛伊德晚年的一些著作中 他越来越急迫地注意到分析研究中的片面性。霍尔奈补充说：“我倒倾向于这一事实 直到最近，一直是只有男孩和男人的思想才是观察的对象。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精神分析是一位男性天才发明的 几乎所有发展了他思想的人也都是男性。他们更容易发展男性心理学，了解男性发育胜于了解女性，这也就再正确、再合理不过了。”

临床观察似乎与力比多理论相矛盾这一点也激发了霍尔奈早期对女性心理学的兴趣 她对社会哲学家乔治·西梅尔和人类学家作品的兴趣 也许是她热中于女性心理学的进一步原因。很清楚 为了给她整个人生哲学做好铺垫 不得不确切地阐明所谓的男性心理学和女性心理学。

霍尔奈在接受分析训练期间及以后 她所学所用的弗洛伊德性理论是些什么呢 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 1895年 有这样一个前提 性挫折是神经质的直接原因。他确信 幼年变得明显的性冲动 其目的是发泄紧张 其对象是满足这种发泄的人或代替者。在弗洛伊德看来 神经质的人幼年的行为和变态者幼年的行为多有相同 这样的孩子是各种各样的变态者。弗洛伊德扩展了性的概念 包括所有人体的

卡伦·霍尔奈《逃离女性身份》。

快乐 所有柔情和爱情 以及生殖器满足的欲望。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 人的性生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幼儿性特征阶段^① 这一阶段又进一步分成嘴巴阶段、肛门阶段和生殖器阶段 以俄狄浦斯情结为顶峰。第二是 7—12 岁的潜伏阶段 从解决俄狄浦斯情结开始 到建立超我。青春期是第三个阶段 大约发生在 12—14 岁之间 导致成熟性功能、异性选择和性交。

弗洛伊德后来假定力比多是心理能量的主要来源 不仅性感是这样 而且侵略内驱力也是这样 此外 还有一个包括各种性欲阶段的发展过程。他还主张对象选择是由力比多的转变造成的 性欲内驱力可以通过反应的形成或升华得到满足、压抑和处置 处理生物学上决定本能的方法决定了性格结构。他还进一步主张 神经质是幼儿阶段的固恋或回归。

弗洛伊德直到 1923 年才完全系统地陈述“生殖器的最初阶段”^② 因为这是霍尔奈关于女性心理学论文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 我摘录格林森在《美国精神病治疗手册》中所陈述的生殖器阶段基本的概念如下：

生殖器阶段发生在三到七岁 这时男孩和女孩发育不同。

在男孩身上 阴茎敏感的发现导致手淫 通常 对母亲的性幻想

列 本·法恩《弗洛伊德：对他理论的批评性再评价》，纽约，大卫麦肯出版社，1962 年。

西 格蒙德·弗洛伊德《婴幼儿的力比多的性器构造》(1933) 载《论文集》第 2 卷，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3 年。

参与手淫活动 同时 男孩对父亲怀有反抗和敌意。对母亲的性爱和对父亲的敌意反抗同时存在 弗洛伊德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男孩在这个时候发现女孩没有阴茎 通常被他解释为她失去了这个宝贵的器官。对母亲性幻想的罪恶和对父亲的死亡愿望继续搅乱着他的阉割焦虑。结果 他通常放弃手淫 从而最终进入潜伏期。在女孩身上 发现男孩有阴茎而她没有 致使她嫉妒男孩 为此抱怨母亲 其结果是 她放弃把母亲作为首要爱的对象 而转向父亲。阴蒂是她手淫活动的主要地带 阴道是未知的。女孩幻想从父亲那儿得到阴茎或婴儿 并对母亲抱有反抗的敌意。作为通常的规则 她因为害怕失去父母的爱 而慢慢地放弃俄狄浦斯努力 进入潜伏期。^①

虽然弗洛伊德的临床观察总是被高度重视 很少有疑问 但是建立在临床观察基础之上的理论结构却成为众多争论的中心。他常说他的主要兴趣是观察 其次才是治疗。卡伦·霍尔奈的主要兴趣却是治疗 因为这个原因 她作为教师 和指导分析家而被高度评价。她的教学和训练才能表现出临床研究的天生的能力。

格雷戈里·齐尔伯格在讨论霍尔奈的论文《母亲的冲突》^② 时说 其中的一个特征“需要进一步强调”即“临床精神分析。……它

格林森，在前面所引用的书中。

② C.P.奥本多夫《讣告 卡伦·霍尔奈》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2 部分，1953 年。

齐尔伯格的讨论被收在《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第 3 卷（1933）第 461—463 页。

与非常强大而不该流行的技术问题和理论思考的趋势相对立，这些技术问题和理论思考总是太模糊而不说明人类行为的现象”。他强调需要“临床环境中的临床现象的临床观察”。所以“我们再回到永久的临床真理上来 按照这一真理 才有可能从对严重的病理学的个人（不仅是所谓边缘的病人，而且是明明白白的精神病人）的深层分析中获得的知识的启发下，研究普通的和轻微神经质的病人。”

所有这些早期论文都反映了卡伦·霍尔奈热衷于临床分析、仔细收集数据、严密测试弗洛伊德和她自己阐述的设想。她在 1917 年的第一篇论文中说：“分析理论是从观察和运用这一方法的经验中发展起来的。然后理论又反过来对实践产生影响。”^①首先是临床观察 然后才是建立在数据之上的假设。这些假设在治疗情境中被进一步测试时会影响那一过程。霍尔奈对仔细观察和临床研究的兴趣从未有过偏离 从未失去这种研究、测试、修改、变化、抛弃和增加新设想的精神。

她总是从临床数据开始 这样可以先从临床构造转向克分子 指对行为的宏观说明 以区别于从微观的神经细胞的分子活动来解释行为——译者注 的假设 再转入抽象过程的更高层次 互不相连的较小假设汇集成一个通则的更高层次。不支持某一特定阐述的数据用新理论进一步测试和解释。在《女性受虐狂问题》这一严密、理智的论文中 霍尔奈对弗洛伊德提供的有关阴茎嫉妒的数据进行了评论，

卡 伦·霍尔奈《精神分析治疗的技巧》，在前面所引用的书中。

她说：“前面的观察足以建立一个为某一理论所需要的假说……但必须意识到 这一假说只是假说 不是事实 而且作为假说也并非不容置疑地有用。”

霍尔奈对精神分析实证研究的所有方面 随着她的女性心理学理论的发展而展开。在《逃离女性身份》一文中 她已经谈及“我的女性发展理论”在《拒绝阴道》一文中 她使用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女性心理学”这样的术语 与弗洛伊德和海伦娜·多伊奇尖锐地争辩。文中她反复提及“我的理论”并用她的临床数据给予证明。尽管她在《女性受虐狂问题》一文中的目的是批判性地评价受虐狂一词的经典解释 但她把自己的思想发展成为对这一词汇的广泛临床描述。她还思索色情受虐狂问题中文化条件的影响 带着这种包含她自己的心理动力学现象学和文化方法的新视角 她已经着手研究《当代的神经质人格》^① 一文中发展的主题——文化对人（不论性别）冲击的结果。

在本书的第一篇论文《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中 霍尔奈对弗洛伊德声称女性阉割幻觉归咎于阴茎嫉妒本身提出了疑问。她用临床证据做数据 继续解释道 男人和女人在试图掌握俄狄浦斯情结中都常常发展阉割情结或转向同性恋。

在《逃离女性身份》一文中 霍尔奈评述了假设的生殖器阶段阴茎嫉妒概念的延伸 这一概念只考虑男性的生殖器官 把阴蒂视为阴茎。霍尔奈引用了社会哲学家乔治·西梅尔关于我们社会“男性本

卡伦·霍尔奈《当代的神经质人格》在前面所引用的书中。

位‘取向的观念’指出，被假定基本阴茎嫉妒通过归纳推理，满足了“巨大力量”的逻辑。

弗洛伊德男性取向的理论引导霍尔奈“作为女人‘宏’惊奇地发问：母亲身份怎么样？身怀新生命的无比喜悦之意识，以及不断盼望这一新生命出现的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幸福。当婴儿最终出世时的快乐？……”阴茎嫉妒概念企图拒绝和贬抑所有这一切。也许是因为男性的恐惧和嫉妒。霍尔奈把阴茎嫉妒看作不是非自然现象，而是两性之间互相嫉妒和吸引的表达。阴茎嫉妒后来成为病理现象是因为与解决俄狄浦斯情结有关问题的缘故。

霍尔奈博士在《害怕女人》一文中讨论了男人对女人的恐惧。这种恐惧可能是男性取向的阴茎嫉妒概念的部分原因。自古以来男人视女人是邪恶和神秘的，月经期尤其危险。男人企图用拒绝和防御来对付他的恐惧。男人如此成功以至于女人长期忽视了这一点。男人用爱情和崇拜来否认他们的恐惧，通过征服、争辩和贬低女人的自尊来保护自己。

在同一篇论文中，霍尔奈博士强调说，没有理由假设少男把渴望阴茎伸进他母亲的生殖器自然是性虐待狂。每个案例都缺乏具体证据，所以把‘男性’与‘性虐待狂’等同起来是不适合的。同样，把‘女性’与‘被虐待狂’等同也是不充分的。霍尔奈再一次强调需要‘具体证据’。她还揭露了因不严密的推理所造成的破绽。即使在富有经验的分析家中也有很自然地接受这样一个理论的倾向，即女人是被动和受虐待狂的，男人是主动和虐待狂的。这一理论虽未被证实，可建

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观念却普遍流行。

她还认为阴茎嫉妒的概念可能根源于男性对女性的嫉妒。霍尔奈在与女性打交道数年以后开始分析男性。这时她被男性“嫉妒怀孕、分娩、母亲身份、乳房以及吮吸强烈的程度而震惊”。^①

精神分析家、霍尔奈的同代人格雷戈里·齐尔伯格说道：“男人对女人的嫉妒其精神起因比阴茎嫉妒更久远因而更基本。”他补充说：“毫无疑问人们一旦学会给覆盖在一些重要心理学数据上的大男子主义打折扣时，对男人心灵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将获得大量的有启迪作用的数据。”

来自加尔各答市的孟加拉国人、印度精神分析学社（1922年）的创始人、精神分析家鲍斯博士给弗洛伊德写信说：“我的印度病人表现出的阉割症状不像我欧洲案例那样明显。印度男性病人比欧洲人更容易被发掘出想当女性的欲望。……俄狄浦斯母亲常常是结合的双亲形象。”^②作为当代对古代大约公元前5000年的反映，印度教哲学、历史和文化模式产生了对女性的不同态度。那时印度文化是母氏制的，妇女实行一妻多夫，而且能在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行使她们的权利。

马格丽特·梅德感到无文字部落许多男性入会典礼是取代妇女作用的企图，在这样的文化中，精心的拟娩典礼几乎是全球性的，通

《逃离女性身份》本书中。

格雷戈里·齐尔伯格《男性和女性》载《精神病学》第7期，1944年。

^① G·鲍斯《鲍斯与弗洛伊德的通信：1929年4月11日的信》，SAMIKSA, 10(1935)。也参见鲍斯特刊 SAMIKSA (1955)。

过拟娩 男人无需所有伴随的痛苦就得到了妇女产后的地位。^①

在历史上存在着母氏和父氏统治下都很和谐而服从的阶段 比较文化研究揭示了异性之间健康的和病理的嫉妒对方的作用和解剖学属性的实例。普鲁诺·贝丹尔海姆从健康和精神分裂症儿童和无文字部落中青春期典礼的研究中发现 他们对孤僻的本能倾向起着同化而非排除的作用。他的前提是“异性之间相互嫉妒对方的性器官和作用”。除了批评在青春期仪式中以男性取向的否定强调阉割忧虑之外 他还对弗洛伊德估计的“孩子倾向于变态的任性”的纯客观观念提出疑问。他更赞成荣格的多价染色体的观念 这一概念是中性的和能产生多种效果的。

《被压抑的女性情结》一文包含了霍尔奈视性冷淡为疾病 而不是“文明妇女的正常性态度”的理由 她觉得性冷淡之频繁是“个人之上的文化因素”造成的——“以男性为取向的文化”不利于妇女及其个性的发展”。

在《一夫一妻的理想问题》一文中 霍尔奈对抗“支持男人的偏见闲谈”即男人自然有“一夫多妻的意向”。她认为这一说法是没有被证实的断定 性交后可能怀孕的心理学意义是没有数据的 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样的理论 女人性交的冲动是由“可能的生殖本能”所决定的 一旦怀孕 这种冲动就减弱了。

在《月经前的紧张》一文中 霍尔奈提出了这样的假设 女人感到

马格丽特·梅德《男性和女性》纽约 威廉·莫罗出版社,1949年。
普鲁诺·贝丹尔海姆《象征性受伤、青春期仪式、嫉妒的男性》,第10页 纽约 科利尔书屋,1962年。

的种种紧张通过怀孕的生理准备过程而得到直接解除 不管何时出现这样的紧张 她都预感到 涉及希望有孩子的冲突”。霍尔奈进一步陈述道 出现月经前的紧张不是女人基本弱点的表现 而是她此时有孩子的需求引起的冲突表现。她争论说 对孩子的渴望是主要驱动，母亲身份代表了比弗洛伊德假定的更重要的问题。

在《两性之间的不信任》一文中 霍尔奈把注意力集中在不信任的态度上 而不是仇恨和敌对上 尽管这些观念更加普遍。她区别了男人害怕女人 这种害怕与不信任是相对的 和仇恨女人的起源。她从多种文明的文化模式中 从历史和文学的不同阶段中 引用了以男性为取向的对女士的偏见以及这种偏见是如何激发不信任的事例说明了这一点。

这篇论文也反映了霍尔奈把焦点从所谓男性女性心理学转向系统阐述她自己关于神经质性格结构 统治和屈服模式的理论 她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一书中把这一理论解释和表述成 豪爽的 和“自我谦避的”解决方法。

在《婚姻的问题》一文中 她利用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无意识过程和神经质冲突的理论 指出以男性为取向的心理学导致了婚姻中一些不可避免的冲突。丈夫带着许多有关母亲的残留态度走进婚姻 即母亲是令人害怕的圣洁女人 他决不可能令她满意。而妻子带进婚姻的是性冷淡、对男性的排斥 作为女人 妻子和母亲的焦虑 以及“逃进所期望和想像的男性角色之中……”

“婚姻问题是不能通过有关对责任和放弃的警告也不能通过对本能的无限自由的告诫来解决的。它要求的是‘婚姻前双方具有的情感稳定’。过去和目前的婚姻记载中充满了奉献与索取。霍尔奈强调需要‘对对方的内在自制要求 (claim) ……我是指在要求 (demand) 而非希望意义上的要求 (claim)’”。这就是‘神经质要求’的确切定义，她在最后一本题为《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一书中更加仔细地作了定义。

尽管霍尔奈在《害怕女人》一文中讨论了男人对阴道的害怕 其实她在《拒绝阴道》一文中就开始批评所谓‘未被发现的阴道’的记载。弗洛伊德认为少女未发觉她的阴道 她最初的生殖器感觉先集中在阴蒂上 然后才在阴道上。霍尔奈争辩道 从她的亲自观察和其他临床医生观察的证据中发现 少女身上出现自发的生殖器感觉 阴道手淫是普遍的 阴蒂手淫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正是因为女孩身上产生的忧虑 以前已被发现的阴道现在才被拒绝了。

弗洛伊德在《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年)中说，女人不是现在这样的女人 而是缺乏阴茎的男性。她们‘拒绝接受被阉割的事实’抱着‘有一天不顾一切地得到阴茎的希望……我不能摆脱这个概念 尽管我犹豫说出来’女人的伦理正常水平和男人不一样……‘我们不应该允许自己通过否认男女平等主义者来叛离这样的结论 男女平等主义者急切地强迫我们把两性在地位和价值上看作完全平等。’^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载《论文集》第5卷,第186—197页,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56年。

弗洛伊德用这段话结束了这篇文章：“在亚伯拉罕（1921）、霍尔奈（1923）和海伦娜·多伊奇（1925）有关男性气质和女人身上的阉割情结方面有价值的全面研究中，有许多与我所写的有紧密关系，但没有一点完全一致，所以这儿我再次觉得有必要发表这篇文章。能够得到弗洛伊德的回应和评点——尽管是不直接的——是很少见的，这也说明霍尔奈的观点受到了重视。”

弗洛伊德在《论女性的性欲》（1931年）中说：“关于少女发育中的前俄狄浦斯阶段”，与这一最先母亲依恋有关的一切内容在分析中似乎令我困惑……实际上，女性分析家，如金娜·L·格鲁特和海伦娜·多伊奇，表现出能够更容易、更清楚地看待这些事实，因为在与正被研究的病人移情情景中，她们有适合充当母亲代替者的优势。但是弗洛伊德说，卡伦·霍尔奈所发现的（1923年）移情情景中母亲代替者“不完全与他的观点相符。一些作者倾向于贬抑孩子最先、最初的力比多冲动，而更重视后来的发育过程，以致——置这一观点于极端形式之中——前者所做的一切将预示一定趋势，随着这些趋势所追求的能量取自于后来的回归和反应组成。所以，以霍尔奈（1926年）为例，她赞成这样的观点，即我们过分地高估了女孩最初的阴茎嫉妒。她随后对男子气质的奋斗力量应归咎于其次的阴茎嫉妒。这一嫉妒是用来避免自己女性的冲动，尤其是那些与对父亲依恋有关的冲动。这与我自己所形成的感想不一致。”

这么长的批评性的回应暗示了弗洛伊德对霍尔奈观点的重视。即使他有限定语“置这一观点于极端形式之中”我仍然对弗洛伊德有两点疑问。其一“霍尔奈并没有‘贬抑孩子最先、最初冲动的重要性’”其二“她没有推断或论述‘对她们所能说的一切预示有‘一定趋势’；后来的回归和反应组成‘更加重要’。”

从《论女性的性欲》发表到1939年去世，弗洛伊德就此问题没再写什么。在《可终止的分析和不可终止的分析》（1937年）中，他发表了一些有关神经质和治疗的最后观点。他讨论了“女人对阴茎的希望，男人与消极状态的斗争”。他说：“当‘弗兰兹于1927年作为原则规定在所有成功的分析中，这两个情结都必须解决时，他要求得太多了……当我们达到了阴茎愿望和男性抗议时，我们已经透过所有心理学层面，到达根底，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遗弃女性气质一定必须是生理学事实，是性别迷团的一部分。”^①这儿问题留给了弗洛伊德，也留给了他的绝大多数追随者。

弗洛伊德在未完成的《精神分析纲要》的“前言”中说：“这本小书的目的是把精神分析学原理加以归纳，提纲挈领地表述它们……只有在自己和别人身上反复进行过这种观察的人，才能对这一学说作出自己独特的判断。”^②卡伦·霍尔奈满足了所有这些资格条件，在女性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及实践的越来越多的方面，作出了与弗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可终止的分析和不可终止的分析》，载《论文集》第5卷，第255—257页。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56年。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纲要》载《论文集》第13卷，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56年；纽约，W.W. 诺顿出版社。

洛伊德不一致的独特判断。

弗洛伊德在《纲要》中讨论性功能发展时说：“第三个阶段叫做崇拜男性生殖器阶段。……在该阶段扮演角色的是男性生殖器而不包括女性生殖器。女性生殖器长期处于未知状态。”在脚注中他补充道：“常常有人认为女性也会出现早期阴道性兴奋的现象 但很可能这里所说的性兴奋其实是发生于阴蒂的 也就是说 发生于一个类似阴茎的性器官。这一情况并不影响我们将这一阶段描述为崇拜男性生殖器阶段。”

弗洛伊德关于早期阴道性兴奋的论述可能是对霍尔奈的《拒绝阴道》一文的直接回答。在这篇文章中 她运用了这样一些概念论述这个问题 未知的阴道、最初的阴蒂感觉、崇拜男性生殖器阶段、阴茎嫉妒的完整概念。在讨论“分析家之间缺乏一致”时所作的另一评论中他可能甚至更特别地指向她：“……如果一位女分析家对自己的阴茎欲望没有充分信服 因而不能在她病人身上给予那一因素以足够的重视的话 我们将不会感到非常吃惊。”弗洛伊德在《论女性的性欲》^② 脚注中的忠告似乎在这儿很适当：“把分析作为长期争论的工具来使用显然引导不出任何结论。”

霍尔奈在《女性机能紊乱的心理因素》一文中引用了“一方面精神的性生活失调 另一方面女性功能紊乱的巧合”接着提出这种巧合是否有规律地存在。根据她的观察 这些身体因素和感情变化之间

西 格 蒙 德 · 弗 洛 伊 德 《 精 神 分 析 纲 要 》 。
弗 洛 伊 德 《 论 女 性 的 性 欲 》 ， 在 前 面 所 引 用 的 书 中 。

没有规律存在。然后她转向第三个问题 在心理性生活方面的某些精神态度和某些生殖失调之间有没有具体的交互作用？

霍尔奈继续受弗洛伊德的一些观念的指导 但给予她自己的解释 这就是《母亲的冲突》(1933年)一文中的证据。她在文中说：“我们的基本分析观念之一是 性欲起源于出生时 而非青春期 因此 早期爱情总带有性的特征。正如我们在整个动物王国中所看到的 性欲意味着不同性别之间的吸引。……由此产生的冲突归咎于与同性父母的竞争和嫉妒的因素。在霍尔奈的整体方法中 吸引是生物学的、自然的、有益的和自发的。

霍尔奈对文化因素越来越浓的兴趣在她 1933年写的《母亲的冲突》一文中特别明显。她刚到美国不久就敏锐地意识到 在类似问题上她在欧洲的经历与美国形成对比。“美国的 父母……对孩子的反对感到惊慌……他们担心是否给予孩子合适的教育和训练。”

真实的科学调查可以具有前后移动、从特性和观察到的数据到假设相互之间不断被核实和测试的特征。不同的数据范围被共同点和差异孤立开来 相似数据组的复发在医学上被称作综合症状和情结。当一个特定原因能够与一个复发调查结果的特定组肯定地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这种效果就叫做疾病本质。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里都有一种被称做类型的复发共同点 高度发展了就是类型学的方法论。

在《过高重视爱情——对当今一种普通的女性类型的研究》一文中 霍尔奈明确地运用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论以及类型学。她看

到个人和环境作为一个单一的移动领域相互影响。总而言之 她在文中描述的妇女“女子气类型”是由同等重要的一定本能要求和文化因素形成的。霍尔奈进一步断言“母氏制理想”是由文化决定的 不是不可变的假设事实。

在《女性受虐狂问题》一文中 霍尔奈反对从弗洛伊德理论推论出的一些未经证实的假设——也就是“受虐狂现象在女人身上比男人多”因为它们“是女性天性的最本质的遗传和血统”女性受虐狂是“解剖性别差异的一个心理结果”。这篇文章反映出霍尔奈对此问题的详细文献知识、推理的严密和清晰以及对临床研究和人类学探索的理解。她评论了精神分析不能回答女性心理学的许多问题的一些原因 然后她提出了人类学家在寻找男人和女人身上存在的受虐狂倾向数据时应遵守的原则。

她再一次对弗洛伊德的假设提出疑问 即在病理学和“正常”现象之间没有根本区别“，病理学现象仅仅像放大镜一样更清楚地反映出在所有人类身上发生的过程”。在弗洛伊德把本我“破坏性的”本能看作是基本、自然和正常的前提下 病理学现象就只是与正常现象在数量上的差别了。但是 对霍尔奈而言 病理学不是健康的夸大 而是转向截然不同的类别——也就是疾病。弗洛伊德把他的人性理论视为全球性的、对行为的惟一解释——对维也纳中产阶级的少数抽样调查真实的东西对跨时空的一切人类来说也是真实的。同样的方法论错误也出现在弗洛伊德以下的争论论点中 俄狄浦斯情结是无所不在的人类现象。而人类学的研究却表明 俄狄浦斯情结在“截然不

同的文化条件下是不存在的。”为回答弗洛伊德关于女人通常比男人更嫉妒的假设 霍尔奈自己的前提是“这一说法仅就现在的德国和奥地利文化而言可能是正确的。”

在《女性青春期的个性变化》一文中 霍尔奈讨论了她对成人妇女分析的一些观察。她说：“尽管在所有案例里 决定性的冲突来自于童年早期 但是最初的个性是在青春期变化的 而且 变化的开始大约与月经初次来潮同时发生。”然后 她区分了四类妇女 解释了在她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中涉及的心理动力。

在《对爱的神经质需求》一文中 霍尔奈把正常的、神经质的和自发的爱区分开来 描绘了强迫的特征与自发不同。虽然对爱情的神经质需求可以看作是‘母亲依恋’的表示”但霍尔奈认为弗洛伊德的观点对动力因素的根本问题没有搞清楚 这一动力因素在后来的生活中保持着童年获得的态度 或使得幼儿的态度不可能放弃。在《女性受虐狂问题》中霍尔奈就已经说过：“十分强调童年印象的固执是弗洛伊德的一个伟大的科学成就 然而 精神分析的经验也显示出，童年曾经发生的情感反应如果继续有种种重要的动力驱使才能保持终生。她的这一对过去的影响及现在的清晰而严密的立场 毫无疑问与弗洛伊德在《论女性的性欲》中的阐述不和。

再则 霍尔奈在《对爱的神经质需求》中还 对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提出质询。弗洛伊德把‘增长了的爱情需求’视为‘力比多现象’。霍尔奈觉得这一观念没有得到证实 她补充说：“对爱情的神经质需求可代表口恋或‘回归’的表示。这一观念的先决条件是愿意把

复杂的心理学现象降低为生理学因素。我相信这一假设不仅站不住脚 而且使对心理现象的理解变得更困难。”

通过对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和依恋及回归概念的批评 通过强调生活和人类自发性的重要性为治疗手段 霍尔奈反驳了弗洛伊德的反复冲动的理论。以‘发展的障碍’代替‘抵抗’、‘依恋’和‘回归’的概念 与弗洛伊德的反复性冲动和严格决定论概念形成了直接对抗。

在这些早期的论文中 霍尔奈就表现出她是一位现象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存在、拥有和行动的本体论区别在《害怕女人》中给予了表述：“现在性别生理危机的危机之一是男人实际上被强迫去向女人不断证明其男性身份 对女人来说却没有这种可比拟的必要 即使她性冷淡也能参与性交、受孕和生育孩子 她只按照存在的方式去扮演角色 没有任何行动……这是令男人充满羡慕和愤怒的事实。在另一方面 男人必须做些什么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抱负。‘有效率’的理想在男性统治的西方世界里是一个典型的男子气理想。‘男性统治的西方世界是以物质、机械和基于被划分为主客观相对的领域的行为方向的。

从存在主义来说，有一个交叉汇合点，实体论的你我关系中的冲突，包括性交在内的任何形式的交往中都有交叉汇合，在这一汇合点上人格的首要性与西方观点是不相容的。在这本书以及霍尔奈后来的作品中，存在主义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发展。

存在主义的观点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古代中国的阴阳哲学里，男性和女性原则上被看作是自然而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只有男女处于平衡状态，生活才能和谐。作为不同的自然表现被接受了，这种差异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构成了联合、团结、丰富的基础。这一取向与西方的弗洛伊德男人取向是大相径庭的，后者把阴茎嫉妒和男性对被动感情的抵抗看作是生理决定的。

在《对爱的神经质需求》中，生物忧虑，一种人类的普遍现象和明确的存在概念，构成了霍尔奈的基本焦虑观的核心，其组成部分是世间的无助感和孤立感，这些被视作潜在的敌意。健康人和神经质之间的差别在于，神经质中基本忧虑的量增加了。神经质也许意识不到自己的焦虑，但以许多方式表现出来，并设法躲避自己的感情。

这本论文集反映了霍尔奈的女性心理学的思想以及与弗洛伊德不同的观点。用她自己所谓的女性心理学反对弗洛伊德的男性取向心理学，从此，她为哲学、心理学以及生活和周旋在变化着的环境中的全人类的精神分析做好了铺垫。

在阅读霍尔奈的这些早期论文时，我们看到了一位女士的智慧和在寻找减轻人类痛苦更佳途径中的经验。她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一书的结束语中，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种精神方法和努力，这些不仅反映在这本集子的论文中，而且反映在她一生的作品里：“阿尔伯特·史威兹在‘肯定世界与生活’和‘否定世界与生活’的意义上运用了‘乐观’和‘悲观’这样的术语。弗洛伊德哲学从其深层意义看是

悲观的，而我们的哲学虽然承认神经症的悲剧因素，却仍属乐观的。”

哈罗德·凯尔曼

于纽约

1966年

前言	1
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	1
逃离女性身份	
——男女对女性身上男性气质情结的看法	22
被抑制的女性情结	
——性冷淡问题的精神分析	43
一夫一妻制理想的问题	62
月经前的紧张.....	84
两性之间的不信任	94
婚姻的问题	109
害怕女人	
——观察男女对异性恐惧的具体差别	127
拒绝阴道	
——对女性生殖器焦虑问题的贡献	146
女性机能紊乱的心理因素	163
母亲冲突.....	178
过高重视爱情	
——对当今一种普通的女性类型的研究	187
女性受虐狂问题.....	230
女性青春期的个性变化	254
对爱的神经质需求	268

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①

虽然我们对于假定的女性阉割情结的几种形式，已经有了越来越全面的认识，^② 但我们关于整体情结本质的调查却没有取得相应的进展。我们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对于这些资料我们已很熟悉，现在，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整个现象值得注意的特征。所以，现象本身就成为一个问题。有人对迄今为止所观察到的女性阉割情结的假定形式，及从女性中不言而喻获得的推论作了一个调查。调查表明，迄今为止，流行的概念是基于某一基本的观念的，这一观念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部分内容我是逐字逐句地引用亚伯拉罕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许多女性 既有儿童也有成人 暂时或

① 1922年9月柏林第七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的论文，《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德文第9期（1923）第12—26页；《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5期，第一部分1924）第50—65页。获《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的许可再版。
特别参见亚伯拉罕《女性阉割情结的表现》（1921）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3卷第1页。

长期地被她们的性别事实所困扰。在女性心理生活中引起拒绝做女性的现象可追溯到当她们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们对于阴茎的向往。这种具有天生缺陷的不愉快的想法，导致了消极的阉割幻想，而积极的幻想则引起了对受到偏爱的男性的一种报复的态度。

在这一系统阐述中，我们假定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即因为女性没有阴茎生殖器官，而使她们感到身处不利。不把这一事实本身看作是问题的一个构成部分，或许是因为对于男性气质自恋来讲，这好像是昭然若揭而无需解释的。不过，迄今为止，从调查中所得到的结论——总计人类中一半的人对其性别的分配不满，并且只有在有利的环境中才能克服这种不满——不仅对于女性自恋而且对于生物科学来讲无疑是令人不满的。因而，问题就出现了：女性中所遇到的阉割情结不仅导致精神病的发展，而且影响性格形成以及正常的女性的命运。这种阉割情结的形式仅仅是出于其对阴茎向往的不满，这是否真的是事实？或者也许这只是由其他力量（大部分如此）提出的一个借口？而这种力量的动力，我们已从我们对精神病的形成的研究中有所了解。

我认为这个问题会从不同的侧面受到攻击。在此，我只想纯粹从个体发生的角度提出某些看法，希望对解决问题有所贡献。而这些看法是我在与病人多年的接触中逐渐

产生的。这些病人中大部分是女性，并且总体上来讲她们的阉割情结是非常明显的。

根据当前流行的观点，女性中的阉割情结完全集中在阴茎嫉妒情结中；男性气质情结实际上是作为同义术语而被使用的。那么，出现的第一个问题是：即使当事人没有一种男子气的生活方式，生活中没有偏爱的哥哥以产生这种可感受的嫉妒，女性经历中也没有“偶发灾难”以引起好像更理想的男性角色，我们如何能够观察到作为一种几乎一成不变的典型现象而发生的这种阴茎嫉妒呢？

在这里，更为重要的好像是引起问题的事实：一旦问题被提出，那么答案就几乎是自发地从我们完全熟悉的材料中浮现出来。假定我们把阴茎嫉妒以可能更频繁地直接表现自己的形式作为出发点，即，想要像男人一样小便，那么对这一资料的重要审查就会发现，这种欲求是由三个成分组成的，有时其中一个有时另一个是更重要的。

我能把它最简洁地表述为尿道性欲，因为这一因素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对此已有足够的重视。如果我们要从产生嫉妒的各种原因中作出判别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必须强调自恋高估的作用^②。自恋高估中，排泄过程是由儿童所

参见弗洛伊德《童贞的禁忌》，载《小型论文集》第4卷。

参见亚伯拉罕《梦和神经症中对排泄过程的自恋高估》，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德文，1920）。

控制的。全能幻想，尤其是有性虐待狂的幻想，事实上更易于男性尿液的喷射有关。作为这种想法的一个例子——这仅仅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我可引用别人告诉我的关于一个男子学校的一个班级的一些事情：当两个男孩小便交叉成一个十字时，他们就说，他们在那一刻所想到的人将死去。^①

在很小的女孩子身上，必定会有与尿道性欲相关的一种强烈的身处不利的感觉出现，即使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正像至今为止我们在许多部位所看到的那样，如果我们把每一个症状及想像男人一样小便的每一个幻想都马上归因于此，那么，由这一因素所引起的作用显然被夸大了。相反，源于并保持这一想法的动力常在其他本能部分被发现——尤其是在主动和被动的偷窥癖中被发现。这种关系源于正在小便时的情形。在小便时，一个男孩能够展示他的生殖器并能看着自己，甚至允许这样做，至少就其本身而言，每次他小便时，他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自己对性的好奇。

根植于偷窥癖本能的这个因素，在我的一个患者身上

编者注：在本世纪早期，更经常玩这个游戏的是那些处于青春前期及早期、其父母是欧洲人的男孩。他们站成直角，用各自的尿液在地上划成十字形，同时，集中思想在一个特殊的人身上，并努力希望这人死去。这种经历充满着魔法和权力的气氛，这些魔法和力量来自于思想的魔法和男性生殖器的力量，并且像尿液一样由阴茎的伸展而得到增加。十字形的意义由于其宗教含义及 x 作记号标示地点的重要性而得到增加。

尤为明显。想像男性一样小便的欲望短时期内占据了她的整个临床情境。这一期间如果她不宣称她曾看到一个男人在大街上小便，她就很少来作分析。有一次她非常自然地叫道：“如果我可以向上帝要一件礼物，那将只能是像男人一样小便一次。”她的联想超出了所有怀疑的可能，而使得这一想法变得完美：“那时我将知道我真正是如何被造出来的。”男人小便时能看到自己而女人不能，这一事实在这个患者身上实际上是她的非常突出的阴茎嫉妒的重要根源之一。这一患者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滞留在前生殖器阶段。就像男性对女性隐蔽的生殖器感到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一样，男性由于其生殖器的可见性，对女性来讲恰恰成为一个强烈的嫉妒对象。

尿道性欲与偷窥本能间的密切联系在另一个患者身上也很明显。这位患者我称之为 Y。她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即像她父亲一样站着小便，来进行手淫。在这个患者所遭受的强迫性神经症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偷窥本能；由于有手淫时被别人看见的念头，所以她有非常严重的焦虑感。因此，她表现出一种倒退到小女孩的想法：我希望我也有一个像我父亲那样的能够在我每次小便时显示的生殖器。

而且，我认为这一因素在所有表现出言过其实的窘迫和女孩的过分拘谨的案例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我进一步推测，至少在我们文明民族中，男性与女性穿着上的差异可

追溯到这一原因——女孩子不能展示她们的生殖器，所以谈到她们的展示倾向，她们已退缩到一个整个身体都适合显示自己的欲望的阶段。这使我们发现一个女性为什么穿着领口很低的衣服，而一个男性却穿着礼服大衣。我还认为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当人们讨论男女之间的差异时总是首先被提到的那种标准——也就是说，与男性的比较客观相比，女性是比较主观的。因为男性想去调查研究的冲动在检查自己身体时找到满足，这种冲动结果可能或者必定被指向外部物体，而另一方面，女性不能够清楚地认识她自己的身体，所以发现很难摆脱自己。

最后，我所假定的阴茎嫉妒的原型有另一个因素，即，被抑制的手淫的愿望。这种愿望通常被深深地隐藏起来，但是仍然非常重要。这种因素可以追溯到一种观念的联结（这些观念大部分是无意识的），这种观念联结将男孩小便时允许握住他们的阴茎解释为允许手淫。

于是，一个目睹一位父亲因其小女儿用小手抚弄她身体的那一部分而责骂她的患者，愤愤不平地对我说：“他禁止她那样做但他自己每天都要做五六次。”在患者 Y 的案例中你将会容易地发现同样的观念联结，对 Y 来讲，以男性的方式小便成为其进行手淫的方式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且在这一案例中，只要她无意识地坚称她应该是一个男性，那她就不能完全摆脱手淫的压力。

这一点很明显。我想，我从这一案例的观察中所得出的结论是非常典型的：女孩在克服手淫方面有非常特殊的困难，因为她们认为由于身体的构成不同而禁止她们做男孩所允许做的事，这是不公平的。或者，就面前的问题而言，我们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来考虑并假定身体构成的差异容易引起受伤害的感觉，所以，后来用于说明拒绝成年女性身份的理由，即男性在他们的性生活上有较大的自由，确实是基于儿童早期的实际经历。凡·奥菲尤森在其关于女性中的男性气质情结的研究结论中强调，他对男性气质情结、幼儿的阴蒂手淫及尿道性欲相互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的分析，有深刻的印象。我的分析为这种关系提供了理由。

我们对为什么阴茎嫉妒是典型事件这一最初问题的答案的思考，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小女孩的自卑感（正像亚伯拉罕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一样）绝不是最初的感觉。但是与男孩子比较，她容易受到关于满足某种本能条件的可能的限制，这种本能条件在前生殖器时期是最为重要的。实际上，从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儿童的观点来看，与男孩关于某种满足的可能性相比较，女孩处境不利。如果把这作为一个真正的事实来讲，我想我可以将事情表述得更准确。因为除非我们对于这种不利的现实非常清楚，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阴茎嫉妒在女孩生活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并且只能使女性发展恶化。以后，当她成年时，性生活

的大部分（关于创造力或许比男性更大的部分）转向女性——我的意思是当她成为一位母亲时——这一事实并不能对处于早期阶段的小女孩有任何补偿，因为这仍然处于她能直接满足的可能性之外。

在这里，我将中止这种思考方向，因为现在我要谈第二个更为广泛的问题：我们刚才讨论的情结真的依赖于阴茎嫉妒吗？阴茎嫉妒是被认作该情结的最终力量吗？

将这一问题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我们不得不考虑什么因素决定着阴茎情结是否成功地被克服，或者决定它是否变成退缩性防守以致出现固恋，对这种可能性的考虑迫使我们更密切地审查在这种案例中对象力比多的形式。于是我们发现，想变成男性的欲望常常非常明显的女孩和妇女们，在她们生命的早期已经经历了一个非常强烈的父亲固恋时期。换句话说，她们首先通过保持其对母亲的最初的认同以正常的方式把握俄狄浦斯情结，并且像母亲一样，把父亲作为爱恋对象。

我们知道在这一阶段，女孩可以以两种可能的方式克服阴茎嫉妒，并且不会伤害她自己。她可能从对阴茎的自淫自恋性欲变成女性对男性（或父亲）产生的性欲，准确地说，是由于她自身对于她母亲的认同；或者变成想要小孩的实质欲望（经过父亲）。关于后来健康的以及不正常女性的爱情生活（甚至在最有利的案例中），任何一种态度的起源

在性格上都是自恋的以及占有欲的本质，对此作出反映是有启发性的。

很显然，在这样的案例中，女性及母性心理在发展。对于患者 Y 来说，与其他所谈到的案例一样，精神上忍受着阉割情结的压力，有许多关于强奸的幻想，这是这一阶段的表现。她所想像的强奸她的男性完全是一个明显的父亲的形象；所以，这些幻想必须解释为一种最初幻想的难以抑制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患者在直到后来的生活中仍然感觉自己步妈妈的后尘，和她一起将父亲的整个性行为占为己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在其他方面非常清醒的患者，在分析的开始就非常倾向于将这种强奸幻想当作真正的事实。

其他的案例也以另一种方式显示了相似的对于这种想像的执着，即把这种最初的女性幻想当作事实。从另一个我称之为 X 的患者那里，我听到无数的谈论。这些谈论充分地表现了 X 把这种与父亲的爱关系作为真实的“事实”。例如，有一次，她回忆她的父亲怎样唱了一首情歌给她听，并且，随着回忆，她发出一种幻想破灭及绝望的大叫：“可这完全是在撒谎！”在她的其中一个症状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在这里我想引用它作为全体类似群体的范型。有时她被要大量吃盐的冲动所控制。在患者儿童时期，她看到母亲由于肺出血而被迫吃盐，她无意识地将其解释为这是她父母性交的结果。因此，这种症状代表她无意识地

宣称她像她妈妈一样从她父亲那里经历了同样的感受。正是这种想像使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妓女（实际上她是个处女），并且使她觉得有一种迫切的需要，要向她的任何新的爱恋对象做某种坦白。

在早期阶段——作为种系发生的经历在个体身上的重复——儿童在一个对其母亲（恨或爱）的认同作用的基础上，幻想将父亲的全部的性爱据为己有；并且在幻想中，这种感受进一步表述得像真的发生过一样——好像是一个在遥远的时代确凿的事实，那时，所有的女性最初都是父亲的财产。对这一类症状大量无误的观察，表明了认识到这些情况是多么重要。

我们知道这种爱的幻想的必然结果是被现实所否认。在随后由阉割情结所控制的案例中，这种挫败常变成一种极深的失望，在神经症中留有深深的痕迹。这在现实感的发展过程中就会出现几乎是大量的干扰。人们常有这种印象，对父亲的这种依恋的感情过于强烈而不承认对这种实际不现实的关系的认识；在其他案例中它又好像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极端的幻想力，使得它难以准确地把握现实。最终，与父母的真正的关系常常并不幸福，从而导致了一种幻想的执着。

这些患者感到好像她们的父亲真的曾是她们的情人，并且后来对她们不忠或者抛弃了她们。有时这又是怀疑的出发点：我只是在想像整个事情吗？这是真的吗？对于过一

会儿我将要谈到的一个患者 Z，这种怀疑态度暴露在反复的冲动中。无论何时一个男性表示被她所吸引，她就会表现出焦虑，害怕她可能只是在幻想对方的喜爱。即使她实际已订婚，她还不断地宽慰自己整个事情不仅仅是她的想像。在一个白日梦里，她想像自己受到了一个男性的攻击，她击中他的鼻子而将他击倒，用她的脚踩住他的阴茎。她继续幻想，她希望对他提出指控但又克制住了，因担心他会声称这一场景是她想像出来的。在谈到患者 Y 时，我曾提到她对于自己的强奸幻想的真实性感到怀疑，并且，这种怀疑与她对父亲的早期感受有关。在她身上有可能找出从这一点出发，影响到她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真的成为其强迫性神经病的怀疑方式。在她的案例中，像其他许多案例一样，怀疑的起源比我们所熟悉的关于病人性别的不确定性有更深的原因，分析过程可能证明这一点。^①

患者 X 常陶醉于早年生活的种种回忆，称其最早期的生活为童年的天堂。在她的记忆中，这种失望与其五六岁时她父亲强加于她的不公正的惩罚有密切的关系。当得知有一个妹妹出生时，她感到她的父爱受到了妹妹的排挤。像较深的地层被揭开一样，很明显在对妹妹的嫉妒背后存在着对母亲的强烈的嫉妒，这首先是与母亲的多次怀孕有关。“妈妈总是有小孩。”她曾愤愤不平地说。更为强烈地

弗洛伊德把怀疑解释为对病人爱（恨）的能力的怀疑。

受到抑制的是她感到父亲对她不忠的两个深层原因（决不是同等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对母亲的性嫉妒，这始于她目睹父母性交之后。那时她对现实的辨别力使她不可能把看到的和将自己作为父亲情人的幻想结合起来。是她一次误听我的对话使我找到了她感情的最初来源。一次当我说到“nach der Enttäuschung”（失望之后）一词时她却听成了“Nacht der Enttäuschung”（失望的夜晚）并且联想到在特里斯坦（Tristan）和伊索尔达（Isolde）做爱的夜晚，布朗嘎纳（Brangane）一直在守夜。

这位患者的反复冲动非常清楚地表明：她的恋爱生活中的典型经历是，首先她和一个父亲的代替者恋爱，然后发现他不忠。关于这类事情，情结的最终原因变得显而易见：我暗指她的内疚感。当然，这类感情相当大一部分将被解释为最初对父亲的谴责，然后转向对自己的谴责。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内疚感，尤其是源于想除掉母亲的强烈冲动的内疚感（对此患者来说，这一自居作用是“除掉她”和“代替她”的特殊表示）在她期待与父亲的关系的灾难时就已经产生。

我特别想强调在这一案例中我所接受的关于想要有一个孩子（来自父亲）的重要性的深刻印象。^① 我强调这一点

参见奥托·兰克的论文《性变态与神经症》，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4卷第3部分。

的原因是，我认为我们容易低估这种愿望的无意识的力量，尤其是其力比多特征，因为与许多其他性冲动相比，自我后来更易于同意这一愿望。它与阴茎嫉妒情结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众所周知，从对阴茎的向往，母性本能得到了“无意识力比多的加强”，^①论及时间的话，这种向往很早便有了，因为这属于自我淫荡时期。然后，当小女孩经受在与父亲的关系中所描述的失望时，她不仅正式放弃将他据为己有的愿望，而且也放弃想要小孩的愿望。这被属于肛门阶段的想法及对阴茎的以往的要求回归性地继承（与影响综合体的因素一致）。当这发生时，那种要求不只是复苏，而且由于女孩想要一个小孩的能量使其得以加强。

我在患者 Z 的案例中看到这种关系尤为明显。在强迫性神经症的几个症状消失后，Z 保留的最后的并且最固执的症状是对怀孕及生小孩的逼真的恐惧。决定这一症状的经历证明是她 2 岁时，她母亲怀孕并生了一个弟弟，而一直持续到她不再是婴儿时对父母性交的观察，也产生同样的结果。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案例好像是不可思议地计划好的来说明阴茎嫉妒情结的中心要点。她对于（她弟弟的）阴茎的向往以及对于弟弟作为入侵者将她从惟一的孩子的地位驱逐出去的强烈的愤怒，一旦通过分析被揭示，就经过矫饰而进入意识。而且，嫉妒伴有我们经常从根子上看到的

参见弗洛伊德《论肛门情欲的本能解释》，载《小型论文集》第 4 卷。

所有表现：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由于对阉割的强烈的幻想而对男性的报复的态度；拒绝女性任务及职能，尤其是怀孕；进一步是强烈的无意识的同性恋倾向。只有当分析深入到最大的可想像的反抗底层时，阴茎嫉妒的原因才变得明显，这个原因是由于对她母亲而不是她从她父亲那里得到小孩的嫉妒。于是经过转换过程，阴茎取代孩子而成为嫉妒的对象。同样，她对弟弟的强烈的愤怒实际上是指向她的父亲和母亲。她感到父亲欺骗了她，是母亲，而不是患者自己有了孩子。只有这种替换被放弃，她才真正从阴茎嫉妒及渴望成为男性中解放出来，她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甚至想要自己的孩子。

这一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呢？这一过程大约可以描述如下：(1)关于孩子的嫉妒被转移到弟弟及其生殖器；(2)继而明显发生了弗洛伊德所发现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父亲作为爱恋对象被放弃，对象关系回归性地由对他的认同所代替。

后一过程在我已经说过的那些她自命的男儿气概中表现出来。人们很容易证实她要成为一个男人的想法决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被理解，而她声称的真正含义是扮演父亲的角色。这样，她采纳与父亲相同的职业。他死后，她对母亲的态度是一种丈夫要求妻子及发号施令的态度。一旦她打了一个很响的嗝，她不禁就会很满意地想：“很像爸爸”然

而她并没有完全完成同性恋对象的选择：对象力比多的发展倒似乎完全被扰乱，并且结果是对自淫自恋阶段的一种明显回归。总之，儿童对兄弟及其阴茎的嫉妒的替换，对父亲的认同以及回归至前生殖器阶段，所有这些都向着同一个方向运作——激起有力的阴茎嫉妒，这样阴茎嫉妒就保持在最显眼的位置，好像统治着整个局面。

在我看来，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在阉割情结很明显的案例中是典型的。所发生的情况是，对母亲认同的阶段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对父亲认同的阶段，同时，回归至前生殖器阶段。我认为这种对父亲认同的过程是女性阉割情结的一个根源。

在这一点上，我想立刻回答两种异议。一种可以这样说：“这种在父母之间的摇摆并没有什么特别相反在每一个小孩子身上都可看到。我们知道，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我们每个人的力比多一生都在男性和女性对象之间摇摆。第二种异议关系到与同性恋的关系，可表述为：弗洛伊德在关于一个女性同性恋案例的精神起因的论文中，使我们相信这样一种向着对父亲的认同的发展是明显的同性恋的基础之一。而现在我却仍然在描绘造成阉割情结的同一过程。作为回答，我将强调这一事实，即正是弗洛伊德的这篇论文帮我理解了女性的阉割情结。一方面，正是在这些案例中，力比多正常的摇摆程度从量的观点来看大大地被超

出，而另一方面，对父亲的爱的态度及对其认同感的压抑并不像在同性恋案例中那么完全有成效。所以，这两种发展情况的相似性并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它对女性阉割情结的意义，相反，这种观点使得同性恋成为并不孤独的现象。

我们知道在每一个阉割情结占优势的案例中，没有例外，多多少少都有一种明显的同性恋趋势。扮演父亲的角色也总是相当于在某种意义上对母亲的渴望。在自恋回归和同性恋对象的精力投入之间的关系中，也许有多种可能的相关程度。所以，未受阻碍的连续性以明显的同性恋达到巅峰。

这里又出现第三种批判。这种批判与阴茎嫉妒的时间和因果关联相协调：难道阴茎嫉妒与对父亲的认同过程的关系不正好是这里所描述的对立面吗？难道不可能是为了建立这种对父亲的永久的认同而首先必须有一种不寻常的强烈的阴茎嫉妒吗？我认为我们不能不认识到一种特别有力的阴茎嫉妒（无论它是体质上的还是个人经验的结果）确实有助于为改变准备道路，这样，患者就会认为自己与父亲相同。然而，我所描述的这些案例以及其他案例的经历，都表明尽管阴茎嫉妒——一种强烈而完整的对父亲的温柔的爱恋关系已形成，那只是当这种爱恋令人失望时，这种女性角色才被放弃。这种放弃及随后对父亲的认同作用使阴茎嫉妒又复活。只有当它从诸如这些有力的源泉中获得营养

时，那种感情才能全力投入。

因为厌恶对父亲将产生的认同，现实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被唤醒，这一点是基本的。所以，小女孩势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以一种想像她对阴茎的渴望得到实现来满足自己，而现在她将开始默想她没有那一器官或想像它可能存在。这些想像的趋势由这个女孩的整个感情的天性所决定；它以以下典型态度为特征：一个女性对父亲并不完全沉默的爱的依恋，由于对他的失望而产生的对他强烈的愤怒感和报复感，在缺损的压力下所强烈引起的内疚感（关于与他乱伦的幻想）。这样，这些想法一直针对着父亲。

这一点我在患者 Y 身上看得非常清楚。患者 Y 我已不止一次地提到，我说过这个患者幻想强奸——她认为那些幻想都是事实——这些最终都与其父亲有关。她也已经到了将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与父亲等同的地步，例如：她对母亲的态度完全是一种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态度。如此，她曾梦见父亲受到一条蛇或野兽的攻击，她马上救了他。

她想像她的生殖器部位长得不正常，并且她有一种好像生殖器受过某种伤害的感觉，她的阉割幻想与此想像的形式相类似。基于这两点，她产生了许多观念，主要大意是：这些特有的想法是强奸的结果。实际上，很明显，她固执地坚持与其生殖器相联系的这些感觉和想法以用作证明这些暴力行为的现实，因此最终证明她与父亲的爱恋关系

的现实。在分析前她曾坚持接受 6 次剖腹手术，其中几次仅仅是由于她的痛苦而进行的。这一事实使我们最清楚地看到幻想的重要性以及她所承受的强迫性重复的压力。另一位患者对阴茎的向往采取了一种绝对荒诞的形式。她的这种曾受过创伤的感觉转换到其他器官上，因此，当她的强迫症被解决了以后，临床情形成了明显的忧郁症。在这一点上她的抵制采取了以下形式：“对我分析明显是荒唐的因为我的心脏、我的肺、我的胃和肠显然是器质性病变。”在此她非常强烈地坚持她的幻想是事实，以致有一次她差一点强迫进行肠手术。她的联想总是产生一些她因病而受到她父亲的伤害的想法。实际上，这些忧郁症好转时，被伤害的幻想成为其神经症的最突出的特征。对我来讲，仅用阴茎嫉妒情结来解释这些现象，想要令人满意似乎是极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现象当作一种冲动作用再重新经历一次，根据一种强迫的模式，因父亲而遭受的痛苦并向她自己证明痛苦经历的现实，那么，它们的主要特征就变得非常清楚。

这种资料的展示可能无止尽地增加，但它将只是重复表明，我们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遇到了在与父亲爱恋关系中曾遭受阉割的基本的幻想。我的观察使我相信这种幻想是非常典型且极为重要的，以致我想称它为整个女性阉割情结的第二个根源。实际上在长期的个案分析中我们已熟

悉了它的存在。

这种联系的重大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受压抑的女性特性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与阉割幻想联系最密切。或者从及早成功的观点来看，正是受伤害的女性特性引起了阉割情结，正是这一情结损害了（但并非最初的）女性的发展。

在这里，我们可能有对男性仇恨态度的最主要的基础，它常常是阉割情结很明显的女性的一个突出特征；将这种态度解释为来自于阴茎嫉妒以及小女孩对于期望父亲能送她阴茎作为礼物的失望的尝试，都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由深层精神分析所揭示的大量事实。当然，在心理分析中，阴茎嫉妒比起更深的被压抑的幻想更容易暴露，这种幻想把缺少男性生殖器归因于一种与作为异性朋友的父亲的性行为上。所以根据事实，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内疚感依赖于阴茎嫉妒。

这种仇恨男性的态度经常尤为强烈地指向奸污处女的男性。其解释是自然的——即根据幻想正是父亲是患者第一次与之性交的人。所以，在以后实际的爱情生活中，第一个配偶以很特别的方式代表着父亲。这种观点在弗洛伊德的关于童贞禁忌的论文里所描述的风俗习惯中有所表述；据此，奸污处女的所为实际上被托付给父亲的代替者。对无意识的心理来说，奸污处女成为幻想与父亲进行性行为的重复。所以，当奸污处女发生时，所有那些属于幻想行

为的情感被重塑——与厌恶乱伦相联系的强烈的依恋感，以及最终由于对爱的失望和假想在这行为中遭受阉割所产生的上面描述的仇恨的态度。

至此我可以结束我的讨论。我的问题是，对来自于阴茎嫉妒的女性角色的不满是否真的是女性中阉割情结的全部。我们已明白，女性生殖器的解剖结构实际上在女性的心理发展中意义重大，且无可辩驳的是，阴茎嫉妒也确实在本质上决定着阉割情结以何种形式在她们身上表现出来。但是，因此而推论她们对女性特性的拒绝是以嫉妒为基础的，似乎是不可接受的。相反，我们能够看到阴茎嫉妒绝不排除对父亲深深的完全的温柔爱恋，并且，只有当这种关系在俄狄浦斯情结上失败时（确切地说是在相应的男性神经症中）嫉妒才导致病人对自己性别角色的厌恶。

认为自己与母亲等同的男性神经症患者与认为自己与父亲等同的女性神经症患者都以同样的方式否认其各自的性别角色。从这一点上来讲，男性神经症患者的阉割恐惧（在我看来）其背后潜伏着一种不被重视的阉割愿望，正好相当于女性神经症患者对阴茎的向往。如果不是男性内心对母亲的认同作用的态度完全与女性对父亲认同作用的态度相反，这种对称将会更引人注目。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对于男性来说，想成为女性的愿望不仅与他的意识自恋不一致，而且因为第二个原因被拒绝，即成为女性的观点同时

暗示着，他的全部惩罚恐惧都将成为现实，都集中在生殖器部位。另一方面，对女性来说，对父亲的认同作用由以前朝着相同方向的愿望所证实，伴随它的不是任何内疚感而是一种解脱感。从我曾描述的存在于阉割想法及与父亲有关的乱伦的幻想之间的联系中，继而发生了不同于男性中的不幸的结果，即成为一个女性被感到是该受谴责的。

在弗洛伊德题为《悲伤与忧郁症》^① 以及《一例女性同性恋的精神起因》^② 的论文 以及《自我的团体心理与分析》中，他越来越完全地表明在人类心理中，认同作用的过程多么令人担忧。对我来讲好像正是对异性父母的这种认同作用成为任一性别中同性恋及阉割情结得以发展的关键。

《小型论文集》第 4 卷。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 卷 第 125 页。

逃离女性身份^①

—男女对女性身上男性气质看法的对比

弗洛伊德在他最后的一些著作中，逐渐迫切地注意到在我们分析研究者中的某种片面性。我指的是直到现在，只有男孩与男人的心理才被作为研究的对象。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明显的，心理分析是由一个男性天才创造的，几乎所有发展其思想的人都是男性。他们应更容易地发展男性心理学并更多地理解男性的发展而不是女性的发展，这样才是自然的和合理的。

在弗洛伊德发现阴茎嫉妒是向着了解特定女性气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久之后，凡·奥菲尤森和亚伯拉罕的研究表明，这一因素对女性的发展及其神经症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近，阳具欲期假说扩展了阴茎嫉妒的含义。这种假说意思是说，在两种性别婴儿的生殖器结构中只有

①《逃离女性身份》，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2 期（1926），第 360—374 页；《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7 期（1926），第 324—339 页。再版获

一种生殖器官，即男性的，扮演着任何角色，正是这一点使婴儿生殖器结构与最终成年的生殖器结构区分开来。^① 根据这一理论，阴茎被认为是阳具，我们推测小女孩和男孩们起初完全认为阴蒂和阴茎价值相同。^②

这一时期对后来的发展部分起抑制作用，部分起推动作用。海伦娜·多伊奇主要证明了抑制作用。她的观点是，在每一种新的性功能开始时例如在青春期、性交、怀孕和分娩之初时，这一阶段又活跃起来，并且每次在不得不被克服之后才能获得一种女性姿态。弗洛伊德肯定了她的解释，因为他认为，只是阴茎嫉妒和对它的克服才引起想要孩子的欲望，并且因此而形成了对父亲的爱恋感。^③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假说是否能帮助我们更满意更清楚地洞察女性发展（弗洛伊德自己表述的见解并不令人满意也并不完全）。

科学常发现，从一个新的观点来看早已熟悉的问题是会有所收获的。否则，我们会自然而然地继续在同样清楚地被定义的思想群中，对所有的新观察进行分类，这是有害的。

弗洛伊德，《力比多婴儿生殖器结构》载《论文集》第2卷第20期。
霍尔奈参考的弗洛伊德的资料常是先于标准版的版本（标准版是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完整的心理学著作以及论文集，由伦敦贺加斯出版社出版）。

海伦娜·多伊奇《女性性功能心理分析》（1925）。

弗洛伊德《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11期（1925）。

我想说的新观点是来自乔治·西梅尔^①一些短文中的哲学观点。西梅尔在此所持的观点是：我们整个文明是一个男性文明，这一观点后来以多种方式，尤其从女性角度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国家、法律、道德、宗教以及科学都是男性创造的。西梅尔绝没有像其他作家普遍所做的那样，从这些事实推论出女性的卑微，而是首先赋予男性与文明这一概念相当的宽度和深度：“需要艺术、爱国主义、一般的道德需求，尤其是社会观念、实际判断中的正确性、理论知识的客观性、生命的活力和奥妙——所有这些像它们原先一样从其形式和要求来看属于一般人类的类别。但是在其真正的历史的外貌中，它们从头至尾都是属于男性的。如果我们以单个词‘客观的’来描述这些被看作属于绝对思想的事物，那么我们会发现在我们人类历史上，客观的 = 男性的这一公式是站得住脚的。”

西梅尔认为如此难以认清这些历史事实的原因是，人类用以评判男性和女性天性的价值标准“起源于性别差异，不是中立的，其实质是男性的……我们不相信性别问题不进入其中的纯粹‘人类’文明，由于这一原因而阻止了其他类似的文明的实际存在即（可以说是对于概念‘人’和

① 乔治·西梅尔《哲学文化》。

特别参见凡尔汀《女性中的男性特征与男性中的女性特征》。

德语 Mensch 人类）。

概念‘人类’^①的幼稚的认同，这在许多语言中同样的一个词被解释为两个含义。暂时我不能确定我们文明社会的重要的男性特征是来自于主要的性别特征，还是只源于男人的某种力量优势。无论如何，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多数不同领域，不适当的成绩被轻蔑地称作‘女人气的’而女性突出的成绩则被当作一种赞扬一样地称作‘有阳刚之气’，。

像所有的科学与所有的评价一样，女性心理迄今为止仅仅是从男性的观点来考虑的，无可避免的是，男性的有利位置将导致他们对女性主观的、情绪性的关系的看法，被认为是客观有效的。根据戴利尤斯的观点^②，迄今为止的女性心理实际上代表着欲望的一种沉积以及男性的一种失望。

在这一情形中，另一种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女性已适应了男性的愿望，并且觉得她们的适应好像就是真正的天性。这就是说，她们过去和现在都以男性的愿望所要求她们的方式看待自己，无意识地顺从了男性思想的暗示。

如果我们清楚我们所有的存在、思想及行为符合这些男子气标准的程度，我们就能明白对男性个体和女性个体来讲，真正摆脱这种思维方式是多么困难。

坦率来讲，事实确实如此，在某个阶段，只有男子气发

德 语 Mann(男人)
戴利尤斯《女性的觉醒》。

展才被考虑。问题是只要还没有完全忘记这个阶段，当其研究将女性作为对象时，分析心理学重视这种思维方式到了什么程度。换句话说，正如以上所析，女性的发展取决于男性的衡量标准发展的程度，因而这种图画不能非常正确地展现女性真正的天性达到什么程度。

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那么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令人吃惊的。当前，女性发展的分析图画（不管图画正确与否）与男孩所有的关于女孩的典型想法的区别绝不是一丝之差。

我们对于男孩子的观点已经熟悉，这里，为了比较起见，我将男孩子和我们关于女性发展的思想列表对照如下：

男孩子的观点

天真地推测女孩和男孩一样都有阴茎

认识到阴茎的缺乏

认为女孩是一个阉割过的残废的男孩

认为女孩曾受过惩罚，这种惩罚也威胁着他

女孩子被认为是卑微的

男孩子不能想像女孩怎能克服这种缺失和嫉妒

男孩害怕她的嫉妒

我们关于女性发展的观点

对两种性别来讲只有男性生殖器扮演着所有的角色

悲伤地发现缺少阴茎

认为女孩曾有阴茎并且因阉割而失去

认为阉割是痛苦的惩罚

女孩子认为自己卑微，阴茎嫉妒

女孩从来克服不了缺失感和自卑感，并且不得不
一再控制其想成为男人的欲望

整个一生中，女孩都想报复男性，因为他们有她所
缺少的东西

如此精确的对应肯定不是客观的正确的标准。很可能小女孩的婴儿期的生殖器官与人们一直认为的男孩的生殖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这必定使我们深思并思考其他可能。例如，我们可以追随乔治·西梅尔的思路并反思一下，女性对男性结构的适应，发生在如此早的一个时期，且如此高的程度，以致小女孩的特定的天性被它给制服，这是否可能。稍后我将谈到，伴有一种男子气观点的感染发生在孩童时期，在我看来，这确实是可能的。但是天性所赐予的一切事物，怎么能如此被结合并且不留任何痕迹，这对我来说好像暂时还不清楚。所以，我们必须回到我曾提出的问题上——我已指

出的这种显著的相似，是否可能在我们的观察中并非片面的表达，由于它们是根据男性的观点而形成的。

这种提议立即遇到内心的抗议，因为我们想起了建立分析研究的确切的经验根据。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理论科学知识告诉我们，这一根据并非完全可信，但所有的经验就其特性而言都包含了一种主观因素。甚至于我们的分析经验都来自于我们的患者在自由联想、梦的回忆、精神症状中所带来的用以分析的材料直接观察，以及来自于我们所作的解释或者从这些材料中所得出的结论。所以，即使这种技术的运用是正确的，理论上在这一经验上仍有多种可能。

如果我们试着使我们的思想摆脱这种男性的思维方式，几乎所有女性心理问题都可呈现出一种不同的现象。

我们想起的第一件事是：成为分析概念中的主要点的，总是或主要是两性间的生殖器差异，并且，我们忘记另一个很大的生物学差异，即，在繁殖职责中男性和女性所起的不同作用。

在费罗恩兹的非常卓越的生殖器理论中，关于母亲身份概念中男性观点的影响表露得最为清楚。^① 他的观点是，对性交的真正激励、两性间的真实的最终意义，应该在回到母亲子宫的欲望中寻找。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男性

费罗恩兹《一种生殖器理论的实验》(1924)。

获得了通过其生殖器真正再次插入子宫的权利。从前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被迫使其机构适应这一器官状况，并且得到某种补偿。她不得不在天性的幻想中以代替物来“满足自己”，最重要的是养一个孩子，这是她最大的幸福。充其量只有当生孩子时她可能才有否认男性的快乐的可能性。^①

根据这种观点，一位女性的精神状况当然不会是非常愉快的。她没有任何性交的真正原始的冲动，或者至少所有直接的——即使只是局部的——满足她都不能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性交的冲动及其中的乐趣，对她来讲肯定毫无疑问比男性少。因为只是间接的通过迂回的道路才达到她最初所渴望的某种满足——即，部分通过性受虐狂的曲折方式，部分通过对她可能怀的孩子的认同的方式。但是这些仅仅是“补偿设备”，她所具有的最终优于男性的惟一的事情是分娩时的快乐，当然这必然是不确定的。

在这一点上，我作为一名女性，很吃惊地要问，母亲身份怎么样？极为幸福地意识到要在其体内产生一个新的生命会怎样？渐渐盼望这个新生命出现的妙不可言的幸福怎样？当这终于出现并且第一次在怀中抱着它的快乐如何？在给婴儿喂奶时的深深的愉快的满足感以及当婴儿需要她照顾时的整个期间的幸福又怎样？

费罗恩兹在谈话中表达了这种观点：在冲突的最初时

又参见 海伦娜·多伊奇《女性性功能心理分析》。

期，男性作为胜利者强加给她母亲身份的负担及其所包含的一切，这一时期对女性来讲结束得非常伤心。

当然，从社会竞争的立场来看，母亲身份可能是一种障碍。现在当然如此，但是在人类与自然界更为亲近时，却不那么确定。

而且，我们根据生物关系而不是社会因素来解释阴茎嫉妒；相反，我们习惯于干脆将女性的社会不利感解释为她对阴茎嫉妒的文饰作用。

但是，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在母亲身份或做母亲的能力中，女性有着无可争论的绝不可忽略的生理学优势。这在男孩对母亲身份的强烈嫉妒的无意识的男性心理中反映得最清楚。我们熟悉像这样的嫉妒，但是很难将这种适当的考虑作为动力因素而接受。像我一样，当一个人有过相当长的分析女性的经历后开始分析男性时，对于这种对怀孕、分娩、做母亲以及哺乳的强烈的嫉妒，会有最吃惊的印象。

根据这种从分析中获得的印象，人们自然必定要问，是否一种无意识的男性贬低倾向并没有在上述母亲身份观点中理智地表达出来。这种贬低倾向表现为：现实中女性确实纯粹地向往阴茎；当所有事情都说了并做了以后，母亲身份仅仅成为使生存斗争更为艰难的一个负担，男人可能很高兴他们不必负担。

当海伦·多伊奇写道，女性中的男性气质情结比男性中的女性气质情结作用更大时，她好像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男性嫉妒比女孩的阴茎嫉妒更能成功地升华并且在文化价值的创立中，即使不是主要力量也是一种驱动力量。

语言本身说明了这种文化生产力的起源。在我们所知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这种生产力毫无疑问在男性中比在女性中更为巨大。他们在每一领域对创造性工作都具有巨大的冲动力量，不正是由于男性感到在生命的创造中起着相对小的作用，从而驱使他们不断获得成就得到过度补偿吗？

如果我们这样联系是正确的话，我们就遇到了问题，即为什么在女性中没有发现相应的阴茎嫉妒的补偿冲动呢？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女性的嫉妒绝对比男性的少；或者很少能以其他方式成功地摆脱嫉妒。我们可以用事实来说明其中任何一种假设。

为了支持男性嫉妒更强烈的观点，我们可指出，仅仅从前生殖器的构造水平的观点来看，在女性这边存在着一种实际的解剖上的不利，^①但从成年妇女的生殖器结构的观点来看，并无不利。因为很明显，作为性交的女性能力并不比男性的弱，只是不同于男性。另一方面，在生殖中男性的

卡伦·霍尔奈《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5卷（1924）。

作用最终小于女性的作用。

我们进一步观察到男性更有必要贬低女性而不是相反。当我们对于现实中这种观点是否合理产生疑问后，我们渐渐明白了女性自卑的想法在无意识的男性倾向中有其来源。但是，如果男性在深信女性的低劣的背后确实有贬低女性的倾向，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这种贬低的无意识的冲动是非常强大的。

此外，从文化的观点来看，有更多的说法支持女性靠工作摆脱阴茎嫉妒并不比男性成功的观点。我们知道在最满意的案例中，这种嫉妒被化作对丈夫及孩子的期望。并且，可能正是通过这种转化丧失了作为升华推动力的大部分力量。但是，在不太满意的案例中，如我现在较详细表明的一样，它承受着一种内疚感而不是被有利地使用，而男性对于不能做母亲可能只是感到不及并且能够毫无抑制地发展其他所有的驱动力。

在这一讨论中，我已触及到弗洛伊德近来开始最为感兴趣的一个问题^①，即，想要孩子的起源及其作用问题。在最近十年的过程中，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已改变了。因此我可简短地描述这一历史演化的开始和结束。

最初的假说^②是，女人的阴茎嫉妒使她想获得孩子和

弗洛伊德《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

弗洛伊德《论特指肛门性欲的本能转换》，载《论文集》，第2卷，第16期。

男人两个愿望的力比多得到加强，但是后一愿望独立于前者而出现。结果越来越强调阴茎嫉妒，直到在最近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弗洛伊德推测想要孩子的愿望一般只能通过阴茎嫉妒及对没有阴茎的失望而产生。对父亲温柔地依恋也只能通过迂回之路而存在——即通过想要阴茎和孩子的愿望。

后一假说是从心理学上解释异性相吸的生物学原理。这与由格罗德克所设计的问题相对应，格罗德克称男孩保持将母亲作为爱的对象，这是自然的。“但是小女孩怎样变得喜欢异性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我们关于女性中男性气质情结的观察资料来自于两个不同的重要源泉。第一个是对孩子的直接观察，其中，主观因素起的作用相对不大。每一个还没有受到过恫吓的小女孩都坦率而毫不尴尬地表现出阴茎嫉妒。我们看到这种嫉妒的出现是典型的，并很好地理解了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明白了比男孩少的自恋耻辱怎样通过一系列由于不同的前生殖器精力投入而出现的不利得到加强：男孩关于尿道性欲、偷窥本能及手淫的明显特权。^①

我想建议我们对小女孩的阴茎嫉妒应用“最初的”这个词，这明显只以解剖上的差异为基础。

在我的文章《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中我已详尽地描述了这一主题。

我们经验的第二个来源，在成年女性所提供的分析材料中得到了发现。自然，要对此有所判断比较困难，所以，有更多存在主观因素的可能。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阴茎嫉妒作为一种巨大的动力因素在起作用。我们看到病人拒绝她们的女性职能，她们这样做的无意识的动机是想成为男性。我们遇到过这样的幻想：“我曾有一个阴茎，我是一个被阉割被致残的男人。”由此产生了自卑感，这种感觉对各种偏执忧郁症想法都有副作用。我们看到对男性的一种明显的敌对态度，有时是以贬低的形式，有时是想阉割他们或使其残废；我们看到了某个女性的命运是如何由这一因素决定的。

我们能够将这些印象与最初的阴茎嫉妒相联系，并且推论出以后的情况，即这种嫉妒必定有巨大的强度，巨大的动力，因为它显然引起了这种作用。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非常自然的，特别是因为我们思维的男性取向。这里与细节相比，我们更多的是在情形的一般性估计方面忽视了这一事实：从对成年女性的分析中，我们已非常熟悉的想成为男性的想法与早期婴儿的初期的阴茎嫉妒只有很小的关系，但是它是一种次要的构成，体现了在向成年女性发展中所有失败的东西。

从开始到结束，我的经验都一直清楚地证明女性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不仅在病人变得悲伤的极端案例中，而且有

规律地、自然地在每一可能的程度及细微差别上导致对阴茎嫉妒的回归，男性与女性俄狄浦斯情结结果之间的差异在我看来好像在一般案例中都如此。在男孩中，由于害怕阉割，母亲作为性对象而被放弃。但是男性作用本身不仅在进一步发展中被肯定，而且在对阉割恐惧的反应中实际被过分强调。我们在男孩的潜伏及青春前期以及后期生活中都看得很清楚。另一方面，女孩子不仅没有放弃将父亲作为性对象，并且同时对女性作用完全退缩。

为了解释这种逃离女性身份现象，我们必须考虑与婴儿早期手淫有关的事情。这种手淫是由于俄狄浦斯情结而出现的兴奋的身体表达。

男孩中的情况再一次显得更为清楚，或者可能只是我们知道得更多。女孩子中对我们如此神秘的这些事情，是否只是因为我们总是从男性的观点来看它们呢？似乎在下列情形时更是如此，即当我们甚至不允许小女孩有特别的手淫形式，而是很干脆地将她们的手淫行为视作属于男性时；当我们将必然存在的差异看作正数与负数间的差异，换句话说，关于手淫焦虑的案例中，是受到惊吓的阉割与确实发生的阉割之间的差异。我的分析经验表明，确实可能小女孩有着特殊的属于女性的手淫方式（这种手淫与男孩的在技术上偶然有所不同），即使我们假定小女孩只进行阴蒂手淫，况且这在我看来是绝对不确定的假定。我不明白为

什么不管其以前的演化如何，人们不该承认阴蒂合理地属于并形成女性生殖器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女孩生殖器发育的早期，她是否有阴道器官知觉，从成年女性提供的分析材料来看很难判断。在一系列完整的案例中，我易于得出这是属实的结论，以后我将引用以这一结论为基础的资料。在我看来，这样的知觉因以下原因在理论上极有可能发生。毫无疑问，一个过大的阴茎正在强行插入，产生疼痛并出血，可能毁坏一些东西，这种熟悉的幻想将表明，小女孩的俄狄浦斯幻想很现实地（依据儿童期可塑的具体的思维）以父亲与孩子间的大小的不相称为基础。我也认为俄狄浦斯幻想以及继而逻辑上产生的内部——即阴道——受伤的恐惧将表明，阴道和阴蒂必定被假定在女性婴儿早期的生殖结构中起着作用。^①人们甚至可以从以后的性冷淡现象中推论出阴道区域确实比阴蒂具有更强的被投入的性欲力量（来自于防卫的焦虑和尝试），因为这种乱伦愿望丝毫不错地无意识地被归于阴道。从这一观点来看，性冷淡必定被认为是一种避免对自我如此充满危险的幻想的尝试。这也像不同作者所主张的那样，将对于发生分娩时的无意识的愉快的感觉，对于生孩子的恐惧作出新的解释。（正是因为阴道与孩子间的不相称以及生

自从想起像这样的联系的可能性以来，我就已学着在这一意义上来解释——换句话说，像描述阴道伤害的恐惧——解释许多我以前赞成从男性意义上来讲解释为阉割幻想的现象。

孩子所带来的痛苦)分娩比以后的性交在更大程度上被无意识地认为代表早期那些乱伦幻想的实现,这种实现并不带有负疚感。女性的生殖器焦虑,像男孩怕阉割一样,一直承受着负疚感的压力,正是由于这种负疚感,它才有着永久的影响。

这种情况的另一种向同一方向起作用的因素是两性间解剖上差异的某种结果。我的意思是男孩能够检查他的生殖器,看手淫的可怕结果是不是在发生;而女孩子在这一点上根本就处于黑暗之中并且一直完全不确定。当然,这种现实考察的可能对阉割焦虑非常严重的案例中的男孩子并不重要,但在恐惧较轻一点的案例中,我认为这种差异非常重要。由于出现得更为频繁,所以实际上这些案例较重要。无论怎样,我已分析的女性中渐为人知的分析资料使我推论,这一因素在女性心理生活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并且会造成女性中常遇到的古怪的内部不确定。

在这种焦虑的压力下,女孩子以虚构的男性角色逃脱困境。

这种逃脱有什么实用的收获呢?这里我指一个所有分析家可能有过的经验:他们发现想做男性的愿望一般比较乐意被认可,并且一旦被接受,就被坚决坚持,原因是想避免与父亲有关的力比多愿望与幻想的实现。这样,成为男人的愿望加强了那些女性愿望的压抑,或对其被发现的抵

制。如果我们真的根据分析原则，这种不断发生的、典型的经验迫使我们得出结论：成为男性的幻想是在早期为了保护主体反对与父亲有关的力比多愿望而设计的。这种男性虚构使女孩子能够逃避现在负担着内疚与焦虑的女性角色。确实，这种脱离自己的队列到男性队伍中去的意图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种自卑感，因为女孩子开始以不属于她的特定生物特征的资格与价值来衡量自己，与此相对的只能是感到自己无能。

虽然这种自卑感非常令人苦恼，但分析经验确切地向我们表明，和与女性态度相关的内疚感相比，自我更容易容忍这种自卑感。所以，毫无疑问，当女孩子从内疚感的锡拉岩礁逃进自卑感的卡律布狄斯旋涡时，自我就增强了。

为了完整性，我再对其他增强作些补充说明。正如我们所知，这种增强在同时发生的对父亲的认同过程中自然发生在女性身上。对于这一过程本身的重要性，除了在我早期研究中已说过的以外，我知之甚少。

我们知道正是这种对父亲的认同过程解释了为什么与父亲有关的脱离自身身份的愿望总是引起采取一种男子气态度这一问题。与已经说过的内容相关的一些看法透露出对这一问题解释的另一种观点。

我们知道无论何时力比多在其发展中遇到障碍，一种组织的早期阶段被退缩性激活。据弗洛伊德最近的研究，

阴茎嫉妒形成了对父亲作为真正爱恋对象的预备阶段，所以弗洛伊德提出的这种思路有助于我们理解内部需要，无论何时只要力比多被乱伦障碍赶回来，它就可通过这种内部需求准确地流回到这个阶段。

原则上我同意弗洛伊德关于女孩经由阴茎嫉妒向对象爱恋发展的观点，但是我认为这种发展的本质也可以有不同的描述。

因为当我们明白最初的阴茎嫉妒的力量中有多少只是通过从俄狄浦斯情结中退化而得到增加时，我们必须不受诱惑，根据阴茎嫉妒将自然界如此基本的一个原则的表现，解释为两性间吸引的原则。

以后，因为遇到我们该如何从心理学上来想像这种原始的生物性原则的问题，所以我们又一次必须承认无知。实际上，在这一方面，我越来越强烈地推测或许因果联系正好相反，正是从很早时期就起作用的对异性的吸引使小女孩的性欲兴趣转向阴茎。根据发育所达到的水平，这一兴趣如我前面所描述的一样，首先以手淫和自恋的方式表现。如果我们这样看待这些关系，关于男性俄狄浦斯情结的起源的新问题理所当然地就会出现。但我想将这些问题放到后面的文章里讲。如果阴茎嫉妒是两性间神秘吸引的首先表达，那么对于何时分析在更深一层而不是在想要孩子和对父亲的温柔的爱慕这一层上揭示阴茎嫉妒的存在，

就没有什么奇怪的。对父亲的温柔的态度并不仅仅是由关于阴茎的失望造成的，还有其他的原因。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把对阴茎的力比多兴趣称之为——用亚伯拉罕的术语——一种“过分的爱”。他说这种爱总是形成对真实对象的爱预备阶段。我们也可以从以后生活中的类推来解释这个过程，我指的是羡慕嫉妒特别地被认为导致一种爱恋态度这一事实。

关于这种退缩发生得非常容易，我必须提到这一分析发现^②，即在女患者的联想中，拥有阴茎的自恋欲望与对阴茎的物体力比多渴望常如此交织在一起，以致人们对“想得到它”蕴含的意思表示迟疑。

再说一点，关于阉割幻想是合适的，整个情结都以它们来命名，因为它们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根据我的女性发展的理论，我也认为必须将这些幻想作为次要构成。我将其起因描述如下：当女性求助于虚构的男性角色时，在某种程度上，她的女性生殖器焦虑被译成男性术语——阴道伤害恐惧成为一种阉割幻想。通过这种转换女孩有所获益，因为她把其预期受惩罚的不确定性（由其解剖构成所决定的不确定性）转换为具体的想法。而且，阉割幻想也在以前的内疚感的阴影下——并且阴茎成为无内疚的一个证据迫

亚伯拉罕《力比多发展史实验》(1924)。

② 弗洛伊德在《童贞的禁忌》中提到这一点。

切想得到。

这些想逃离女性而成为男性角色的典型动机——其起因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动机——由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工作的真正不利得以加强和支持。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成为一个男性的欲望，当它起因于最后这一原因时，就成为那些无意识动机的尤为合适的合理化形式。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种不利实际上是一种现实，并且它比大部分女性所知道的要大得多。

在这种联系中，乔治·西梅尔说：“与男性相关的更大的重要性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可能是由于其优越的力量的地位。”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两性关系可被残酷地看作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正如一直如此的事实，这里“主人的特权之一就是不必一直认为自己是主人，而奴隶是从来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地位的”。

在这里我们或许对分析作品中这一因素的低估有了解释。实际上，一个女孩从出生以后一直受其自卑感暗示的影响。这种暗示无论是无情还是微妙地传送的，都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其自卑感是不断增强其男性气质情结的一种经验。

还有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由于至今为止我们的文明纯粹是男性气质的特征，所以对女人来说，取得真正使她们的性格的升华要困难得多，所有普通职业都被男人

占据了。这同样对女性的自卑情绪发生了影响，因为她们不能在这些男性职业中像男人一样取得同样的成功，为她们的自卑现实提供了一个基础。在我看来，不可能判断出女性的这种社会服从地位在多么巨大的程度上加强了逃离女性身份的无意识动机。人们也许会把这种联系看作是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但我这儿只能提出这些问题，它们是些非常严肃而重要的问题，需要单独作调查研究。

这些同样的因素对男人的发展肯定有非常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它们导致女性气质愿望的抑制强烈得多，这些愿望带有自卑的烙印；但另一方面，成功地将它们升华对他来说又容易得多。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解释了女性心理学中的某些问题，许多方面与当前的观点不同，我描绘的画面可能甚至确实是相反观点的片面之词，但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意图是想指出，一个错误的根源可能出自于观察者的性别。这样，向着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迈进一步需要：摆脱男性或女性观点的主观性，获得一幅女性的精神发展图画，这幅图画比我们现在取得的要更符合女性本质的事实——不同于男性本质的特征。

被抑制的女性情结^①

性冷淡问题的精神

说也奇怪，医生和性专家对广泛存在的女性性冷淡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从性冷淡对于个体的重要性来讲，一种观点是把女性性冷淡比作男性中潜藏的躁动情结。因此，持此种观点的人声称，这两种现象特别是性冷淡的频繁发生，都是一种疾病。而且这种观点指出了甚至更加严肃地对待性冷淡的病原探究及治疗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性冷淡频繁发生的本身已使人们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人们不能将如此普通的现象看作一种疾病，就其整个渐变进程而言，性冷淡应更准确地被视为有教养女性的正常性态度。无论人们用多么科学的假说去证明这一概念的正确性，^② 他们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医生们既

原载《性科学杂志》第 13 卷（1926—1927）第 67—77 页。

此问题请参照迈克斯·马克尤斯所写的《性问题的神经官能病理》，载莫尔的《性科学指南》第三版第 2 卷，1926 年。

没有理由去为他的治疗干预手段辩解，又没有通过这种治疗干预获得疗效的机会。

于是，人们便产生了这种印象：一般地说，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无论他们强调的是社会因素或内在因素，都是基于一种强烈的主观信念，因此，都不能有助于引导我们对所讨论的问题进行广泛而合乎实际的阐明。而精神分析学从一开始就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就其本质而言，也必须采用这种不同的方式，这就是医生对个体及其病情发展的精神分析观察。

如果我们要问这条道路能够带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接近问题的解决，也许我们最终可以对下面两个问题获得答案：

(1) 依照我们的经验，什么样的发展进程会导致一个特殊的女性形成性冷淡的症状？

(2) 女性力比多衰减现象可被归结为什么意义？

同样的问题可用下面这种较少理论性的方式来表达：性冷淡仅仅是一种孤立的且相当不重要的症状吗？或者它是与真实的心理躁动或身体健康状况紧密联系的吗？

请允许我用一种粗略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贫乏的）比喻来阐明这些问题的意义或可能的价值。假如我们想像一下，我们若对产生咳嗽的病理过程一无所知，我们定会去想像这一讨论的可能性：即咳嗽在一切病例中是一种疾病现

象或者仅仅代表一种主观存在的令人生厌之事，因为很明显，许多人咳嗽并不是真正有病。然而，只要我们继续忽视咳嗽与真实深层障碍的关系，对咳嗽产生机理的不同见解将只能继续存在。

尽管这个比喻有其明显的缺点，我作这样一种比喻是基于一个有待我们大家去探讨解决的特别的看法，像咳嗽一样，性冷淡可能仅仅是一种表明更深层的内部毛病的信号。

然而，疑问立即便会出现。我们知道，有性冷淡症状的许多女性却身体健康而且很能干。由于有两个原因的存在，这种反对意见不如它开始时所呈现的那样令人信服。首先，仅仅通过对一个个体病例的详尽而仔细的调查，就能表明是否存在难以弄清的与性冷淡相关的躁动情绪？例如，一个人的性格障碍或其人生计划失败，它们可能被错误地归结为外部因素。第二，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心理学的结构并不像一部机器那么严密，假如在某一点上有毛病或者生来的弱点，作为一个整体它就必然会失败。相反，我们有相当的能力将性力量转变成为非性力量，这样便有可能用一种有文化价值的方式成功地将它们升华。

在对个体的性冷淡起源进行深入探讨之前，我不妨先去看一下我们在实际中经常发现的与性冷淡相关的现象。在这里，我想将自己局限于那些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正常范

围内的现象。

无论我们是否把性冷淡看作一种受器官或心理条件约束的现象，它都是一种女性性功能的抑制。因此，如果发现性冷淡与其他特定的女性性功能损伤相联系，是丝毫不奇怪的。在众多病例中，我们看到最多的便是月经功能紊乱现象，^① 这些紊乱包括月经循环周期的无规律、痛经或者在心理上一直保持着的紧张、易怒或脆弱状态，这些通常开始出现在月经到来之前的八到十四天，每次都会引起相当严重的心理平衡损伤。

在其他的病例中，问题的症结则在于妇女对于母亲身份的态度。有时，她们给出一些合理化的形式完全拒绝怀孕；有时，会经常出现没有明显的器官疾病所造成的流产；在另外一些病例中，我们会遇到那些为数众多的且为人熟知的对于怀孕的抱怨。^② 诸如神经焦虑或分娩功能衰弱等不适都可能在接生过程中出现。对另外一些女性来说，哺乳婴儿变成了一大难题，表现为从完全不能喂奶这种极端现象到神经性衰竭；或者我们不能找到她们对于孩子的正确母性态度，取而代之，我们会看到另一种现象，那些易怒的或过分焦虑的不能给予孩子真正温暖的母亲们，往往会

此处及下文的所述中，均不包括由确定的器官原因引起的障碍。

很显然，我们不能指责是新陈代谢中的物理—化学变化导致了这些紊乱，因为当一种积极的心理态度存在时，它们单独不可能导致这些困难。

把孩子留给家庭老师去照顾。

与上述类似的现象也常常会发生在妇女家庭杂务中。要么家务劳动被过高估计并且被变成对家人的一种折磨，要么这些家务劳动使她感到极端地厌倦，这正如每一项不情愿去做但必须做的任务最后都变成了一种负担的情形一样。

然而，即使所有这些女性功能的障碍均不存在，也还有一种关系经常是损害性的或是不完善的，即对待男性的态度。对这些障碍的本质我会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及的。这里我只想说，她们不管是在冷漠还是病态的忌妒心理中，在不信任还是易怒状态中，在抱怨还是自卑感中，在对情人还是对女性的亲密友情的渴望中，她们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她们都不能胜任与一个异性恋爱对象的完整的恋爱关系（包括肉体的和心灵的）。

假如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对这些女性的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作一番更深层的洞察，我们通常会碰到她们对女性角色的坚决的拒绝，这是一种较为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这些女性的意识自我中通常不具有这种积极拒绝女性的迹象。相反，她们的整体面貌连同她们的自觉态度又都是女性化的。性冷淡的女性有更强烈的性欲反应和性要求，这一观察警告我们不能将性冷淡与性拒绝等同看待，这一点早已被正确地指出过。事实上，在更深层的研究中，我们整体上都

没有遇到性拒绝这种病例，而是发觉一种不愿去担当特殊女性角色的心理现象。这种厌恶达到的意识程度，通常是以社会对妇女的歧视或对丈夫或一般男人的指责等因素来为她们的这种心态寻求合理解释。可是，从更深层次上看，这里存在着另一个明显可以察觉的动机——一个或多或少对男性性别的强烈渴望或幻想。我在这里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早已进入了无意识的领域里，虽然这些渴望可能部分是有意识的，但是这些女性一般都没有意识到她们的渴望程度和更深层的本能动机。

女性感到被歧视，对男性羡慕妒忌，渴望丢弃女性角色而变为男人，这种整体的情感和幻想内容上的复杂性，我们称之为“女性的男性气质情绪”。这种情绪的影响效果或多或少地在生活健康而有神经质的女性中表现为广泛的多样性，因此我只能满足于以一种相当概括的方式简明扼要地指出这些问题的主要方面。^①

这种对男性的妒忌达到了最引人注意的程度，这些希望在对男性的憎恨、对男性作为特权性别的内心痛苦中表达出来——就像工人对其雇主存有潜在的敌意一样，每天通过各种各样的游击战方式，努力去打败他的雇主或在心理上削弱他。总之，我们一眼就会认同这种陈述，因为它出

亚伯拉罕《女性气质阉割情结的表现》，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4 卷（1921）。弗洛伊德《童贞的禁忌》（标准版本 第 11 卷）第 191 页。

现在无数的婚姻生活中。

但同时我们又会观察到同样的一个女人，无论她怎样贬低所有的男人，可是依然会认为他们比自己优越得多。她对女人能否取得任何真实成就的能力没有丝毫自信，反而更倾向于认同男性对于女性的贬斥态度。虽然她自己并非男性，但至少她渴望去分享男性对女性的评判。这种态度经常与对男性明确的贬抑倾向交替出现，这不禁使人想起狐狸和酸葡萄的故事。

进一步讲，这种无意识的妒忌态度使得女性对自己的优点一无所知。即便是做母亲的角色，对她也仅是一种负担，她对任何事情都是以男性的标准去衡量——也就是用一种与她自身内在完全不同的标准——因此，她很容易把自己视作无能。因而，在今天即使在很有天赋的妇女身上，我也能看到相当程度的不自信，尽管取得的成绩是肯定的并且为人们所认可。这种不自信来源于她们内心深处的男性气质情绪，并且以对批评过分敏感或者以一种胆怯的方式表现出来。

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被命运从根本上损伤和歧视的情感也会导致无意识的对生活的补偿要求，因为她被虐待了。与这些要求的起源相一致的是，她们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地满足。人们习惯于将女人的这种无休止的要求和永远不停的不满足解释为是由于性生活不满意所致。但较深

层的探究清楚地证明，这种不满足早已可能是男性气质情结的必然结果。对于男性气质无意识的强烈要求是不为女性态度所接受的，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并且可以被经验所证实。假如男性作为性伙伴丝毫不被拒绝，女性又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使得这些要求必然导致性冷淡。性冷淡反过来又很有可能加剧上面提到的自卑感，因为在更深层次上，性冷淡已被准确无误地验证为不能胜任做爱。这与以下的看法完全不同，即通常把这种对性冷淡的自觉道德评价为可敬的贞操的证明。反过来讲，这种对缺乏性活动准确无误的无意识情绪很容易引起对于其他女性的神经过度紧张的妒忌。

男性气质情结的其他结果则更深地根植于无意识之中，假如没有无意识机制的确切知识便不可能去理解它。许多女性的梦和症状清楚地表现出她们并没有从根本上甘心忍受女性气质。与此相反，在无意识的幻想生活中，她们都一直保存有自己实际上被创造为男性的想像：相信自己已被生活中的一些影响弄得残缺不全、受到了心灵的创伤或肉体的伤害。为了保持这种幻想，她们将女性生殖器想像为是病态和被破坏的器官，这一概念在以后可以通过月经的行经事实被反复地肯定和实践——虽然这些女性是具有完好无损的意识和较好的教育背景。这种本质上与无意识幻想的联系会轻易地导致上面所提到的行经困难，还会

导致性交中的疼痛以及妇科的一些障碍。^①

在另外的病例中，与她们相关的这些想法、抱怨和忧郁症的恐惧不与生殖器官自身相联系，但转移给其他所有可能的器官。只有像超出常规论文框架结构那样的详尽的精神分析材料，才能使我们有足够的依据，去洞察个体病例的发展进程，只有对进程本身的分析，才能使人们对这些无意识的男性气质渴望的强烈程度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如果我们要去探究这些女性的这种奇怪情结在心理学发展中的起源，我们经常会认同并直接去观察她们的童年时代。在这一阶段，小女孩确实因男孩子的生殖器而嫉妒他们。这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发现，且很容易通过直接的观察来加以检验。但主观的分析解释并不能给这些观察增加什么新的内容，而且甚至在直接被认可的当口，人们遇到了坚定的怀疑。无论什么情况下，评论家都不能反驳孩子们可能表达这种想法的事实，但他们还是极力试图去否认他们的发展意义，他们会称这样的渴望甚至妒忌可以在女孩子身上观察到，但那仅仅意味着是一种与其他孩子的玩具或糖果的羡慕相类似的妒忌。

因此，请允许我提及一个因素，一个使我们大家对这样一种观点产生疑惑的因素——也就是身体所展示的意义，

即使有像“异位”这样的真实器官病变的存在，这些主观的抱怨还是常常源于她们的这些心理因素。

在幼小孩子的生活中还没有发展为一种心理学的冷漠之前，已经在发挥着较重要的角色作用。这种对于身体的早期态度使我们这些成年的欧洲人感到陌生。然而，我们看到在其他文化群体中，人们对于性器官的想像是较为天真和较少压抑的，因此人们相当公开地崇拜甚至是景仰机体的性标志，特别是对于阴茎，他们都对它赋予神奇的力量并把它放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这种潜藏在阴茎崇拜之后的思维模式实际上与孩子的思想有如此的相似关联，以至于对任何熟悉孩子世界的人来说，这一点很明确地会被领悟到。反过来，这种思维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孩子的世界。

假如我们现在将这个阴茎妒忌阶段认可为一种全凭实验和观察的事实的话，一种几乎不能用推理思维加以驳斥的反对呼声便会轻易地出现。反对者会这样说，女孩子完全没有理由去妒忌男孩子，女孩子有作为母亲的如此不容置疑的生理优势，以致人们宁可反过来这样想，男孩子会在意识深处妒忌女孩有做母亲的权力。我想简短地指明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它还能给男性造成强有力的刺激，驱使男性在给予孩子生命时，会尽他最大的生产能力。^①从另一方面看，这个早期阶段的小女孩还没有意识到，相对于男

参见，诸如“child”(孩子)和“work”(工作)，“create”(创造)和“give birth”(生孩子)等词在语言学上是等同的。

孩子，她有一个未来的优势，因此这不会阻止她在这一阶段感到自身处于劣势。然而，在指责我们过高估计阴茎妒忌的评论中，确有一些合理的成份。因为实际上，后期生活中的男性气质情结以及它经常带来的灾难性的结果，并不是这种早期发展阶段的直接产物，而仅仅是经历过复杂的迂回道路才产生的。

为了理解这些情形，人们不得不认识到这种阴茎妒忌的态度是一种自恋态度，其指向是个体自我，而不是目标主体。在一个健康发展的女性个体中，这种自恋式的阴茎妒忌几乎完全淹没在她对男人的目标力比多渴望和对孩子的期盼中。^① 这种经验与这样的观察非常符合，即她们把自己安全地置于女性地位，表现不出有任何的迹象值得称之为上文所提到的男性气质渴求。

然而，精神分析式的洞察已表明：为了保证这样一种正常的发展，许多条件必须得到满足，同时还表明，在发展中存在着许多阻碍和干扰的可能性。心理性进一步发展的决定性阶段是在家庭内部首次产生性目标关系的阶段。^② 在这个阶段，心理性发展在个体的三到四岁之间达到其高峰期，不同的因素的介入会使女孩从她的女性角色中退缩出

我假定通晓这个阶段的精神分析调查研究，我们将其概括在俄狄浦斯情结这一集体术语之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肛性欲的本能转变》载《论文集》第2卷第164—171页。

来。例如，对哥哥的明显偏爱经常成为小女孩形成强烈的男性气质的重要因素。早期的性观察在这一方面会有一种持续不断的影响。这种情况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尤为真实，在那里性方面的事要避免孩子们，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离奇古怪而又自我禁闭的性格。在孩子一周岁以内的这段时间里，他会非常频繁地看到父母性交，这样孩子便会将其视作母亲被强暴、被伤害或者被折磨致病的典型例子。看到母亲的经血痕迹更增强了对这种观点的认同。像父亲的暴行以及母亲的生病等这样偶然的印象，会增强孩子认为女性地位不稳定且危险观念。

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到小女孩，特别是当她第一次性发展高潮期到来时所发生的一切。在这一时期她会不自觉地将自己本能的性要求与她母亲的等同起来。这些无意识的本能要求会产生另一种冲动，这种冲动会在同一方面发挥作用。也就是说，这种早期女性对父亲的性爱态度愈强烈，当它由于对父亲的失望或对母亲的负罪感不能实施时，其危险性也就愈大。进一步讲，这些影响会不可分离地与她的女性角色保持联系。这种与负罪感的联系又会特别容易受到手淫的威胁，正如大家所知，手淫在这一阶段是性刺激的一种机体表达方式。

由于这些焦虑和负罪感，为了寻求安全感，女孩会完全从她的女性角色中转移出来，躲藏在幻想的男性角色里。

这种本来源于于天真妒忌的男性渴望，就其本质而言注定会尽早消失，现在却被这些强烈的冲动变成了挥之不去的东西，而且会从这一点出发，展现我在上文中所指出的巨大影响。

持非分析性观点的人往往更容易首先想到以后性生活的失望。确实我们有时会看到，当一个男人不能从女人那里获得性满足时，就会把他的性要求转向同性恋目标。当然，我们不能过低估计这些以后的事件，但经验提醒我们注意：这些以后性生活的不幸可能早已是童年时代形成的性态度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从另一方面讲，所有这些后果即使没有后天的经历也会产生。

一旦被这种无意识的男性气质渴求控制住，她就会跌进一个致命的恶性循环里去。因此，她起先从女性角色中逃避出来躲入男性角色幻想中，这种幻想一旦被确定，就反过来进一步加深她对女性角色的拒绝，甚至还略带些蔑视。一个将自己的生活建筑在这样一种无意识掩饰之下的女性会从根本上受到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由于男性气质渴望动摇了她对自我的情感，她便会受这种渴望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她的一些生活经历不可避免地要提醒她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角色，她同时又会受到压抑的女性情结的影响。

文学作品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处于这种冲突中的女性最

后崩溃的悲惨命运。斯格勒（Schiller）的小说《奥尔良的少女》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在宏大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稍纵即逝的女性形象。小说中以浪漫化手法展示的历史斗篷代表了女主人公在她的负罪感重压下崩溃的一幕，因为一瞬间她爱上了她的国家的一个敌人。这种动机看起来不足以形成这么深刻的负罪感，也并不足以导致这么强烈的崩溃；这种罪与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错误的，也是不公平的。然而，一旦我们假定诗人的直觉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源自无意识的冲突画面，其深刻的心理学含义便会立即展示出来。对这部剧本的心理学理解则必须在它的序曲中去寻求解答。在序曲中，少女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这声音禁止她所有的女性体验，但却允诺给她以男性的荣誉作为替代。下面我就引用这段诗句：

你永远不能拥抱男人的爱，
也不能让罪恶的情感火焰灼烧你内心的热情，
你的头发将永不能被新娘的花环装饰，
没有哪一个可爱的孩子会在你的乳房筑巢，
但是，我将以战争的荣誉使你变得伟大，
超出所有现世的女人的名声和命运。①

弗里德里克·斯格勒《奥尔良的少女》第 15 页。由查尔斯·E·佩恩杰翻译，纽约弗里德里克·昂杰出版公司，1961 年。

我们不妨假设上帝的声音在心理学上等同于父亲的话语，这种假设是被无数的生活经验所证实的。于是这个基本情境的核心便会呈现出这样一种事实：这种被禁止的女性体验是与禁止她对父亲的情感相联系的；而且这种禁止被投射到父亲身上的结果，便是把她推向了男性角色的深渊。因此她的彻底崩溃不可能是因为爱她国家的敌人而产生的，而是因为她全然地去爱着，又因为她被抑制的女性情结已经完全崩溃，伴之而来的仅有负罪感，使她不可能再站立起来。偶然地，也是极其特别地，这种冲突不仅导致了情感的抑郁，同时还导致了她的“男性”成就感的覆灭。

在医学心理学中经常被观察到的许多病例，有些类似于那位极具直觉的天才诗人所刻画的情形。这些情形中的女性是在初次经历了性体验之后才变得神经质或者表现出性格上的改变，这也只能在她们发现性是什么或者经历过真实的体验之后才能发生的。简而言之，人们会说这就是那些女性们由于无意识的焦虑或者负罪使自身通向特定的女性之路被阻塞了的具体情形。这种阻塞不一定就必然导致性冷淡，这些抵抗决定了在什么程度上女性体验会被阻塞，这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这儿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系列连续的症状，从抵抗性体验的念头到仅通过性冷淡的体态语言才明显表示出抵抗情绪。假如这种抵抗处于相对较弱的程度，性冷淡通常就不是一个严重的不可更改的反应形

式。性冷淡在一定条件下（大部分是无意识条件下），是可以被克服的。对一些女性而言，性体验不得不发生在一种禁闭的环境中；对另一些女性而言，性体验将不得不伴之以遭受某些暴力侵犯；对还有一些女性来说，这种性体验只有排除掉所有的情感因素后才有可能。在最后这类病例中，女性对所钟爱的男人性冷淡，然而她却能够完全在身体上屈从于一个仅对她有性欲而没有爱的男人，从而完成性体验。

从性冷淡的这些不同表现中，人们可以正确地推知它的心因性起源。而且，对性冷淡发展过程的分析性洞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在一定心理条件下，它的出现和消失是严格地由个体的发展历程所决定的。史泰克尔说：“没有审美情趣的女人仅仅是那种还没有找到使她满意的适合形式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这一论断是一种误解，因为“适合形式”可能会与无意识的条件联系起来，这种无意识条件一点都不能被实现，又不能被意识自我所接受。

因此，这种性冷淡现象适合一个较大的结构形式，实际上它可以凭其本身的力量构成一个重要的症状，由于缺乏实际的释放，很多女性对力比多的不断积累几乎都不能忍受。然而，只有通过这种躁动情绪的发展变化，性冷淡才能获得它自身真实的意义，而这种变化的躁动情绪正是性冷淡的基础，并且仅仅只是它的一种表示而已。从这一点来

看，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其他的女性功能也会如此频繁地受到性冷淡的影响，为什么在一个没有性冷淡以及它的潜在抑制的女性身上我们几乎看不到严重的神经性躁动不安。

让我们再回到一开始就提出的性冷淡现象频繁发生的问题。根据这个概念，性冷淡的普遍性并不能足以证明它是正常现象，特别是当我们能够追溯到产生性冷淡的抑制发展过程之后，这种说法就更加没有理由。然而，性冷淡的频繁性的起因仍是一个有待大家去探究的问题。

仅仅通过分析的手段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精神分析也只能做到指出性冷淡发生时所遵循的发展道路，或者更确切点说，是发展旁路。除此以外，它也只能允许我们对这些道路的简易可行性进行一定的探讨。但为什么经常重蹈覆辙，它不能给我们丝毫的解答，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是推测而已。

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这种频繁性的解释应与超个人主义的文化因素有相当的联系。众所周知，我们的文化是一种男性中心的文化，因此总体来讲这种文化并不欢迎女性及其个性的展示。^① 这种因素对女性有多种多样的影响，在此我仅想提出两点以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

乔治·西梅尔《哲学的艺术》，选自维尔纳·克林哈特博士编辑的《乔治·西梅尔文集》(1911)。

首先，无论女性个体作为母亲还是情人如何地被珍爱，从人类学和精神的角度讲，人们总是认为男性更有价值。小女孩就在这种普遍存在的观念中长大。假如我们意识到，从孩提时代女孩就具有妒忌男性的理由，我们就能容易地抓住这一点：这种社会印象曾经多么有力地在意识层次上去支持她的男性情结渴求，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她的女性角色的内在肯定。

另一个不利因素在于当代男性性爱的某种怪癖。我们只能偶尔地在女性身上看到的那种将性爱生活分割为性与浪漫两部分的情形，在有教养的男性身上发生的频繁程度不亚于性冷淡在女性中的流行。^①如此看来，一方面男性在生活中寻找与他的精神世界接近的生命伴侣和朋友，但对于她，他的性概念始终是禁闭的，并且他的内心深处渴望女性也能以类似的态度与自己相互交流。这种分割对于女性的影响极为清楚，这非常容易导致性冷淡，即使这种从自身发展中带给她的抑制是能够克服的。另一方面，这样的男性会寻找一个女性仅与她发生性关系，这一点最清楚的证明便是他与妓女的关系。而这种态度在女性身上的回击则必然也导致性冷淡。对女性而言，她的情感生活与她的性生活通常较为一致地联系起来，当她不能爱或被爱时，她便不能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之二：男子性爱对象选择的一种特殊类型》(1910)、《论文集》第4卷第192—202页。

完全地奉献自己。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认为，由于男性的优势地位，他们的主观需要在现实中很容易得到满足；而社会习俗和教育对于“女性情结抑制”的形成和保持则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因此，以上这些简短叙述清楚地证明了到底是什么强大的力量在限制女性气质的自由展现中起着作用。另一方面，精神分析表明，在女性的发展中，有多种可能和倾向将导致她们从内心深处去拒绝女性角色。

而在多大程度上是内因还是外因起决定性作用，会因个体的具体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讲，这是一个两种因素联合作用的问题。也许我们会这样设想：如果我们能持续不断地对这一联合作用的模式进行较为精确的洞察，我们便有可能对女性情结抑制的频繁发生有一个真正的理解。

一夫一妻制理想的问题^①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以不断增长的惊异自问，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对婚姻的若干问题 进行彻底的分析解释？尽管确实每一个分析家对这个问题都有许多见解要发表，尽管无论从实际的或理论的角度考虑，都认为对这些问题的一些批评是必要的：从实际考虑，因为我们每天都得面对婚姻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从理论上讲，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找不到另一种情形会像俄狄浦斯情结这样与婚姻有着如此密切、又如此鲜明的关联，但这个问题依然研究甚

本文于 1927 年 9 月 3 日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举行的第十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宣读，载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9 卷（1928），第 318—331 页。经《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的许可重印。

② 这并不是说，这些问题几乎所有的方面在精神分析作品中均未被触及。我仅参考了如下著作：弗洛伊德的《“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紧张情绪》和《爱情心理学评价》；费罗恩兹的《性习惯的精神分析》；赖希的《性欲高潮的功能》舒尔兹—汉克的《精神分析导论》弗兰格尔的《家庭精神分析研究》。另外在《婚姻》（由迈克斯·马克尤斯编辑）中，我们找到了若黑姆的《婚姻的基本形式与变化》，霍尔奈的《婚姻的心理适应与不适应》、《选择婚姻伴侣的心理条件》、《典型婚姻冲突的心理根源》。

少。

（我对自己说）也许这是由于婚姻这个问题自始至终离我们太近，以致我们无法对之形成具有科学好奇心、抱负心的有吸引力的研究目标吧？但也可能并非是婚姻问题本身，而是婚姻中的若干矛盾冲突离我们太近了，离我们大部分个人生活经历中最为深刻的东西太近了。还有另一个困难：婚姻只是一种社会习俗，而我们对婚姻的若干问题采取的从心理学角度去进行研究的方法必然会受到阻碍；与此同时，这些问题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也迫使我们至少去努力理解它们的心理学基础是什么。

虽然为了完成现在的这篇论文，我仅选择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但是，我们首先必须努力去形成从婚姻中得到启发的有关基本精神状态的一个概念（虽然这仅是一个宽泛的概括），在《伊赫布克》中凯瑟林最近提出了一个既清楚又引人注目的问题。他在书中问道，尽管在所有年龄阶段中都有持续不断的婚姻不幸，但究竟是什么不停地驱使人类走入婚姻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幸运地不用被驱使这个概念，而将其归结为想要一个丈夫和孩子的自然渴望；我们也不用如凯瑟林那样求助于抽象的解释；我们能够更精确地确认，驱使人们走入婚姻的因素很明显地恰恰是一种期望，在这种期望中我们会发现由童年时代的俄狄浦斯情结所产生的所有以往的渴望，都会得到满足：那种想

成为父亲的妻子的渴望，想使他成为自己唯一拥有的渴望，以及去为他生孩子的渴望。了解到以上这些情况后，我可以这样说，由于我们承认在任何特定的时代，社会结构都将影响到这些永恒的渴望的形成，所以当我们听说婚姻制度不久就会走向终结这样的预言时，我们持极端怀疑的态度。

因此，婚姻在一开始就背上了危险而又沉重的无意识渴望的包袱。这是或多或少都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些渴望的持续循环发生，无论是有意地去深切洞察这一系列难题，还是我们从别人生活中得到的有关这些问题的经验，都不会对我们有太大的真正帮助。这里有两个原因来解释为什么这些无意识渴望的包袱是危险的：从本我的角度看，主体受到失望的威胁，不仅仅是因为实际上成为父亲或母亲，一点也不能实现童年时代的渴望在我们头脑中留下的憧憬，还因为——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这里的丈夫或妻子永远只能是一个替代品。失望的痛苦程度一方面依赖于主体的执着程度，另一方面又依赖于找到的目标与得到的满足感及那种特定的无意识性渴望的矛盾程度。

从另一方面来看，超我时时会受到旧日的乱伦禁闭意识觉醒的威胁，这种威胁是与婚姻伴侣相关的；这种无意识渴望得到满足的程度越高，其危险性也就越大。在婚姻生

活中这种乱伦禁闭的复活具有明显的典型性，稍作修改后便导致与孩子跟父母的关系中一样的结局；也就是说，直接的性目标让位于一种亲切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中，性目标便被抑制了。就本人而言，我仅知道，在一个病例中，这种发展变化还没有产生什么附带影响，妻子仍然爱着她的丈夫，并把他作为性目标，而这个病例中的女性在 12 岁的时候已经与她的父亲享受到了真实的性满足。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婚姻生活中性关系往往沿着这些轨道发展：性要求的强度由于渴望的被满足而有所减弱，而且特别是因为仅与一个目标有性关系时，这种渴望总是较容易被满足。但是这种典型现象后面较深层的动机，都可以追溯到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不断反复中，无论这个进程的发展速度有多么快，也无论它发展到多么特别的程度。^①除了偶然因素以外，能够体现早期状况的影响的方式和程度，将取决于乱伦禁闭情结在多大

在他的《性生活中最普遍的堕落方式》论文中（《论文集》，第 4 卷，第 203 页），弗洛伊德已经用类似的形式对此问题进行了攻击。文中他这样写道：“但是，本能的精神价值观会不可避免地随着它的满足而堕落这一说法是真实的吗？”他提醒我们想到一个习惯性的酗酒者和他喝酒后发生的事情——这种仅仅是消磨时间的生活方式使他如何变得越来越强烈地依赖于喝酒的特殊形式。弗洛伊德对于整个问题的回答与此处所给的答案是一致的，他提醒我们：在性生活中，原先的性目标会被一系列无休止的替代品所代替，“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真正令人满意的。”我仅对这一解释加以补充，人们不仅会经常地去寻找“真正”爱的目标，而且我们不得不考虑，人们还会不停地从目标中退缩出去，因为这种禁闭情结是如此容易地将其自身与那种渴望的满足联系起来。

程度上仍能使得相关的个体自身在思想深处将它感知为生活力量。尽管这种较为深刻的影响效果表现在不同的个体身上如此不一致，我们仍可以用一个通用的公式来描述：它们会导致形成一定的局限或条件束缚，因此，尽管有乱伦禁闭情结的存在，主体仍能够去忍受这种婚姻关系。

正如我们所知，这种限制在她们所选择的丈夫或妻子类型中就已能够为自身所感知。事实可能是这样的，被选择作为妻子的女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使他回想起自己的母亲，譬如种族或社会血统，智力才干或外貌，这个女人都必须与母亲呈现出一定的相似。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因审慎而激励、因第三者的介入而受感染的婚姻往往变得比真诚的爱情伴侣相对更好。虽然婚姻状况与源自于俄狄浦斯情结的那种渴望的相似性会自动产生主体早期的态度和心理发展的再现，但是假如这种无意识的期望还没有完全从开始时就与自身的未来的丈夫或妻子联系起来，这种反复就会较少发生。此外，当我们考虑到这种无意识倾向对于保护婚姻免受更为惨烈的灾难时，我们可以察觉出由中间介绍人来安排婚姻对象的这种习俗有其心理学智慧的一面，比如在东方犹太人中间就流行这样一种习俗。

我们可以看到，在婚姻自身内部，有多少与上述相同的情况可能是由我们头脑中所固有的精神习俗所造成的。关于本我，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殖器官的抑制情结，从对于爱

人简单的性节制到完全阳痿或性冷淡，这种性节制通常排除前期性乐或性交中方式变化的可能性。进一步讲，在自我方面我们会看到，他用多种形式试图去得到宽慰或寻找出合理的理由。上述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形式都等于是对婚姻生活的一种否认，而在女性身上，这种否认仅仅以外表认可她们已结婚了这样一个事实来体现。在内心里她们从来不去认同这一点，而且还经常伴随有一种对婚姻惊讶的内心感觉，或者倾向于签自己的处女名、像小姑娘一样做事，等等。

但是在良心要求为婚姻正名的内部需要的驱使下，自我通常采取对待婚姻的相反态度，给婚姻蒙上一种夸大的紧张感，或者更确切地说，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强调感受到的丈夫或妻子的爱。人们有可能杜撰这样一个词汇“因爱而合理”，而且还能看到与之相类似的真实案例。在法庭上，陪审团会对因爱而引发的犯罪给予一个较为宽大的判决。弗洛伊德在他的一篇关于女性同性恋的论文中说，我们的意识对任何其他事情都不会比我们感受到的对另一个人的爱或恨的程度表现出如此的不完善，甚至是错误的。这一点对于婚姻尤为适用。在婚姻中那种被感受到的爱的程度通常被过高估计了。我一直都在自问，我们对此该做何解释？人们易形成一种错觉，认为这种关系稍纵即逝，这实际上并不奇怪；但人们还会认为，在婚姻中，不仅是这种持久

的关系，还有较为频繁的性渴望的满足都试图消除对于性的过高估计以及与之相连的错觉。最显而易见的答案便是，人们极其自然地竭力为自身在婚姻生活中所包含的对于精神生活的极大渴求进行辩解，认为它们是强烈的感情的缘故。所以，他们牢牢抓住这种情感观念不再放手，即使当这种情感已经不再是生活的力量时，也是如此。然而，必须承认，这是一种相当肤浅的解释，这种解释可能源自于我们在自我中所熟知的合为一体的需要，为了证明在生活中如此重要的关系中的一种专心态度，我们很有可能将一个伪造事实归咎于它。

与俄狄浦斯情结的关联又一次为婚姻中的现象提供了一个较为深层的解释。我们看到，人们走入婚姻时所带着的神圣的戒律和爱的誓言以及对于丈夫或妻子的忠贞不渝，会被无意识地认为是第四圣诫的更新。因此，在婚姻中不爱伴侣对于无意识来说则变成了和不能实施与父母相关的戒律一样同等程度的罪行，在这方面——对于恨的抑制和对于爱的夸大——这种早期生活经历也被迫在每一个细节上精确地重现出来。现在我想，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只有假定爱本身能够成为一个必要条件，给被超我禁闭的关系添加了合理的外观，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这种现象。这样说来，对爱的保留，或者对爱的错觉将自然地起着一个重要的经济功能，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那么顽固地为爱而奋斗

的原因。

最后，当我们发现痛苦（如神经官能症）会成为一个条件，婚姻在这个条件下能够控制自己并能抵制非常强烈的乱伦禁闭情结时，我们将不会感到奇怪。为此目的，痛苦会呈现出如此多样的形式，以致仅予以一个简短的概述是不合适的。因此我将只提及它们中的少数几个。例如，一些人的家庭或职业生活条件，被无意识的安排管理着，因此，主体“为了家庭”必须超负荷地工作或者不得不去做一些无谓的牺牲，他或她往往会将其视为负担。又或者，在婚后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现象，人们牺牲了他们个人发展中的相当一部分，或者是职业生活方面的，或者是性格方面的，或者是智能方面的。最后，我们还必须将这种无以计数的案例计入在内，在这些案例中，一方可能通过有意识地去享受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变成了另一方要求的奴隶，并且心甘情愿地去忍受这种痛苦的地位。

关于以上所述的种种婚姻，有人会经常愕然地问自己：是什么原因使它不解体，相反却经常是如此稳定呢？正如我已指出的，精密的思考使我们看出，正是这些痛苦条件的满足才保证了这种结合的持久性。

分析至此，我们会意识到在上述的婚姻和那些以神经官能症为代价的婚姻之间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明确的分界线了。可是对于后者，我不想涉及，因为在这篇论文里我主要

是希望讨论那些能够被描述为正常的情况。

无须说明我在这次调查中对真实情况所做的一些肆意的处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所描述的每一种情况都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决定，而且还因为为了清楚地呈现它们，我已经将每一种情况都割裂开来，而实际上它们是不分彼此混合在一起的。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从所有这些情况中，我们可以察觉到某种东西，特别是在具有极高估测能力的女性身上，一种根本的母性态度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共性。单单这种态度就似乎使得婚姻对她们而言是可能的。她们好像在说：在我与丈夫的关系中，我不必充当妻子和女主人的角色，但可以仅担当母亲的角色。尽管如此，这还是表明了喜爱关怀和责任。这种态度在某种方式上对婚姻是一柄安全的护卫伞，但它是基于对爱的限制基础之上的，而且丈夫和妻子间更深层的生活可能会因此而变得枯燥无味。

无论在单个个案中这种太多和太少实践的两难境地的结果会是什么，在所有的案例中这结果又是极其精确的，其中有这样两种因素——非错觉和乱伦禁闭情结——随着对丈夫或妻子潜藏的敌意而产生的种种后果，这两个因素使一方疏远另一方，从而驱使他或她不愿意地去寻找新的爱情目标。这就是产生一夫一妻制“问题”的基本情况。

还有其他的渠道可以通向由此解放的力比多——升华、压抑、对以前目标的欲力投入压抑以及通过孩子的发泄

途径。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其他人会成为我们的恋爱目标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童年时代的印象与它们的第二次精细化有如此大的差异，因此这种种印象实际上容许较为众多不同类型的选择目标，这一点是很正常的。

基于此，这种寻求新目标的冲动（又是在相当多的正常人身上）有可能从无意识源泉中获得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因为虽然婚姻代表了一种对幼年渴望的满足，但这种满足也只能在主体的发展使他（或她）将真实的自我等同于父亲或母亲的角色时才能获得。无论何时，当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从这种虚构的模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总能看到同样的现象：谈论中的人在某些根本上会将自己依附于由父亲、母亲和孩子构成的三位一体中的孩子角色。当事实确实如此时，源自于本能态度的渴望便不能直接地通过婚姻得到满足。

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对带有童年渴望烙印的爱的具体描述。因此，为了说明婚姻的这种内在意义是如何阻止它的实践的，我仅需要将这些描述从你的记忆中唤醒即可了。对孩子来说，爱的目标总是固定不变地与一些被禁止的东西的印象联系在一起；然而对丈夫或妻子的爱并不仅仅是被允许的，除此以外，还有被压在心头的对婚姻责任的不祥预感。竞争对手（这里是指有被伤害

的第三者的情况)只能被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本质排除在外;实际上,从法律角度看,独占是一种特权(这里,根据遗传学,我们在一个不同的水平上,因为以上提及的种种情况都有它们在俄狄浦斯情结问题上的起源,而我将要提及到的问题可追溯到对一些特殊情形的依恋,在这些情形中,俄狄浦斯情结的矛盾冲突已不存在了)。我们可能再三地被迫去证实性欲的有效性或是性欲的吸引力,因为在自恋欲结构中存在对生殖器的不确定性和其相应的虚弱性。或者,只要有对同性恋的无意识倾向,便会有寻求同性目标作为恋爱对象的冲动。从女性的角度来讲,这也许会以一条迂回的道路来实现;要么丈夫可能被驱使与其他女人发生性关系,要么妻子自己可能去寻求充当第三者的角色。首先——从实践观点看,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性爱生活的不和谐持续不能解决时,主体将被迫把脆弱的感情集中到客体上面,而并不是集中到那些性渴望上面。

不难看到,任何一点这种幼年状况的保留对于一夫一妻制原则都是不利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它必定是不可避免地驱使丈夫或妻子去寻求新的恋爱目标。

此时,这些一夫多妻的念头便会与伴侣要求的一夫一妻关系,以及我们为自己在脑海里建立的忠诚理想发生冲突。

让我们先来看这两个要求中的第一个,因为很显然要

求别人作出放弃是一种比将要求强加在自己身上更容易的事。从广泛的意义上讲，这种要求的起源是清楚的；坦率地说，这是一种幼年时期想要独占母亲或父亲的愿望的一种再现。现在这种独占的要求对婚姻生活来说一点都不奇怪（正如我们所料想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能看到它的源泉）；正相反，这正是每一个完满的爱的关系的精髓。当然，在婚姻及其他关系中，它可能是一个纯粹出于爱所做出的要求，但从其起源上来看，它是如此根深蒂固地与破坏性倾向和对目标的敌意联系在一起，以致常常已没有丝毫的爱存在，这使得这种要求仅仅是一个遮盖敌对倾向得以实现的屏障罢了。

仔细分析便可知道，为了能够独占对方，当这种渴望采取与目标合作的形式时，它首先显示为口欲期的引申物。即使在普通的观察中，它也经常在其占有的贪婪性中暴露自身的根源，这种独占贪婪不仅表现为他不愿给予对方任何其他性的体验，还会妒忌她（他）的朋友、工作或兴趣。以上这些事实肯定了来自我们的理论知识的推测，也就是，在这种所有权中，正如在任何一种口头许诺的态度中一样，都有矛盾情感的相互掺杂。有时我们有这样一种印象，男人不仅比女人更精力充沛地在实践中把这种单纯而又完善的一夫一妻制的忠诚要求强加于妻子身上，而且男人要求独占的本能更强烈一些，而女人对于她们丈夫的这种要求就

要逊色得多了。这种情况有其重要的意识根源，如：男人希望确保他们的父亲地位，更精确地讲，可能是这样一种原因，这种要求的口欲起源在男性身上给了它更强烈的推动力，因为当母亲给他喂奶时，他至少在体验一种与恋爱对象部分媾合的经历，然而女孩子却不能追溯到她与父亲的关系中任何相应的体验。

在另一种结合中更进一步的破坏性因素是与这种渴望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成长的早期，这种想要独占母爱或父爱的要求遇到挫伤和失望，结果造成憎恨和妒忌的反应。因此，在这种要求的背后总是潜藏着一定程度的憎恨，在这种要求的实现方式中我们一般都能窥探到这一点；而且一旦从前的失望感再度出现时，它通常便会暴发出来。

早期的挫折不仅仅伤害了我们的目标之爱，而且伤害了处于最脆弱点上的自尊，并且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带有自恋创伤。因为这一原因，以后要求一夫一妻制关系，而且是用与早期失望所留下的心灵创伤的敏感性成比例的专横态度去要求这种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我们的自豪。在族长制社会里，独占的要求首先是由男性提出的，这种自恋的因素最为直接的证明便是荒唐地迷恋于“戴绿帽子”。同样，这一要求并不是出于爱而做出的，它仅仅是一个名誉的问题。在一个被男性主宰的社会里，它尤其会注定变得越来越名誉化，因为男人通常考虑更多的是他在同伴中的地

位而非爱。

最后，一夫一妻制要求是紧密地与肛门性虐待的本能要素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它和自恋要素一起给予一夫一妻制婚姻以一个特别的特征。因为与自由恋爱关系形成对照，婚姻中的占有问题是以一种两面性的方式与其历史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婚姻代表经济合作这一事实，与那种将女人看作男人附属品的观点相比已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因此，没有任何特别的肛门性特征的个人压力，这些要素在婚姻中开始生效并且将爱的要求转变为肛门性虐待的独占要求。这种起源的基本要素能够在旧日对不忠的妻子女们进行最残暴的刑事惩罚的方式中探查到的，但是在今天的婚姻中，在为了使这种要求得以实施而采用的一些方式中，这些基本要素仍能经常不自觉地显露出来：一种是或多或少的爱的迫使，另一种便是为折磨对方而设想出的戒备性怀疑。在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分析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两者。

因此，一夫一妻制理想从这些源泉中获得了它的生存力量，这些源泉看起来还是相当原始的。尽管它的所谓的低级起源，这种思想已经成长成为一种独断的理想，而且正如我们所知，它还分享着其他理想的演化进程，在这些理想中，被意识拒绝的那些基本本能冲动找到了它们实现的方式。在这个例子中，对此演化过程有所贡献的是这样一个

事实——我们那些被抑制得最强烈的渴望的实现同时也代表了一种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有价值的成就感。正如拉多在他的一篇名叫《一位焦虑的母亲》^①的论文中所指出的，这种理想形式能够使自我去克制其批判功能，否则，这种批判功能将使自我认识到这种永久性的独占要求虽然作为一种‘渴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种‘需要’不但是难以实现的，而且也是不公平的；进一步来讲，与其说它表明了对真诚的爱的渴求，不如说它更是代表那种自恋式的和肛门虐待式的冲动的实现。正如拉多所指出，这种理想形式给自我提供了一种“自恋的保险”在其掩护下，自我可以自由地去展示那些在另外情形下会遭受谴责的本能。同时，自我根据自身的判断提升这种要求，其理由是这种要求既正确又理想。

当然，这些要求是为法律所赞许的，这一事实极其重要。在那些源于认识到由于这种强迫的存在而使婚姻暴露出危险的改革建议中，人们通常会对后一点提出特别的异议。然而这种法律许可可能只是人们头脑中的这种要求所具有的外在和可见的价值表现。而且，当我们意识到这种独占的要求是基于一个多么根深蒂固的本能基础时，我们也会看到，假如现在有合乎理想的理由证明它是来自于人性的话，我们将以任何方式、任何代价去寻找一种新的形式

去取代它。除此之外，只要社会还珍视这种一夫一妻制，从心理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为了补偿它所强加给本能的限制，它就会有兴趣允许那些潜藏于这一要求之下的基本本能去得到满足。

这种一夫一妻制的要求因为有其普通的基础，所以在每个个体情形中它都可能从各个方面被加强。有时，它的一个组成成分可能会在本能经济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或者我们认识到的作为一般嫉妒中动机力量的所有那些因素都可能起作用。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种对一夫一妻的要求描述为免受嫉妒折磨的一种保险措施。

正如嫉妒一样，这种要求在另一方面可能会由于负罪感的重压而被抑制，它会在我们的耳旁窃窃私语道，我们没有权利去独占父亲。同样，这种要求还可能会被淹没在其他本能目标之下，如在人们熟知的潜在同性恋中所表现的那样。

正如我以前所说，一夫多妻的渴望与我们自己怀有的忠贞理想是相互冲突的。与其他人的那种一夫一妻的要求不同，我们自身对于忠诚的态度在我们幼年的经历中没有直接的固定模式，它的内容代表了一种对本能的限制，因此它很明显不是什么基本的，甚至在它最初开始之时也不是，但它却是一种本能的转变。

在研究这种一夫一妻的要求时，我们通常有更多的机

会接触女性，而不是男性，我们也在自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如经常被断言的那样）男性生来就有较多的一夫多妻的性情；首先因为我们对天生性情的问题知之甚少。但除此而外，这种主张明显只是一种偏袒男性的闲谈而已。但是，我想我们有理由问，是什么心理学因素使得忠诚在实际生活中在男性身上比女性稀有得多呢？

对于这个问题会有多种答案，因为我们无法将它与历史的和社会的因素分割开来。比如，男性在每一种方式上都能较有效地去实现他们对于一夫一妻的要求。我们会问，较多忠诚的女性会被这一事实间接地制约到什么程度呢？我想问题不仅仅在于女性在经济上的依赖地位，也不是由于女性的不忠而对其实施的严厉惩罚问题；在这个问题中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因素存在，这一点弗洛伊德在他的《童贞的禁忌》中已有明白的表述：主要是为了保证对于她的一些“性奴隶”标准，男性要求女性以处女的身份走入婚姻。

从分析角度来看，我想起与此问题相联系的两个问题。其一，既然在生理上怀孕的可能性使性交对于女性比男性更是一件瞬间的事情，难道这一事实没有一些心理学上的代表性吗？如果人们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个人倒觉得奇怪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知道得如此之少，以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不能将性交与特殊的生育本能隔离开

来，但我们总是在其精神超结构下成功地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深知，“精神”和“性爱”之间的分离是一种支配性的——实际上几乎是特别的——男性特征，而这种分离和忠诚的可能性有很大联系。是否这里所叙述的可能并不是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与性别之间的生理差异有精神相关的东西呢？

第二个问题源于下面的思考。俄狄浦斯情结在男性和女性身上所显示的不同结果可以这样系统地陈述：男孩会因他对自己的生殖器的骄傲而更为彻底地放弃他最初的恋爱目标，而女孩仍然对父亲本人保持着强烈的执着眷恋，但只有当她在较大程度上放弃她的性别角色才能明显做到这一点。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我们是否没有证据去证明，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两性间的区别使女性有更加严重的生殖器禁闭情结；是否，不确切地说，这种不同使得忠诚对女性来说更容易实现，正如性冷淡较之阳痿是普遍得多的情形一样，而这两种症状都是生殖器禁闭情结的表现。

到这里我们已涉及到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我们应该将其看作忠诚的必要条件，即生殖器禁闭情结。然而，我们只要看一看为了达到这一情结，性冷淡女性或性功能衰弱的男性容易产生这种不忠诚特征的倾向，就会感到形成忠诚的条件也许是正确的，但当然还需要一个较准确的陈述。

当我们看到那些具有强迫性特征的忠诚的人们通常将

性负罪感隐藏于传统的禁闭^①之后时，我们便向前迈进了一小步。所有被传统禁止的东西——包括未经婚姻许可的所有性关系——与无意识禁闭情结一起变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就赋予传统自身以较大的道德重要性，如我们所期望的一样，那些只有在一定条件下结了婚才会感到自由的人通常会遇到这种困难。

现在，这种负罪感特别在夫妻关系中能够被体验到。婚姻的一方不仅仅无意识地假设另一方是自己孩提时代垂涎和热爱的父母的角色，而且更有甚者，对旧日的禁闭和惩罚的恐惧会在（她）的心里复现并折磨着（她），特别是以前对于手淫的负罪感现在又变得活跃起来，在第四禁戒的压力下，制造出同样一种夸张的责任感的负罪氛围，或者形成一种易怒反应。或者在另外的情形下，这种氛围变成一种不真诚，或者形成一种焦虑反应，老是害怕对对方隐瞒任何东西。我往往这样假定，手淫与不忠诚会比简单地通过负罪感的方式更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事实是，在手淫开始之初，与父母相关的性渴望便找到了其机体表达方式。但在早期的手淫幻觉中，父母通常是被其他的目标所取代的；因此，这些幻想及最初的渴望代表了孩子对父母最早期的不忠诚。这也同样适用于与兄弟、姐妹、伙伴、佣人

西·格瑞特·伍德赛特在《克瑞斯蒂恩·拉朗施塔特》中非常明显地表示了这种关联。

等人之间的早期的性体验。正像手淫在幻想方面代表最早的不忠诚一样，它又在现实中被这些体验所代表。在分析中我们发现，对这些早期的事件仍然保留着特别敏锐负罪感的人们，无论这些事件是幻想还是真实的，就因为这一原因，他们以特殊的焦虑来回避在婚姻中的任何不忠诚，因为这意味着以前的负罪感会再现。

通常正是这种旧日执着眷恋的保留会在那些带有强迫性忠诚的人（姑且这么说）身上再现出来，尽管这种人有强烈的一夫多妻的渴望。

但忠诚也可能有另外一个明显不同的心理学基础，这个基础可能会同时存在于有上述情况的同一个人身上，也可能完全独立地存在着。因为我提到过的这种或那种原因，我们说的这种人对于独占的伴侣要求特别敏感，而且作为反应，他们也会对自己提出同样要求，从意识角度来讲，在他们看来，只有自己做到了才能对别人提出要求。但在这种情形中，较深层的原因在于对全能的幻想，按照这种幻想，一个人对其他关系的放弃会像魔幻的动作一样，迫使对方也作出同样的放弃。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在对一夫一妻要求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动机，这一要求是以什么样的力量形成一种矛盾冲突的。用一个物理活动的比喻，我们可以称这些相互对立的推动力为婚姻中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我们将不得不说，在这

里我们有一种三位一体的力量，其中每个对手都实力相当。两者都从源自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最直接、最基本的渴望中获得其动机力量，这两种推动力在婚姻生活中都应被动员起来，虽然它们在活动程度上会有各种可能的不同，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还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原则去解决婚姻生活中的这些矛盾冲突。甚至在单个案例中，虽然我们能够还算清醒地看到是什么动机在起作用，但只有当我们根据分析经验回过头来反观时，我们才会察觉出究竟是哪一种结果会随着一种或另一种行为而产生。

简而言之，我们观察到一夫一妻的基本原理不仅被违背，而且被遵守时，恨的要素都能够找到一个排泄口，而且会以极不相同的方式发泄出来；我们还观察到，恨的情感是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直接地指向伴侣的，而且它们在两方都起着削弱丈夫和妻子之间脆弱的连结的作用，婚姻生活本应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留给道德家们，让他们去决定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

然而，这样获得的洞察并没有使我们在这样的婚姻冲突面前束手无策。发现滋长冲突的无意识源泉不仅削弱了一夫一妻制的理想，而且减轻了一夫多妻制的倾向，从而使这些冲突的解决变得可能。我们已获得的知识还在另一方面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当我们看到两人婚姻生活中的这种

冲突时，我们通常容易不由自主地想到，唯一的解决方式便是夫妻分手。我们深信我们对于这样的未经检核的个人印象必须保持一种完全的保留的态度。我们对每一个婚姻中的这些或那些冲突的不可避免性理解得越深，我们的确信将会越深刻，在现实中控制这些冲突的能力就越强大。

月经前的紧张^①

月经这样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已成为困扰我们的焦虑幻想的焦点和起点，这一发现并不会使我们感到吃惊。当我们更加开明地看到焦虑与性的一切都密切相关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的经验来自于对个别病人的分析，以及给人最深印象的人种学事实。男女都有这种焦虑幻想，原始人的禁忌中具有男人非常害怕女人的有力证据，这一害怕确实围绕着月经这一中心。对每个女人的分析都表明，随着月经出血的出现，她体内主动和被动特征的激烈冲突和幻想都被唤醒了。虽然我们对这些幻想及其对女人经历它们的意义还缺乏足够的理解，但是它已经给我们提供了

载《精神分析教育学杂志》，第 5 卷 第 5/6 期(1931) 第 1—7 页。经卡伦·霍尔奈基金会许可翻译重版。

这儿我将不深入探讨月经禁忌的原因，我仅仅指达里深刻而有益的论文《神话学与阉割情结》(1927)和《月经情结的起源》(1928)，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又参见 C. D. 达里的信，载《精神分析教育学杂志》第 5 卷 第 5/6 期。

切实、有用的工具，使我们能够对同时发生的心理性和功能性月经紊乱产生治疗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这一现实的关注还很少，事实上，失调不仅出现在月经期，而且更常见于月经开始来潮的前几天，尽管后者不太受重视。这些失调虽然人们一般是很清楚的，包括种种程度的紧张，从讨厌一切的感觉、无精打采或迟钝感、自我蔑视的强烈感，到明显的压抑和严重沮丧感。所有这些感觉都经常和易怒感、焦虑感混合在一起；虽然它们频繁地出现在健康妇女身上，但人们通常把这些心情波动看作是正常的，人们并认为这是病理过程；此外，很少把它们与心理失调或转化成歇斯底里症相联系。

显然，这与对月经出血幻想的充分介绍并没有关系。它们也许真的变成实际月经失调，但通常出血一开始，它们就伴随着解脱感而缓解了。有些妇女每次看到月经前焦虑、月经后便得到解脱的联系时都很吃惊，解释她们月经来潮时的解脱感时坚持说，所有这些讨厌的恶梦只是受整个心理过程的迷惑而已。这些状况与出血和对出血的解释根本无关，还有另一个因素支持这一理论，即它们常出现在月经来潮之前；也就是说，它们出现在与下意识中预感到出血的联系也不会发生的时候。月经不仅仅是出血，在这一点上心理过程与生理过程是相似的。

对从生理角度看问题的内科医生来说，他们不像我们

这么关心月经前的紧张，因为他们知道，全部过程的基本、也许是最基本的事件发生在出血开始之前，他们更容易满足于心理负担是以生理为条件的一般概念。

简单回顾一下事情的过程也许是有益的。大约在两次月经之间一个卵细胞在一个卵巢内成熟，周围的薄膜（卵泡）破裂，如果受精的话，卵细胞通过输卵管游到子宫着床。卵细胞保持两个星期的存活期有待受精。同时卵细胞的成熟薄膜变成脂肪黄体素。这种黄体在功能上是一种内分泌腺——即分泌出的一种最近才被分解成纯净形式的物质。这种物质被称做“雌激素荷尔蒙”，因为它甚至在拿掉卵细胞的老鼠身上也能产生动情周期。这种雌激素荷尔蒙作用于子宫，使衬在子宫内的分泌粘液膜发生同怀孕时一样的变化；也就是分泌粘液膜变成海绵体，充血，位于子宫内的腺充满了分泌物。如果不发生受精的话，粘膜的表层就脱落，为发育胚胎而聚集起来的物质被排出，死卵细胞被附随的出血排除出去。同时，分泌粘液膜的再生又开始了。

雌激素荷尔蒙的功能在这以后并未停止，其他生殖器官也变得更加充血，比如乳房，人们经常甚至在月经来潮以前就能发现乳腺细胞的实际长大。还有，荷尔蒙影响血液、血压、新陈代谢和体温的变化。由于有这样的影响范围，我们描述女人生活中的巨大节奏周期，其生物意义在于每月一次为生育过程的准备。

这些生物事件的知识本身，并没给我们提供有关月经前紧张这一特定心理学内容的任何信息，但是理解它们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某些心理过程与这些生理事件相平行，或者是由这些生理事件造成的。

这种观念总体上说并不新鲜，伴随着被描述的事件而出现性力比多的增加是一个已被证明的生物学事实。这一平行事件在动物身上能清楚地观察到，正是因为这一联系，荷尔蒙得到雌性激素的名字。我们同意如哈威洛克·艾利斯等著名研究者的意见，他们假设人类女性也存在着力比多增多的同样心理平行过程，所以女人将面临必须自身把握力比多紧张增加的问题，这一问题因文化限制而变得困难。也就是说，如果有机会满足基本本能需要的话，那么这一任务就会顺利完成；只有因外在或内在原因得不到这样的机会时，问题才会变得困难。这一联系也在健康女性身上得到了证实，即在相对平稳的心理 - 性发育的女性身上，她们的月经失调在爱情生活实现期间完全消失，在受到外界挫折或感到不满时重现。对导致这些紧张出现的心理机制的观察表明，我们在这儿交往的这些女人因为某种原因，对待挫折时非常地无能为力并以愤怒作出反应^①，她们不能将任何或仅仅一些愤怒向外发泄，而只能转向反对自己。

这种反应采取的形式与其复杂过程的普通分类无关。

在因情绪压抑而不满的女性身上，我们发现了更严重的症状和更复杂的心理机制。我们感到，她们尽管失去一些活力，但也许仍然能够保持不安的平衡。可是，当力比多增加时，冲突占了优势，再也不能保持平衡。由此出现回归童年的现象，并因人而异，其病兆表现为幼儿期反应的再现。

这些反应得到临床观察的支持，几乎没有争议。但是，我们还得自问，这一因果联系是否有条件限制？因为月经前的紧张，尤其是温和型的，虽经常出现，然而不像我们估计的那么频繁，甚至不是每种神经症中都与它们有关。为了回答后面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在大量的神经症中，把性力比多的表现及具体的描述和月经前紧张的出现和不出现联系起来。这也许使个人状况的一些方面更加容易理解。首先我们必须重复这个问题：像这样的力比多增加确实是月经期紧张的具体动因吗？

实际上，我们只考虑了心理事件的部分方面的影响，从而大大忽视了其他在生理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我们不应忘记，力比多的增加在生理意义上为胎儿作了准备，基本器官的变化为怀孕作了准备。

所以，我们必须问一问：可否想像女人对这些过程是无意识的呢？怀孕的身体准备就绪是否可能在精神生活中表现出来呢？

回顾一下我们的经验吧。我自己的观察确定无疑地肯定了这种可能性。T病人自发地报告说，月经来潮以前她的梦总是感性而红色的，似乎感到处于邪恶的压力之下，感到身体沉重而丰满。月经的来潮给她带来解脱感。她常以为孩子来到了。她生活中有这样一些情况：她是老大，有两个妹妹；母亲凌驾于众人之上，爱争吵；父亲一心扑在病人身上，比较尊重妇女。一起旅行时，她和父亲常被当作一对夫妇。十八岁时，她嫁给长她三十岁、人格和外貌酷似父亲的某一男人。她和这个男人相当快活地生活了好几年，没有性关系。那段时间里她在情感上极其不喜欢孩子。后来，她渐渐地对婚姻和生活环境变得不满，对孩子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然后，她决定从事一份职业，在护士学校教师还是助产士之间犹豫以后，选择了前者。在当老师的多年时间里，她对孩子有一种特别的爱护性情；后来这一职业又使她不愉快。她开始体验到这些孩子不是她的，只是别人的。性欲上她仍保持排斥，除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以外，那时不是考虑子宫怀孕，而是患了子宫肌瘤，不得不承受子宫切除手术。她的性欲只是在要孩子的愿望不能实现以后似乎才变得明显起来。我希望这一极端未完成的图画足以说明一个事实——在这个案例中想要个孩子的愿望受到了最大的压抑。她的神经结构表现出强烈的慈母心和孩子气两个方面，这一神经结构总体上是同一中心问题的具体说明。

我不想深入探讨这个案例中是什么加强了想要孩子的愿望，从而导致了这么强烈的压抑。富有启发性的证据足以说明，正如其他类似性质的案例一样，由于以前与破坏性冲动的联系，想要孩子的愿望被过度地集中，并带着焦虑和负罪感。

如此压抑，若走极端的话，会导致完全而有效地拒绝要自己孩子的愿望。我发现，毫无例外地与其他神经结构完全无关，在那些月经前出现紧张的案例中，人们可以相对肯定地假设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想要孩子的愿望，同时对这一愿望的抵抗又是如此强烈，以致从来没有实现它的可能性。这使我们困惑，引导我们假设当机体为怀孕准备时，被压抑的要孩子的愿望被动员起来，同时伴随着对立的欲力投入，导致精神平衡的失调。反映这种冲突的梦常常出现在月经来潮前夕。然而，需要有更确切的检验来核对与以某种方式体现母性的梦相巧合的频率。例如：月经前的紧张定期地出现在这样的病人身上，她们表现出的要孩子的愿望很强烈，但因害怕如果实现了梦境，生孩子各个阶段的问题又引起了她们的焦虑，从害怕性行为到包括婴儿护理；紧张同样出现在这样的女人身上：分娩时死亡的恐惧阻止她实现强烈的生孩子愿望的可能性。

在我的经验中，月经紧张状态在生孩子愿望伴随着冲突、但确实发生怀孕和分娩的案例中发生较少。这儿我想

起几个女人，她们的母亲身份明显在她们生活中占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在她们身上，联想的无意识冲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现出来，如早晨恶心、分娩收缩较弱，或过分保护孩子。

这儿我十分谨慎地总结一下我的看法。很显然，这些紧张可能出现在想要孩子的愿望被实际经历所加强、但由于某种原因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案例中。力比多的增加并非是唯一的原因，这一点通过对一个慈母心很重但充满冲突的女人的观察变得很明显。她承受特别失调的月经前紧张，尽管那时她和一个男人的性关系通常相当满意。可是，因为无法抗拒的原因不可能实现生孩子的愿望，这一愿望在那时还特别强烈。月经来潮前她的乳房总是涨大，在这一阶段，她不断地想到有关孩子的问题，有时假想避孕工具及其影响和可能的伤害。

我还未深入研究的另一现象，即随着月经来潮时心理冲突的明显解脱，表明力比多的增多确实影响了月经前紧张的出现，但那不是具体动因。因为力比多的增加贯穿整个月经期，所以情感紧张的突然消弱无法从这一点得到解释。不管怎样，经血的出现就终止了怀孕的幻想，正如 T 病人的案例所示，“现在小孩降临了”。各人的心理过程也许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在上面提到的一个案例中，奉献思想是前提，当事人在月经来潮时会这样想：“上帝已接受了

这一奉献。”同样，紧张的解脱根据个体不同的形式，有时依赖于以出血为代表的幻想的无意识实现，或依赖于超我的放松，因为强烈拒绝的幻想现已结束，它们随着月经的开始而停止是一个基本事实。

总之，从以上所说的所有观点中得出这样的假设：月经前的紧张由于为怀孕准备的生理过程而直接消除。至此我对这一联系已如此肯定以至于出现失调时我能预计到，在疾病和个性的核心部分会出现涉及想要孩子的愿望的冲突。我相信我的这种预计从未失误。

我要再一次界定一下区别于妇科医生的概念。我们不是在处理一个基本的弱点——一个导致人们得出妇女效率较低的宣传性结论的条件，而是认为妇女在周期性的特殊时期表现的负担，仅仅对那些母亲身份思想伴随着巨大内心冲突的妇女才有。

我十分相信母亲身份表现出的女性问题，比弗洛伊德估计的更关键。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想要孩子的愿望是“绝对属于自我—心理学”的，^① 是因为缺少阴茎而失望的表现，它只是辅助性地出现^②，所以不是主要的本能。

相反，我觉得想要孩子的愿望确实从对阴茎的愿望中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肛门性欲的本能转变》（1916）载《论文集》第2卷第164—171页。

^②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载《论文集》第5卷第175—180页，1956年。

得到很多辅助性行为的强化，但是，这一愿望本身是主要的，它本能地深深扎根在生理学之中。对月经前紧张的观察只有建立在这一根本概念之上似乎才可理解。我的确赞成这样的观点：这些观察显示，要孩子的愿望满足了弗洛伊德提出的“内驱力”的所有条件，所以，指向于母亲身份的内驱力是“连续流动的躯体内刺激的心理表现”的一种情况。^①

弗洛伊德《性学三论》，载《论文集》第 5 卷。

两性之间的不信任^①

今天，我在与各位谈论有关异性间的关系问题时，需要先向大家表示抱歉，我主要关心的不是治疗这个对医生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只是在最后才会简单涉及。我更关心的是向你们指出异性间不信任的诸多原因。

男女之间的关系与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其倾向与重点来说，都是侧重于这些关系的肯定方面。我们倾向于认为异性间的爱是根本的、确定的因素，而敌意是偶然的、可避免的事件。虽然我们对这样的口号并不陌生：“性别之战”、“性别间的敌意”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倒是使我们过分集中在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上，这种关系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观点偏向一边。实际上，从众多案例史的回忆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爱的关系很容易被明

^① 1930年11月20日在德国妇女医学协会柏林-勃兰登堡支部会上宣读。《异性间的不信任》载《女医生》第7期(1931)，第5—12页。经卡伦·霍尔奈基金会的同意翻译重版。

的和暗的敌意所毁。另一方面我们又非常急于抱怨个人不幸、不配对、社会或经济原因等方面的困难。

我们发现造成男女关系不好的个人因素也许是相关的。不过，由于爱的关系的障碍非常频繁地出现，或定期出现，我们不得不自问：个案中的障碍是否不起因于共同的背景？这种轻易而频繁出现的异性间的怀疑是否具有共同性质？

想在一次简短的讲座中对如此广阔的领域对各位介绍一个完整的调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甚至将不提及像婚姻这样的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影响诸因素，我仅仅想随意选择一些心理学上可理解的、附属于两性间敌意和紧张的原因和影响作为话题。

我从一些平凡的事说起，也就是说，许多这种怀疑的气氛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辩解的，它显然与个别对象无关，而是与自觉感情的强烈和抑制自觉感情的困难有关。

我们知道或模糊地感到，这些自觉感情能导致入迷、失控、投降，这意味着跳入无边无际的大海之中，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真正的感情是如此难得。因为就像成功的商人一样，我们不愿意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宁愿有所保留、总是准备着撤退。尽管如此，由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都自然地害怕在另一人身上消失自己，那就是为什么发生在爱上面的事也发生在教育和心理分析上；每个人都认

为自己知道他们的一切，但很少有人真正知道。人们容易忽视自己付出的那么少，可是更多地觉得对方身上的同样缺陷，有一种“你从未真正爱过我”的感觉。一个妻子因为丈夫没把他所有的爱、时间和兴趣放在自己身上，而怀有自暴自弃的思想。她不会注意到自己有多少敌意、隐藏的仇恨和敌对行为是通过态度表现出来的。她只因自己怀有大量的爱而感到绝望，同时对对方缺乏爱感觉最强烈、看得最清楚。即使厌恶女人的斯特林伯格有时也设法辩解地说，他不恨女人，而是女人恨他、折磨他。

这儿我们根本不是在讨论疾病现象，在病理学案例中我们只看到一般正常现象的扭曲和夸张，任何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容易忽视他自己的敌意冲动，但在自己的罪恶意识的压力下，可能把它们投向对方。这一过程必然造成明的或暗的对对方的爱情、忠贞、真诚或仁慈的不信任。这就是为什么我宁愿说两性间的不信任，而不说仇恨；因为这更符合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对不信任更熟悉。

在我们正常的爱的生活中，失望和不信任几乎无法避免的进一步原因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强烈的爱情激起了我们隐藏着的全部期望和对幸福的渴望，这些期望和渴望在我们内心深处处于麻痹的状态。所有无意识愿望现正等待着被实现，它们的性质相互矛盾，向无边际的全方位扩展。爱的对方应该既强壮又无能，既控制我们又被我们

控制，既禁欲又有感觉。他应该既强奸我们又很温和，既有时间专一地和我们在一起又努力投身于创造性工作。只要我们假设他实际上能实现所有这些期望，我们就给他性欲之光的过高评价。我们把这种过高评价的量值视作对爱情的衡量，而现实中它仅仅表达了我们期望的强度。我们这些要求的性质本身就注定这些愿望不可能被实现，这儿就是失望的来源所在。我们也许能以或多或少有效的方式对付这些失望。在有益的情形下我们甚至不必意识到众多的失望数量，就像我们没意识到暗藏期望的广度一样。然而，在我们身上保留着不信任的痕迹，就像孩子发现父亲根本不能为他得到天上的星星时留下的不信任痕迹一样。

至此，我们的考虑肯定既不新颖又无具体分析，而且在过去常被较好地固定格式化了。分析方法从以下这些问题开始：人类发展中导致期望和实现期望之间矛盾的特殊因素是什么？什么造成了它们在特殊案例中的特别意义？先让我们从一般考虑着手。人类与动物之间有一个基本区别——即婴儿无助和依赖的阶段很长。童年乐园经常是成人喜欢用来欺骗自己的一个幻觉。对孩子来说这一乐园充满了太多太多的危险魔鬼。与异性的不愉快经历似乎不可避免。我们只需回忆一下，即使在童年早期，孩子就拥有类似于成人又不同于成人的激情和本能性欲的能力。孩子在驱动力的目的方面是不一样的，但最重要的不同是其要求的

纯洁完整性。他们发现很难直接表达欲望，表达出来的地方又不被严肃地看待。他们的严肃性有时被视为可爱或被忽视或被拒绝。总之，孩子将承受被拒绝、出卖和说谎的痛苦而耻辱的经历。他们还可能置于父母或兄弟姐妹之下。当他们玩弄自己的身体以寻求被大人拒绝的快乐时受到训斥和威胁。孩子面对这一切时相对无力，一点儿也不能或只能少许公开表现他的愤怒，也不能通过智慧理解来抓住这一经历。所以，气愤和敌对行为以过度幻想的形式被禁锢在体内，这些幻想几乎达不到意识的曝光，它们在大人的眼里是罪恶的行为，从用武力、偷窃到杀人、放火、砍碎、使窒息。因为孩子模糊地意识到他体内的这些破坏力，根据同态复仇法律，他感到同样受到大人的威胁。这儿就是这些幼儿焦虑的起源所在。没有孩子能完全逃脱这些幼儿焦虑。这已经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前面所说的爱情恐惧。正是在这最无理性的区域，童年旧日来自父亲或母亲威胁的恐惧被重新唤醒了，迫使我们本能地采取守势。换句话说，爱的恐惧总是搀杂着恐慌，害怕对他人可能做出什么，或他人可能对我们做出什么。就拿阿鲁岛（Aru Islands）上的一个情人来说，他决不会把一卷头发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心上人，因为如果引起争论的话，他的心上人会把它烧掉，从而致使对方生病。

我想简单地描绘一下童年的冲突怎样会影响后来生活

中与异性的关系。让我们以一个典型情形为例：由于对父亲的巨大失望而遭到严重伤害的少女，将这种想从男人那儿接受的内在本能希望转变成强迫去夺取的怀恨愿望，从而奠定了向后来的态度直线发展的基础，根据这一态度她 will 不仅拒绝母性本能，而且只有一个驱动力，即伤害男性，剥削他，吸干他。她成了吸血鬼。让我们假设有一个从希望接受到希望拿走的类似转移，再进一步假设后者希望由于罪恶意识的焦虑而被压抑；那么我们这儿就有了构造某一类女人的情意丛，这类女人因为害怕每个男人都会怀疑她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所以不能与男性和睦相处。这确实意味着她担心他会猜出她压抑的渴求。或者通过把压抑的愿望完全射向他，她会想像每个男人只是想剥削她，从她身上想得到的仅仅是性满足，完事后就抛弃她。或者我们假设过分谦虚的反应形式将笼罩着被压抑的权力驱动。那时，我们发现，有一类女人回避索求或接受丈夫的任何东西。然而，这样的女人由于被压抑的东西恢复了，对未表达出的、常常是未形成固定格式的、未实现的愿望，作出忧郁消沉的反应。从而，像她的对方一样不知不觉地从煎锅跳进火中，因为忧郁消沉比直接对抗行为对他的伤害更深。压抑对男性的敌对行为经常使她丧失重要活力，然后她觉得面对生活束手无策，把自己无助的完全责任转移到这个男人身上，掠夺他的生命力。这儿你们看到这类女人在无

助和幼稚的伪装下控制着她的男人。

这些事例说明女人对男人的根本态度是怎么会被童年的冲突而阻碍的。为简化起见，我只强调一点，但这点对我似乎很关键——即在母亲身份发展过程中的阻碍。

现在我继续追溯男性心理学的某些特征。甚至那些有意识地保持与女人的肯定关系并高度尊敬她们为人类的男人，怎么会在内心深处隐藏着对女人的不信任呢？这种不信任是怎么反过来与他们形成性格时期所经历的对母亲的感情联系起来呢？虽然诸如这样的分析性观察可能是非常有启发的，但是我不愿意追随个人发展的航道。我倒愿意把注意力放在男人对女人的某些典型态度上，以及这些态度在历史的种种时代和不同的文化中是怎样出现的，不仅表现在与女人的性关系上，而且更经常的是表现在非性欲的情景，比如对女人的一般评价方面。

我随意选择一些事例，从亚当和夏娃开始。就像《旧约全书》中记载的那样，犹太文化是直言不讳的家长式的。这一事实在他们的宗教中反映出来，即宗教里没有母系女神；反映在道德和风俗习惯上，则允许丈夫有权利简单地把妻子打发走就可解除婚姻关系。只有对这种背景有所意识，我们才能看清在亚当和夏娃的历史上两个事件中的男性偏见。首先，女人生育的能力被部分否认、部分贬低：夏娃是由亚当的肋骨制成的，她被诅咒在悲痛中怀上孩子。其次，

把她诱惑亚当偷吃知识果解释成性诱惑，这样女人就以性欲迷惑者的形象而出现，使男人陷入悲惨之中。我相信正是这两个要素，前者出于愤恨，后者出于焦虑，从最早期到现在一直破坏着异性间的关系。让我们简捷地接下去看看。男人对女人的恐惧深深扎根于性欲，正如这一简单事实所示：他只害怕有性吸引力的女人，虽然他强烈渴望得到她，但不得不囚禁她。而在另一方面，老年妇女却深受尊敬，即使在年轻女子被畏惧和镇压的文化中也是如此。在一些原始文化里，老年妇女在部落事务中有决定发言权；在亚洲民族中她也享有很大的权力和很高的声望。另一方面，在原始部落中，女人在整个性成熟阶段都被禁忌包围。阿兰达部落的女人能够魔术般地影响男人的生殖器，如果她们对着草的叶片唱歌，然后把它指向一个男人或扔向他的话，他就会生病或完全失去生殖器，女人引诱他走向毁灭。在某个东非部落，丈夫和妻子不睡在一起，因为她的呼吸会削弱他。如果一个南非部落的女人在睡着的男人腿上跨过，他将不能跑步。因此，打猎、打仗或钓鱼以前，一般规定性警戒两到五天。甚至更严重的是害怕月经、怀孕和生产，行经期中的女人被广泛的禁忌所围攻——男人如果触摸来月经的女人的话就会死去。在所有这一切的深处有一个基本思想：女人是和幽灵沟通的神秘的人类，从而具有能用来伤害男性的魔力。所以他必须使她处于屈从地位，从

而来保护自己、反对她的权力。因而孟加拉的米利族人不准女人吃老虎肉，惟恐她们变得更强壮。东非的瓦塔威拉人不让他们的女人知道生火的艺术，惟恐女人成为他们的统治者。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为了女人顺从而举行仪式；一个男人假扮成恶魔来威胁女人。麦加的阿拉伯人把女人驱逐出宗教庆典，以阻止女人和他们的统治者之间的亲密行为。我们在中世纪发现类似的风俗习惯——少女的礼拜仪式与焚烧巫婆连在一起；完全被剥夺性欲的对“纯洁”慈母心的崇敬与性诱惑女人的残酷毁灭相邻。这儿又一次暗示了潜在的焦虑，因为巫婆与恶魔交往。如今，随着敌对行为方式的更人道，我们只是象征性地焚烧女人，有时带着公然的仇恨，有时带着明显的友好。在任何情况下“犹太人该烧”^①。在友好和神秘的判决仪式^②上，许多美好的东西是说女人的，但恰恰不幸的是，在上帝给予她的自然状态中，她和男人不相等。麦比乌斯指出女性的头脑比男性的轻，但这一点不必以如此残酷的方式来表达。相反，可以强调的是，女人一点不比男人低贱，只是不同而已。可是不幸的是，女人较少享有或根本没有男人如此高度尊敬

原译者注：引自于十八世纪德国作家、幽默家、启蒙和理性观点的发言人高邵尔德·艾夫莱姆·莱辛的《智者纳旦》一文。这一词句成为了俗语，其意思是说不管他的行为多么有价值、用意多么好，作为犹太人的德行，人是有罪的。

② autos-da-fé：中世纪天主教会异端裁判所对持“异端”者进行的公开处刑，字面意义为 act of the faith（宗教正统行为）——译者注

的人类或文化品质。据说她深深扎根于个人和情感领域，那是很精彩的；但是很不幸，这使她们不能处事公正和客观，所以使她没有资格在法律和政府及精神社团里占有位置。据说她只能在家从事性爱。精神爱神与她最深处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她与文化趋势有分歧，所以正像阿西阿斯直言不讳地说的那样，她是次等人类。女人也许勤奋、有用，但是，哎呀，她不胜任生产性的和独立的工作，确实，可悲的、血淋淋的月经和分娩妨碍了她的真正成就。因而每个男人都像虔诚的犹太人祈祷时那样暗暗地感谢上帝没把他创造成女人。

男人对母亲身份的态度是一个广阔而复杂的方面。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这一领域没有问题，即使厌恶女人的人也显然愿意尊重作为母亲的女人，在一定条件下崇拜她的母性，就像前面提到的贞女礼拜仪式一样。为了得到更清晰的画面，我们得分清两种态度：男人对慈母心的态度，正如贞女礼拜仪式上以最纯洁的形式表现的那样；对母亲身份的态度，正如我们在古代母亲女神的象征主义中看到的那样。男性总是赞赏慈母心，如女人表现的某些精神品质，即有教养、无私、自我牺牲的母亲；因为她是能实现男人的所有期望和渴望的理想女人的化身。在古代母亲女神眼里，男人不尊敬精神意义上的慈母心，而是尊敬最基本意义上的母亲身份。母亲女神是土地女神，像土壤一样肥沃，她

们带来新生命并抚育它。正是女人的这种创造生命的力量，一个可与自然力相比拟的力量，使男人充满了羡慕，这确实实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因为对自己缺乏的能力而不带愤恨地保持欣赏，是违背人类本性的。所以，男人在创造新生命中的微薄参与对他来说成为一个巨大的刺激，刺激他去创造男人可以创造的东西。他创造了可以引以自豪的价值 国家、宗教、艺术和科学基本上是男人的发明 我们的整个文化都带着男性痕迹。

然而，正如在其他地方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这儿也同样发生：即使最大的满足和成就，如果产生于升华的话，也不能完全弥补自然没有赋予给我们的东西。所以一直存在着男人普遍愤恨女人的明显残余。这种愤恨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有所表现，男人为反对女人侵犯他们的知识领域的威胁，采取怀疑的防御策略；因此他们倾向于贬低怀孕和分娩，而过分强调男性性功能。这种态度不仅仅表现在科学理论上，而且在整个异性关系和一般的性道德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母亲身份，尤其是不合法的母亲身份，不能充分得到法律的保护。相反，有大量的机会满足男性的性欲需要。强调不负责任的性放纵以及把女性贬低成纯粹生理需要的对象是这种男性态度的进一步后果。

从巴乔芬的观察中我们知道，这种男性文化至上的情况并不是从人类一开始就有的，最初是女人曾经占据了中

心地位，这就是所谓的母氏制。那时的法律和风俗习惯以母亲为中心。杀母在当时正如索福克勒斯在欧墨尼得斯身上反映的那样是不可饶恕的罪状，而杀父相比之下只是一个小罪状。男人只是在有历史记载的时代才开始有较小的变化，在政治、经济和审判领域以及性道德领域发挥领先作用。目前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女人再次敢于为平等而战的斗争阶段，我们还无法确定这个阶段的持久程度。

我不想被误解，以为我是在暗示所有的灾难都是由男性至高无上造成的，如果女性被给予优势的话，异性关系就能改善。然而我们得自问一下到底为什么得有性别间的权力之战。在任何特定年代，更有权威的一方将创造一种合适的意识形态来帮助维持其地位，并使这一地位能让较弱的一方接受。在这种意识形态里，弱者一方的不同被解释为低级，并将证明这些差异是不可改变的、基本的或上帝的旨意。这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否认或隐藏其斗争的存在。这就对本文开头提出的为什么人们对性别之战的存在这一事实意识如此淡薄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遮蔽这一事实是出于男人的利益；他们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强调使女人也接纳了这些理论。企图解释这些文饰作用^①并检验其根本驱动力的意识形态，仅仅是弗洛伊德所走道路的一步而已。

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心理学术语，指针对不愉快困境所采取的防御机制，即个体试图利用似乎合理的途径来使不可能接受的情境合理化或保护这种情境。——译者注

相信我的说明所表示的愤怒根源比恐惧根源更清楚，所以我想简单地讨论一下恐惧问题。我们已经看到，男性把女人视为性欲的人，他们的恐惧对准这一目标。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呢？阿兰达部落泄露了这一恐惧的最清楚的一面，他们相信女人具有魔术般地影响男性生殖器的力量。这就是我们在分析中所说的阉割情结。正是来自心理基因根源的焦虑追回到罪恶感和童年旧日的恐惧，其解剖 - 心理学的核心在于这一事实：在性交过程中男人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殖器委托给女性的身体，赠与她精液，并将之解释为向女性交出生命活力，类似于性交后勃起消退的经历被视为被女人弄弱的证据。虽然，下面的观点还未完全行得通，但是根据分析和人种学数据，与母亲的关系比与父亲的关系很可能更强烈、更直接地与死亡的恐惧有关。我们习惯于把渴求死亡理解为渴求与母亲的团聚。在非洲神话传说中，是女人把死亡带到世界上来的，伟大的母亲女神也带来了死亡和毁灭。给予生命者也是能够带走生命者，这一观念似乎占据了我们的思维。男人对女人的恐惧还有更难理解、更难证实的第三个方面，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动物世界的某些周期性的现象的观察来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雄性经常装备着某些独特的刺激物来吸引雌性，或通过独特的策略在性交期捉住雌性。如果雌性动物具有和雄性一样急切或强烈的性欲需要的话，如此的安排是难以想像的。实

际上，我们发现雌性在受精以后无条件地拒绝雄性。虽然从动物世界中的取例只能非常小心地被应用到人类身上，但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可以提出下列问题：因为女性的部分性欲能量是与生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男性对女性的性依赖比女性对男性的性依赖是否可能更大？男人是否可能非常感兴趣于使女人依赖他们？这些因素就其精神起因的性质和与男性有关而言，似乎是男女之间巨大权力斗争的根源。我就谈到这儿吧。

被称作多面之物的爱成功地架起了孤独两岸之间的桥梁，这些桥梁可能很美丽，但很少是为永恒而造，它们经常因承担不起过重的负担而倒塌。这儿是开始提出的问题的另一个答案，即为什么我们对性别之爱比性别之恨看得更清楚——因为性结合给我们提供最大可能的幸福。因此我们自然很容易忽视，这种不断摧毁我们幸福机会的破坏力是多么强大有力。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问一问，分析洞察力怎么能对减少异性间的不信任作出贡献？对这一问题没有一致的回答。对情感力量的恐惧、在爱的关系中控制情感的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投降与自我保留之间、你与我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完全能理解而不能缓解的正常现象。本质上这同样适用于源自未解决的童年冲突的不信任的准备状态。然而，这些童年冲突的强度可以相差甚远，留下种种深浅不一的痕

迹。分析不仅能在个案中帮助改善与异性的关系，而且试图改善童年的心态，并预先制止极端的冲突。这当然是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在重大的权力斗争中，分析能通过揭示这一斗争的真正动机来实现其重要功能。这种揭示将不会削减动机，但也许可以为在自己的场地上打这场仗，帮助创造一个更好的机会，而不是把它归类到枝节的问题上去。

婚姻的问题^①

好的婚姻不压制配偶的发展潜能，好的婚姻中没有紧张的暗流在家里回荡，夫妻感情是如此热烈，从而能够给予善意的“漠不关心”。为什么好的婚姻这么少？婚姻制度难道不能与人类生活的某些特定事实相调和吗？是因为好的婚姻仅仅是一个即将消逝的幻觉，还是因为现代人实在不能使婚姻牢固？当我们谴责婚姻时，我们是在承认婚姻的失败，还是承认我们自己的失败呢？为什么婚姻常常是爱情的坟墓？我们必须服从这种情形，就像服从一种无法避免的法则一样呢，还是服从我们自身内部的力量呢？（这种力量在内容和冲击力上有所变化，或许是可以认识到的，甚至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却对我们造成破坏。）

表面上看来问题非常简单——而且没有希望：与同一

载《精神分析运动》第4期（1932），第213—223页，经卡伦·霍尔奈基金会的许可翻译再版。

个人长年累月地、日常性地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在性关系方面，通常会产生令人厌倦的、索然无味的情绪。于是情感的逐渐淡出和冷却被认为是无法避免的。凡·德威尔德写了一整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如何改正这种性生活不和谐状况的善意的建议。然而他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处理的是一种症状，而不是一种疾病。那种认为婚姻是由于枯燥单调的岁月而失去了它的灵魂和光芒的观点，只是这种情况的一种表面现象。

感觉到这种在起作用的潜在力量并不非常困难，但对它进行深入的探索则会令人不舒服。不必用弗洛伊德的观点来进行训练就可以认识到如下内容：婚姻的空虚不是因为简单的疲劳，而是隐藏的破坏力量的结果，这种力量是在秘密地起作用并逐渐削弱它的基础；它仅仅是在失望、不信任、敌意和憎恨的肥沃土壤上发芽的种子。我们并不愿意认识这些力量，尤其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对我们来说，它们是神秘的。我们对它们仅有的认识已预先假定我们对自己提出了令人不舒服的要求。然而如果我们当真希望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认识这个问题，这种认识就是我们必须寻找和深化的。这个基础的心理学问题一定是——对配偶的厌恶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有几个性质非常普通的原因，不足为奇得不用再提了。这些原因来源于人类自身的限制。无论我们赞同《圣

经》所说的我们都是有罪的，还是赞同马克·吐温所说的我们都是有些疯狂的，或者用一种更开明的方式称这种缺点为神经症，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些限制。所有这些假设只容许一个例外：即我们自己。有谁听说过在权衡是否结婚的人会这样说：从长远来看，他最终将发展这样或那样的不愉快的特点？夫妇双方的不完美在长期共同紧密的生活中肯定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来。他们起初付诸于行动的是较小的雪球滚动，它们在山坡的斜面上滚动时，不断地发展。也许如果一个男人坚守他独立自主的幻想，那么，他对自己所需的情感以及受妻子限制的情感会带着隐藏的痛苦作出反应；反过来，他的妻子能察觉到他被压抑的反叛，反应时就会带着隐藏的焦虑，恐怕失去他，而且出于这种焦虑本能地增加对他的要求。丈夫对这种情况的反应带有增强的敏感与防卫，直到最后水坝决堤了，但双方都不明白其中潜在的愤怒。这种决堤也许是因一件小事爆发出来的。与婚姻相比，建立在诸如卖淫、调情、友谊或者恋爱基础上的任何短暂的关系在性质上更简单，因为在这儿，要避免与对方的摩擦要相对容易些。

而且，人类普遍的缺点还在于，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我们只愿意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会尽力。一个有终身工作的公务员通常不会使出最大的努力去工作，因为不管怎样，他的工作是安全的，他不必像专业人员或工人那样

为职业去竞争、去斗争。让我们来看看婚姻契约的特权吧：要么是受法律所允许的，要么没有什么法律利益，但受流行的标准保护。但是从心理学的观点我们很容易看到，支持的权利、终生的交往、忠诚甚至性的合作使婚姻背负了巨大的包袱，并且没有巨大的危险。这与不会被解雇的公务员的例子有致命的相似之处。几乎没有什么关于婚姻的教育，以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当我们被赠予爱河这个礼物时，我们还必须一步步地去建造一个良好的婚姻。暂时只有一个已知的方法在法律和幸福之间架起一座桥，它涉及我们的个人态度朝着内心放弃对配偶的要求的这个方向变化。要弄清楚，我是指需求而不是在希望的意义上的要求。除了这些一般的困难以外，还有更个人化的问题，每个个案都有所不同，在发生的频率、质量和强度上都有所变化。还会有一系列无穷无尽的陷阱去干涉爱情、产生怨恨。列举、描述它们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将目光集中到几种主要的情况上并加以详细描述，这或许会更简单、更清楚。

如果我们没有选择“正确”的配偶，婚姻可能从刚开始就预示着不好的结果。那么，我们在选择与之分享生命的伴侣时，我们常常选择了不合适的伴侣，对这一事实我们将如何理解呢？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我们缺乏对自己需要的意识吗？或缺乏对对方的认识？或只是因为恋爱中暂时

的盲目？这些因素肯定都有些作用。然而，在我看来，记住这些是必要的：总的来说，一个自愿婚姻的选择并不会全是错误的。伴侣的一些品质的确反映了我们的一些期望，他身上有些东西的确预示着可实现我们的某个愿望，或许在婚姻中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然而，如果自我的其他部分无动于衷，和配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种疏远对长久的关系来说不可避免地被证明是令人不安的。于是，这样一个选择的根本错误在于这一事实：即作出的选择只是为了满足一个孤立的条件。单单一个冲动、一个唯一的愿望，强制性地置于最重要的地位，遮蔽了其他一切。比如，一个男人或许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愿望：把一个有很多追求者的姑娘称作自己的女友。对于爱情，这是一个特别不幸的情况，因为这个女人的吸引力将会随着对情敌的征服而渐渐消失，并将只能由于新情敌的出现而被重新点燃，这些新情敌是被无意识地追求的。或者配偶看起来是有吸引力的，是因为他或她可能承诺实现我们在经济、社会或精神上对认可的秘密的渴求，或许在一个不同的例子里，仍然很强有力的幼稚的愿望会决定这个选择。这儿，我想到一个才华横溢并且很成功的年轻人，四岁丧母，所以特别深切地渴望得到一个母亲。他和一个年长的、丰满的、慈母般的、有两个孩子的寡妇结了婚，她的智力和人格都差他很远。再来看看这个女人的情况，她十七岁时嫁给一个大她三十岁的男人。

这个男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明显地像她深爱的父亲。尽管完全没有性关系，这个男人使她幸福了很多年，直到她长大成熟不再具有孩子般的愿望。然后，她意识到，和一个虽然有很多可爱的品性但对她来说并不是关系重大的男人结合在一起，自己实际上是很孤单的。在这些案例里（确实有很多），我们内心仍有太多的空白、仍有太多未完成的愿望。最初的满足之后便是失望。失望并不等于厌恶，但它构成了厌恶的源泉，除非我们有这种极其少见的能够接受的才能，并不觉得建立在这样一个有限制的基础上的关系，将会阻挡我们寻找其他可能的幸福渠道。不管我们有多么文明、如何能控制住我们本能的生命，在内心深处我们仍能感觉到不断增长的愤怒，这种愤怒指向威胁要阻碍极其重要的努力得以实现的任何人或力量，这是符合人性的。这种愤怒在我们并不知晓的情况下能够必将溜进来，甚至当我们并不注意它的结果时，它仍将非常活跃。配偶会察觉到，我们对他的态度变得更挑剔、更急躁、更疏忽了。

我想再谈谈另一种情况：我们对爱的要求逐渐苛刻成为引起冲突的危险，但它并没有自相矛盾的愿望造成冲突的危险那么大。我们常常感受自我在我们的努力中要比我们在实际上更统一，因为我们本能地感觉到——而不是没有原因——我们体内的矛盾将会对我们的个性和生命构成威胁。这些矛盾在情感平衡受到扰乱的人身上更为明显。

但如果对此划条明显的分界线看起来似乎是离题了。这些内部矛盾在性的领域能够更容易、更强烈地表现出来，这一点在于事物的性质内部。因为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例如工作或人际关系中，外部现实施加于我们的是一个更统一同时也是更适应的态度。甚至那些通常墨守成规的人最容易将性做为他们矛盾对立的梦幻场。这些变化的愿望将被带入婚姻是绝对自然的。

我想起了一个有很多相似情况的典型案例。一个温和、依赖别人且有些女人气的男人同一个比他有活力、有才干、母亲般类型的女人结了婚。这是一个真正确实的婚姻匹配。然而这个男人的愿望和许多男人一样，是矛盾的。他同时也会被一个悠闲的、轻佻的、苛求的女人所吸引，这种女人所代表的特征不是第一个女人能够给他的。正是他愿望里的这种双重性毁了这个婚姻。

我们再谈谈这些个体的案例。尽管他们和家庭紧密相连，他们选择的妻子在种族、外貌、兴趣和社会地位上却是和他们的背景截然相反的。然而，这些人同时对这些差别感到厌倦，对这一点还没意识到，不久就开始寻找一种更熟悉的类型了。

我还能想起一些女人，她们很有抱负，总想占上风，却不敢去实现这些野心勃勃的梦想，相反，希望她们的丈夫为她们完成这些愿望。他应当是学识渊博，比别人都强，为人

所知且受人尊敬。当然有些女人对他们的丈夫能实现她们的所有梦想表示满意。然而在这样的婚姻中同样经常发生的是：妻子不能容忍自己的愿望被其丈夫实现，因为她自己对权利的渴望不能容忍她活在丈夫的阴影之下。

最后，有些女人选择了一个女子气的、纤细的、软弱的丈夫。她们常被自己男子气的态度所激发，尽管她们自己并不知道。然而，她们也对一个能对她们采用武力的、强壮的、残酷的男性怀有渴望。于是她们责怪其丈夫不能按这两种期望行事，并私下鄙视他的软弱。

这种冲突可能对婚姻配偶产生厌恶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当我们想当然地把对方真正的才能贬低到一文不值的同时，我们或许会责怪他的无能，责怪他不能给我们最基本的东西。一直得不到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迷人的目标，它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真正”渴望的，这个想法灿烂地照耀着他。另一方面，我们可能甚至责怪他确实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因为这个满足本身证明是不能与我们矛盾的内部努力所共存的。

到目前为止的这些反思中，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隐藏着一个事实，即婚姻也是两个异性个体间的一个性的关系。如果一方对另一方的性关系已被扰乱，从以上事实中可以得出怨恨最深的根源。人们觉得婚姻里的很多不幸外表上只集中在这个特定的配偶身上的冲突。这样很容易使

人相信，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不同的伴侣，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容易忽视这个事实：决定性的因素很可能是我们内心对异性的态度，并且这种态度在我们同其他任何伴侣的关系中都会以类似的方式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婚姻中出现的困难，大部分常常，或更适当地说总是，是作为我们自身发展的结果被我们自己提出来的。两性间的斗争不仅为几千年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宏伟的背景，而且在一个特定的婚姻内变成斗争的背景。我们常常发现的各种形式的男女间的不信任，通常不是源于我们随后岁月的不愉快经验。尽管我们宁愿相信这些不信任源自这样的事件，但它却始于早期的儿童时代。后来的经验在青春期和青年后期发生时，通常被以前所获得的态度所制约，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联系。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内容，让我再补充几句话。爱和热情不是在青春期才首次出现的，幼儿已经能够充满激情地去感觉、渴望和要求，这一基本的、几乎不可磨灭的观点得归功于弗洛伊德。由于幼儿的精神还没有被破坏、被禁止，他或许可能以一种与我们成人所可能采用的十分不同的强度来体验这些感受。如果我们接受这些基本事实，而且将我们像各种动物一样倾向于异性相吸的伟大自然法则，不言而喻地来接受它，那么，可能引起争论的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假设，作为每个儿童都必须经历的一

个发展阶段，在我们看来就不是这么特别和奇怪了。

在这些早期爱的经验中，儿童通常会经历挫折、失望、拒绝、无助的嫉妒感等不愉快。而且，他还会有被欺骗、被惩罚和被惊吓的经历。

这些早期爱的经验的一些踪迹将一直存在并将影响他后来对异性的关系。这些踪迹在个案中变化无穷，然而在两性态度的多样性中也出现了一个可识别的模式。

在男性身上我们通常看到下列与母亲的早期关系的残留。首先，他们对令人害怕的女性有退缩情况。因为通常是母亲受委托照顾婴儿，从母亲那里我们不仅接受到最早的温暖、照料、温柔的经历，也体验到最早的关于禁止的经历。个人完全从这些早期经验里脱胎换骨似乎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印象，早期经验的踪迹几乎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特别是当我们看到男人置身于男人中时得到多么快乐的解脱，无论这是建立在运动、俱乐部、科学甚至是战争的基础之上。他们看起来像逃离监督、得到解脱的学生。很自然，这种态度将在他们同其妻子的关系中最清楚地重复出现（妻子比其他女人更有可能注定要代替他母亲的位置）。

对母亲的依赖关系还未解决，第二个特点，即认为女性是神圣的又出现了，对处女的崇拜使这一思想达到了顶峰。这个观点或许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美好的方面，但其

反面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在极端的例子里它会导致这样的信念：得体的、值得尊敬的女人是缺乏性欲的，对她怀有性的愿望将会羞辱她。这个概念进一步暗示，即使一个人会非常爱她，也不能期望和这样的女人有完全的爱的经历，他只能在一个低级的女人——一个妓女那儿寻找性的满足。在明确的案例里，这意味着一个人可能爱慕并且欣赏他的妻子，但不能对她有性欲，于是对她或多或少有些拘谨。一些妻子可能意识到男性的这种态度，但并不表示反对，尤其假如她们是性冷淡的话。然而它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双方公开的或隐蔽的不满。

在这个情况下，我想提一下第三个特征，在我看来它似乎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态度特征。那就是男人害怕不能满足女性，害怕女人的一般要求，特别害怕她的性要求。即使女性是性冷淡的，但她能够性交、怀孕、生育，而男性必须一次次将自己证明给女性，就这一点而论，这种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根植于生物事实。根据本体论的观点，甚至这种恐惧也起源于童年时代。那时小男孩感到自己将成为一个男人，但害怕他的阳性会受到嘲笑，于是，当他孩子气的求婚遭到讥笑和拒绝时，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这种不安全感的痕迹将经常保留着，超过了我们愿意承认的程度。它常常隐藏在对阳性过分的强调背后，然而这些不安全感在与女性关系中，通过不断变化的自信泄露出来。婚姻能够使

男性对于妻子引起的任何挫折产生持久的过分敏感。如果他的妻子不能被他单独拥有，如果最好的对他来说远不够好，如果他不能满足她的性欲，所有这些对于基本上不安全的丈夫来说，像是对男性自信的一个巨大的侮辱。反过来，这种反应将本能地唤起他想通过逐渐损害他妻子的自尊来羞辱她的愿望。

选择这几个例子是想证明男性的一些典型趋势。它们或许足以表明，对待异性的某些态度也许在儿童时代就获得了，并将必然在以后的关系中，特别是婚姻关系中，表现出来，且相对独立于配偶的人格。这些态度在他的发展中被克服得越少，丈夫在与妻子的关系中肯定就感到越不舒服。这种感觉的存在经常是无意识的，并且它们的来源也总是无意识的。对它们的反应可能变化多端，它可能导致婚姻内部从隐藏的怨恨到公开的憎恨等诸多紧张和冲突，或许会导致丈夫在工作中、在男人或其他女人的陪伴中寻求和发现对紧张的释放，对这种女人的要求他不害怕，和她在一起他不感到负有各种义务。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无论好歹，婚姻的纽带被证明是强大的。然而与另一个女人的关系使人更放松、更满意、更愉快。

由妻子带进婚姻的困难中，我想只提及一个因素：性冷淡，一个从她性格形成时期便形成的价值不明确的礼物。它本身是否重要可以讨论，但它暗示着与男性的关系中的

一种障碍。无论个体内容变化如何，它总是拒绝男性的一个表现，要么是拒绝某一特定的个体，要么是拒绝一般男子的性欲。有关性冷淡发生频率的统计数字差距很大，在我看来基本上不可信。这部分是因为感觉的性质不能以统计数字来表达，部分是因为我们很难估计，在获得快感的能力方面，有多少女人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欺骗自己。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倾向于假定，低程度的性冷淡的发生频率比我们从女性直接陈述中预料的要高。

当我说性冷淡通常是拒绝男性的一种表示时，我并不是指对男性显著敌意的表现。这种女性在其体态、穿着及行为举止上是非常女性化的。她们或许给人以这种印象：她们的整个生命就是“适宜于单独的爱”。^①我所指的是某些更深层的东西，即无法真正地恋爱、无法屈服于男人。这些女人宁愿走自己的路或者用她们的嫉妒、要求、厌烦和唠叨将男性赶走。

这样的态度是如何发生的呢？首先，有人会倾向于将此归咎于所有我们过去和现在抚育女孩子的方法上的过失，性禁止的压力、与男性的隔离，使她们不能用正常的眼光看待男性。于是他们是以英雄或怪物的形象出现。然而，证据和沉思揭示出，这种看法太表面化了。对女孩子更加严格的教育与性冷淡的增加并非平行相伴的，这是一个事实。

引用 马雷尼·狄特瑞奇的著名歌曲《独自恋爱》。

而且我们发现，就基本特征而言，人类的本性从来不因禁止或压制而得到本质上的改变。

在最后的分析中或许只有一个因素，那就是焦虑，它强大得足以使我们从生命需求的满足中吓跑。如果我们想了解它的起源和发展，就遗传上可能的理解而言，我们必须仔细看看女性儿童的本能内驱力的典型命运。这里我们能发现种种因素，使女性角色对小女孩来说显得非常危险，从而使她不喜欢这个角色。早期童年时代典型的恐惧及它们明显的象征作用很容易使人们猜测它们隐藏的意义。对夜盗、蛇、野兽、雷的恐惧的意义如果不是女性对能够征服、穿透、毁坏的控制力量的恐惧的话，那么会是别的什么呢？还有与早期对母亲身份的本能的预感相联系的附加恐惧。小女孩既有点害怕将来要经历这个神秘而恐怖的事件，同时又有点害怕她或许永远没有机会去经历它。

小女孩用一个典型的方法从这些不愉快的情感中逃脱：让思想飞入一个渴望的或假想的男性角色中。在她们四至十岁期间，人们很容易观察到或多或少清晰的方面。在青春期之前或青春期之间，嘈杂的顽皮行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女性态度。但是一些强大的和干扰的残余或许会持续潜伏在表面之下，并在以下几种方式下生效：野心、对权力的追求、对看来一直比他优秀的男性的憎恨，对男性好斗的态度，可能以对性操纵的变化的方式，最终，抑

制或完全阻碍她通过一个男人得到性满足。

如果我们理解这个粗略描述的性冷淡的发展史，有一点会变得更清楚：如果我们将婚姻看作一个整体，我们看到性冷淡产生的背景以及它在对待丈夫的整体态度中的表达方式，要比性冷淡症状本身更加严重，将它只看作是快乐的缺失，或许并不这么重要。

母亲身份是女性功能之一，容易被这样一个不利的发展所扰乱。这里我不想讨论这种身体的和情感的困扰所能表达的多种方式，而是把自己限制在一个问题上。是否一个基本良好的婚姻会通过孩子的出生而遭受苦难？孩子是亲和还是损坏了婚姻？我们可以常听到人们以不可质疑的方式提出这一问题。然而用这样普通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是无成效的，因为这个答案将依赖于个体婚姻的内部结构。因此我的问题将以一个更具体的方式提出：一个迄今良好的婚姻配偶间的关系能否因孩子的到来而被破坏呢？

尽管这样一个结果在生物学意义上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它或许在特定的心理环境下真能发生。例如，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无意识中非常依赖母亲的男人，一旦他的妻子成为母亲以后，将会把她作为一种母亲的形象来对待，于是，他就不可能与她再发生性关系。这种态度上的变化通过文饰作用得到辩护 妻子经怀孕、生育、哺乳之后 已失去了她的美丽。正是通过这些文饰作用，我们通常才试图

认真思考这些情感或抑制，它们从我们身心无法理解的深处上升到我们生活中来。

一个相应的女性案例的先决条件是，由于她发展过程中的某种歪曲，她所有的女性的渴望只集中在孩子身上。结果是，在成熟的男人身上她只爱孩子，丈夫本人对她来说象征着孩子，并且他理应要给她这个孩子。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有了孩子以后，这个丈夫及丈夫对她的要求就会变得多余，甚至令人讨厌。

这样，在特定的心理环境下，孩子也可能成为疏远或厌恶的根源。

我想在这一点上作出结论，至少目前是这样，尽管我甚至没有触及到其他重要的冲突可能性，如产生于潜在的同性恋的冲突可能性。更详尽的理解在原则上对从上述讨论的心理顿悟中得出的观点不会增加什么内容。

因此，我的出发点如下：当婚姻中迸出火花或第三者侵入时，我们通常认为应为婚姻破裂负责的已经是一个特定发展的结果。它们通常是躲避我们的一个过程的结果，但那会逐渐变成对配偶的厌恶。这种厌恶的根源与配偶令人讨厌的品质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像的要少得多，而与由于我们自身的发展而带入婚姻的未解决的冲突的关系要多得多。

因此婚姻中的问题将不能通过对责任和放弃的告诫来

解决，也不可能通过使本能无限自由的告诫来解决。前者如今对于我们再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后者十分明显对于我们追求幸福也没什么帮助，除了使我们面临失去最宝贵的价值的危险。实际上，问题应这样提出：哪些导致配偶厌恶的因素可以避免？哪些可以缓和？哪些可以克服？发展中过度混乱的不协调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在强度上。可以恰当地说，良好婚姻的机会依赖于婚前配偶双方得到的感情稳定的程度。很多困难看起来似乎无法避免，期望像礼物一样送给我们满足，而不需为之去努力，或许这是人性的一部分。两性间一种本身很好的，即没有焦虑的关系或许仍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我们也必须学会接受我们内心某些特定的、矛盾的愿望，将它们视为我们本性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在一个婚姻中全部满足它们是不可能的。我们对放弃的态度将会有所变化，它取决于历史的钟摆敲击我们的时刻。我们这一代以前的人们对本能要求太多的放弃。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过度害怕它的趋势。婚姻和其他任何关系一样，最值得向往的目标，是在实际的特点和假设理想之间、在限制与驱动力自由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然而，真正威胁婚姻的基本的放弃不是被配偶真实的缺点强加于我们的。毕竟，我们能够原谅他，因为他不能给予我们超过他的本性所允许的限制的东西，但我们也必须放弃我们的其他要求，表示出的或暗示出来的这些要求太容易

破坏气氛。我们将不得不放弃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和发现满足我们体内的其他驱动力，不仅是配偶让其潜伏着的空闲的性驱动力。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认真反思一夫一妻制的绝对标准，用开放的思想再次审视它的起源、它的价值和它的危险。

害怕女人

—观察男女对异性恐惧的具体差别

在《游泳者》这首民歌里，席勒讲述了一个男子如何为了赢得一个女人跳入危险的旋涡的故事——这个女人最初是以一个酒杯来象征的。他描述了深处的危险，并将注定吞没一切：

旋涡吮吸着平静黑色的巨浪，
白色的泡沫分开了大海，
像黑暗里一条蜿蜒通往地狱的路，
此时巨大的混乱中终于有了一个间歇。
波浪在一圈圈旋转——越来越深，
像山中炸雷劈开的峡谷！

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18期（1932）第5—18页；《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13期（1932），第348—360页。经《国际精神分析杂志》许可再版。

白日玫瑰般的色彩在欢庆，
空气和天空被给予了死亡！
下面的恐惧或许永不再发现一个声音——
在天国的仁慈下人也不会伸展得太远！
他将永不把目光
从用恐惧和黑夜织成的面纱下抬起！

在悬崖脚下，
弥漫着赤热的、紫色的、无人迹的迷濛！
耳边是恐惧的寂寞，
眼里更加受惊的恐惧持续着！
蝶螈、蛇、龙居住在深处，
缠绕着它们地狱般冷酷无情的巨浪。

《威尔赫姆·特尔》中的渔童的歌更轻快地表达着同样的思想：

清澈、微笑的湖水允许别人在它的深处游泳，
一个男孩在它绿色的岸上睡觉；
接着他听到一只曲子，
流畅、柔和，
像天使在高处歌唱般甜美。

他兴奋激动地醒来，
水在他的胸下低吟；
从深处传来一个声音，
“你必须跟我走，我迷住了这个牧童，
我把他诱惑下来了。”

男人从未厌倦过对暴力的显示，通过暴力男人感到自己被女人吸引，伴随着他的渴望的是害怕或许会经她而死去，而且很丢脸。我特别提一下在海涅有关洛雷 的传奇的诗里，对这种恐惧的令人感动的表述：她高坐在莱茵河的河岸上，以她的美貌诱捕船夫。

这里又一次是水 像其他“因素”一样 水表现着首要因素：“女人”吞没了这个屈从于女性诱惑的男人。尤利西斯不得不吩咐他的船员，将他与船桅绑在一起以逃避美丽女人的诱惑和危险。斯芬克斯之谜几乎无人能解，大部分企图解开谜语的人都丢掉了性命。神话故事里的皇宫是用求婚者的头装饰的，他们大胆地试图解开国王美丽的女儿的谜语。卡莉女神^②在被杀死的男子的尸体上跳舞。没有一个男子能征服的参孙却被达力拉（*Dalila*）夺去了力量。朱迪斯把自己给了赫勒夫雷斯之后杀死了他。塞勒穆在战马上

① Lorelei：德国传说中的一女妖，出没莱茵河岩石上，以其美貌及歌声诱惑船夫触礁沉没。——译者注
见达理《印度神话与阉割情结》一文中的描述。

提着圣徒约翰的头颅。女巫被烧死是因为男牧师惧怕她们体内魔鬼的活动。维迪坎德的东方精神毁灭了每个屈从于她魅力的男人，并不是因为她特别邪恶，而仅仅是因为这样做是她的本性。这一系列的例子数不胜数。通常，男人处处通过否认对女人的惧怕来使自己摆脱对女人的恐惧。他说：“不是我害怕她，是她本身太邪恶，能犯任何罪，她是个食肉兽、吸血鬼、女巫，她的欲望永远没有满足，她正是凶恶的化身。”男性对女性的渴望与恐惧之间永不休止的冲突，难道不可能是男性对创造性工作的整体冲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吗？

根据原始的敏感，女性在她的女性成年期流血的事实面前变得更加不祥。在月经期间和她们接触是致命的^②：男人失去他们的力量，牧草枯萎，渔夫和猎人什么也得不到。对男人来说，奸污处女涉及最大的危险，如弗洛伊德在《童贞的禁忌》^③中所指出的，丈夫特别害怕这个行为。弗洛伊德在这部作品里，也使这种焦虑客观化，对证明了阉割冲动的确会在女性身上发生非常满意。可是为什么这不是

塞齐斯将艺术创造的冲动解释为寻找犯罪感的同伴，但在我看来，他对问题深入得不够，因为他的解释是一方面的，并且只考虑了整体人格的一部分，即超我。参见塞齐斯《共同的白日梦》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

参见达理的《经期情结》，无意识意象协会，第 14 期（1928）及温塔斯坦的《少女的青春仪式与她们在童话中的形象》载《意象》第 14 卷（1930）。

弗洛伊德《童贞的禁忌》载《论文集》第 4 卷。

禁忌现象的一个充分的解释，有两个原因。首先，女性不是普遍用像这样可辨认出的阉割冲动来对奸污处女作出反应的。这些冲动大概仅限于有强烈发展的男子气态度的女性身上。第二，如果奸污处女一定会唤起女性身上的破坏冲动，我们仍然必须使男人体内的紧迫的冲动暴露出来（就像我们在每个个体分析中所做的），这个冲动使他将初次强制进入阴道看作是如此危险的一种行为，实际上，如此危险以致只能由一个强壮的男子或由一个选择冒着失去生命或男子气概以获得报酬的陌生人才能不受到伤害地完成这项任务。

当人们考虑这个无法抵抗的透明物质团时，很少认识和注意男性隐藏的对女性的恐惧这个事实，这真的不值得注意吗？（我们吃惊地自问。）几乎更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自己能够长时间地忽视它，我将在别处详细讨论她们的态度在这个方面形成的原因（那就是说，她们自己的焦虑和自尊的损害）。男性一方对使他的恐惧平静首先有着非常明显的战略原因。但他也试图用各种方法甚至对自己否认它。这也是我们曾暗指的这些努力的目的，在艺术和科学的创造性工作中使它“客观化”。我们可以推测，甚至他对女性的赞美，也不仅仅是来源于他对爱的渴望，而且来源于他想掩饰其恐惧的愿望。然而，一种类似的宽慰也可以在男性常常表露的对女性的贬低里被观察到。这个爱与崇拜的态

度表示：“我没有必要去害怕一个如此奇妙、美丽且神圣的人！”那种贬低的态度则暗示：“害怕这样一种生物太可笑了，如果你全面地看待她，她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东西。”

这最后一种减轻焦虑的方法对男性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它可帮助支持他的男性自尊。后者似乎感到承认对女性的恐惧要比承认对一个男人（父亲）的恐惧在其最核心处受到的威胁大得多。为什么正是在对女性的关系中男性的自我感觉如此特别敏感呢？其原因只能通过他们的早期发展来理解。这点以后再谈。

在精神分析中这种对女性的恐惧被揭示得非常清楚。男性同性恋就其基础而言，通常实际上和其他的性变态一样，具有逃避女性生殖器或否认它的存在的愿望。弗洛伊德曾表示这是物恋^②的一个基本特征 然而 他相信它不是以焦虑为依据，而是以因女性缺乏阴茎而引起的一种令人厌恶的感觉为依据。但我想，从他的解释中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作中也存在焦虑。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对阴道的恐惧淡淡地隐藏在厌恶之下。只有焦虑是一个足够强的动机，它能阻止一个由力比多驱使而和女子结婚的男子达成目标。但弗洛伊德的叙述没能解释这种焦虑。一个

我清楚记得当我第一次听到一个男人以一个普遍的意见的形式断言上述观点的时候是多么的惊讶。发言者是格罗德克，当他在谈话里提到“男人当然是害怕女人的”时，他明显地感觉到他在声明一些不言而喻的事。格罗德克在他的著作里反复强调这种恐惧。

②：弗洛伊德《物恋》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9卷（1928）。

男孩与父亲有关的阉割焦虑不是他害怕曾受过这种惩罚的人的一个充分的理由。除了对父亲的惧怕以外，一定有一个更深的惧怕，其目标是女性或女性生殖器。现在对阴道的惧怕本身明显地不仅存在于同性恋者和性变态者中，也存在于接受精神分析的男人的梦想中。所有精神分析医生对这类梦都很熟悉，我只需给出其概要：例如，一辆汽车在飞驰，突然掉入一个坑中，摔成碎片；一只小船正在一条狭窄的海峡中航行，忽然被吸入一个旋涡；有一间神秘的有血污的动物和植物的地下室；一个人正在爬一个烟囱，有掉下来和被杀死的危险。

波梅耶博士的德勒斯登实验 允许我们引用一系列产生于一个偶然的观察的实验，并说明这种对阴道的恐惧。在一个治疗中心里，医生和小孩子在玩球，过了一会儿，医生给孩子们看球里有一个裂缝。她把裂缝的边缘拉开，把手指放进去，于是它被紧紧地夹住了。她让二十八个男孩做同样的事，其中只有六个毫不害怕地照做了，八个男孩根本不能被说服去照做。十九个女孩中有九个将手指放进去，没有一丝惧怕，其余的有一些轻微的不自在，但没有人有严重的焦虑。

无疑对阴道的惧怕常被隐藏在同时存在的对父亲的惧怕后面，或者被隐藏在无意识的语言里，隐藏在对插入阴道

这个实验是哈脱尼博士在德勒斯登的一个儿童诊所里做的。

里的阴茎的恐惧后面。①

这两个原因。首先，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男性的自尊在这种方式下将遭受较少的磨难；第二，对父亲的惧怕更确实，在性质上更少些神秘性。我们或许可将它比作对真实的敌人和对鬼魂的害怕之间的区别。突出关于阉割父亲的焦虑因此是有倾向性的 例如 像格罗德克在《蓬头彼得》一书中对吮吸拇指的分析所显示的；切破了手指的是男人，但是说出了威胁的却是母亲，所用的工具——剪刀，是一个女性的象征。

所有这些大概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男性对女性（母亲）或对女性生殖器的恐惧要比对男性（父亲）的恐惧更深远，分量更重，通常受到更积极的压制，在女人体内寻找阴茎的努力代表的首先是一个强烈的企图——企图拒绝罪恶的女性生殖器的存在。

对这种焦虑是否有个体发生学上的解释呢？或者它不是（在人类中）男性存在和男性行为的一个整体的部分吗？通过经常发生在雄性动物身上的交配后的昏睡状态——甚至死亡状态，对这种焦虑是否能帮助说明呢？② 是否对男

贝欧姆《论同性恋心理》，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德文）第 11 期（1925）梅拉尼·克莱因《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载《国际心理分析杂志》第 9 卷（1928）；《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象征形成的重要性》（1930）载《国际心理分析杂志》第 11 卷（1930）；《反映在艺术工作和创造冲动中的婴幼儿焦虑情况》，载《国际心理分析杂志》第 10 卷（1930）第 436 页。

② 伯格曼《母亲智慧与感性认识》。

性来说，爱与死亡彼此联系得要比对女性而言更紧密？在女性体内性的联合潜在地制造了一个新的生命。男性是否伴随着他征服的愿望感觉到，在他与女性（母亲）聚会的行动中有隐藏的灭绝的愿望？是否也许正是这种愿望潜伏在“死亡本能”的下面？用焦虑对它作出反应的正是生的愿望吗？

当我们尽力用心理学和个体发生学的术语来理解这种焦虑时，如果我们采用弗洛伊德的观点，即区分幼儿与成人性欲的是对于儿童来说阴道仍保持未被发现的状态，我们会发现自己相当迷惑。根据那个观点，我们不能提出一个生殖初期，而必须宁愿称它为阳具初期。于是将幼儿生殖器组织时期描述为“阳具欲期”更好一些。很多记录下来的处于那个阶段的男孩的话表明，弗洛伊德理论的观察依据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我们就忍不住要问，是否他的描述真的将具体的表现中的幼儿生殖器欲概括成这样，或仅适用于它的一个相对晚一些的阶段？弗洛伊德说具有特征的是，男孩的兴趣是以明显的自我陶醉方式集中在自己的阴茎上：“他体内的男性部分后来在青春期产生的驱动力，在童年时代主要表现为一种对事物的探求冲动，表现为性好奇。”至于其他生物的阳具的存在和尺寸的问题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开始于器官感觉的阳具冲动本身的本质肯定是一个

弗洛伊德《力比多的幼儿生殖器组织》(1923)。载《论文集》第2卷。

穿透的愿望。这些冲动的存在几乎无须质疑，它们在儿童的游戏和对幼儿的分析中被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如果说男孩关于母亲的性欲望不在于这些冲动的話，那么很难说它真正在于哪里。如果手淫主要不是对异性阳具冲动的自我淫荡的表示，那为什么他手淫焦虑的目标是作为阉割者的父亲？

在阳具欲期，男孩在精神上的定向主要是自恋的，因此他的生殖器冲动直接指向一个目标的那个阶段一定是一个更早一些的阶段。一定要考虑它们不直接指向他本能地勘探其存在的女性生殖器的可能性。在早期和晚期生活的梦里，在病征和行动的特殊模式里，我们确实发现，性交的表现没有具体局限，有口欲的、肛门的、性虐待的。但我们不能把这作为相应的冲动的一个首要证据，因为我们不能肯定这些现象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表示了对生殖器目标本身的一个移置？实际上，所有那些等于表明，一个特定的个体受到具体口欲的、肛门的、性虐待的趋向的影响。它们明显的价值是比较小的，因为这些表现通常与反对女性的某些影响相联系，于是我们不能说它们是否在本质上是这些影响的产品或表达。例如，贬低女人的倾向或许在对女性生殖器的肛欲表示中表现出来，而口欲的表示或许表达焦虑。

但除此以外，在我看来有众多的原因说明为什么女性

阴道的存在仍保持“未被发现”是不大可能的。一方面，一个男孩当然会自动得出结论：别人和他的身体构造是一样的；但另一方面他的阳具冲动肯定会本能地吩咐他在女性身上寻找合适的洞——而且是他缺少的一个洞，因为一种性别通常会在另一种性别身上寻找和它是互补的或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我们认真地接受弗洛伊德的声明，即儿童的性理论的形成是以他们自己性的构造为模型的，那么它必须肯定意味着在目前的联系中，男孩受插入阴道的阳具冲动所驱使，在幻想中想像一个互补的女性器官。这正是我们应该从我开始谈论男性对女性生殖器的恐惧时引用的所有材料中推断出来的。

这种焦虑决不可能只从青春期开始。在那个时期的起初，这种焦虑被非常清楚地表示出来，我们只要看一看，通常掩饰焦虑的男孩的自负外表是十分细微的。在青春期，男孩的一个任务明显地不仅仅是将他自己从对母亲乱伦的依恋中解脱出来，更通常的是掌握他对所有女性的惧怕。他的成功通常是渐进的，起初，他避开所有的女孩子，只有当他的阳性被充分唤醒时才能驱使他突破焦虑的阈限。但我们知道，通常青春期的冲动会复苏，但已经作了必要的修改，这些冲动属于早期幼儿性欲的成熟，它们采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系列早期经验的忠实的复制。而且，正如我们在梦和文学作品的象征中所遇到的那样，焦虑的怪诞的特征

无误地指向早期幼儿幻想时期。

在青春期一个正常男孩已经获得关于阴道的有意识的知识，但他害怕的是女人身上的一些奇怪的、神秘的、不熟悉的東西。如果成熟男子仍将女性视为巨大的神秘，他无法勘探的神秘，他的这种感觉最终只能与她身上的一点联系起来：母亲身份的神秘。其余的仅仅是他这种害怕的残余。

这种焦虑的起源是什么？它有什么特征？是什么因素遮蔽了这个男孩与他母亲的早期关系？

在一篇关于女性性欲的文章^①里，弗洛伊德曾指出其中最明显的因素：是母亲最先禁止孩子本能活动的，因为是她倾向于让孩子处于婴儿时代；第二，孩子明显地经历了对母亲身体^②的施虐冲动，这可能与被她的禁止所引起的愤怒有关。根据同态复仇原则，这个愤怒留下了焦虑的残余。最后，这或许是主要的一点——生殖器冲动的具体命运本身构成了另一个因素。两性解剖上的区别导致男孩和女孩身上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如果真的要理解他们的焦虑和焦虑的多样性，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在他们早期性欲时期儿童真正的情况。女孩生物条件的本性给予她接收的愿望，进取体内的愿望，^③她感到或知道她的生殖器对于她父亲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1 卷（1930），第 281 页。

② 参见上述所引用的梅拉尼·克莱因的著作，我认为它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这并不等于被动。

的阴茎来说太小了，这使她对自己的生殖器愿望的反应带有直接的焦虑，她害怕如果她的愿望实现了，她自己或她的生殖器将受到损坏。^①

另一方面，男孩感到或直觉地判断他的阴茎对于他母亲的生殖器来说太小了，其反应是害怕自己的官能不足，害怕被拒绝、嘲笑。这样他的忧虑与女孩子的忧虑位于不同的方面，他最初的恐惧根本不是阉割忧虑，而是对自尊的威胁的一个反应。^②

为了不发生误解，让我对此进行强调，我相信这些过程的发生仅仅是本能的以器官感觉和器官需要的张力为基础的，换句话说，我认为这些反应即使在女孩子从未见过他父亲的阴茎或男孩从未见过他母亲的生殖器，并且对这些生殖器的存在没有任何智力知识的情况下，也会发生的。

男孩子因为这一方面的反应，会受另一种方式的影响，并且从他母亲那里受到挫折的影响要比女孩从她与父亲的经验里得到的要严厉得多。在两者情况下，力比多冲动都受到打击。但女孩在她的挫折里有一个特定的安慰——她保持了身体的完整。但男孩在第二个敏感点上遭受打击——他的生殖器官能不足感，这一感觉可能从开始就伴着他的性欲的愿望。如果我们假定强烈的愤怒最通常的原因

我将在另一篇论文里更详细地讨论女孩子的这种情况。

此处我还是指《异性间的不信任》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见《心理分析运动》（1930）。

是由于在那个时候非常重要的冲动的挫败，那由他母亲而造成的男孩的挫折必将唤起他体内双重的愤怒：首先通过把他的力比多推回到它本身，第二通过他受伤的男性自尊。同时，由性器欲前期挫败导致的旧日的愤怒大概也被再次激起。结果是他插入阴道的阳具冲动和由于挫折引起的愤怒，这两者合并在一起，这个冲动带有一点施虐的色彩。

这里让我强调一下，在心理分析文献中常显得不足的一点——即我们没有理由去假定这些阳具冲动在本质上是施虐的，因此在每个例子里没有具体证据的情况下，将“男性”等同于“施虐的”，将女性等同于“受虐的”，这是不能允许的。如果破坏冲动的混合物真的是相当大的话，那么根据同态复仇原则，母亲的生殖器必须变成直接忧虑的一个目标。这样，如果它起初由于与受伤的自尊相联系而使他感到厌恶的话，那它将通过第二过程（通过挫折、愤怒的方式）变成阉割忧虑的一个目标。并且当男孩注意到目标的踪迹时这通常就得到了加强。

后一种忧虑常常在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上留下一个持久的印记，正如我们从非常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种族中任意给出的例子中所了解到的那样。但我不认为它经常以相当大的程度发生在任何男性身上，当然它也不是男性对异性的关系中一个独特的特征。这种忧虑与我们在女性身上碰到

的在细节上作了必要修改的忧虑非常相像。在分析中，我们发现它以任何显著的强度发生，当事人总是一个男人，他对女性的整体态度已有了明显的神经症的扭曲。

另一方面，我想与自尊相联系的忧虑在每个男人身上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痕迹，也在他对女性的一般态度上留下了特殊的印记，这或许不存在于女性对男性的态度中，或许如果存在，也是间接得到的。换句话说，它不是她们女性本性的一个必需的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究男孩幼儿期忧虑的发展、他克服忧虑的努力以及这种忧虑的表达方式，我们也只能抓住这种男性态度的一般意义。

根据我的经验，害怕被拒绝、被嘲笑在对每个男人的分析中都是一个典型的部分，无论他的心理状态和神经症的结构如何。精神分析的环境和与女精神分析医生的经常预约，使这种忧虑和敏感显得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要清楚得多，因为日常生活给男人提供了许多机会，通过避免可能激起这些感觉的情境，或通过一个过分补偿的过程来逃避这些感觉。这种态度具体的基础很难察觉，因为在精神分析中，它大部分通常是无意识地通过女性定向被隐藏起来了。^①

^① 参见贝欧姆《男性身上的女性情结》，载《国际心理分析杂志》第 11 卷（1930）。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后一种定向尽管没有女性身上的阳性态度那么明显（我将给出原因），但也是常见的。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它的各种根源，我只能说我推测自尊受到的早期伤害可能是使男孩对他的男性角色感到厌恶的可靠原因之一。

很显然，他对那种伤害及随后对母亲的恐惧的典型反应是撤回对她的性欲，而将性欲集中在他自己和他的生殖器上。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这个过程有两重优势：使他摆脱他和母亲之间已经产生的使人痛苦、充满忧虑的情境，并会通过积极地增强他的阳具自恋而恢复他的男性自尊。对他来说，女性生殖器已不再存在，这“未被发现的”阴道是一个被拒绝的阴道。他的这个发展阶段与弗洛伊德的阳具欲期是完全一样的。

与此相应，我们必须明白主宰这个阶段的探寻态度以及男孩子探索的具体性质，这种性质表现为从目标退却，随后是带有一些自恋色彩的忧虑。

那么他最初的反应具有增强的阳具自恋的趋向，结果，年幼的男孩子毫不尴尬地说出想做女人的愿望，他现在对这一愿望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更新的忧虑，恐怕他的话不被认真对待；一定程度上又带有阉割忧虑，一旦我们认识到男性阉割忧虑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对想做女人的愿望的一个反应，我们就不能完全同意弗洛伊德的信念，他认为双

性同体在女性身上比在男性身上表现得更明显。^① 我们必须将它视为一个仍未解决的问题。

弗洛伊德强调的阳具欲期的一个特征，非常清楚地揭露了由小男孩与他母亲的关系留下的自恋创伤：“他的行为仿佛表明他有一个模糊的思想，即他的性器官可以并应该更大些。”^② 我们必须这样来进一步阐述这些观察：“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在阳具欲期开始的，但并没有随之停止；相反，它在少年时代被天真地展示出来。并作为一种对于其阴茎的大小或性交能力的深藏的忧虑，或者作为被较少隐藏的自豪而继续坚持存在。

现在生物学上两性区别的一个急迫要求是，男子实际上必须继续向女性证明其男子气概。对于女性并无相似的需要。甚至当她性冷淡时，她仍然可以从事性交活动并怀孕、生子。她执行她这部分的任务仅仅通过“存在”而没有什么“行动”——这是一个常使男人充满赞赏和愤怒的事实。另一方面，男人为了满足自己，不得不做些什么。“效率”的理想是一个典型的男性理想。

为什么当我们分析害怕她们体内男性倾向的女性时，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活动范围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我们常发现她们无意识地把野心和成就视为男性的属性，

弗洛伊德《论女性的性欲》，载《国际心理分析杂志》第 11 卷(1930)，第 281 页。

弗洛伊德《力比多的幼儿生殖器组织》载《论文集》第 2 卷。

这大概是一个基础的原因。

在性生活本身中我们看到，简单的对爱的渴望驱动男性与女性发生性关系，这种渴望常常被男性体内占主要地位的、一次又一次向自己及别人证明其男子气概的内部冲动所遮蔽。因此，这种类型的男子以更极端的形式表现时就只有一个兴趣：征服。他的目标就是“拥有”很多女人，最漂亮的和追求者最多的女人。在这些男人中，我们发现了一个自恋的过分补偿和残存忧虑的混合物，这些男人想要实行征服时，他们对把他们的意图太当真的女性充满愤慨，而对无需他们证明自己男子气概的女性又满怀感激。

另一个避免自恋创伤痛苦的方法是采取被弗洛伊德描述为贬低恋爱目标的倾向的态度。^① 如果一个男人对任何与他平等的甚至比他级别高的女人没有愿望的话，或许他是在根据最有效的酸葡萄原则保护他受伤的自尊？从妓女到淫荡的女子那儿，人们不必害怕在性、伦理、智力的领域被拒绝和要求，他能觉得自己高人一等。^②

这给我们带来了第三种方式，一个在它的文化结果中是最重要、也是最不利的方式：减少女性自尊。我想我已经表明，男人对女性的贬低建立在一个明确的贬低女性的精

弗洛伊德《对爱情心理学的贡献》，载《论文集》第4卷。

这并不贬抑驱使男人找妓女的其他动力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的描述见弗洛伊德《对爱情心理学的贡献》载《论文集》第4卷；贝欧姆《对同性恋心理的贡献》，载《国际心理分析杂志》（德文）第6卷（1920）和第8卷（1922）。

神趋势之上——这个趋势根源于男性对特定的生物事实的精神反应，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如此广泛而顽固存在的精神状态。女人是幼稚的感情生物，所以不可能有责任感、独立性，这一观点都是贬低女性自尊的男性趋势作用的结果。男性指出有非常多的女性和这种描述相符合。当他们以此来证明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这一类型的女性是否没有受过对男性来说一个系统的选择的培养？重要的不是个体心智的强弱，从亚里士多德到莫比尤斯，已经花费了令人吃惊的精力和才智。真正重要的是这一事实：普通男人不安全的自尊使他一次又一次选择了幼稚的、非母性的、歇斯底里的女性类型，并通过这样做使每个新生的一代暴露于这种女人的影响之下。

拒绝阴道

—对女性生殖焦虑问题的贡献

弗洛伊德对女性发展的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如下的基本结论：第一，小女孩的本能早期发展过程是与男孩一样表现在两方面：性感区方面（在两性中，仅有一个生殖器官，即阴茎起一定的作用，阴道的作用尚未被发现）和首选的对象方面（对两性来说，母亲都是最初的爱对象）。第二，两性之间存在差异，这是由于虽然力比多相似，但解剖学和生物学基础却不同。从这个前提出发，合理而必然地得出了这一结论：女孩觉得她们自己在力比多的阳具定位上不如男孩充分。她们只好嫉妒男孩这方面的天生优势。关于与母亲的冲突，它是女孩与男孩所共有的，但女孩增加了一个关键性的冲突，她将没有阳具归咎于母亲。这一冲突是关键性的，因为正是这个冲突，才使得她与母亲分

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德文)第 19 期(1933),第 372—384 页;《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4 期(1933),第 57—70 页。再版获《国际精神分析

离，而转向父亲。

因此，弗洛伊德选用一个恰当的术语来形容儿童性欲旺盛时期，即男孩和女孩身上幼儿生殖器的第一时期，他称之为生殖器阶段。

我可以想像，一个不熟悉精神分析的科学研究人员，在阅读这一论述时会不加注意，仅将它看作许多奇怪而特别的观点之一，而这些观点是分析学派希望世人所信仰的。只有接受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的人才会明白，这一特殊的论点对整体上理解女性心理学是十分重要的。它的全部成果是弗洛伊德的最重大的发现之一，估计将被证明为永久的成就之一。我曾说过，认识儿童早期的印象、经验和冲突对他整个以后的生活十分重要。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接受这一命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个人早期的经验对主体处理后期经历的能力和他处理的方式都有形成性的影响，那么至少从潜在的角度来看可以产生以下有关女性特定心理生活的结论：

(1) 随着女性器官功能的新阶段——月经、性交、怀孕、分娩、哺乳和绝经的到来——甚至一个正常的女人（实际上如同海伦娜·多伊奇所假想的），在完全接纳她身体内所发生的变化之前，不得不克服男子气倾向的冲动。

(2) 甚至在正常的女人中，无论种族、社会、个人条件

海 伦 · 多伊奇《女性性功能精神分析》。

如何，女人比男人更易于将力比多依附或转向同性的人。也就是说，女性中发生同性恋的远远多于男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面对与异性有关的困难时，女人比男人更易于彻底地退却，转变为同性恋。因为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不仅她对同性的依恋支配着她儿童期的最重要的几年，而且当她第一次转向男人（父亲）时，依恋中夹杂着极度的愤恨。“既然不能有阴茎，我想有个孩子来替代一下，出于此目的，我转向我的父亲。因为解剖结构上的不足，我怨恨母亲，而她应对此负责，所以我不再亲近她了，而转向父亲。”正是因为我们相信早年生活的形成性影响，所以，如果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在整个一生中不保留一丝用强迫选择的东西替代真正所渴望事物的痕迹的话，我们倒该觉得它是一个矛盾了。^①

(3) 远离本能的一些事物的相同特征是继发的和替代的，甚至在普通的女人身上，做母亲的愿望中也会有这一特征，或者至少会很容易地表现出来。

弗洛伊德决不会认识不到渴望有孩子的强度。他认为，一方面，它代表了小女孩最强烈的本能对象关系——即对母亲的关系的主要结果，这一关系是以子母原初关系的相反形式表示的。另一方面，它也是对阴茎的早期原始期

我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讨论一下早期对象关系的问题，毕竟对象关系是小女孩的阳具态度的基础。

望的主要产物。关于弗洛伊德观点的特殊之点，更确切地说，做母亲的愿望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分解为个体发育的要素，并且可以从同性或阳具的本能欲望中获得原始的能量。

(4) 精神分析的第二个原理是，个人对性方面的态度是他对以后生活态度的原型。如果我们接受它，最终可推知，女人对生活的整个反应将以强烈而隐藏的愤恨为基础。因为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小女孩的阳具妒忌对应于在最重要、最基本的本能欲望上所具有的根本劣势感。这里，我们具有建立一般愤恨的典型基础。的确，这种态度并不是必然产生的；弗洛伊德特地说过，在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女孩设法找到了男人和得到了母亲身份。但如果早就存在并且根深蒂固的愤恨态度不是很容易地表现出来——通过与相似情况的男人比较，女人却要容易得多——或者并不准备将之作为对女人重要的情感基调的潜在伤害，这就与我们所有的分析理论和经验又一次产生矛盾。

从弗洛伊德对早期女性性欲的解释可以得出有关整个女性心理学的十分重要的结论。当我们思考这些结论时，我们可能会觉得应该反复将对观察和理论反映的检验应用于它们所依赖的事实基础，应用于对它们的正确评价。

我觉得，光靠分析经验并不足以使我们判定作为弗洛伊德理论基础的某些基本思想的合理性。我认为，应先由

受过分析训练的人对常态儿童进行大规模的有控制的系统观察，再对这些基本思想作最终的判决。我对这些观点持有疑问，其中包括对弗洛伊德这样的论述的疑问：“众所周知，男女特征的明显的差异是在青春期之后首次产生。”我亲自作的一些观察并不能证实这一论述。相反，我经常对小女孩在 2—5 岁间表现出特定的女性特征感到惊奇。例如，她们常常自发地对男人卖弄风骚或显示出母性焦虑的特征。从一开始，我就发现，将这些看法与弗洛伊德关于小女女孩性的最初男子气倾向的观点很难统一起来。

我们可以认为弗洛伊德所谈的论点，即两性起初的力比多流向的相似性，是局限于性的范围。但个人的性欲决定了其他行为模式，我们发现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为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对正常男孩和女孩出生后五六年内的行为差异进行大量的准确的观察。

结果表明，在最初的几年里，没有受到威胁的小女孩经常表现出早期的阴茎嫉妒；她们会问问题，她们对自身的劣势作了比较，她们说也想要一个阴茎，她们表现出对阴茎的仰慕或借以后自己会有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暂时假定这些表现经常或有规律地发生，在我们的理论结构中，我们应该将这些表现赋予多大的权重、安置于何位置，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与弗洛伊德的总体观点相一致的是，他利用这些表现来说明，小女孩拥有阴茎的渴望已经决定了她的

本能生活的程度。

为反驳这个观点，我将阐述下列三点：

(1) 在相同年龄的男孩身上，我们看到了相同的表现。

他们也想拥有乳房或生育小孩。

(2) 无论男性或女性，从整体上看，这些表现对儿童的行为产生了影响。如果男孩强烈希望拥有像其母亲一样的乳房，那么，一般说来，他同时也会表现出十足的小男孩式的攻击性行为。小女孩对她兄弟的生殖器产生羡慕和嫉妒之情时，举止就会像一个十足的小女人。因此，早期的这些表现是否应被看作基本的本能要求的体现，是否不应该将这些表现归为不同的类别，我觉得这两个问题似乎尚未有确切的答案。

(3) 如果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双性倾向，则可能出现另一个类别。这对我们理解心理很重要，弗洛伊德经常强调它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认为，尽管一出生，个体的性别已在生理上固定下来，双性倾向却一直存在，只不过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受阻。它的结果是从心理上来说，儿童对自己性别角色的态度最初是不确定的和临时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它，因此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双性欲望。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并猜想，这种不确定性只会随着指向对象的爱情不断上升而成比例地消失。

为了阐述我的上述论点，我可以指出一些显著差异，它

们存在于变化无常的顽皮儿童最早期和所谓的潜伏期扩散了的两性表现之间。如果这个年龄的女孩希望成为男孩——但这里必须对这个愿望发生的频率以及决定这些愿望的社会因素加以研究——这决定她的整个行为方式（喜好玩男孩游戏和男孩的做事方式，否定女性特征）。此行为方式表明，这类愿望来源于心理的另一层面，这一情况不同于早期的情况，然而它表明她所经历的心理冲突的结果，^①在没有特殊理论假设的情况下，并不能认为此情况表明了男性欲望，而男性欲望在生物学上已被证伪。

弗洛伊德所创建的另一个理论前提与性感带有关。他假设，女孩早期的生殖器感觉和活动主要作用在阴蒂。他对早期阴道手淫是否发生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阴道仍然完全“未被发现”。

要解决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需要对正常儿童再次进行广泛和精确的观察。我本人和乔斯纳·缪勒早在 1925 年就对这个论题持怀疑的态度。而且，我们从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妇科医生和儿科医生那里所获得的大多数信息表明，儿童早期阴道手淫至少与阴蒂手淫一样普遍。这可通过以下各方面的资料加以证明。经常观察到如潮红

霍尔奈《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5 卷，1924。

乔斯纳·缪勒《女孩生殖期的力比多发展问题》，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3 卷，1932。

和溢液等阴道兴奋标记，经常将外部物体插入阴道，母亲经常埋怨儿童将手指放入阴道。著名的妇科医生威尔海姆·李卜曼(Wilhelm Liepmann)^①说过，他的经验使他相信儿童早期甚至在幼儿期的头几年，阴道手淫比阴蒂手淫更经常发生。在儿童期的较后阶段，情况才相反，阴蒂手淫会较多。

这些总体上的印象并不能代替系统的观察，因此它们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但它们确实显示出连弗洛伊德本人都承认的例外，而且这些例外是经常发生的。

接下来自然应该解释分析中所产生的这一问题，但这是很难的。就从最乐观的方面来看，病人有意识回忆的材料或分析中浮现的记忆不能作为明确的证据，因为与其他任何情况都一样，我们必须考虑压抑的作用。换句话说，病人不记得阴道感觉和手淫可能是有一定理由的。相反，我们应该因她对阴蒂感觉的忽略而产生怀疑。^②

来接受分析的女性甚至不能期望她们有正常自然的阴道过程，这是一个更大的困难。因为她们的性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偏离正常，她们的阴道敏感性或多或少地受到削弱。同时，身体上的偶然差异似乎也起一定的作用。我所收

出自私人谈话。

^② 1931年，在德国心理分析协会成立之前，在对我的有关生殖器阶段的论文的讨论中，贝欧姆引用了几个案例，病人仅回忆起阴道感觉和阴道手淫，而阴蒂感觉和手淫显然未被发现。

集的案例中约三分之二有下述状态：

(1) 用手进行的阴道手淫所产生的明显的阴道性欲亢进发生在性交之前。性冷淡表现为阴道痉挛和性交中阴道分泌有缺陷。（这种情况我仅见过两例，并且决不会有误。）总体而言，我认为用手进行的生殖器手淫偏向于对阴蒂或阴唇的手淫。

(2) 自发的阴道感觉大多数伴有明显的分泌物，它是由无意识的刺激情景所引起的，如听音乐、开车、摆动、梳头发、某些移情情况。没有用手进行的阴道手淫；性交中性冷淡。

(3) 非生殖器官手淫，如身体特定运动、受到束缚或对施虐—受虐的幻想等产生自发的阴道感觉。无论何时要接触到阴道，如与男人性交、医生进行检查、用手进行手淫，还是进行医疗冲洗等，都会产生强烈的焦虑，因此拒绝性交。

可以暂且将我的观点总结如下：在用手进行生殖器手淫中，选择阴蒂要比选择阴道更为普遍，而一般性兴奋引起的自发的生殖器感觉常常发生在阴道。

从理论的立场来看，我认为，病人身上经常出现的自发性阴道兴奋是很重要的。即使病人对阴道的存在是无知的，或有一些模糊的认识，即使病人后来的分析不会使对阴道魅力的记忆或其他证据显露出来，也不会使对阴道手淫的回忆显露出来。因为这个现象暗含了这个问题，也就是，是

否从一开始，性兴奋就不可能用可觉察到的阴道感觉来描述。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等待收集更为广泛的材料，而不是仅凭分析者从自己的观察中所获得的材料。同时大量的思考结果似乎支持我的观点。

首先，强奸幻想发生在性交之前，远早于青春期，因为经常发生，所以应该加以重视。如果我们假定不存在阴道性欲，那么没有办法解释这些幻想的来源和内容。因为事实上，这些幻想不会突然停止在模模糊糊的暴力行为的想法上，通过这一暴力行为她得到了孩子。相反，幻想、梦和这类焦虑通常与有关实际的性过程的本能知识明显相违背。它们采取伪装的形式很多，我只列出其中的一些：罪犯破越门窗行窃，持枪威胁，动物（如蛇、鼠、蛾）爬行、飞翔或跑进某一场所；动物或女人被刀刺伤；火车驶进车站或隧道。

我谈及性过程的“本能”知识，是因为我们通常遇到这种想法——如，在儿童早期的焦虑和梦中——当处于从观察或别人的解释中并不能得到理智的知识的阶段时。读者可能要间插入女性身体过程的本能知识是否必然是以阴道作为接受器的本能知识作为前提呢？如果我们赞同弗洛伊德的“儿童的性理论是以儿童自己的性结构为模型”这一观点，则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仅表明，自发经历

的冲动和器官感觉，划清和决定了儿童性理论的发展之路。如果我们相信体现了合理而详尽阐述的性理论的起源，那么本能知识可以在戏剧、梦和各种形式的焦虑里找到象征的表达形式。本能知识显然还未达到推理范围和详尽阐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应该承认它。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假定青春期的特征，即强奸恐惧和小女孩幼儿期的焦虑，都是以阴道感觉（或从阴道感觉产生的本能冲动）——即身体的这个部分应有东西插入——为基础的。

我认为，这里我们回答了可能提出的异议，也就是，许多梦表明，当阴茎首次插入体内时才会开始产生幻想。因为若没有先前的本能存在——和潜在的器官感觉，同时伴有消极的接受目标，就不会产生这类幻想。有时，这类梦的联系清楚地表明特定想法的起源。因为偶尔会发生这类情况，即当对手淫的有害结果出现一般焦虑时，病人会梦到下述的典型内容：她做针线活时突然看见针洞眼，便对洞产生羞愧之情；她过桥或跨过桥上的裂口，这时突然桥中间断裂；她正沿着一个滑坡走，突然滑倒，正面临掉进悬崖的危险。根据这类梦，我们可以猜测，当病人是小孩时沉溺于手淫，她们受阴道感觉的驱使去发现阴道，她们的焦虑表现在担心自己已在本应无洞的地方挖出洞来。与男孩相比，女孩的压抑引发生殖器手淫要更容易、更频繁，弗洛伊德对此原因作出了解释。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从来不全然相信

弗洛伊德。如众所知，弗洛伊德假定^① 女孩对 阴蒂 弄淫感到恶心，因为与阴茎的比较使她们的自恋受到打击。当我们考虑手淫冲动后的驱力强度时，自恋耻辱并不足以产生抑制。另一方面，女孩害怕对自己的那个部位会产生不可弥补的伤害，这种强大的恐惧使她停止阴道手淫，要么使她将手淫局限于阴蒂，要么使她永久地停止所有的用手进行的生殖器手淫。我相信，有进一步的证据说明在与男人进行带有羡慕的比较中，存在早期的阴道受损恐惧。我们经常听到这类病人说男人的下面封闭得如此完好。类似地，女性手淫所产生的最深层次的焦虑以及自己无法生育的恐惧，这两者似乎与身体内部有关，而与阴蒂无关。

这是另一个观点，用于证明早期阴道兴奋的存在及其意义。我们知道，对性行为的观察会对儿童产生极大的兴奋效果。如果我们接受弗洛伊德的观点，我们必须假定，这样的兴奋使小女孩产生想插入阳具的冲动大体上与小男孩被唤起的阳具冲动相同。但我们要问：在对女性病人的分析中普遍碰到的焦虑——巨大的阴茎会戳穿她的这一恐惧出自何处？巨大的阴茎观念的起源仅可能在儿童期寻找到，当时儿童肯定看到父亲的阴茎并且吓了一跳。还有，对显示在性焦虑的象征中的女性性角色的理解从何而来？我们

弗洛伊德《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6卷，1927。

如何解释 在分析中当充满感情地唤起‘原始意像’时 常常表现出对母亲的巨大妒忌和无限的愤怒呢？如果那时病人仅能分享父亲的兴奋，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上面的资料：强烈的阴道高潮之后紧接着又有性冷淡；没有局部刺激但会发生继发的阴道兴奋 但性交中却性冷淡 要理解早期的性游戏、梦和焦虑 以及后来的强奸幻想对早期性的观察的反应，这些也引出了反思和疑问；最后女性手淫产生了焦虑的特定内容和结果。我认为如果将前面的资料汇总起来，那么只有一个假设可作为对所有问题、假设的完满回答，即从一开始，阴道就担当着它自己合适的性角色。

与这一思考结果紧密相连的是性冷淡问题。我认为，此问题不在于如何将力比多的敏感性传到阴道，^① 而在于尽管阴道已有敏感性，但阴道对强烈的力比多兴奋为什么不能作出反应或仅作出较弱的反应，且力比多兴奋在性交中伴有充满感情的局部刺激？必定仅有一个比享乐的愿望

弗洛伊德假设力比多紧紧地附在阴蒂区，以致将敏感性传到阴道是很困难的或不可能的，要对此作出答复，我能冒昧地用弗洛伊德之矛来攻其之盾吗？弗洛伊德证明了我们是多么乐于享乐，甚至没有性特征的过程——如身体运动、讲话或思考都是如何带有性的色彩。这些过程与疼痛或焦虑一样，是一种令人痛苦的经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假定，在充满享乐机会的性交中，女人竟不敢抓住这些机会！据我看来 这个问题实际不可能发生 我不赞成海伦·多伊奇和梅拉尼·克莱因提出的有关力比多从口腔移向生殖器的假想。虽然毫无疑问，许多案例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问题仅在于我们是否要把力比多看作是能够转移的，或当早期就建立并坚持口腔态度时，口腔也属于生殖器领域，这是否是不可避免的

更强烈的因素，那就是焦虑。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阴道焦虑或它的幼儿期因素意味着什么？阴道分析表明，首先，伴有对男人的阉割冲动所致的焦虑来源有两方面：一方面，病人害怕自己的敌对冲动；另一方面，她害怕会受到预感的因果报应的惩罚，也就是，她体内的东西将遭受破坏、偷窃或被吸出来。这些冲动本身大多数不是来自于现在发生的事情，而是应追溯到幼儿期对父亲的敌对冲动与憎恨之情，追溯到小女孩所遭受的失望与沮丧之情。

梅拉尼·克莱因描述了与这些焦虑相似的情况，可追溯到早期对母亲身体的破坏冲动。这又是一个害怕报应的问题。这种害怕会采取各种形式，但本质是插入身体或已在体内的任何东西（食物、粪便、小孩）都可能导致危险的产生。

尽管本质上各种焦虑与男孩的生殖器焦虑相类似，它们呈现出从潜伏到焦虑的特征。焦虑已是女孩生物构造的一部分。在本文以及我以前写的文章中，我已指出焦虑的原因。这儿，我仅需完成以及总结我以前的论述。

(1) 首先，父亲与小女孩的身高及生殖器大小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不必费心去决定从观察中是否可推论出阴茎和阴道的悬殊，或是否可从本能角度来理解悬殊。很容易理解且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满足阴道感觉产生的紧张的幻想（如渴望吸收自己，渴望接受）会引发本我中的焦

虑。正如我在《女性的恐惧》一文中所说 我相信 在生物决定的女性焦虑中，我们有不同于男孩原有的与母亲相关的生殖器焦虑。当他幻想完成生殖器冲动时，他要面临损害自尊的事实“我的阴茎对母亲来说太小了”)另一方面 小女孩面对着身体部位会受损伤。因此回想它的最终生物学基础，男人对女人的恐惧是生殖器自恋，而女人对男人的恐惧是身体上的。

(2) 这里^①强调了焦虑的第二个特定来源及其普遍性和意义。这个来源是指小女孩看到成年亲戚来月经，除了所有(次要的!)阉割解释外，她第一次明白女性身体的柔弱。同样，她看到母亲流产或分娩，她的焦虑就会明显增加。在儿童的心里和(当压抑起作用时)成人的无意识中，性交和分娩有密切的联系，这个焦虑不仅表示为分娩恐惧，而且还表示为性交恐惧。

(3) 最后，在小女孩(同样由于她身体的解剖结构)对阴道手淫的早期尝试的反应中产生了焦虑的第三个特定的来源。我认为这些反应的影响，女孩比男孩更长久，原因如下：首先她实际不能确定手淫的影响如何，而男孩虽然对其生殖器也有焦虑，但他能认识到生殖器仍存在，并且未受损。^② 小女孩无法证明她的焦虑是没有现实基础的。相反，

这里《月经情结的起源》载《意像》第14卷(1928)。

最要考虑的是真实情境及无意识焦虑的强度，例如，男人的阉割焦虑可作为包茎的结果而得以加强。

对阴道手淫的早期尝试使她再次感到自己身体的柔弱。^①

我在分析中发现，当小女孩尝试手淫或与其他孩子玩性游戏时，会因处女膜很小的破裂而产生疼痛之感或受点小伤，这一情况是很普遍的。

总之，发展顺利——如儿童期的对象关系尚未成为冲突的成熟来源——便能很好地把握住焦虑，使主体认同自己的女性角色。在不顺利的情况下，女孩的焦虑效果要比男孩更持久。我认为，根据事实，女孩较经常放弃直接的生殖器手淫或至少把它局限到易接触到的阴蒂，这样仅需要较小的焦虑精力投入。与阴道有关的一切东西——阴道的存在、阴道感觉和本能冲动的知识——要服从无情的压抑；简而言之，错误的假设一直主张不存在阴道，同时它也决定小女孩对男性的性角色偏爱。

所有这些思考支持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在“不能发现”的阴道背后有着对阴道存在的拒绝。

整体看来，早期阴道感觉的存在或阴道的发现对早期女人性方面的整体概念有什么样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仍须继续加以探讨。尽管弗洛伊德没有明确论述它，然而很明显，

我们饶有兴趣地回忆妇科医生威尔汤姆·尼卜曼（他的立场不是分析学派的）在其一书中讲到女人的“柔弱”是女性的特定特征之一。分析可以使这些经历一目了然，首先，屏幕式地回忆生殖器的损伤，以后的生活中一直持续，可能会持续一个秋季。病人回忆表现出与原因不相称的恐惧与惭愧。第二，也许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恐惧，惟恐可能产生这样的伤害。

如果阴道仍原始地“未被发现”，那么这将成为支持小女孩的生物决定的原始阴茎妒忌的假设或她们原初阳具器官的假设的强有力的证据之一。因为如果阴道感觉或渴望不存在，但根据阳具构想力比多集中在阴蒂，那么我们仅能理解小女孩因缺少自己特定的享乐来源或特定的女性欲望的来源，所以被迫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于阴蒂，再将它与男孩的阴茎比。事实上，在比较结果上处于劣势，则认为自己瘦弱。^① 另一方面，如我推测，如果小女孩经历早期阴道感觉和相应的冲动，她肯定从一开始就喜欢自己的性别角色的特征，并且弗洛伊德假设的原始阴茎嫉妒就很难解释。

本文阐明的观点是，原始的阳具性欲假设对整个女人的性概念来说有重大的影响。如果女性有特定的原始的阴道性欲，那么阳具性欲假设（若不完全排除在外的话）至少受到极端的限制，以致那些结果变得非常难以捉摸。

海伦·多伊奇通过逻辑推断过程获得阴茎嫉妒的基础。参阅海伦·多伊奇《女性心理生活中的受虐狂的意义》。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1 卷（1930）。

女性机能紊乱的心理因素^①

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人们通过妇科学文献对女性障碍的心理因素影响展开了讨论。意见分歧很大。一方面倾向于认为这些因素的影响很小——例如，承认存在情感因素的作用，但同时又强调它们是依赖于体质条件、腺性状况或其他身体条件起作用。

另一种倾向则认为心理因素的影响很大。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不仅可将它们看作明显的或不明显的机能性障碍的本质起源 这些障碍包括假孕、阴道痉挛、性冷淡、月经失调、充血等；而且他们宣称，心理上的影响似乎超过了对疾病和障碍的怀疑，比如早产或晚产、多种子宫炎、不育和多种白带都与此有关。

心理刺激可引发生理上的变化。对于这一事实，帕罗

本文于 1932 年 11 月 18 日在芝加哥妇科学协会召开的会议上宣读。载《美国产科学与妇科学杂志》第 25 期第 694 页，1933；C.V 莫斯比公司出版。

所做的实验提供了经验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对此不必再有怀疑。我们知道，刺激食欲可影响胃的分泌，恐惧会加快心脏的节律和肠的蠕动；血管舒缩的改变如脸红，可表明害羞的反应。

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从中枢神经到外周器官的刺激传导途径。

从这些相当简单的联系到心理冲突是否会导致痛经这一问题的提出，论题似乎发生了突变。然而我认为基本的差异并不存在于过程本身，而是存在于方法。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刺激一个人的食欲，然后可以测量胃腺的分泌物。你也能测量当一个人产生某种恐惧反应时的分泌物的变化，但你在实验中不能引发痛经。痛经的情感过程很复杂，以致无法进行实验；但即使你设计实验将人置于某种极为复杂的情感状态下，你也不能得到具体的结果，因为痛经不是单一的情感冲突的结果。但它是以一系列情感条件为前提的。这些条件的基础存在于不同的时期。

由于上述原因，通过实验了解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揭示特定情感与某一症状如痛经之间联系的方法显然是一个历史方法。通过她的详细生活史，可使我们了解此人特定的情感结构，了解症状和情感之间的关联。

如我所知，仅有一个学派——精神分析学派可以提供具有高度科学精确性的见解。精神分析讲述了在实际生活

中起作用的心理因素的实质、内容和动力等知识——如果要科学地探讨情感因素是否会引发机能性障碍这一问题，上述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此处，我不会涉及方法的具体细节，但以简洁的形式说明某些情感因素是必要的。我在分析过程中发现这些情感因素对于理解女性机能性障碍是很重要的。

我从一个事实谈起，因为它的反复出现引起我的注意。我的女病人们有多种不同的心理病因：各种焦虑状态、强迫症、忧郁症等。工作和人际交往上有抑制、人格障碍。在每个神经症中，她们的心理性生活都被扰乱了。她们与男人或孩子或这两者的关系严重受阻。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神经症中，任何一个病人都有生殖器系统的机能性失调——不同程度的性冷淡、阴道痉挛、各种月经失调、瘙痒、疼痛、溢液，这些症状却没有器质性的基础。在揭示出无意识的冲突，如担心得癌症或不正常的猜忌症等各种忧虑，以及怀孕与分娩中有心因性根源的障碍后，上述的症状就会消失。

这里列举三个问题：

(1) 失调的心理性生活与女性机能性障碍的一致是惊人的——但，这种一致正常吗？精神分析者在彻底地了解大量的案例上占有优势，但毕竟繁忙的分析者也只能接触几个案例。即使我们可用人类学事实及其他观察方法来证实

我们的发现结果，但有关这一结果的频率和效度的问题则需要妇科医生将来给出答案。^①

当然，让他们进行这种研究需要时间和心理学的训练；但要是将用于实验工作的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心理学的训练，显然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2) 如果我们假定这种一致是正常的，心理性障碍和机能障碍难道不可以来源于体质条件或腺的状态的共同基础吗？

现在我不想深入探讨这些复杂的问题。但我要指出，根据我的观察，这些机能性因素和情感障碍并不共存。例如，有些女人性冷淡，对自己的女性角色很反感，有男子气倾向。其中一些人的第二性征——声音、头发和骨骼——趋向于男人，但大多数仍保持明显的女性体型。对两组人——一组粗看上去具有男子特征，另一组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你可发现引发情感变化的初始冲突；但仅第一组所发生的冲突有体质条件上的基础。我认为，并不知道体质因素以及它们对以后态度的影响，却假设两者有联系，这是不正确的。而且，如果忽视了心理因素，这种假设会导致极为危险的治疗后果。例如，在汉尔班和斯库兹所著的现代妇科学德语版课本中，作者曼斯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一女孩

编者按：霍尔奈博士认为妇科医生可以更精确地评价他们发现的结果并提供显著的统计分析资料。因为与精神分析者相比，他们可接触更多的病人。

要治疗持续了一年半的痛经。她介绍说，自己在一次舞会上不慎感冒。后来，曼斯发现她与一男人已发生了性关系。她告诉曼斯，那男人激起她的性兴奋，但同时又惹怒她。曼斯根据她的性关系中不可能有快感的理论声称她表现出“雌雄间性型”，所以建议她与那男人分手。她努力按此建议做了，两次月经没有痛经。后来她再拾旧情，痛经又出现了。

这似乎是根据薄弱的知识得出了极端的治疗结论。这使我想起《圣经》中的一句名言“如果你的眼睛触怒了你 就将它挖出来”。

从治疗学的观点看，似乎最好看一下可能由体质因素造成的冲突的心理水平，尤其是没有这些因素时我们经常看到的相同的冲突。

(3) 现在讨论第三个问题，这一问题可简单明确地表述为：“在心理性生活中的某些心理态度和某些机能性生殖器障碍之间有特定的相关吗？”不幸的是，人的本性并非简单，而我们的知识又不够用，从而使得我们无法对它作出明确而严格的阐述。事实上，在所有这些病人中，你会发现某些基本的心理性冲突。这些冲突与这一事实一致，即：表明所有病人都有某种程度的性冷淡——至少也有过渡性的性冷淡；但与特定的机能性症状的正常关联中，某些特定的情感和因素起着主要的作用。

性冷淡作为基本障碍，其病人总具有下述独特的心理态度：

首先，性冷淡的女人对男人有着矛盾的态度，总是包含有怀疑、敌对和害怕的成分。但这些成分不会很明显。

例如，一个病人潜意识里认为所有的男人都是罪犯，应将他们斩尽杀绝。这个想法是她将性行为看作血淋淋的和令人疼痛行为的自然结果。她视每个结婚的女人为英雄。通常你会看到一种矛盾的伪装形式，要了解病人对男人的真实态度不是依据她的陈述而是依据她的行为。女孩可能会很坦率地告诉你她们如何喜欢男人，她们如何倾向于将它们理想化。但同时，你会发现她们没有明显的理由就残忍地抛弃“男友”。下面举一典型的例子：我的病人 X 与男人有相当好的性关系，可总是持续不到一年。总是在一段短暂的间隔之后，就会对他的愤怒不断地增长，最后竟不能忍受他。然后，便寻找抛弃他的借口。事实上，她对男人的敌对冲动如此强烈，以致她担心会伤害他们，所以就逃避他们。

有时你会发现病人告诉你她们想到与丈夫离婚，而深入的调查表明，那些敌对的信号虽然很小，但有很大的阻碍，它们来源于日常生活。比如，对丈夫持蔑视的态度，忽视他的优点，从他的兴趣所在或朋友圈中退出，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为权力而进行持续的冷战。在这些情况中，你不

仅会或多或少地知道，性冷淡是敌对潜流的直接表示。而且，在精神分析的高级阶段，当揭示出从内心里对男人产生厌恶的根源时，你会准确地知道性冷淡是如何开始的——当克服掉这些冲突时，你就会知道它是如何结束的。

这是男性心理学和女性心理学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异。一般情况下，与男人比较而言，女人的性与温柔、情感和爱的联系更为紧密。而男人的性冲动不一定与对女性的爱有关，甚至在男人对女人不感到特殊的温情时，他们一般不会阳痿。相反，性生活和爱情生活之间有着分界线，以致在极端的病理学情况下，男人可与不喜欢的女人有性关系，而对他真正喜欢的女人没有性欲望甚至会阳痿。

可能由于明显的生物学原因，大多数女性的性感觉和她们整个的情感生活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一致性。因此隐藏的敌对态度很容易表示在给予或接受性的无能上。

对男人的这一防御态度不必有深刻的根基。能唤醒女人身上柔情的男人可能会很好地克服她们的性冷淡，这是经常的；但在其他一系列情况下，这种敌对防御态度是很深厚的。如果女性要摆脱它，就要暴露它的根基。

在后一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对男人的对抗感情在儿童早期就已埋下。要理解早期生活经历的深远影响，没有必要知道较多的分析理论，但要明白两点：儿童生来就有性感情，与受抑制的成年人相比儿童的感情更强烈。

在这些女性的成长史中，你会发现她们早期的爱情生活中有刻骨铭心的失望：她们很依恋父亲或兄弟，而他们却使她大为失望；或者兄弟受偏爱；或者如下所述的一个全然不同的情况。病人十一岁时诱奸了她的弟弟，几年后弟弟死于流行性感冒。她有着强烈的罪恶感。三十年后她来接受分析，她仍然认为自己害死了弟弟。她的诱奸使得弟弟开始手淫，而他的死又是由手淫所致。这个罪恶感使得她憎恨自己的女性角色。她希望成为男人，更确切地说，她变得坦然地妒忌男人，尽可能失信于他们。她产生了强烈的阉割梦和幻想，并且变得性冷淡。

顺便提一句，此案例可说明阴道痉挛的心理起因。尽管她的处女膜没有异常，丈夫也有性交能力，但直到结婚四周后才被破身——这是一名外科医生干的。痉挛部分表达了她对女性角色的厌恶，也部分表达了她所妒忌的男人的阉割冲动的防御机制。

这种对女性角色的厌恶，无论是怎样开始的，常常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有这样一种情况，父母偏爱弟弟，病人对此产生妒忌，这样对她的整个一生产生不良影响，尤其是在她与男人的关系方面。她自己想成为男人，在梦和幻想中扮演男性角色。有时，在性交过程中她意识到自己十分渴望变性。

在这些性冷淡女性身上，我们还发现另一种冲突——

与母亲或姐姐的冲突。此冲突情形在机能上更为重要。可意识到对母亲的感觉会有所不同。有时病人在治疗的开始——甚至对自己——承认仅有对母亲关系的积极一面。她们可能已感到震惊，因为观察表明，尽管她们渴望母爱，但事实上她们所做的又与母亲的要求总是相反。在其他情况下存在着明显的憎恨。尽管她们意识到冲突的存在，但她们不知道它的本质原因，也不知道它对心理性生活的影响。这些本质特征之一也许是，例如母亲不断地对这些女人表现出禁止性生活和性快感的能动作用。最近，人类学家报告了一些原始部落的风俗，从而解释了这些冲突的普遍性：当父亲去世后，女儿留守在死者的屋里，但儿子却要离开。因为他们担心先父的灵魂对他们产生危害。当母亲去世后，儿子留守在死者的屋里，但女儿要离开，因为担心母亲的灵魂会将她们杀死。这一风俗表达了对报复的对抗和恐惧，在对性冷淡的女性分析中可看到相同的情况。

不知分析过程的人可能会问：如果病人未意识到这些冲突，你怎样才能这么确信冲突确实存在，而且起着特定的作用呢？这里将给出此问题的一个答案。对于缺乏分析经验的人来说，答案是很难理解的。病人以前的非理性态度被唤醒、被激起，并且指向精神分析者。例如，病人 X 有意识地对我充满深情，尽管其中混杂着恐惧。但当她幼儿期对母亲的憎恨浮到表层时，她在候诊室会害怕得发抖，在我

的身上会看到凶残的罪恶之魂。很明显，她已将以前对母亲的恐惧移情到我的身上。一件特殊的小事使我们认识到对可怕的母亲的恐惧在她的性冷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分析中的一段时间，她的性抑制已经消失。此时我外出了两个星期，回来后她告诉我，一天晚上她与朋友聚会，喝了酒——但不超过她平常的酒量——她记不起后来发生了什么，但她的男友告诉她，当时她很兴奋，提出性交并且性交中极度的性欲亢进（那时以前，她一直是性感完全缺失）。当时她用一种胜利的声音大喊了好几次，“我可以结束霍尔奈对我的治疗了。”我，作为她幼想中可怕的母亲，不存在了，因而她可成为既无恐惧又充满爱情的女人。

另一病人，先是阴道痉挛后又性冷淡。她将对母亲的恐惧尤其是对比她大八岁的姐姐的恐惧移情到我身上。病人几次试图与男人发生关系，但总因她的情结而失败。一般她会因我而生气，有时甚至会产生幻想，认为是我使得男人远离她。尽管理智上她也认识到我是帮助她作调适的，但原先的那种对姐姐的恐惧占了优势。当她与男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时，她立刻梦见姐姐在追赶她。

性冷淡会受其他心理因素的影响，现在我将谈及其中的一些因素。但我不会深入地探讨它们与性冷淡的联系，仅指出它们对另一些机能性障碍的重要性。

首先，手淫所产生的恐惧不仅对身体过程产生影响而

且对心理态度也产生影响。众所周知，如果这些恐惧与手淫相关联，几乎每一疾病都可看作是恐惧的结果。女性恐惧往往是她们担心手淫会损伤自己的生殖器官。这一恐惧与幻想有联系，她们幻想自己曾与男孩一样，但已被阉割。这一恐惧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表示。

(1) 有着模糊而深层的恐惧，担心自己不正常。

(2) 具有猜疑症恐惧和症状，如没有器质基础的疼痛与溢液。这使得她们会去征求妇科医生的建议，然后她们接受有启发性的治疗或某种宽慰，而且感觉好些了——但自然而然地又会产生恐惧，产生相同的抱怨。有时这一恐惧使她们坚持要做手术。她们感觉到身体上有毛病，并且只有通过手术这一根本手段才可治疗。

(3) 此外，恐惧还有一种形式：因为我损伤了自己，所以我永远不会有孩子。每一个小女孩对这一关系的恐惧有时是相当有意识的。甚至这些年轻的病人通常会首先告诉你，她们认为生孩子很令人恶心，希望永不生孩子。后来，你就会明白，这一恶心感觉代表了她们对早期希望有许多孩子的“酸葡萄”效应。上面提到的恐惧使她们否定这一愿望。

许多无意识的冲动倾向与渴望生孩子有关。某些无意识动机可能阻碍天生的母性本能。我现在不作详细解释，仅谈谈一个可能性：对于那些心理上有一部分强烈地希望

成为男人的女人来说，怀孕和做母亲代表女性任务的完成，有很大的意义。

不幸的是，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假孕的案例。但它可能也产生于渴望小孩的无意识强化。暂时的经闭表明十分渴望生一小孩。每个妇科医生都知道只要怀孕了，经常焦虑和抑郁的女人就会变得十分快乐而沉着。对她们来说，怀孕也代表着特定形式的满足。

我脑中的案例所强化的不是生孩子、照顾他、抚爱他的想法，而是强化怀孕本身；体内怀一个孩子的想法。怀孕状态体现她们异常自恋的价值观。两个案例都有晚产的情况。虽不能过早下结论，但至少可认为，想将孩子保存于体内的愿望可用于解释晚产的一些案例，而这些案例无其他方法加以解释。

起作用的另一因素是非常害怕在分娩中自己会死去。这一恐惧本身可能是意识到或意识不到的。恐惧的真正起源是永远意识不到的。根据我的经验，它的一个本质成分是以前对怀孕母亲的对抗。我记得，有一病人极度害怕在生孩子过程中会死去。她回忆说，孩提时，许多年来她一直紧张地监视她母亲看她是否又怀孕了。她在街上一看到怀孕的女子就有一种冲动想去踢她的子宫。自然她也怕受报应，担心相当糟糕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她身上。

另一方面，对小孩的无意识敌对冲动会抵消母性本

能。这些冲动对充血、早产和生产后的抑郁的可能影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让我们再次回到手淫所产生的恐惧问题上来。我已提过，病人感到身体受破坏的想法导致恐惧的产生，这一恐惧又导致猜疑症状的出现。可用另一方法来表达这些恐惧：对手淫的态度。受伤害的想法使女人憎恨自己的受了伤的生殖器，月经的来潮在情感上可确证这一假设。对这些女人而言，流血和受伤之间有紧密的联系。由此可以理解，月经对她们来说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她们对它极度厌恶。

这又把我引到了经血过多和痛经的问题上了。当然，我们所讲的案例是既没有局部性原因又没有其他器质性原因的。理解机能性月经障碍的基础是：那时与生殖器官的身体过程相当的心理就是不断增长的力比多紧张。女人如果心理性发展平衡，碰到紧张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但许多女人不能保持此平衡，不断增长的力比多紧张对她们来说是最终导致垮台的因素。

在紧张的压力下，病人会唤起幼儿期的幻想；尤其是与流血有关的幻想。一般而言，这些幻想的内容主要指性行为是残忍的、流血的、令人疼痛的。我无一例外地发现这一幻想对所有病人的月经过多和痛经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痛经不是出现在青春期，则通常是当病人涉及到成人性问题

题时才开始。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病人一想到性交就总会
出现极度的月经过多，眼前出现流血的幻想。在分析中，我
们发现儿童期的某些记忆决定着这一幻想，同时幻想也是
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出现的。

她在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她最害怕的回忆是新生
儿诞生的情景。她听到母亲的嘶叫声，看到从母亲的房
里端出好几碗血。婴儿出生、性和血之间的早期联系如此
紧密以致一天晚上，因为她母亲的肺出血，她立刻将血与父
母的关系联系起来。她的月经使她回忆起幼儿期对带
血的性生活的印象和幻想。

我所提到的这个病人有严重的痛经。她本人也完全意
识到她真正的性生活与各种施虐狂的幻想有关。她一听到
或读到残忍的行为就感到性被激活。她描述来月经时的疼
痛的感觉时说，仿佛体内被什么东西撕破了。幼儿期的幻
想决定了这一特定形式。她记起，小的时候就认为在性交
中男人将女人体内的东西撕破。在痛经时，她的情感上将
过去的幻想付诸于行动。

我认为，我的许多关于心理性因素的阐述听起来完全
像是幻想出来的。尽管可能这些并不真是幻想的，只是与
通常的医学思维不相同。如果想要有超越情感的决策，仅
有一个科学有效的途径——用事实来检验。也许宣泄可以

解释特定的心理根源，症状在这一过程中消失，但这不能证明宣泄过程会使症状痊愈。任何技术性的建议可能都有相同的结果。

科学的检验^①应该与其他科学领域相同：应用自由联想的心理分析技术，看结果是否相似，没有达到此要求的任何一个决断都是缺少科学价值的。

在我看来，似乎妇科医生还有其他一种方法可获得某些情感因素和机能性障碍之间特定相关的证据。如果仅给病人一些时间与注意，至少她们中的一些人很容易地表现出冲突。我认为这种进行方式有直接的治疗学的价值。只有当医生接受足够的精神分析培训后才能进行正确的分析。此过程的敏锐不亚于手术。不仅有主要的手术还有次要的手术。次要的心理治疗包括处理最近的冲突、揭示它们与症状的联系。在此领域中已做过的工作，能够很容易地大规模展开。

人们必须意识到这一可能性仅有的一个局限：如果想要避免犯错误，尤其是激起个人无法应对的情绪上的错误，就要有广博的心理学知识。

编者按：重新组织霍尔奈的论述，可以使她的意思更为清晰。科学的效度要求是，许多受过培训的心理分析者使用自由联想技术研究一组有女性机能性障碍和心理性障碍的病人，他们将会揭示相似的心理动力外形；经过心理分析治疗，病人的症状变好，解决了特定的心理冲突和已被揭露的防御；随着病人数量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分析者再度确信这些结果。

母亲冲突^①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对母亲天生的教育能力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大约三十年前，母性本能被认为是抚育孩子的绝对有效的向导。当这一点被证明不够格时，接着出现了教育理论知识同样过分强调的信念。不幸的是，科学教育理论的工具并不能证明比母性本能更能确保不失败。现在，我们正在转回到强调母子关系、重情感作用一边。然而，此时我们依靠的不是本能的模糊概念，而是一个确切的问题：什么是能够干扰理想态度的情感因素？这些因素的起源是什么？

我不打算讨论人们在分析母亲时所看到的多种冲突，这儿我只想努力呈现一种特殊类型，在这种类型中，母亲和她自己父母的关系反映在她对自己孩子的态度上。我记得

此论文在美国行为精神病学协会 1933 年会议上提交。转载《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第 3 卷 第 4 期（1933 年 10 月）重版获美国行为精神病学协会版权许可。

一位三十五岁时来找我的女人病例。她是位教师，富于智慧和才能，个性鲜明，总体上显得非常平衡。但她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当她得知丈夫有外遇欺骗了她时所经受的有节制的沮丧。她本人是个道德水准很高的女人，受教育和职业的强化，养成了对他人宽容的态度。因而，自然存在的对丈夫的敌对反应对她来说却不是自觉能接受的。尽管如此，失去了对丈夫的信任不能不影响她对生活的态度，并把她笼罩在生活的罗网之中。她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到她十三岁的儿子。她儿子遭受着严重的神经症的苦恼及焦虑状态的折磨，他自己的分析表明，这与他非同寻常的母恋有关。一度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满意的解决。可是过了五年之后她又回来了，这次的问题是隐藏在第一阶段的。她说她的一些男学生流露出对她超出温和的感情——实际上，有证据表明某些男孩对她产生了爱情，她自问自己是否与这种激情和爱情的激励有关，她觉得自己在对待这些学生的态度上有错，指责自己对这种激情和爱情负有责任，并深深陷入了自我谴责之中。她坚信我肯定会谴责她的角色，可是，当我却没有这样做时，她显得难以置信。我设法安慰她说，在这个情境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如果一个人能够在某一领域里努力工作，以至于从事真正高尚的创造性工作的话，更深层的本能将起作用，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这一解释并没有使她减轻心理负担，所以我们不得不寻求这些关系

的更深层的感情根源。

最后出现的情况是这样的。首先，她自身感情的性本质变得显而易见。一个男孩跟随她进城接受分析，她实际上爱上了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一个稳健而严谨的女人与自己和我（心理医生）斗争，抵制与一个相对不成熟的男孩发生爱情关系的冲动，与她认为是唯一妨碍爱情关系的所有传统绊脚石作战。目睹这一切是相当惊人的。

后来发现，她的爱并不真正专注于这个男孩本人身上。对她来说，这个男孩和在他以前的其他男孩都以一种明显的方式代表了父亲的形象，所有这些男孩都有生理和心理倾向，使她想起自己的父亲，这些男孩和她父亲在梦中都常常以一个人、一个同样的人出现。

她开始有意识地明白，在她青春期极力反抗父亲的背后隐藏着对父亲的深刻而激烈的爱。在父亲固恋的病例中，主体通常表现出对年长男人的明显偏爱，因为他们似乎意味着父亲。在这个病例中，幼儿期的关系是反向的。她试图用幻想中的这种形式来解决问题：“我不是得不到父爱的小女孩，但如果我长大了，他就变小了，那么，我将是母亲，父亲则是我的儿子。”她记得父亲去世的时候，她的愿望就是躺在他身边，像母亲对孩子一样把他抱在怀里。

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些男孩代表的仅仅是她对父亲的移情的第二阶段，她的儿子是这种转移的爱情的第一个接

受者，然后才转向和她儿子同年的这些男孩身上，为的是把注意力从乱伦爱情的对象身上偏离。她对学生的爱是一种逃脱，是对亲生儿子爱情的第二个形式，儿子代表了她父亲的主要化身。她一旦意识到对其他一个男孩的激情时，就感到对儿子的巨大紧张减少了。因而，她坚持要每天收到这个男孩的一封来信，否则她就很担忧。当她对其他男孩的激情控制了她时，对儿子的过重情感就立刻减轻，这一点证明，这个男孩以及在他前面的其他男孩是如何实际上代替了她的儿子。她的丈夫也变得比她更年轻、个性更软弱，夫妻关系也是非常清楚地带有母子特性。她与丈夫的结合随着儿子的一出世便失去了感情意义。事实上，正是她对儿子的过重感情造成了儿子青春期开始时的严重神经质困扰。

我们的基本分析观念之一是：性欲起源于出生时，而非青春期，因此，早期爱情总带有性的特征。正如我们在整个动物王国中所看到的那样，性欲意味着不同性别之间的吸引。我们发现这在童年的表现是，女儿本能地感到对父亲的吸引力更大，而儿子对母亲的吸引力更大。由此产生的冲突归咎于与同性父亲或母亲的竞争和嫉妒的因素。在以上病例中我们看到这种冲突以悲剧性的方法随着三代人的成长而起作用。

我在五个病例中看到这种从对父亲向对儿子的爱的移

情，对父亲感情的复活通常是无意识的，对儿子感情的性本质只在两个病例中是有意识的。通常有意识的只是这种母子关系中的高层情感内涵。为了理解这种关系的特征，人们必须意识到，就其真正的本质而言，这将是一种被搅乱的关系，不仅乱伦的性成分从幼儿关系转移到父亲身上，而且曾经与他们有必然联系的敌意成分也转移了。敌意感的一定残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于嫉妒、失败和罪恶感而引起的同样不可避免的影响的结果。如果对父亲的感情从其本质上转向了儿子，那么儿子接受的将不仅是爱，而且是旧日的敌意。一般地说，两者都将被抑制。爱与恨之间的冲突有意识流露出来的形式之一是过度关心的态度。这些母亲看到她们的孩子不时地被危险包围，产生一种夸大的恐惧，惟恐小孩会感染疾病或传染病或遭遇事故，对孩子的关心到了狂热入迷的地步。我们说到的那位母亲以完全沉湎于对儿子的照顾来保护自己，因为她看到儿子面临着无数的危险。在他小时候，靠近他的所有一切东西都得消毒杀菌，甚至后来，只要他有丝毫不幸，她就不去学校而呆在家里，全心地照顾他。

在其他病例中，这样的妈妈不敢去碰自己的儿子，害怕自己会伤害他们。我记得有两位妇女雇佣保姆照顾儿子，尽管这笔费用不符合她们的预算，保姆的存在在情感方面也对家庭极大不方便，但是母亲宁愿承受保姆的存在，因为

保护儿子不受所谓的危害是太重要了。

这样的母亲对儿子过分关心的态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她们的爱具有禁止乱伦爱情的特征，她们不时地感到儿子被带走的威胁。例如，一位妇女梦见她抱着儿子站在教堂里，不得不把他奉献给某个可怕的女神。

父亲固恋病例中的另一种复杂情况是由于母女之间存在的妒忌而引起的。母亲和正处于成熟期中的女儿之间有一定数量的竞争是很自然的事，但当母亲自己的俄狄浦斯情境造成过度强烈的敌对感时，它就会以奇怪的形式开始于女儿婴幼早期。这样的对抗也许表现在对孩子的一般恐吓、极力讥笑和轻视、阻碍她具有吸引力或和男孩见面等方面，总是带着妨碍女儿女性发展的秘密目的。虽然我们很难察觉到隐藏在表面的种种形式背后的妒忌，但整个精神分析机制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结构，所以不需要详细的描述。

让我们来想一想，当一个妇女感到不是和父亲而是和母亲有特别强烈的牵连时，会产生怎样的更为复杂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我分析的这类病例中，某些特征一直很明显。下面的情况是很典型的：一个女孩可能有原因很早就产生了对女性世界的厌恶，也许是因为她母亲恐吓过她，或经历过来自父亲或兄弟方面的彻底理想破灭的失望；她也许有过可怕的性经历；或发现她的兄弟比她受宠得多。

作为这一切的结果，她在情感上转离天生的性别角色，而发展男性倾向和幻想。如果这种男性幻想一旦建立，它就导致加在原来对男人憎恨之上的竞争态度。抱有这种态度的女人很显然是不适合结婚的。她们性冷淡、不满，表现出男性倾向，例如希望凌驾于别人之上。这种女人结婚、有孩子以后，容易显示出对孩子的夸大依恋，这被描述为固定在孩子身上的被封闭的力比多。这一描述尽管是正确的，但没有洞察这一进展的特别过程。如果认识到这种发展的起源，我们就能理解作为企图解决某些早期冲突的结果的个别特征。

妇女的凌驾态度和绝对控制孩子的愿望表现出这种男性倾向，她或许害怕这一点，所以太忽视孩子。两个极端的一端会表现出来。她可能不屈不挠地探问孩子的事，或害怕牵涉到性虐待狂倾向，从而保持被动，不敢干预。对女性角色的愤恨则表现在，教育孩子男人是淫荡者，女人是受难者（女性角色既可怜又令人厌恶，月经是疾病“灾害”），性交是丈夫色欲的牺牲品。这些母亲不能忍受任何性的表示，尤其在女儿一边，但经常在儿子方面也是如此。

这些男性化的母亲常常发展对女儿的过分依恋，类似于其他母亲对儿子的依恋。女儿常以对母亲的强烈依恋予以回报，变得和自己的女性角色不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果是她发现在后来的生活中很难赢得与男人的正常关系。

还有另一种重要的方式，孩子在这种方式中实际上直接地重新唤起了父母的形象和作用。父母不仅是婴幼儿期和青春期爱与恨的对象，而且是婴幼儿恐惧的对象。许多意识构成——特别是我们称作‘超我’的无意识部分——是父母的恐惧形象在我们人格中的混合的结果。

这种曾依恋于父亲或母亲的旧日的幼儿恐惧可能还会转移到孩子身上，导致对他们的巨大而模糊的不安全感。由于复杂的原因，这一情况在这个国家似乎特别真实。父母以两种主要形式表示这种恐惧。他们惧怕被孩子反对，害怕自己的行为、喝酒、抽烟及性关系受到孩子的批评。或者无休止地担心是否给予孩子合适的教育和训练。其原因是对孩子的秘密负罪感，造成要么为了避免不和而过分纵容，要么公开敌对——即作为保护手段而本能地运用攻击。

这个主题还未阐述详尽，还有许多与母亲的父母之间冲突的间接结果。我的目的是想表明这一方式，孩子在这种方式中可非常直接地代表旧日的形象，从而强迫刺激曾出现的同样的情感反应。

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种观察在孩子的指导和抚育孩子的条件改善的努力中有什么实际用途？”在单个个案中，对母亲冲突的分析将是帮助任何孩子的最好方法，但是这在广泛的范围内是行不通的。然而我认为，从这

些相对少数病例的分析中获得的详细知识本身能为指导将来的工作提出遗传因素真谛所在的方向，而且，了解病原因素表现出的伪装形式的知识，也许有助于在目前的实际工作中更容易地去发现他们。

过高重视爱情

——对当今一种普通的女性类型的研究

女性不断在为争取独立、争取扩展自己的兴趣范围与活动领域而努力。对于女性的这种努力，怀疑论者经常坚持认为：只有在经济困难时才需要女性作出这些努力，而且这些是与她们的遗传品质和自然倾向背道而驰的。相应的，所有这种类型的努力都被认为对于女性毫无意义。在他们看来，女性的每一个念头，都应该全部集中在男人身上或母性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恰如马雷尼·狄特利齐的著名歌曲中所唱的“我所知道的只有爱 没有其他”。

谈到这一点，不同的社会学思想立即在我脑中出现。然而，社会学的思考太过明显，且耳熟能详，因此不需要再进行了。对于女性的这种态度，无论它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也不管该如何评价它，都代表了家长制眼中的理

想女性——一位仅仅渴望去爱一个男人并被他所爱的女人，她敬慕他、服侍他，甚至按照他的意愿喜好去改变自己。持有这种观点的人，错误地从外部行为中推断说，存在一种天生的、本能的性情倾向。然而，现实之中，后者并非能够被如此确认，因为生理的因素不会以纯粹的、不加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总是随着传统与环境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正如布立佛尔特近期在《母亲们》一书中详细指出的那样“继承的传统”不仅对理想与信念而且对情绪态度及所谓的本能的修饰性影响，不应该被高估。^①然而，继承的传统对于女人们而言，意味着将她所参与的（起初可能相当广泛）一般活动任务压缩到更为狭窄的领域：性爱与母性。对于继承的传统的信奉，就社会与个人而言，均达到了某种暂时的目的：有关社会的方面，这里我们暂且不谈。从心理学对于个人的角度来考虑，只需要指出，这一心理结构对于男性而言，虽然有时造成极大的不便利，但是另一方面，对他构成了一个可以经常从中获取支持的自信之源。相反，对于女性，由于长达几个世纪以来，她们形成了较弱的自尊心，上述的心理结构就形成了一个和平的避风港，使女性在培养其他能力以及面对批评与竞争时坚持自己的主张方

^① R. 布立佛尔特《母亲们》（伦敦，1927）第2卷，第253页：“对劳动进行的性别分工是原始社会的社会发展的基础，而随着农业带来的巨大的经济革命，这样的性别分工废止了。女人原本是作为主要的生产者出现的，渐渐在经济上变得非生产性、贫困而依赖……只有一个经济价值保留下来，这就是女人的性。”

面，不必花费太多努力和过于焦虑。因此，可以理解的是——仅仅从社会学的立场来说——女人们今天是在按照她们希望独立发展自身能力的冲动行事，她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其代价只是与外界作反抗，与她们内在的抵抗情绪作斗争，而她们内在的抵抗情绪则是由女性只有性功能的传统理想的强化而造成的。

然而，并不能过早地断言说，每一位敢于从事她自己的事业同时又不愿为这样的勇敢而抛弃自身女性气质的女性都面临这样的矛盾。因此，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一矛盾受到女性地位变化的限制，并且限指那些开始或正在从事一项事业的女性，她们追求特殊的兴趣爱好，一般都渴望自身个性的独立发展。

社会学的洞察力使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类冲突的存在，认识到它们产生的必然性，而且大体上可以辨认出它们所表现的许多形式，认识到它们更为间接的影响。仅举一例来说，这样的洞察力使人理解为何会导致截然不同的态度：从完全否认女性气质的极端立场走到它的对立面，即完全拒绝承认女性的智力活动与职业活动。

如下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勾勒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范畴：为什么在某一个特定的案例中，冲突会以某一种特定的形式出现？或者说，为什么冲突会以这一特定的方式达到其结果？说到冲突的结果，为什么一些妇女会病倒？或者在她

们的自身潜力发展方面遭遇到严重的削弱？就个人方面而言，有哪些因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以及可能出现什么类型的结果？当与个人命运相关的这些问题出现时，你也就踏入了个人心理学的领域，事实上是精神分析学的领域。

这里将要描述的观察结果并非源自社会学的兴趣，而是由于在对众多妇女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遇到了某些明确的困难而随之产生的。这一现状迫使我们考虑解决这些困难的特定因素。目前的报告是基于我自己所作的七个案例分析，以及其他许多通过精神分析学会议为我所熟知的案例。基本上这些病人中的大多数没有明显的症状；两位病人有并非典型的抑郁倾向，并偶尔出现疑病焦虑；两位病人偶有疾病发作，曾被诊断为癫痫。但在每一个病例中，所有显现出来的症状都被某些特定困难变得模糊难辨，这些困难在所有案例中都涉及到病人与男人、男人与工作的关系。由于她们十分频繁地遭遇这样的困难，病人们或多或少已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她们自身的人格。

然而要想把握所包括的确切问题，绝非易事。第一印象只不过产生这样一个事实：对于这些妇女而言，她们与男人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在于她们从来不能成功地在一 段持续时间里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关系。要么是形成一种关系的努力彻底失败，要么就是曾经有过一系列仅仅是

短暂的关系，结果不是由于男人就是由于女病人的缘故而破裂了——而且这样的关系通常表现出缺乏一定的选择性。要不然，就是如果一旦建立起时间更为持久的、具有更深层含义的关系，却往往会由于女人一方面的某些态度或难以接受的行为，最终总是导致挫折、失败。

同时，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都有一种对工作、对成就的压抑，并且或多或少明显缺乏兴趣。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困难是能够被意识到的、可以立即显现出来的，但是就部分而言，病人们没能意识到这些困难，直到心理分析使之真相大白。

仅仅是在稍微长一点的心理分析工作之后，我才认识到在一些显著的例子中，核心问题不在于任何爱的抑制，而是在于一种全部的、唯一的对男人的过度关注。这些女人似乎只被一个想法牢牢控制住：“我必须有一个男人”——这一想法缠住了她，并被过高看重，发展到凡是与这一想法相似的思想都予以吸收。相比之下，生活的其他内容变得陈旧、无聊、毫无用处。她们中大多数人曾拥有的才华与兴趣要么对于她们而言已毫无意义，要么已经失去了曾有的意义。换句话说，目前存在的影响她们与男人关系的冲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可以减轻的，但是，这一实际问题在她们的爱情生活中不是强调得太少而是强调得太多了。

在一些事例中，对于工作的抑制首先在心理分析中表

现出来并逐步得到明确，与此同时，在对由性欲产生的焦虑进行心理分析的过程中，与男人的关系也得以改善。这样的变化在病人本人与她的亲朋好友们的眼中，估价是不同的。一方面，这个变化被认为是一种进步——像一位父亲所表现的，喜悦万分，因为他看到作为心理分析的结果，女儿变得更加富有女性气质，她现在想结婚了，对学业已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我反复遇到这样的抱怨——这位或那位病人在经过心理分析后，虽然获得了一种更佳的与男人的关系，然而她却失去了原先具有的工作中的效率、能力与乐趣，并且一心只注重与男人的关系。这的确很值得思考。显然，这样一幅图景也可能代表了一种人为的心理分析、对于治疗结果的错误判断。当然，这仅仅是在某些妇女的案例中出现的结果，而非针对其他妇女。那么，出现这种或那种结果、形成某一倾向性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在这些妇女的整个问题中，是否有曾被忽视的东西呢？

最后，所有这些病人或多或少都具有令人瞩目的一种特性：害怕“不正常”。这样的焦虑体现在性欲方面，体现在与工作的关系中，或者是以一种更为抽象且累赘的形式，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或低人一等的普遍感觉，她们将之归罪于一种遗传性的、难以改变的倾向。

有两个原因使这一问题逐步得以澄清。一方面，这一

图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们对真正具有女性气质的女人的传统概念——她在生活中没有其他目标，只会将自己的一切慷慨地奉献给男人。第二个困难在于心理治疗师自身，他确信爱情生活的重要性，并经常愿意将去除爱情生活中的烦恼作为自己首要的任务。当病人主动强调爱情生活的重要性时，他因此会很乐意地跟随进入病人所提出的问题。假如一位病人告诉心理治疗师，他生命中最大的野心是去南部海域群岛旅游，他同时期待心理分析可以为他解决完成这一心愿过程中所存在的内部矛盾冲突，那么心理治疗师会自然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请告诉我，为什么这一旅行对你会如此重要呢？”当然这样的比较是不全面的，因为性欲的确会比去一趟南部海域的旅行要重要得多；然而通过这一比较可以显示出，虽然我们的洞察力本身是正确的、确切的，但是对于异性经验的重要性的认识会不时地使我们变得盲目，致使我们对于这一领域神经过敏似地给予了过高估价与过分强调。

从这一观点来看，这些病人表现出有差异的两重性。她们对于男人的感觉实际上很复杂——我愿意说得更形象些，很轻率——她们把异性关系当成生活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这无疑是一种被迫的过高估价。另一方面来看，她们的天赋、能力、兴趣、野心、相应的可能获得的成就与满足感，远远超过了她们所估计的程度。我们因此错将重点从

努力争取成就转移到性的方面；实际上，就人们在价值领域中可以谈到的客观事实而言，这里我们所具有的是一种客观的价值虚构，因为尽管在最终的心理分析中，性的确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是满意之源，然而它又确实不是唯一重要的，也并非最值得信赖的。

与女性心理治疗师相联系的移情状态始终由两种态度所支配：竞争和求助于与男人有暧昧关系的活动。^① 每一次提高，每一点进展，对于她们而言似乎不是她们自身的进步，而仅仅是治疗师的成功。一次心理分析中进行说教的主题给我这样一个印象：我并非真的希望治愈她，或者说我之所以建议她去另一座城市定居是因为我害怕她的竞争。另一位病人对每一次（正确的）解释均作出反应，指出她的工作能力没有获得提高。再有一位病人，每当我感觉治疗已有一定进展的时候，她会习惯性地，她因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而感到抱歉。这些病人的泄气、失望的抱怨仅仅是为了掩饰她们顽固地希望挫败治疗师的初衷。她们强调，治疗中所取得的明确进展，事实上应该归功于治疗之外的某些因素，而任何在更糟糕的方向上产生的改变则是治疗

对于一位男性治疗师而言，态度可能是同样的。或者移情可能表现得比较短暂或者较为长久，正如弗洛伊德描绘为“汤与面条的逻辑”的景象。第一个案例中，治疗师主要象征着母亲和姐姐（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均如此，因此每种情况必须按照其自身的特点来决定）。第二个案例中，病人具有某一类病人的特征，即长期以来对赢得男人有持续的渴望，这使得病人与男治疗师自身之间产生了联系。

师的过错。她们经常会在自由联想中遇到困难，因为自由联想意味着她们一方的让步与治疗师的胜利，而且自由联想可以帮助治疗师走向成功。总而言之，她们希望证实治疗师并不能做任何事情。一位病人开玩笑地用以下这个幻想故事来表达她的想法：她希望在我的房子对面住下来，并在我的房子上贴上引人注目的海报，指向她的住所，海报上还有一行脚注，“那里住着唯一优秀的女治疗师”。

在治疗中，如同在生活中一样，包含着另一种移情态度，那就是与男人的关系被推至令人瞩目的地位，并非常频繁地扮演着其中角色。经常是一个男人接着一个男人扮演着角色，从仅仅是靠近到发生性关系；病人们在说明他做了什么或者未做什么，他爱她们还是令她们失望，以及她们如何对他反应时，会占用一个小时的绝大部分时间，甚至病人会毫不厌烦地在最小的细节上拉长时间。角色扮演的表现以及这一角色扮演促成心理阻抗的情况并不总是立刻显而易见。有时它会被掩饰起来，因为病人企图表明她与某位男人有着令人满意的关系，可能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一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还在进行。——这一努力与治疗师一方的具有指导性的期望相一致。然而通过反省，我可以这样说，对于这些病人的特定问题以及她们特定的移情反应，如果用更为准确的知识进行判断的话，通常可能透视这一游戏表象，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她们的角色扮演。

在这一活动中，有三种倾向变得突出。可以描述如下：

(1) “我害怕因为将你看作一个女人、一个母亲的形象而对你产生依赖感。因此我必须避免将自己用任何爱的感情纽带与你拴在一起。因为爱是有依赖性的。故而，要从中逃离，我则必须将我的感情寄托在其他地方，寄托在男人的身上。”由此，在对一位显然是这一问题类型的妇女进行心理分析时，引进了她做的一个梦，梦中表现出这个病人试图来接受治疗，结果却与她在等候室里见到的一个男人双双逃走了。这种对治疗师有保留的态度，病人常常用以下看法作貌似有理的自我辩解，即她认为治疗师不会回报她的爱，因此让自己陷入感情旋涡并无益处。

(2) “我更希望你来依赖我（爱我）。因此我向你示爱，还试图用对男人们的关注来激起你的妒忌。”这里表现出病人根深蒂固的、很大程度上是前意识的信念，即嫉妒是极好的、可以奏效地激起爱情的手段。

(3) “你妒恨我和男人的关系，事实上，你企图阻拦我通过任何可能的途径去得到他们，你甚至不希望我变得有魅力。但是出于恶意我会展示给你看，我还是能够做到。”治疗师只是出于理智愿意提供帮助，有时候甚至连这一点都不是。久而久之，冰层最终会破裂，坦诚相见的事实会让人震惊与震撼，因为的确有人希望帮助他人来获得这一领域的快乐。另一方面，即使存在一个自信的智慧的高级构

造，当病人一旦企图对治疗师的失败借题发挥时，她确实确实的不信任、真真切切的焦虑以及对治疗师的愤怒还是会暴露出来。这种愤怒有时几乎是妄想狂的性质，其内容包括指责治疗师应对这或者对那负责，斥责她主动介入其中，有意引起愤怒。

像这样的仔细研究引导我们去假设，与男人相关的行为的关键在于一种强烈的、同时也是可怕的同性恋倾向，而这导致了病理学上的逃向男人的现象——实际上，同性恋就“真正的男人气质的行为”的意义而言，它促使男人们与女人们有所依靠的努力仅仅是一种有意识的表现。这也导致这些当事人在处理与男人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轻率、无选择性的明显特征。这种对女人的矛盾情绪必然成为同性恋的特征，而这样的情绪矛盾可以解释病人为什么必然逃离同性恋，特别投向男人的怀抱，而且只要治疗师扮演的是一个母亲的角色，她们就表现出对其不信任、焦虑与狂怒的情绪来。

临床的发现起初无法反驳这样一个解释。在睡梦中，我们遇到明确的、想成为一个男人的表现，而在生活中，男性气质的行为方式却以不同的伪装出现。真正的特征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些表达明确的案例中，这些愿望被理直气壮地拒绝，因为这些女人认为成为一个男人与成为同性恋者是等同的。这种具有同性恋色彩的关系的基础几乎总

是在生命中的某些阶段出现。这样的关系并不会发展到超出初级的阶段，这一点与前文的解释相一致，正如以下事实所示：绝大部分案例中，女性间的友谊扮演的是极其微小的角色。所有这些现象也许都可以用掩盖明显的同性恋的防御手段来加以很好的解释。

人们非常吃惊地发现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建立在“无意识同性恋倾向及因此而逃离”基础上的解释在治疗中完全无效。因此必然有可能有其他的解释，也是更正确的解释。从移情状态中获得的一个例子给出了答案。^①

一位病人在她接受治疗的开始阶段就不断地给我送花，起初是匿名的，后来是公开的。我的第一个解释是，她表现得如同一个男人在追求一个女人一样。尽管她笑着承认了这一解释，却并未改变她的做法。我的第二个解释是，这些礼物是她打算作为自己充分暴露的侵略性的一种补偿，这一解释也未灵验。另一方面，当病人在联想中毫不含糊地陈言，通过送礼物的方式，可以让一个人依赖于另一个人时，这一图景魔术般地发生了变化。紧随其后的一个幻想故事展示出藏在这个愿望之后的、深层的、破坏性的内容。她说，她希望成为我的情妇，为我做任何事情，样样都尽善尽美。由此，我会渐渐变得依赖她，完全相信她，直到

我不断地感到震惊，因为每当我向这些病人证明她们企图成为男人的愿望完全不存在与任何对象的联系时，她们无一例外地反应出敏捷与天真 就像我刚刚用同性恋来 谴责 她们似的。

有一天——她会在我的咖啡中下毒药。她用来概括她的幻想故事的一句话完全是典型的这一类人的想法：“爱情是一种谋杀。”这个例子尤为清晰地揭示出这一群人的态度特征。只要她们对女人的性冲动被清楚地觉察到，她们事实上就经常被体验到“第二性”的罪恶感。因此在移情中，只要治疗师以一位母亲或姐妹的形象出现，她们的本能态度同样是毫不含糊地具有破坏性的，因此其目标便是控制与摧毁；换句话说，后一种情况是破坏性的，而不是性欲的。因此“同性恋”这一术语是误导，因为同性恋通常意味着具有性目标的态度，即使与具有破坏性的因素混杂在一起，也都是指向同一性别的性伴侣的。然而在目前的案例中，破坏性的冲动仅仅是与力比多的冲动有着松散的联合。混杂于其中的性元素与青春期的性元素一样遇到同样的命运：就内部原因而言，不可能形成与男人的令人满意的关系，同时大量的自由运动的力比多存在着，因此，力比多会指向女人。还有一些原因，我以后会加以解释，为什么力比多的其他发泄途径，如工作或者自我性行为都不可行。此外，在对于其他女人的冲动中，还有一个积极的因素，即转向她们自己的男性气质，这在所有的案例中都不成功。同样不成功的是，企图通过力比多的关系来使得具有破坏性的冲动变得没有危害性。这些因素的组合可以部分地说明同性恋的焦虑——即为什么在这些案例中性欲、温柔的或者甚至是

友好的感情并不广泛地指向女人。

然而，对取得如此进展的女人只需看一眼，就能够立即发现这一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尽管指向女人的恶意倾向在这些群体中是清楚的，也是随处可见的（正如在移情中以及在她们的生活中可以见到的那样），同样的倾向也可以在无意识的同性恋女人（我刚刚给出的定义）身上以同样的程度找到。因此，对这些趋势的焦虑并不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对我而言倒不如说，这些在同性恋方向上已取得进展的女人，其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一种非常早期并且影响深远的对男人的逆来顺受——不论任何原因；因此在这些当事人身上，与其他女人的性的竞争已相对后退至幕后了。因此在她们身上，而且偶然也是在我们所说的群体中，结果不仅将性冲动与破坏性的冲动“联合”起来，而且用“爱情”来“过度补偿”这些破坏性的倾向。

就我们印象中的这些妇女而言，如此过度补偿要么不会发生，要么不太重要；同时我们发现病人与女人之间的竞争不仅仍然持续，而且这一竞争事实上已严重恶化了。因为这一斗争（后者染上了强烈的憎恨色彩）的目标——赢得一个男人，没有被放弃，于是就存在对这种憎恨的焦虑，对报复的恐惧，但却没有强迫其停止的动力；事实上，保持现状的确对其有利可图。对女人的强烈憎恨源自竞争，不仅在情欲领域，也在其他领域的移情状态中体现出来，然而却以

投射的形式在情欲的领域得以十分清楚的表达。因为如果基本的感觉是认为（女）治疗师挡在了病人与男人构建关系的路上，那么这里谈到的绝不仅仅是令人生畏的母亲，而应特别提及的是有妒忌心的母亲或者姐姐，她们不能忍受女性类型的发展或女性领域中的成功。

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完全认识到病人在阻抗过程中怂恿男人与女治疗师对阵的用意。这一企图是出于恶意地为了告诉有嫉妒心的母亲或姐姐，病人能够占有或者抢到一个男人。但是这一可能性的实现，是以坏良心或是焦虑为代价的。这一事实中也出现了公开的或隐蔽的对任何挫折的恼怒反应。一场斗争在其表层之下进行着，其中部分如下：当治疗师坚持进行分析而不是允许病人表演她与男人之间的关系时，这就被无意识地解释为在治疗师一方的一种禁令，一种反对。倘若心理治疗师偶尔指出，假如没有心理分析，那么病人所谓建立起与男人之间关系的企图是不可能有效果的，此举对病人来说就意味着治疗师在情感上重复母亲或姐姐压制病人作为女性的自尊心的企图——仿佛治疗师是说：你太渺小了，或太没有价值了，或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你不能吸引或是抓住一个男人。可以充分理解的是，她的反应是为了证实她能够做到。在年轻一点的病人身上，这一妒忌表现在她们直接强调自身的年轻，而治疗师的年龄要大得多。就此而言，治疗师太老了，

无法理解想争取一个男人对于女孩来说是一件多么自然、超乎任何东西的事情，必然会比治疗师看得更加重要。并非偶然的，家庭状况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意义上，以几乎一成不变的形式再次展现，例如，当病人感到与一个男人有关系是对治疗师的不忠诚时就是这样。

在移情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总是病人以后的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的特别清晰而未经删除的版本。病人几乎总是想方设法赢得一个其他女人所仰慕的，或者在某方面有牵连的男人——经常不考虑他的其他品质。或在一些有严重焦虑的病例中，病人对具有如上精确描述特征的男人，抱有绝对的禁忌态度。这正如有一个案例中的病人陷得太深，以致将所有的男人都当作禁忌——因为从最终的分析中可以知道，每一个男人都是从某个可能的女人手中被夺走的。在另一位病人那里，她的竞争起初是在与一个姐姐之间进行的。在她初次性交后，做了一个带有焦虑情绪的梦，梦中姐姐威胁性地围着房子追逐她。病理学中增长的竞争所采用的形式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我这里就不需要进一步详细描述细节了。情欲的压抑与受挫，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与破坏性竞争相联系的焦虑所引起的，这一点也是类似的事实。

但是最基本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如此迅猛地使竞争的态度得以增长，并且赋予这一态度以强烈的破坏性质？

在这些女人以往的历史中，有一个因素在事件发生的规律性及其影响中是非常突出的，并以此为特征：所有这些女人在童年时代，都曾经在为争夺一个男人（父亲或兄弟）的竞争过程中居于第二名。经常很明显——在十三个案例中有七个是如此——最重要的是一位“姐姐”通过种种不同的手段能够无忧无虑地控制一块地盘，也就是说，获得爸爸的宠爱，或者在一个案例中是取得哥哥的疼爱，在另一个案例中赢得弟弟的喜爱。除了在一个案例中，一个年长得多的姐姐很显然是父亲的宠爱，她明显不必用任何特别气力就可以阻挠妹妹获得父亲的关注。心理分析揭示出当事人对这些姐姐的强烈愤怒。如此这般的愤怒集中到两点上。其一可以指向女性的卖弄风情，因为当事人的姐妹曾经成功地借此赢得父亲、兄弟或以后的其他男人的欢心。在这些案例中，这种愤怒是如此强烈，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自我防卫的方式，在完全否认女性的花言巧语这一意义上，阻止病人在这一方向上的发展；因此她压抑自己，不穿吸引人的衣服，不跳舞，不参加任何与情欲领域有关的活动。第二种类型的愤怒是针对姐姐们对病人的敌意。其整个的范围只能逐步地预测。归结到一个普通的公式上，可以表述为：年长的姐姐会威胁恐吓年幼的妹妹，有些通过直接的威胁。因为她们有更强大的体力、更发达的智力水平，她们可以直接使之奏效；有些是对妹妹们希望变得更富有

性感的所有努力统统加以嘲笑；还有一些——有三个案例是肯定真实的，可能还是四个——通过性游戏的方法使妹妹依赖于她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最后的方法，会留下最深的愤怒的烙印，因为它使得年幼的孩子们失去了防御——一部分是因为卷入了性的依赖关系，一部分是因为罪恶感。也正是在这些案例中，可以找到公开表现的最为明显的同性恋倾向。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母亲是一位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女人，被一群男性熟人所包围，并让父亲处于一种完全依赖于她的境地。在另一个案例中，父亲不仅宠爱姐姐，而且与居住在这幢房子里的一位亲戚有着风流韵事，还尽一切可能与其他的女人欢娱。在另外一个案例中，一位依旧年轻，并且美丽非凡的母亲不仅对于父亲而言，而且对于儿子们，以及对于那些经常出入于这幢房子的不同男士而言，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注意的中心。在最后这一个例子中，还添加了一个复杂因素，这个小女孩从五岁起到九岁，都和一位年长她几岁的哥哥有性方面的亲密关系，尽管后者是母亲的专宠，并且对母亲一直保持着比对这个妹妹更为紧密的关系。而且因为他的母亲，他突然在青春期断绝了与妹妹的关系，至少中断了他俩的性关系。在另一个案例中，有位父亲在病人四岁时就开始在性方面接近她，而在她青春期到来时，父亲对他们之间的这一关系更为直露无隐。同时，他不仅继续极端地依赖母亲——母亲正接受从

方方面面献来的殷勤——而且对其他女人的诱惑力十分敏感，因此这个女孩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即她仅仅是父亲的一个玩偶，在他方便的时候或者当另有成人妇女出现时，她就会被扔到一边。

因此所有这些女孩在她们的童年时代都经历了为了争得男人注意的剧烈竞争，这种竞争或是从一开始就很令人失望，或者最终以失败为结局。这种与父亲有关联的失败当然是这个小女孩在家庭环境中的典型命运。但是这些案例之所以形成特殊、典型的结果，是由于在情欲上绝对控制了局势的母亲或姐姐的存在所带来的竞争加剧，或是因为唤醒了父亲或兄弟的独特的幻想。还存在另一个附加的、操作性的因素，在谈及另一种联系中我将回到这一因素的意义上来。这些案例的绝大多数病人，其性发展均比一般案例的病人受到更仓促、更强烈的性冲动，这是因为其他人或事所引起的性兴奋对病人的早期经验的放大作用。这种早熟的生殖器兴奋的经验比其他渠道（口部的、肛门的以及肌肉的性欲）所获得的肉体的快感更为巨大、强烈。而这种性经验不仅使生殖器领域显得更重要，而且为她们本能地更早、更为完整地领会为占有男人而斗争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这样的斗争会带来与其他女人竞争这一长久的、破坏性的态度，在每一种竞争状态中，都可以确信有

同样明显的心理存在——被征服者对胜利者怀有持久的仇恨之心，忍受着她自己的自尊心的伤害，因而必然会在随后进行的竞争形势中处于一个不太理想的心理位置上，而且最终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为，他自己取得胜利的唯一机会就是对手死去。确切地说，同样相同的结果可以在我们所讨论的案例中找到踪迹：对于女性自尊而言，一种受到蹂躏与压迫的感觉、一种与女性自尊有关的持久不安全感，还有对更为幸运的竞争对手的深层的愤怒。其结果是在所有案例中，发生部分或全部的避免或抑制与女人们进行的竞争，或者在另一方面，发生夸大了比例的被迫竞争——即被击败的感觉越强烈，受伤害者就越专注于竞争对手的死去，似乎在说：只有你死了，我才有自由。

这种对于取得胜利的竞争对手的仇恨，最终会有两条必居其一的道路。如果这种愤怒很大一部分仍处于前意识状态之中，那么对于情欲失败的责骂就会落到其他女人的头上。如果这种愤怒是更深地被压抑的，则可以在病人自身的人格中寻找难以成功的原因；所产生的自我折磨式的抱怨会与一种罪恶感相伴而生，这种罪恶感来自于被压抑的愤怒。在移情之中，人们经常可以清楚地发现，不仅一种态度是如何改变另一种态度的，而且一种态度的压抑是怎样自动加强了另一种态度。如果压抑了指向母亲或姐妹的愤怒，病人的罪恶感会增加；倘若病人的自责减少了，对其

他人的愤怒就会骤然上升。在她看来，必须有人对我的不幸负责 如果不是我 必然是其他人 如果不是其他人 那就是我自己。在这两种态度中，“是自己的罪过”的感觉 受到更强烈的压抑。

不能与男人们建立起令人满意的关系是否就该责备自己，这种折磨人的疑虑在心理分析中起初并非以这种形式出现，而是通常以一种普遍的信念表达出来，即事情并非它们原来应该成为的那样；病人们总是为她们是否“正常”而感到焦虑。有时候这种焦虑转化为一种恐惧，担心她们天生在器官上不太健全。偶尔，针对如此疑虑的防御机制显著的表现是，她们竭力强调自己是正常的。如果存在这种具有防御性特征的强调重点，那么往往她们会把心理分析当作是应该拿来羞辱的东西，因为这证明了，凡事并非原来应有的面貌；相应的，她们会试图将心理分析保守秘密。在同一个病人身上，心理态度可以从一个极端变到另一个极端，从感到连心理分析也不能改变如此基本的毛病的无望，到相对立的确信无疑，认为事事都很好，因此她们不再需要心理分析。

这些疑虑在意识层中采取的最频繁的形式，是一种病人因为丑陋而不可能对男人产生吸引力的信念。这种信念是独立存在的，从不管真正的事实究竟怎样。例如，这种信念可以在美丽绝伦的女孩身上找到。这种感觉是指一些真

实的或想像的缺点——直头发，大手或大脚，太肥胖的体型，太高大或太矮小的身材，她们的年龄，或者不好的肤色。这些自我批评总是与一种深深的羞愧感相联系。例如，有一位病人，有一段时间为她的脚而烦恼；她匆匆跑到博物馆，是为了用那些雕塑的脚来比较她的脚，她感到如果发现自己的脚难看的话，就得自杀。另一位病人出于她自己的感觉，不能理解丈夫为什么不为他那弯曲的脚趾而感到极度羞愧呢？另一位则因为她的兄弟曾经评论说她的胳膊太肥而绝食了好几个星期。在一些案例中，这种感觉是与服装相关的，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漂亮的衣服就不会有吸引力。

当试图战胜这些苦恼的想法时，服装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而却没有任何永久的成功，因为疑虑也会侵入这一领域，并使之成为无穷的痛苦折磨。如果没有衣服可以拿来搭配得完美绝伦的话，那么就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同样，如果一套服装让穿衣人变得太胖，或衣服看上去太长或太短 太平淡或是太优雅 太显眼 太年轻 或是不够时髦，也令人难以忍受。姑且承认服装对于女性的确是很重要，毫无疑问会出现不适宜的影响——羞愧、不安全，甚至愤怒。例如有一位病人，如果她认为衣服让她显得胖了，她就会习惯性地衣服撕裂；在其他案例中，怒火会发泄到裁缝身上。

另一个防御的企图是希望成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女人 我什么也不是，”这些病人中的一个这样说；“我若有可能成为一个男人，处境会好得多。”她作出这一评价的同时，还伴有一些显著具有男性特征的手势。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防御方式，病人试图证明自己能够吸引男人。这里我们再次遇到同样的全部感情。没有男人、从来未与男人有过瓜葛、保持处女之身、未婚——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不光彩的，让人们看不起的。而拥有男人——无论他是崇拜者、朋友、情人或是丈夫——都可以证明一个女人是“正常的”。因此才会发狂地去追求男人。而男人只需要达到一个要求，即是一个男人。如果他有其他增强女人的自恋满意感的品质，则当然更好。否则她的不加选择会达到惊人程度，这和她在其他方面的水平会有显著的差别。

但是这种企图也与对服装的态度一样，仍然不会成功，无论如何，对任何事的证实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即使这些女人成功地让一个又一个男人与她们谈恋爱，她们总能够想出理由来贬抑这种成功——诸如以下的原因：在这个男人身边没有其他可以谈恋爱的女人；或者，他算不上什么 或者“总之是我强迫他到这一境地的”或者“他爱我因为我聪明，或是因为我对他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有用”。

首先，心理分析会揭示出对性器官的一种焦虑，其内容在于，当事人担心手淫已经伤害了她自己，并以这一方式给

她造成了一些损伤。这些忧虑经常以特殊的观念表达出来，如处女膜已被损坏或作为手淫的后果，当事人无法怀孕生孩子。^① 在这种焦虑的压力之下，手淫通常完全被压制，而且与此有关的回忆也全部被抑制了；在任何情况下，从来没有手淫过的辩解都很典型。在相对不太频繁的案例中，手淫在生命的后一阶段被放纵了，紧随其后的是严重的罪恶感。

对手淫的极端防御的本质基础可以在相伴而生的明显虐待狂的幻想中找到，幻想对某一个女人以不同的方式施以伤害性的打击 这个女人受监禁、受羞辱、被迫堕落、受折磨，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个女人的生殖器被撕裂。最后提到的这个幻想是被压抑得最深的，但似乎是关键的、起着心理动力作用的因素。就我的经验而言，这种幻想从来不是直接表露出来的，甚至当手淫的幻想沉迷于其他残酷的方式时也是如此。但是这种幻想可以从诸如下述的数据中重新建构起来：在病人因为感到衣服使她显得肥胖而撕破衣服的案例中 显然 这一行为首先是与手淫相等价的 其次 她随后感到自己仿佛成了一个谋杀犯，她似乎急于要抹去谋杀的痕迹，更进一步说，肥胖对于她意味着怀孕，并且使她

人们不断得到这样的印象，即后一种焦虑是与手淫相联系的“最深”的焦虑，但没有确切的数字来支持对这种焦虑所作的数量上的判断时，却犹豫不决。在任何事件中，对孩子的渴望是所有这些女人身上突出强烈的渴望，也是在大多数案例中起初被强烈压抑住的渴望。

想起了其母亲的怀孕（当她五岁的时候），接着她想到治疗师的怀孕必然带来内部的撕裂，最后一种自然产生的感觉就是，当她在撕扯自己的衣服时，仿佛在撕扯她母亲的性器官。

另一位病人已经完全克服了手淫的习惯，当她出现痛经的时候，她会有一种与之相联系的感觉，似乎她的身体内部被撕碎了。当她听说堕胎时，她会感到性兴奋；她回想起童年时有这样的观念，即丈夫用一根编织针从其妻子身上取出了什么。有关强奸与谋杀的报告也会使她激动。不同的梦境里都包含一个主题，一个女孩的性器官被一个女人伤害了或施加了手术，因此而流血。有一次，一个女孩在感化院受到一位教师的折磨，这与病人本来希望对治疗师或极端憎恨的母亲所做的事情背道而驰。

在其他的病人那里，你也可以从一种相似的害怕报复的表现中，推测出这些破坏性的冲动的存在，也就是那种被夸大了的焦虑，一种唯恐每一种女性的性功能都会伴有痛苦与流血的焦虑，尤其是奸污处女与生孩子。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发现在童年期指向母亲或姐妹的破坏性的冲动在无意识中从以来未加改变的形式、未被削弱的力量仍然存在。梅拉尼·克莱因曾经对这些冲动的作用予以了不少强调。通过这一解释，可以很容易相信，这是争论的、受激怒的竞争，这样的竞争不允许她们

变得安静。起初针对母亲的冲动有这样的含义：你不应该与我的父亲性交；你不应该生下他的小孩；如果你这样做了，你所受到的伤害会使你不能再做这些事情，从而导致永远的无伤害；或者，正如进一步详细阐明的那样——你会变得非常丑陋，让所有的男人都讨厌。然而这样的想法，按照无意识中流行的无情的以牙还牙的治罪法，就会带来几乎同种类型的恐惧。因此，如果我在我的手淫幻想中希望这种伤害降临到你的头上，并使你受到惩罚，我不禁害怕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不仅如此，而且当我希望痛苦与伤害降临到我的母亲身上时，我会担心自己处于同样的境地之中。事实上，不少这样的案例中，痛经就发生在当她们开始随便想起性关系的时候。而且此时痛经的发生，是明显有意识地将之作为对于这种性渴望的一种惩罚。在其他的案例中，病人的恐惧具有不太特别的特征，在对个人的性交加以禁止的作用中表现出来。

这些报应的焦虑有部分是针对未来的，正如刚刚指出的那样；但是也有部分是指向过去的。如：因为我在手淫中实践了这些破坏性的冲动，同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和她以同样的方式受到摧残，或者是——正如进一步详细阐述的——我变得和她一样丑陋。在一位病人身上，这种联系完全是有意识的、直言不讳的，父亲确切的性接近引起了一场异常激烈的竞争：在心理分析之前，她几乎不敢看

镜子中的自己，因为她认为自己很丑陋，尽管事实上她显然是漂亮的。当对她与母亲的冲突进行心理分析并使之坦然面对时，在进行放松的一刻，她在镜子里看见自己有着母亲的容貌特征。

对男人的破坏性的冲动也在每一个案例中有所表现。在梦境里，这些被表达为阉割冲动，在生活中则表现为希望伤害他人的种种相似的形式，或是以防御的形式来对待这些冲动。这些冲动指向男人，但显然仅与不正常的观念有少许联系，她们在心理分析中的自我暴露通常进行得几乎没有阻抗，而且从不改变图景。另一方面，当进行自我暴露或对指向女人们（母亲、姐妹、治疗师）的破坏性驱动力进行分析时，焦虑会消失。相反，只要有过量的焦虑阻止、控制与这些驱动力相联系的强烈的罪恶感，焦虑就会保持不变。这里所设定的防御机制就是——我曾指出的貌似针对心理分析的一种阻抗——是一种对罪恶感的阻抗，其中有这样的含义：我没有以任何方式伤害我自己，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同时也是对命运的一种抱怨，即一个人被造成这样而非与此不同的那样；或者是对遗传倾向的抱怨，为什么一次定终生；或者在两个案例中，抱怨指向一个姐姐，她对病人的生殖器做过什么；或是指向童年时受到的压抑，并且此后从未进行过改善。这里显然可见，这些抱怨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保持下来的原因，便是对个人罪恶感的一种

防御机制。

起初，我设想病人对自己不正常的坚定信念是被男性气质的幻想所决定的，是由于有丧失阴茎或者通过手淫可能长出阴茎的想法而感到羞愧的感觉；我将这种对男人的追求看作部分是源于过分强调女性气质的次级地位，部分是由于她自己不能成为男人就希望由一个男人来做自己的补充。但是从事情过程的心理动力机制来看，正如我上文曾经描述的那样，我已经确信，男性气质的幻想并不代表心理动力上有效的方法，而仅是一种对次级倾向的表达，这种倾向根本原因在于她们与女人之间进行的上述竞争。男性气质的幻想同时也有对不公正命运以及对母亲的指责，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合理化了，因为不能生而为一个男人，或者这是在梦中及幻想中营造出来的从女性冲突折磨中逃脱的需要的一种表现。

当然，在有些案例中，执着地想当男人的幻想的确扮演了一个心理动力的角色，但是这些案例似乎有显然不同的结构，因为在其中有相当明显的与某一个特定的男人相一致的情况——一般是父亲或兄弟，在此基础上，会在同性恋的方向上发展或形成一种自恋的态度和倾向。

对于与男人的关系的过分重视有其根源，就我们目前所讨论的话题而言，并非根源于性冲动的不寻常的力量，而是在于男女关系之外的一些因素，即受伤害的自尊心的恢

复对胜利的、女性的、竞争对手的蔑视。必须问一下，是否在何种程度上，对性满足的渴望在对男性的追求方面处于关键的地位。在意识上肯定是为此而斗争，但是从本能的观点来看也是这样吗？

对这一联系，必须谨记于心的很关键的事实是，这种满足不是以平均的热忱去寻觅的，而是确实的、毫不含糊地被过分重视的。这种态度有时也在一个清醒的水平上显得很突出，但是开始我倾向于低估它，一方面，是由于性压抑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从其他渠道得到的对男性的渴求的力量；因此我曾将所谈论的态度当作是很大程度上的合理化，其作用是为了掩饰无意识的动机，把对男人的渴望描绘成“很正常、很自然”。事实上，现在这一重点无疑也会起到这些作用；我们在这儿发现亦为老式格言中所言的信念，病人总是——在一些方面——是正确的。尽管如此，在对性满足的自然渴求及对所有超乎性之上的元素适当关注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对性的渴望的过度要求，并且针对异性性交尤为如此。这一印象基于如下考虑：在这些女人当中，如果她们本质上仅仅是一方面以此作为对抗其他女人的手段，另一方面作为自我声明“自恋式的补偿”而言，那就不容易解释现实中的事实，即经常在不觉察的情况下，以及经常真正与她们的自觉态度相矛盾的时候，她们热切地寻找所谈及的性交伴侣。你经常可以发现她们持有这样的观点：缺少

了这种性要求她们就会变得身体不健康或是工作没有效率。其合理化来自于一个让人半懂不懂的心理分析的观点，或者一些激素的理论，或者简单地从男性对戒欲的危害性的思想方式出发。性交的重要性对于她们而言有多少，虽然在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决定因素，但就其表现而言，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不会突然从获得性交的可能地位中离开。这些寻求合理化的努力有三条途径，可能存在内在不同，然而它们有共同的潜在动机，故而是可以相互交换的：卖身的幻想、结婚的渴望、成为男人的愿望。卖身的幻想与婚姻的渴望在此基础上意味着总会有一个可得到的男人。成为男人的愿望，或对男性的怨恨，在这一关系中，来自于一种观念，即男人总是能够在他想要的时候进行性交。

我相信以下三个因素可以对这种过于重视性欲的现象作出解释：

(1)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在这些女人的典型心理的排列方式中，有许多东西迫使她们进入性的领域，因为通往其他满足的可能道路已变得极为艰难。同性恋的冲动遭到拒绝，因为与破坏性的冲动相伴而生，而且由于具有对其他女人的竞争态度。手淫并不令人满意，如果还没有完全被压抑的话，在绝大多数案例中已被完全压抑住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所有其他形式的自我性满足就更广的意义而言，包括以直接的和升华的方式出现的自我满足都受到了

抑制 例如 吃的享受、赚钱的享受、艺术或自然的享受。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女人与所有那些认为自己生来就有缺陷的人一样，心怀强大的、强烈的愿望，希望她们自己拥有所有的东西，不让其他任何人享有哪怕是最小的一点东西，从其他所有人身上拿走所有东西——一种被压抑的愿望，因为它带来的是反抗的焦虑，并且因为它与个人在其他方面的行为标准不相符合。除此之外，在所有的行为范围之内，都有抑制存在，一旦与野心相组合，就会导致巨大的对内的不满意。

(2) 第一个因素可以解释性需要强烈的确切原因；但是一个更进一步的因素可以成为这一增长的过高估价的根源——这个因素建立在个人起初在女性竞争中的失败的基础上，并导致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即唯恐其他女人会不断成为异性活动中的干扰因素。这一点事实上已经在移情状态中足够清楚地得到表明。这实际上仿佛欧内斯特·琼斯所描述的“失语症”一般，只不过这里它不是关于某人失去自身获取性经验的能力的焦虑问题，而是一直害怕由于外部的作用，性能力受到挫折的问题。这种焦虑通过上文提到的获得安全的尝试来躲避。就成为长期争论对象的所有目的都受到过分责备而言，这种焦虑对于过分重视性欲具有影响作用。

(3) 第三来源对我来说似乎是最未能得到良好确

的，因为我无法在所有案例中察觉到它的存在，因此我不能保证它在每一件事例中都有相关性。这些女人中的有些人，正如已经被提到过的，会回忆童年时代与性高潮相类似的童年早期性兴奋。在其他一些病人中，你可以用一些理由来推断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在紧随其后的现象的基础上进行的推断。这些现象诸如，与性高潮相联系的恐惧，虽然有这方面的知识，但在梦中却会有所违背。这种在早期生活中经历的性兴奋是令人恐惧的，不是因为它所经历的特别条件，就是仅仅因为其相对于当事人的不成熟而言的惊人力量，所以它被压抑了。这样的经验留下了一定的痕迹，但却是——一种远远超乎来自于任何其他渠道的快乐，并且是奇异的给整个有机体赋予生命力的东西。我倾向于认为这些痕迹使这些特定的女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平均的例子——将性满足看作是一种长生不老药，而且仅有男人才能够提供它，没有了它，女人就会干涸、衰弱下去，缺乏了它就使得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成功变得不可能。然而，这一点必须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不管对男人展开强烈追求的多种多样的决心有多大，也不管为达到这一目标所投入的努力有多么费劲，所有这些企图都注定会失败。这一失败部分在于曾经提到过的原因。这些原因和为男人而进行的竞争中引起失败的原因扎根于同一土壤，然而这一竞争同时也带来了为争夺男人所

做的非常特别的努力。

因与女人竞争而被激怒的态度当然迫使她们不断重新表明其性方面的优越性，但同时，她们对女人的破坏性的冲动，导致任何为了男人的竞争都无一例外地附加上了深层焦虑。与这一焦虑力量相对应，可能还与对失败的主观意识及随后降低的自尊心更加相对应的是，一种增强的与其他女人竞争的期望和由此增长的焦虑之间产生了矛盾，并导致表面上要么避免这样的竞争，要么在这一方面更加努力争夺。这一明白的画面因此可以展示女人的全部感情，即她们在为建立与男人之间的关系时，其所做的任何接近男人的举动都被极度抑制了。虽然她们全然不顾其他愿望地渴求男人，她们是唐璜的真正典型。可以用一种类别来概括所有这些女人，不考虑她们外部的不相似性，这是由于不仅她们的基本矛盾是相似的，而且她们的感情取向也有相似性，不管她们外部的经历有多么巨大的差别——更确切说，特别考虑到她们在性的领域中的态度。就已经提及的因素而言，在男人方面的“成功”并未得到感情上的如此珍惜，这在一个重要的程度上解释了这一相似性。进一步说，在任何案例中，没有哪一例取得了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令人满意的与男人的关系。

对她们的女性气质的羞辱，直接地并且通过担心不正常的恐惧驱使这些女人向自己证实她们的女性力量，但出

于女性不断产生的自我贬抑，这一目标从未达到过，如此的技巧必然使一种关系快速转移到另一种关系。她们对于一个男人的兴趣，甚至可能仅仅等同于在幻想中与他热恋，一旦他被“征服”——即一旦他变得在感情上依赖于她们的时候，兴趣通常就消失了。

通过爱情使一个人变得依赖的倾向，正如我曾经将之描述为移情特征的这一倾向，还有另一个决定因素。它是由认为依赖是危险的、必须以任何代价加以避免的焦虑来决定的，因此，由于爱情或任何感情的约束都会制造最大程度的依赖，后者构成了正该予以避免的灾祸。换句话说，对依赖的恐惧是一种对失望和羞辱的深层恐惧，她们认为这些是坠入爱河而引起的结果，是她们在童年亲身体验过的宁愿随后传到别人身上的羞辱。早期经验遗留下来的如此强烈的脆弱的情感可能是由一个男人引起的，从而产生的行为却同等地指向男人和女人。例如，这个病人企图通过表达她的后悔使我依赖于她，她说后悔没有去看一位男性治疗师，因为人们可以更容易地让一个男人爱上她从而赢得这场游戏。

保护自己免受情感依赖之苦，这与希望变得坚强的愿望是相呼应的。正如德国英雄故事中的西格弗雷德（Siegfried）为达到此目的而在龙血里洗澡一样。

在其他的例子中，防御机制所表现的是一种专制与警

戒的倾向，确信其伴侣会比她依赖他而更加依赖于她，当然，只要伴侣表现出任何不依赖的迹象，这还伴有相应的公开或压抑的猛烈愤怒的反应。

这种双重决定的对男人的喜新厌旧，更进一步的作用是使深埋于心的报复的渴望得到满足，这种满足同样在她早期的失败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这种渴望是占男人上风，将他抛开，拒绝他，正如她自己曾经感受到的被抛在一边并被拒绝一样。上文曾经提到，显然，选择合适对象的可能性非常渺小，事实上并不存在；部分因为她们与其他女人的联系，部分因为她们自身的自尊心，这些女人盲目地试图夺取一个男人。而且，这儿谈论的三分之二的案例中这些机会仍进一步减少，因为她们仍固恋父亲，而父亲是当初在童年时代斗争的中心人物。这些案例起初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即事实上，她们在寻找自己的父亲或者一个父亲的形象。以后，她们非常快速地抛弃一个个男人，因为后者与这一理想不相符合，或者也因为他们成为她们的重复报复的接受者，而这些报复当初是打算针对父亲的；或者换句话说，对父亲的固恋构成了这些女人的神经症的困难核心。尽管事实上，这一固恋增加了这些女人的许多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这个类型起源的特别因素。无论如何，它不是构成我们所谈的特定问题的动力要点，因为这些案例中的三分之一，在这方面没有找到任何在强度上或任何特征方面

超出一般水平的东西。我这里提及此事仅仅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因为从经验中可知，当你跟从这些早期的固恋而不首先对整个包含的问题加以分析的话，就可能会走入死胡同。

对于这个病人来说，走出如此完全不叫人满意的状态只有一条路，即通过成就、自尊与建立志向的途径。这些女人无一例外寻求这一出路，借此她们都发展了巨大的雄心。她们被强大的冲动激励，这一冲动发源于受伤的女性自尊，发源于夸大的竞争观念。一个人可以通过成就与成功来树立自信心，如果不是在性的领域，那么就是在其他任何努力的领域中，其选择是由个人特定的能力所决定的，并且胜过了所有的竞争。

然而，她们在这条道路上与在性的领域中一样，也早已注定会失败。我们现在必须考虑这种失败之所以不可避免的原因。简单地说，因为成就领域的困难与我们在性的领域所见到的困难同样重要，这里所有应该需要考虑到的是它们表现出来的形式。当然，只有在竞争中，对个人在性的领域的行为与成就领域的行为的平行性才能看得最为清楚。有些病人具有几乎呈病理增长的需要，正在从这一领域驱逐其他任何女人，在这些病人身上有着清醒的野心和在每一种竞争活动中获得认可的渴望，但是其深层的不安全感当然是明显的。在三个案例中都反映了这种不安全

感，表现了她们绝对的失败中特定的模式，她们不顾巨大的野心，不屈不挠地追逐既定的目标，但失败了。即使是善意的批评也会使她们沮丧，赞扬也同样如此。批评引发了她们对不能竞争成功的暗藏的恐惧，赞扬则形成对无论是什么样的竞争的恐惧，当然尤其是对胜利的竞争的恐惧。在这些案例中再次出现的第二个因素有其单调的规律性，这便是她们的唐璜主义。正如她们不断需要新的男人一样，她们也无法使自己稳定下来做任何固定的工作。她们热衷于指出，让自己安下心来做某一固定类型的工作会剥夺她们追求其他兴趣的可能性。这种担忧是一种托词，因为与此背道而驰的事实是，她们从来不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精力真正去追寻任何兴趣。

在那些避免参与性领域的竞争的病人们身上，她们始终摆脱不了自以为难以取悦别人的感觉，这样的竞争野心也几乎总是受到压抑。当那些仅仅表现出做事情比她们强的女人在场的时候，她们就会完全感到被降级到了底层，感到不被人需要，并以强烈爆发的愤怒对此情此景进行反应——正如在移情状态中所实现的那样——乐意以压抑作为反应。

当缔结婚姻时，她们常常会将自己压抑的雄心转移到丈夫身上，因此，她们用所有的自身野心的动量来要求丈夫必须成功。但这种野心的转移仅会有局部的成功，由于她

们自身对待竞争的不间断的态度，她们同时会无意识地等待他的失败。她们对丈夫采取何种控制的态度方式，取决于她们自身对性的最大化的需要。由此从婚姻的开端，他就可能被认为是一个竞争对手，她们对丈夫的这一关系会使她们跌入无能感的深渊，伴随对他的最深的怨恨情绪——正如她们避免进行性的竞争一样。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出现的进一步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困难，来自于她们增长的野心与她们脆弱的自信心之间的惊人差异。所有这些女人都能够从事生产性的工作，与她们的个人才华相一致 如当作家、当科学家、当画家、当内科医生、成为管理者。完全不证自明的是，每一项生产性的活动都需要一定量的自信作为先决条件，显然缺乏自信力则会产生瘫痪无能的效果。当然在这里也是一样。与她们过度的野心并驾齐驱的，是由她们破碎的自信心中产生的从一开始就缺乏勇气的现象。同时，这些病人中大多数没有意识到由于她们的野心而带来的受困其中的高度的紧张。

这种差异有着进一步的实际结果。因为她们毫不意识到这一差异，而期望从一开始就获得荣誉——例如 不用练习就会弹钢琴，或是没有技巧就能绘出杰出的画作，不费艰辛劳动就可以取得科学的成功，或是不必经过训练就能准确地地区分诊断心杂音与肺音。产生不可避免的失败后，她

们不会将之归因于自己的不现实、过头的期望，而是认为自己整体上缺乏能力。她们于是倾向于丢下自己此时所做的任何工作；她们于是放弃通过耐心的劳动去取得知识与技能，而这是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她们致使增长的野心与减弱的自信心之间的差异又进一步、持久地增大了。

这种没有能力去赢得任何东西的感觉，正如从性的领域发出的力量一样，在折磨着她们，照例维持着同样的固执。病人决心向她自己以及其他的人，而且首先是向治疗师证明，她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她是笨拙的、愚蠢的。她放弃了本来相对立的任何证据，并把每一回赞扬都当作骗人的奉承话。

是什么维系着这些倾向？一方面，一个人确信自己无能，需要一种出色的对成功取得任何有价值东西的抵抗手段，从而担保此人能够对付成功的竞争的危险。确信对做任何事情都无能，对上述的抵抗所起的作用，远远不及它对控制整个图景的积极努力所起的特殊作用。也就是说，获取一个男人或者是不顾其他所有力量去从命运中强行夺走男人——而且通过用证据证明自己的弱点、依赖性与无助，从而达到目的。这种“方案”总是完全无意识的，但出于那种原因对此“方案”的追寻却是更加固执的，看似无意义的“方案”会背道而驰——当从这种无意识的期望的观点来看时，成为有计划的、有目的的、向一个确定方向的努力。

表面上，这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比如某种模糊然而固执的概念表明，在男人与工作之间存在选择，通往工作与独立的道路会妨碍或者切断通向男人的道路。想要这些病人了解这一概念没有任何现实基础，是毫无效果的。对于设想中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对阴茎与孩子之间的变通的解释，都同样不起作用。如果将她们的固执看作是对上述的方案的一种表达的话，即使不被理解，她们的固执也变得很清楚了。有一位病人，上述的变通的观点在其对工作极度抵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移情过程中以如下的幻想展示了其潜在的希望：通过支付治疗费用，她会渐渐失去她所有的钱，变得贫困。但是，这个分析不能够帮助她解决关于工作的抑制。结果她会被剥夺所有支持的手段，并且不能设法维持生计。在那种情况下，她的治疗师将不得不去照顾她——尤其是她的第一位男性治疗师。同样是这位病人，她迫切地显出不仅没有能力去做与工作有关的事情，而且加入工作同样会产生有害的结果，借此试图让治疗师禁止其工作。如果治疗师以她对于工作的适宜性以及她的能力作为理由来鼓动她去工作的话，她的反应——真正合乎逻辑的方式——是来自于其秘密方案受挫的愤怒，而这一反应的意识层的内容是，治疗师将她看作仅仅适合于工作，并且要阻挠她的女性气质的发展。

在其他的案例中，这种基本的期望表达为一种嫉妒，嫉

妒那些被男人支持或者在工作中获得男人促进的女人。常常出现具备相类似含义的大量幻想，幻想收受男人的支持或礼物、孩子或性的满足、精神的帮助与道德的支持。相对应的口欲虐待狂的幻想出现在梦境中。在两个案例中，病人强迫父亲本人来支持她们，因为她们宣称自身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

就其动力机制而言，她们整个的态度没有改变，直到某个病人将此态度放入到她们秘密的期望中时，会产生如下的效果：如果我不能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赢得父亲的爱——即，一个男人的爱，我会通过表现得无助这一机制来强取这种爱情。如以往一样，这是以她们的可怜来打动人的魔术。这种受虐狂的态度的作用是为了达到异性恋的目的而采用的一种神经症的扭曲了的方式，这些病人认为除此以外别无它法。

你可能会说，显而易见，这些病例中，她们无法以足够的兴趣投向所谈论的工作中去。实际上，“对于工作的抑制”这个术语并不足以涵盖这个问题，因为绝大多数案例中，最后带来的是心理上的完全贫瘠。她们的目标仍然固着在性的领域中，在那个领域中存在的冲突被转移到了工作领域中，最后所谓的对于工作的抑制其实是被争取爱情

这里有大体上相同的想法，正如瑞奇在《受虐狂的特征》（载《国际杂志》，1932）中所表述的那样，他还能够把受虐狂的行为证明为有助于最终获得快乐。

的渴望利用了，至少以间接的方式，以怜悯与温柔照料的方式利用了。

因为工作不仅必然是低效的、不令人满意的，而且变得确实痛苦，所以这些病人们以加倍的力量——以一个次级的方式——强行闯回到性的领域里来。这种次级的过程可以采取个人的性经验的方式，例如婚姻，以及以其他任何在环境中相似的事情作为方式开始进行。这也能够解释曾经提到的可能性，即当治疗师错误判断了事情的真实状态时，治疗也会成为一种令其激动的因素，继而将所有的重点从一开始就放在性的领域内。

随着年龄的增长，困难自然会变得更为明显。年轻人面对性方面的失败很容易得到安慰，并且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命运”。至少在中产阶层中，经济独立还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而且渐渐变得狭窄的兴趣也不至于被很清晰地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例如说三十多岁，爱情中连续的失败事件可以看作是过去的、死去的事件，同时逐渐地，建立起令人满意关系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加无望，主要是由于内部的原因：增加的不安全感、对总体发展的妨碍，以及因此在发展成熟年龄所应具有的魅力特征上的失败。进而，缺乏经济独立性更会逐渐成为一种负担。最后，病人感觉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主观或环境成就的不断强调，弥漫在工作领域、成就领域的空虚感逐步以不断增加的程度被感受

到。生活似乎更加缺乏意义，痛苦渐渐发展，因为这些人必然在两面性的自我欺骗中越来越多地失去自我。她们认为只能通过爱情才能取得快乐，然而，就她们的构建来看，她们从来不能做到这一点，而另一方面，她们对于自身能力价值的信念却不断减少。

每一位读者都可能会注意到这里所描写的这种类型的女人，如今经常以较小夸张的形式随时随地在我们中产阶层的知识分子圈里出现。在文章的开头，我就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即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的原因决定的，在于社会缩小了女人工作的范围。然而，在这里所描述的案例，其特定的神经质困境，显然是由于不幸运的个人发展所引起的。

这一描述可能带来这样的印象，即两股力量，社会的与个人的，是彼此分离、孤立的。这是不对的。我认为我能够在每一个例子中表明，这里所描述的这种类型的女人，仅仅在个人因素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这样的结果，并且我设想，此种类型发生的频率是由事实解释的，即在有社会因素的情况下，在个人发展中即使细小的困难也足以驱使女人走向这一类型女人的发展方向。

女性受虐狂问题^①

对女性受虐狂问题的兴趣远远超出了仅是医学和心理学的范畴，因为至少对西方文化的学者来说，它涉及到在妇女文化定义中评价女人的根本问题。事实好像是，在我们文化区域中，受虐狂现象在女人身上比男人多。对这一观察已经出现了两种解释方法，一种方法试图发现受虐狂倾向是女性天性的最本质的遗传或血统，另一种方法则尝试评价社会条件反射作用在受虐狂倾向的传播中，对这种独特性起源的重要性。

在精神分析文献中——以拉多和多伊奇的观点为这一观点的代表——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是把女性受虐狂看作是解剖性别差异的一个心理结果。这样，精神分析借用它的科学工具，来支持受虐狂与女性生物学之间特定亲密关系

根据 1933 年 12 月 6 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年中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扩写。载《精神分析评论》第 22 卷，第 3 期（1935），第 241—257 页。经《精神分析评论》的许可再版。

的理论。社会条件反射作用的可能性还没有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考虑。

这篇论文的任务就是扩大探索决定生理和文化因素在这一问题中重要性的成果；仔细回顾这个方面提供的心理分析数据的有效性；提出心理分析知识是否能够被用来观察与社会条件反射作用可能联系的问题。

人们可以把至今为止呈现出的心理分析观点归纳如下：

在女性性生活和母亲身份方面寻找和发现的特别的满足具有受虐狂特性，与父亲有关的早期性欲和幻想的内容是渴望被致残，即被男人阉割。月经具有受虐狂经历的隐藏含义，女人在性交中秘密渴望的是强奸和暴力或在精神领域的羞辱，分娩过程给她一种无意识的受虐狂满足，母亲对孩子的关系也是如此。而且，就男人纵欲于受虐狂幻想或行为而言，这些反映了他们想扮演女性角色的渴望。

多伊奇 假设了生物学性质的遗传因素，这不可避免地导向女性角色的受虐狂概念。拉多^②指出了迫使性发育进入受虐狂渠道的遗传因素。至于这些具体的女性受虐狂形式是否来源于女性发育的偏离，或是否代表“正常”女性的态度，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海 伦 娜 · 多伊奇《女性受虐狂及其性感缺失的关系》，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2期（1930）。

② 桑道儿·拉多《女人害怕阉割》载《心理分析季刊》第 3、4期（1933）。

各种受虐狂特征的倾向在女人身上也比男人更经常地发生，这一点至少被确信地假设。生活中的一般行为是模仿性行为模式，而性行为模式反映在女人身上注定是受虐狂。当人们抱住这一基本精神分析理论时，以上结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接下去，如果多数或全部妇女对性和生殖的态度也都是受虐狂的话，那么，她们无疑对生活的非性态度也比男人更经常地反映出受虐狂倾向。

由此可见，这些作者实际上在论述正常女性心理学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论述精神病理学中的一种。拉多确信他只关心病理学现象，但是，从他对女性受虐狂起源的推论中，人们只能得出这一结论，即大部分妇女的性生活是病态的。这样看来，他的观点和多伊奇提出的观点（即：成为女性就是成为受虐狂）之间是理论上的差别，而不是实际上的差别。

妇女在手淫、月经、性交和分娩中寻求和找到受虐狂满足，对这一事实不必质疑。它确实无疑地出现，但出现的起源和频率还是要讨论的问题。多伊奇和拉多在论述这一问题时都完全忽略对频率的讨论，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心理学遗传因素如此有力、如此无所不在，以致考虑频率就变得多余了。

在起源问题上，两位作者都假定，在女性发育中，决定性的转折点在于少女意识到自己没有阴茎，并假定这一意

识的震惊具有永久的影响。这一假设有两个数据来源：一是对神经质妇女的分析结果，她们幻想和希望拥有或希望已经拥有阴茎；二是对少女的观察，她们在发现别人有阴茎时表达了想有阴茎的愿望。

前述的观察足以建立一个实用的假说，其意思是说，想拥有某一来源的男性气质的愿望在女性性生活中起一定作用，这一假说可以用来寻求对妇女身上的某一神经质现象的解释。然而必须意识到这是假说，不是事实；作为假说，甚至也不是不容置疑地有用。除了个人或文化条件以外，对男性气质的渴求不仅是神经质女人，而且是每个人类女性身上的一种主要动力因素。当提出这一主张时，人们不得不承认，没有证实这一主张的数据。不幸的是，因为历史和人种学知识的限制，我们对心理健康或不同文化条件下的妇女了解甚少，或根本不了解。

由于没有数据证实频率、条件反射作用，没有观察到少女对发现阴茎的 reactions 的重要性，所以，这是女性发育中的转折点这一假说虽令人兴奋，但很少能用到连续证明中。确实，为什么当女孩意识到缺乏阴茎时会转向受虐狂呢？多伊奇和拉多用截然不同的方法试图进一步解释这一假设。多伊奇相信，至今依附于阴蒂的积极性性虐狂力比多，从她内在意识到缺乏阴茎的防御工事中弹回……最频繁的是在受虐狂回归的方向偏离。这种受虐狂方向的摆动是“妇女解

剖的部分命运”。

让我们再问一下：这些数据是什么？就我能看到的而言可能只是小孩身上存在的早期性虐狂幻想这一事实部分是从对神经质孩子的直接观察中引出的，部分是从对神经质大人分析的重建中引出的。没有证据说明这些性虐狂幻想到处存在 比如我想知道美洲印第安小女孩 或特罗布里恩德的小女孩是否有这种幻想。即使认为这一现象到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仍然还需要三个进一步的假设来完成描述：

(1) 这些性虐狂幻想产生于阴蒂的积极性性虐狂力比多的欲力投入。

(2) 由于没有阴茎的自恋伤害的缘故，女孩放弃阴蒂手淫。

(3) 至今积极性性虐狂力比多自动向内转化，变成受虐狂。

所有这三个假设似乎推测性都很强。众所周知，人们会变得害怕他们的敌对行为，结果宁愿充当受苦角色。但是，一个器官的力比多一欲力投入怎么能成为性虐狂，然后又向内转化呢，这似乎很令人怀疑。

多伊奇想“诊察女性气质的起源”，她是指“适于妇女的、妇女精神生活的被动受虐狂情绪”，她证实受虐狂是女性精神生活中最基本的权利。毫无疑问，许多神经质妇女

的情况确实如此。但是，所有妇女心理—生理上必然如此这一假设却不令人信服。

拉多以更仔细的方式继续研究。首先，他不是一开始就指出“女性气质的起源”，而只是想解释神经质妇女身上某些临床值得注意的情况图画，给出有关妇女身上种种抵制受虐狂驱动力的数据。而且，他不把拥有阴茎的希望看作是特定事实，但认识到这儿可能有一个问题。你们将记得我前面提出过同样的问题，琼斯和德布罗特接着也提出过，但所建议的种种解决方法却截然不同。琼斯、拉多和我至今意见一致，因为我们在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中看到了一种抵制。琼斯认为这是对消失器官 的危险的抵制；拉多说是抵制男性气质的驱动力；我认为是抵制与父亲的乱伦愿望。^② 德布罗特建议男性气质的渴望是由于与母亲的早期性欲望的缘故。在这儿讨论这一分枝问题，超越了这篇文章的范围；依我看这个问题还未得到解决。

拉多为妇女在阴茎发现以后的受虐狂发展提供了以下公式：他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即这一发现对女孩来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恋冲击，但他认为，其效果因情感条件不同而异。按照拉多的说法，如果它发生在早期性发育全盛期

消失器官，指早期正常发育的由于退化而造成的痕迹器官。——译者注

我不再承诺这一观点，其理由将在以后的文章中阐明。实际上，我倾向于同意拉多的观点，尽管我用不同的理由达到我的结论。

的话，除了自恋打击以外，它代表了一种特别痛苦的经历，因为它使女孩相信，男性比女性能从手淫中得到更大的快乐。他认为这一经历如此痛苦，以致它永远摧毁了这个女孩至今为止在手淫中找到的快乐。在我们理解拉多是如何从这种未被证实的反映中推断出女性受虐狂的起源以前，有必要讨论一下这一潜在的前提，即主要快乐的可能性意识无疑地破坏了被视为较低的可达到的快乐。

这一假设怎么和日常生活中的数据相巧合呢？比如：这将意味着，一个以为葛莉泰·嘉宝比其他女人都更有吸引力。但没有机会与她见面的男人，作为“发现”她的高超魅力的结果，将失去与可接近的其他女人发生关系的快乐。意味着一个喜欢山的人将发现，他对山的快乐被海滨胜地会提供更大快乐的想像毁灭了。当然，这种反应偶尔能被观察到，但只在某一类人身上，也就是在过分贪婪或疾病性贪婪的人身上观察到。拉多应用的这一原则肯定不是快乐原则，也许最好叫作贪婪原则。这虽然对解释某些神经质反应可能有价值，但很少能被用于“正常”的孩子和成人。事实上它是与快乐原则背道而驰的。后者是指人们在每个特定情景中寻求满足，即使它不能供给最大快乐的可能性时，即使缺乏这种可能性时也寻求满足。有两个因素解释了这种反应的正常出现：一是快乐寻求驱动力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弗洛伊德把这些作为相对于神经质患者的健康人的特

征而提出来；二是自动的现实测试过程，这一过程致使对能得到的和不能得到的东西进行自动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登记。即使假设后一过程在孩子身上比大人作用慢，一个喜爱自己破布娃娃的小女孩，尽管可能一时热情渴望玩具店里穿得漂亮的娃娃，但意识到不可能得到更漂亮的娃娃以后，还将继续玩自己可爱的破布娃娃。

就让我们暂时接受拉多的假设，即至今对性欲发泄满意的女孩发现她的手淫快乐被阴茎的发现破坏了。那么，人们可以期待这对受虐狂驱动的发育有什么作用呢？拉多的论点如下：由阴茎发现造成的极端精神痛苦激发了女孩的性欲，这给她提供了替代性的满足。这样她就被剥夺了自然的满足手段，从那时起，只有通过受苦来渴望得到满足这一唯一的方法，她的性欲驱动力变成了并保持着受虐狂。她后来可能认为，这一奋斗的目标很危险，于是建立起种种防御，但是性欲驱动力本身肯定且永久转向了受虐狂的渠道。

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姑且承认女孩将因幻觉得不到主要源泉的快乐，而确实痛苦万分，那么，为什么这种痛苦会激励她的性欲呢？由于这种假设的反应是作者建立随后终身的受虐狂态度的基石，所以人们想知道它实际发生的事件。

由于证据还没有被呈现出来，人们在周围寻找可以合

理借鉴的类似反应。相应的事例必须满足与那个小女孩病例中给予的同样先决条件：一些痛苦事件的出现突然中断了习惯性的性欲发泄渠道。如想想这个男人的情况：他至今一直性生活很满足，后来被监禁，置于如此严格监督之下，以致所有的性欲发泄渠道都被阻塞。这样的男人会变成受虐狂吗？也就是目睹鞭打、想像鞭打，或实际被挨打及被虐待会激起他的性欲吗？他会沉溺于迫害和被加害的痛苦幻想中吗？这样的受虐狂反应肯定会出现。毫无疑问这只代表几种可能的反应之一。这样的受虐狂反应仅仅出现在以前有过受虐狂倾向的男人身上。其他的事例导致同样的结论。一个妇女被丈夫抛弃，没有任何紧接着的性欲发泄渠道或发泄的期望，她会作出受虐狂的反应；但她越是镇定，就越能暂时放弃性欲，在朋友、孩子、工作或娱乐中找到满足。还有，如此情景下的女人，只有已经建立了受虐狂倾向模式，才会作出受虐狂反应。

如果我冒险去猜一猜，是什么暗含的前提促使作者把这样的挑战性叙述看作是不证自明的话，我该说这是对性欲需求的紧迫性的过高评价——好像给性冲动强加了与一般快乐追求的努力同样迫不及待的贪婪；更加具体地说，就好像当性欲发泄受阻塞时，他必须立刻抓住另一个能得到的性刺激和满足的机会。

换句话说，像拉多假设的这些反应虽然不是不证自明

或不可避免，但确实肯定存在；它们在出现时，以受虐狂驱动已经存在为先决条件；它们是受虐狂倾向的表现；但不是其根源。

根据拉多的论证轨迹，小男孩不转向受虐狂确实是不奇怪的吗？几乎每个小男孩都获得一个观念，即大人的阴茎大得多。认为大人——父亲——能比他获得更大的快乐。能获得更大快乐的思想会破坏他自己手淫的欢乐，他会放弃手淫，承受严重的精神痛苦，这一痛苦激励他的性欲，以接受痛苦来代替满足，自那以后就成为受虐狂了。这种情况似乎不经常发生。

我进入最后一个关键点。假设女孩确实对阴茎的发现反映出严重的精神痛苦；假设可能更大快乐的思想破坏了她可得到的快乐；假设精神痛苦确实激发了她的性欲，并代替了性满足；假设所有这些争论中的考虑是为了辩论的目的，那么她为什么最后被迫在痛苦中寻求满足呢？这儿好像在因果之间有矛盾。掉到地上的石头除非被外在动力移动，否则将呆在那儿不动。一个活的生物体被外伤性事件袭击时会使自己适应新环境。拉多假设建立随后的防御性反应，以抵抗危险的受虐狂驱动时，他对驱动力本身的忍耐特性没有提出异议，相信这一特性一旦建立，将保持激发力而不改变。弗洛伊德极力强调，童年印象的固执是他的一个伟大科学成就；然而，精神分析的经验也显示出，童年曾经

发生的情感反应，如果继续有种种重要的动力驱使，才能保持终生。如果拉多不作这样的假设，即一个单一的外伤性冲击，没有个性内部需要的支持，就能够具有永久的影响，那么，他必须假设，虽然冲击在消逝，但据称缺乏阴茎的痛苦事实仍存在，其结果造成手淫的放弃，性欲力比多永久指向受虐狂的渠道。但是临床经验指出不手淫在受虐狂孩子身上决不是一成不变的。^① 所以据此提出的一连串原因也不能成立了。

虽然拉多不像多伊奇那样假设这种外伤性事件在女性发育中定期地不可避免地出现，但是，他正确地陈述道，它肯定以“惊人的频率”发生。实际上根据他的假设，一个女孩只有例外才能逃脱受虐狂偏向的命运，不言而喻的结论就是说，女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受虐狂。在谈到这点时，他犯了内科医生如果努力想在更广的基础上解释解剖现象的话容易犯的同样错误——即从有限的证据中无根据地概括。精神病学家和妇科医生在他之前大体上犯过同样的错误：克莱夫特·艾宾观察到受虐狂男人经常扮演受苦女性的角色，就把受虐狂现象说成是代表一种女性品质的品级过分发育；弗洛伊德从同样的观察中假设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有紧密联系；俄国妇科医生尼米罗感受于妇女在

和戴维·M·利维通信中，他引用事例，其中，有挨打幻想的女孩纵欲这些幻想的同时也手淫。他说他知道受虐狂现象和缺乏生殖器操作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失去贞操、月经和生产中的苦难经历，就谈起“妇女的流血悲剧”；德国妇科医生利普曼感受于妇女生活中频繁的疾病、事故和辛苦，就假设说，易受伤害、易怒和敏感是妇女特征的基本三组合。

只有一个可以被引证的合理化理由，即弗洛伊德假设的在病理学和“正常”现象之间没有根本区别；病理学现象仅仅像放大镜一样更清楚地反映在所有人类身上发生的过程。毫无疑问，这一原则打开了眼界，但应该意识到它的局限性。比如在对待俄狄浦斯情结时得考虑这些：首先，它的存在和暗示在神经症中看得很清楚，这一知识会使精神分析家观察敏锐，以致较微弱的迹象也常常被观察到，然而就此得出结论说，这是无所不在的现象，在神经质患者身上更为明显。这一结论易引起争论，因为人种学研究已显示，俄狄浦斯情结术语表示的特殊构造在广阔的文化差异条件下可能不存在。^① 所以，人们必须把原来的假设缩小成这样的陈述，即父母和孩子关系中的特殊情感模式只有在一定文化条件下才出现。

事实上，人们发现，同样的原则能应用到女性受虐狂问题上。多伊奇和拉多有感于他们在神经质女人身上频繁地发现女性角色的受虐狂概念。我估计每个精神分析家将会

贝欧姆《俄狄浦斯情结的历史》，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1期（1930）。

作出同样的观察，或在使他们更加确切的发现中得到支持。女人身上的受虐狂现象可被发现是直接敏锐观察的结果，否则就像在与妇女的社会论战中（完全在精神分析实践领域之外），在文学的女性性格描绘中，或对外国道德的妇女，如不被丈夫打就不觉得被丈夫爱的俄国农民妇女的检验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她们可能在观察中不被注意地过去了。在这些证据面前，精神分析家得出结论，他们这儿面临着一个无所不在的现象，这一现象在精神生物学基础上，带着自然法律的规律性起作用。

从部分考察中得到的结果，由于忽视文化或社会因素，造成片面或断然的错误——也就是说，不考虑妇女生活在有不同风俗习惯的文明之中。在以证实受虐狂是如何根深蒂固于女性特征为目的的讨论中，人们常常要引用沙皇和家長政权的俄国农民妇女。但是她现已成为自作主张的当今苏维埃妇女，如果以鞭打作为对她爱的象征的话，她无疑会很惊奇。这一变化发生在文化模式中，而不是发生在某些特殊的妇女身上。

更一般地说，不管何时出现频率问题，只要涉及到社会学的含义，即使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拒绝考虑它们，也不能禁止它们的存在，不考虑这些含义，则会导致把解剖差异和个人努力错误地评价为原因因素，来解释实际上部分或全部是社会条件作用的结果的现象。只有综合两方面的一系列

条件才能导向全面的理解。

涉及到下面问题的数据将与社会学和人种学的方法有关：

——在种种社会和文化条件下，对女性功能的受虐狂态度出现的频率是多少？

——在种种社会和文化条件下，与男人相比，妇女中一般受虐狂态度或显示的频率是多少？

如果这两个调查为这一观点，即所有社会条件下都有女性角色的受虐狂提供支持的话；如果与男人相比，在女性中一般受虐狂现象同样有决定性的多数的话，那时，也只有那时，人们才会合理地进一步寻求这一现象的心理原因。然而如果这种无处不有的女性受虐狂不出现的话，人们将希望用社会学—人种学来研究下面问题的答案：

(1) 在什么特殊社会条件下，受虐狂与女性功能经常相联系？

(2) 一般受虐狂态度在什么特殊社会条件下出现在女人身上的频率比男人高？

这样的调查中，精神分析的任务是给人类学家提供心理学数据。除变态和手淫幻想以外，受虐狂倾向和满足是无意识的。人类学家不能去探索这些问题，他所需要的是些标准，他能用这些标准去识别和观察受虐狂，这种受虐狂有很大可能表示受虐狂驱动力的存在。

给予这些数据，对于涉及女性功能中受虐狂满足的问题来说相对简单，在心理分析实验的基础上假设受虐狂倾向是理智而安全的：

(1) 当经常出现功能性月经紊乱时，如痛经和月经过多。

(2) 当怀孕和分娩中经常出现心理基因障碍时，如害怕生孩子、对此小题大做、痛苦、为逃脱痛苦而煞费苦心的手段。

(3) 当经常出现意味着贬低或歧视妇女这样的对性关系的态度时。

这些迹象不被看作是绝对的，相反人们考虑下列两个限制性：

(A) 疼痛、痛苦或害怕痛苦是由受虐狂驱动促使的，或由受虐狂满足造成的。这样的假设在精神分析思考中似乎已经成为习惯了。所以有必要指出，这样的假设需要证据。比如，亚历山大假设，背着重背包爬山的人是受虐狂，特别是如果有他们可乘的汽车或火车更容易到达山顶的话。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背重背包更经常是非常现实的原因。

(B) 痛苦，或甚至自己施加的疼痛，在更原始的部落中，也许是一种魔术般思考的表达，为的是回避危险，也许与个人受虐狂无关。所以人们只能用相关部落历史的整体结构的基本知识来解释这样的资料。

关于问题二的精神分析任务要困难得多，其数据要涉及一般受虐狂态度的表现。理解整个现象仍然很有限，事实上还没有怎么超越弗洛伊德的陈述，即它是与性欲和道德有关的。可是，有这些开放性的问题：这主要是延伸到道德领域的性欲现象，还是延伸到性欲领域的道德现象？道德和性感受虐狂是两个分开的过程，还是仅仅来源于共同潜在过程的两组满足？或者受虐狂可能是非常复杂现象的集体术语？

人们觉得理所当然该用同样的术语来表达悬殊的满足，因为它们都有一些共同趋势：倾向于在幻想、梦或现实世界中整理暗示着痛苦的情景；或在一般人没有痛苦的情景中却容易感觉痛苦。这种痛苦可能是肉体的，可能是精神领域的。与痛苦相关的紧张能得到解脱或一些满足，那就是为什么人们追求受苦的缘故。满足或紧张的解脱可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有性欲或无性欲的。无性欲的功能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对恐惧的宽慰、对犯罪的赎罪、对犯新罪行的允许、用其他方法得不到的目标策略、敌意的间接形式。

认识这种范围广阔的受虐狂现象并非令人鼓舞，反而更令人迷惑，更富有挑战性。这些一般的陈述肯定对人类学家没有很大帮助。但如果所有有关条件和功能的科学担忧都被搁置一边，如果人类学家调查的基础只是那些在精

神分析情景中有明显和广泛受虐狂倾向的病人身上可觉察得到的表面态度的话，那么，他就可支配处理更多的具体数据。所以，为了这一目的，列举这些态度而无需详细追溯到他们的个人条件也许足矣。不必说，并非属于这一范畴的每个病人身上都有这些态度；但整个综合症状非常典型（正如每个精神分析家将认识到的那样），以致如果在治疗开始时这些倾向很明显的话，人们就可以安全地预料整个情况，当然细节不同。细节涉及到出现的顺序、单个倾向之间的重要性分布、尤其是为抵制这些倾向而建立的防御形式和强度。

让我们来看看在受虐狂倾向分布甚广的病人身上有哪些觉察得到的数据？依我看，这样的个性表面结构的概要如下：

人们可以在多种方式中找到抵制强烈恐惧的宽慰。放弃是一种；压抑是另一种；拒绝恐惧、变得乐观则是第三种；等等。被爱是受虐狂者使用的特殊宽慰手段，因为他有着相当自由漂浮的焦虑，所以需要注意和柔情的不断表示。由于除片刻以外，他从不相信这些表示，所以他过分需要注意和柔情。一般说来，他在与别人的关系上非常情感化，容易依附他人，因为期望他们给予他所需的宽慰；容易失望，因为他从来得不到、从来不可能得到所期望的东西。“巨大爱情”的期望或幻想经常起着重要的作用。性欲是得到柔

情的最通常的方法之一，他也容易过高评价它，抱着性欲能解决人生全部问题的幻想不放。这个意识有多深，或他实际上多么容易发生性关系，取决于他在这一方面的压抑。在他曾有过性关系或企图有性关系的地方，他的个人经历都经常表现出“不幸福的爱情”他被抛弃、失望、羞辱、虐待。在非性关系中，同样的倾向出现在所有进展中，从无能或感到无能、自我奉献、顺从到扮演殉道者的角色、感到或确实被羞辱、虐待和剥削。否则，他就觉得自己无能，或者生活残酷是一个特定事实。而人们在精神分析情景中能看出，这不是事实，而是一个顽固的倾向，这一情景使他坚持用这一方法看待或安排它。还有，这一倾向作为无意识的安排，在心理分析情景中表示出来，激励他冲击挑衅，使他并无真正原因而感到被破坏、被损害、被虐待、被羞辱。

因为别人的柔情和怜悯对他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他很容易变得极端的依赖。这种过分依赖性在与分析医生的关系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

他从不相信实际可以得到的任何形式的柔情（而不是依附于它以代表垂涎的宽慰），其中另一个觉察得到的原因在于他极大地降低了自我尊重；他觉得很自卑、绝对不可爱，而且不值得爱。在另一方面，正是这种自信的缺乏，使他觉得，通过拥有和表现自卑感情、软弱和痛苦来求助同情，是能赢得所需柔情的唯一方法。人们看到，自我尊重的

退化根源于他那被称作“适当的进取心”的麻痹。我这儿是指工作的能力，包括下列属性：采取优先权，作出努力，把事情办到底；获得成功；坚持自己的权利；受打击时保护自己；形成和表达独立的观点；认识自己的目标，以及能够根据目标计划自己的生活。^① 在受虐狂者身上，人们常发现因这些原因而产生的广泛压抑，这在整体上解释了他为什么在生活斗争中有不安全感或甚至无助感的缘故，说明他为什么后来依赖别人、寻找他们的支持或帮助的诱因。

精神分析揭示，从任何竞争中退却的倾向，是他们没有能力去自作主张的另一个觉察得到的原因，为避免因竞争带来的危险而努力克制自己，从而造成了他们的压抑。

在这种自我挫败倾向的基础上不可避免产生的敌意感也不能自由表达，因为它们被视为危及由爱带来的宽慰，而这是保护自己避免焦虑的主要动力。所以，软弱和痛苦已经起了很多作用，现在又充当间接表达敌意的传达媒介。

对人类学调查采取什么样的觉察得到的态度，取决于可能是一个主要错误的来源；也就是说，受虐狂态度不总是这样的明显，因为它们经常被防御隐瞒，只有在防御除去以后才经常清楚地出现。由于这些防御的清晰分析显然超出了这一调查的范围，所以防御肯定采取了它的表面价值，结

在精神分析文献的领域中，舒茨 - 汉克的《命运与神经官能症》特别强调这些压抑的病原重要性。

果，这些受虐狂态度的事例肯定观察不到。

那么，回顾一下觉察得到的受虐狂态度，不管它们的深层动机是什么，我建议人类学家要寻找有关这些问题的数据：在什么社会或文化条件下，我们在女人身上比在男人身上更经常地发现：

- (1) 用损害和侵略的直接表达方式表现压抑；
- (2) 视自己软弱、无助或下等，并在此基础上含蓄地或直率地要求体贴和便利；
- (3) 情感上变得依赖异性；
- (4) 表现出自我牺牲、顺从、觉得被利用或被剥削、把责任推到异性身上的倾向；
- (5) 把软弱和无助用作求爱和征服异性的手段。^①

除了这些对受虐狂妇女的精神分析经验直接归纳的系统阐述以外，我也许还对女人身上出现偏爱受虐狂的原因因素进行某些概括。我期待这些现象将出现在任何文化结丛中，包括以下一个或更多的因素：

- (1) 扩张与性欲发泄途径的阻塞。

在列举的因素中，我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仅仅对童年有影响的因素上——这一点可能打动精神分析读者。然而人们得考虑：(1) 孩子肯定会感觉到间接通过家庭媒介的因素影响，特别是通过在她的环境中施加在女人身上的影响；(2) 虽然受虐狂态度（像其他神经质态度一样）主要产生于童年，但是后来的生活在一般的病例中起决定作用（即在这样的病例中，童年条件没有严峻到能单独形成一定性格的程度）

文化结丛，指多种文化特征互相关联的模式。——译者注

(2) 孩子数目的限制，因为有孩子和抚养孩子给女人提供了种种满足的发泄途径（心软、成就、自尊），当有孩子和抚养孩子是社会评价的标尺时，这一点就变得更加重要。

(3) 总体上把女人估价得低于男人（至今导致了对妇女自信的贬低）。

(4) 女人对男人或家庭的经济依赖，因为经济依赖以情感依靠的方式培养情感适应。

(5) 女人生活领域的限制，主要建立在情感束缚的领域，如家庭生活、宗教或慈善工作。

(6) 到达结婚年龄妇女的过剩，尤其当结婚成为提供性欲满足、孩子、安全和社会承认的主要机会时，尤其如此。^① 这一条件是相关的，因为它偏爱情感上依靠男人，一般说它不是自发的发展，而是被现存的男性意识形态形成和塑造的发展，至此它也是中肯切题的，因为它在女人中引起了特别强烈的竞争，从竞争中退却在促使受虐狂现象的加快上是一个重要因素。

以上列举的所有因素都有重叠的部分。比如：如果竞

然而必须记住，像家庭包办婚姻这样的社会规则会大大降低这一因素的有效性，这一考虑也启发了弗洛伊德的假设，即女人一般比男人更嫉妒。这一说法，仅就现在的德国和奥地利文化而言，可能是正确的。然而从更加纯粹的个别解剖生理学来源（阴茎嫉妒）中推断这是不令人信服的。虽然在个别病例中也许如此，但不考虑社会条件而进行的归纳容易受前面提到的同样根本的异议。

争性奋斗（如职业的显赫）的其他发泄途径都被阻塞的话，女人之间的强烈的性欲竞争就会更加强有力。似乎对越出正轨发展负责的不是一个单独的因素，而是一些连续相关的因素。

人们必须特别考虑这一事实：当一些或全部提到的要素在文化结丛中都存在时，也许会出现某些关于妇女“特征”的固定意识形态。比如妇女天生软弱、富有情感、依赖性强，没有独立工作和自发思维的能力。人们被诱导把女人本质上是受虐狂这一精神分析信念包括到这个范畴里。非常显然，这些意识形态不仅作用于使女人顺从她们的辅助角色（表现为不可改变的角色），而且作用于灌输这样的信念，即它代表了她们所渴望得到的成功或值得赞美和值得想望的奋斗理想。施加在妇女身上的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物质上被这一事实所强化，即表现出具体指定的特点的女人更经常被男人选中。这意味着女人的性爱可能性取决于与她们“真实特征”构成的形象一致。所以，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中，受虐狂态度（或更确切些，受虐狂的更温和的表达）在女人中受偏爱，而在男人中受劝阻。像情感上依赖于异性（紧贴的藤）热中于“爱情”、抑制扩张、自发的品质在女人中被视为非常值得想望的，但出现在男人身上时则被羞辱和嘲弄。

人们看到这些文化因素给女人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

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中，很难看到女人仅从文化影响中逃脱就能告别受虐狂的特点，而不受妇女解剖生理学特征及精神方面的影响。

然而，某些作家——如 H·多伊奇——从对神经质妇女的精神分析经验中进行了归纳，认为我所指的文化结丛本身就是这些解剖生理学特征的影响。在那种人类学研究完成以前，争论这一过分的概括是没有用的。让我们来看看妇女躯体组织中实际促使她们接受受虐狂角色的因素吧。可能为受虐狂现象准备好成长土壤的妇女解剖生理因素在我看来好像有以下几点：

(A) 男人的平均体力比女人大。根据人种学家的看法，这是固有的性别差异，无论如何当今确实存在。虽然软弱和受虐狂不完全相同，但是体力低下的认识可能助长受虐狂女性角色的情感概念。

(B) 强奸的可能性在女人身上同样会引起被袭击、被征服、被伤害的幻觉。

(C) 月经、夺去贞操和生产，由于是流血或痛苦的过程，也许容易作为受虐狂努力奋斗的发泄途径。

(D) 性交中的生物学差异也适合受虐狂确切陈述的因素。性虐待狂和受虐狂基本上与性交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性交中的女性角色（被进入）更容易适合受虐狂履行的个人误解（需要时）男性角色适合性虐待狂活动。

这些生物学功能本身对女人没有受虐狂涵义，不导致受虐狂反应；但如果存在其他来源的受虐狂需要^① 它们就会很容易地被涉及到受虐狂幻想中去。这一幻想又反过来使生物功能提供受虐狂满足。除了承认女人身上有某种为女性受虐狂概念而准备的可能性以外，至于她们的素质和受虐狂的关系，所有附加的断言都是假定；全部受虐狂倾向在成功的精神分析以后会消失的事实，以及对非受虐狂妇女（这毕竟存在）观察的事实，警告我们甚至对以上准备的要素也不要过高估计。

总结：女性受虐狂问题不可能单单与解剖—生理学—精神特性方面的遗传因素有关，而必须被视为文化结丛或社会组织的重要条件反射，特殊的受虐狂妇女在这其中发展起来。直到我们在显然不同于我们文化的一些区域里，运用有充分根据的精神分析标准，得出人类学调查的结果之后，这两组因素的分量才能被确定。可是现在，解剖—心理—精神因素的重要性被这一主题的一些作家大大高估了，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我所记得的受虐狂态度的来源将在以后的交流中陈述。

女性青春期的个性变化^①

在分析患有神经质麻烦和性格障碍的成人妇女时，人们时常发现这两种情况：（1）虽然在所有病例中决定性的冲突来自于早期童年，但是最初个性的变化却发生在青春期。这时她们对环境常常不惊慌，人们不觉得她们有危及未来的发展或需要治疗的病理需要，而认为是人生这一阶段自然的短暂问题，或甚至是值得向往和有前途的象征。（2）这些变化的开始大约与月经初次来潮同时发生。这一联系一直不明显，不是因为病人没有意识到这一巧合，就是因为即使她们观察到暂时的巧遇，也没有赋予它任何意义，因为她们没有注意到或“忘记”了月经对她们们的精神暗示。个性变化与神经质症状相反，是逐渐发生的，这也有助于伪装和遮蔽真正的联系。通常只有在病人洞察到月经在他们

提交于 1934 年美国行为精神病学协会的会议。转载于《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第 5 卷第 1 期（1935）第 19—26 页。再版获美国行为精神病学协会的版权许可。

身上的情感影响之后，才自发地看到这一联系。我暂时倾向于区分以下四类变化：

(1) 女孩专注于高尚的活动；对性爱区域形成反感；

(2) 女孩专注于性爱区域（对男孩着迷）；失去工作兴趣和能力；

(3) 女孩变得情感“超然”，抱着“不在乎”的态度，无法把精力投入任何事中；

(4) 女孩习得同性恋倾向。

这一划分是不完全的，肯定不包括现存可能性的整个范围（比如卖淫和犯罪的产生），只是指那些我有机会从偶然来治疗的病人中直接地或推断地观察到的变化。另外，这一划分也是专横的，尽管行为类型的划分是必须的，包括轮廓分明的类型总是虚构的，而现实中时常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转变和混合。

第一组类型的女孩，对两性在解剖和功能上的差异及繁殖之谜表现出自然的好奇，感到对男孩的吸引，喜欢和男孩一起玩儿。青春期前后，她们突然对宗教、伦理、艺术或科学追求方面的心理问题变得热衷起来，而同时对性爱区域失去了兴趣。经历这种变化的女孩，通常此时不来治疗，因为其家庭对她的严肃和缺乏专情倾向感到很高兴。困难并不明显，只是在后来的生活中，尤其是结婚以后才出现。容易忽视这一变化的病理性质有两个原因：第一，发展一些

心理活动的兴趣是这些年中所期望的。第二，女孩自己没有意识到对性欲真的反感，她只觉得对男孩失去了兴趣，多多少少不喜欢跳舞、约会和轻浮，渐渐地离他们而去。

第二组呈现一幅相反的画面。非常有天赋和前途的女孩，此时除了对男孩以外，对其他什么都不感兴趣，思想不能集中，着手开始任何心理活动后不久就全部放下。她们变得完全专注于性爱区域。正如相反方向一样，这一转变被视为像以下的合理化一样“自然”和“防御”即对这个年龄的女孩来说，把兴趣转向男孩、跳舞和专情是很“正常”的。当然如此，但下面的趋向又怎样呢？一个女孩不由自主地爱上了一个个男孩，而并不真正在乎他们中的任何人。一旦她确信已征服他们以后，要么甩掉他们，要么激励他们甩掉她。她觉得一点儿不吸引人，虽然证据恰恰相反。她们通常回避实际发生性关系，以社会的要求为基础使这一态度变得合理，虽然其真正原因是她性感缺失，如同她最终冒险走这一步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旦周围没有男人崇拜她时，她就变得沮丧或心神不定。另一方面，她对工作的态度不像辩解所暗示的那样，是以下事实的“自然”结果。由于她先占据了男孩，所以其他兴趣被迫退向背景衬托。可是，她在现实中却是非常有野心的，一事无成的感觉对她是一种极大的痛苦。

第三类女孩在工作 and 爱情两个区域都变得很压抑。表

面上这也同样不一定很明显。从表面观察，她也许给人很适应的感觉，在社会接触方面没有任何困难，有男女朋友，老于世故，直率地谈论有关性的一切，假装没有一点儿压抑，有时也进入这样或那样的性关系，但不和他们中的任何人有情感介入。她冷漠而孤高，充当自己和别人的观察者、生活的旁观者。她也许对现存的疏远欺骗自己，但她不时敏捷地意识到，自己与他人或他事没有深刻而肯定的情感纽带，任何事都不重要，在她的活力、天赋和缺乏开朗之间有醒目的自相矛盾，通常，她觉得生活很虚伪，很无聊。

第四组是最容易被描绘、最被人所知的了。女孩完全不理睬男孩，而与其他女孩发展紧密和强烈的友谊，对女友的性特征也许有意识也许没有意识。如果对这些倾向的性特征意识到的话，这样的女孩就会经受强烈的内疚感之苦，好似罪犯一样。她对工作的态度也许有变化，由于有野心，有时又很能干，因而常常难于确定自己的存在，在效率时代之间有“神经质障碍”。

虽然有四种非常不同的类型，但只要足够准确的话，即使表面观察也显示出她们有共同倾向：对女性自信感到不安全，对男人抱有充满冲突和敌对的态度，无力去“爱”——不管这一术语意味着什么。如果她们不完全躲避女性角色的话，她们就以扭曲的方式反叛或夸张它。在所有这些病例中，与性欲相连的罪恶比她们承认的多得多。“嘲弄镣铐

的人未必自由”。^①

精神分析还显示了更为令人震惊的相似点，多得一时使人容易忘记她们在生活态度中表现出的种种差异：

她们都感到一种对每个人的普遍敌对，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但是，他们对男人和对女人的态度却不同。对男人的敌对在强度和动机上不一样，比较容易被暴露，而对女人则有绝对破坏性的敌意，结果被深深隐藏着。她们也许模糊意识到敌意的存在，但决不会意识到它的真正范围、残酷性和进一步的含义。

她们对手淫都有强烈的防御态度，可能最多记得小孩时手淫过，甚至拒绝承认它曾经起过作用。她们在意识水平上对手淫相当诚实，真的不去做或只是以非常隐蔽的方式去做，感到对此没有意识欲望。正如后来显示的那样，这种有力的冲动虽存在着，但是完全与其他的性格分开，并以这种方式隐瞒起来，因为这些冲动和众多的内疚感和恐惧感混杂在一起。

是什么造成了对女人的极端敌对呢？从她们的生活历史中只有部分可以解释。出现了某些对母亲的批评：缺乏温暖、保护和理解，偏护兄长，对性贞洁要求过严。这一切多多少少有事实来支持，但她们自己感到敌意与现存的怀疑、违抗和仇视是成比例的。

席勒《嘲弄镣铐的人未必自由》。

然而，真正的含义在她们对女性精神分析家的态度中变得显而易见。不包括技术细节，不包括个别差异及防御差异，我们说的类型个性逐渐出现了下列情况：她们深信精神分析家不喜欢她们；她们怀疑精神分析家对病人事实上抱有恶意，且憎恨她们的幸福和成功，特别是谴责她们的性生活，干预她们的性生活或企图这样做。

这一点作为内疚感的反应和恐惧的表达被揭示出来，与此同时，人们逐渐看到她们的担心是有原因的，因为她们在分析情景中对精神分析家的实际行为是被众多的违抗和击败分析家的倾向所促使的，不管她们是否同时也击败了自己的目的。

可是，实际行为仍然只是现实水平上存在的敌意的表达。人们只有进入犹如夜梦中和白日梦中出现的幻想世界才能揭示它的整个范围。这儿，敌对以最残酷、最落伍的方式出现。

这些残酷的原始冲动在幻想中产生，它们使人理解对母亲和母亲形象的深层内疚感，而且最终使人理解为什么手淫完全被抑制、至今仍和恐惧搀杂在一起。幻想伴随着手淫，所以对此引起内疚感。换句话说，内疚感与手淫的肉体过程无关，而与幻想有关。能够抑制的只是肉体过程和手淫欲望，而幻想仍然在深层活动着，由于早期被抑制过，幻想保持着幼稚特性。虽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个人

继续带着内疚感作出反响。

可是，手淫的肉体部分并不是不重要，强烈的恐惧从手淫中产生，其基础是害怕被毁被伤，无法修补。恐惧的内容还未被意识到，但在各种各样的从头到脚的忧郁症恐惧中发现了众多伪装的表达——害怕作为女人她们身上出了问题 害怕将不能结婚和生育——最终，所有案例中共同的恐惧是害怕没有吸引力。虽然这些恐惧直接追溯到肉体手淫，但只有从手淫的精神含义角度才可理解。

这种恐惧的真正暗示是：“因为我对母亲和其他女人具有残酷、毁坏性的幻想，所以我应该担心她们要以同样的方法来破坏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同样的复仇恐惧解释了她们为什么感到和精神分析家在一起不轻松的原因。尽管在意识上信任她的公平和可靠性，但她们仍情不自禁地切身感到，挂在头顶上的剑肯定要落下，感到精神分析家心怀不轨、有意要使她们痛苦。她们得在令她不快和显示出她们的敌意冲动之间选择一条狭窄小道。

由于她们经常处于致命打击的恐惧之中，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她们为什么觉得有保护自己的重大必要。她们用逃避和设法击败精神分析家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因此，她们的敌意在上一个层面上具有防御的含义。与此相类似，她们对母亲的大部分仇视具有同样的对她感到内疚的含

义，具有用转向反对她的方法来抵挡与这种内疚有关的恐惧的含义。

在艰难地经历这些的时候，反对母亲的主要根源在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它们的痕迹从这一事实的一开始就显而易见：除第二组以外——参加与其他女孩的竞争，虽然带着巨大的担忧——她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其他女孩的竞争，无论哪儿只要有另一女人上阵，她们就立刻退却。她们坚信自己缺乏吸引力，所以觉得比周围的任何其他女孩都差，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可以发觉，她们采取同样的倾向避免与精神分析家的竞争，实际存在的竞争战斗被隐藏在绝望地感觉比精神分析家低下的背后。即使最终她们不得不承认她们的竞争意图，她们也只提及工作上的智慧和能力，而不提及女性水平上的竞争，例如：她们一贯抑制贬低分析家的外表和衣着的思想，如果这种思想表现出来的话，就处于极度尴尬的状态。

竞争不可避免，因为在童年就有与母亲或姐姐特别强烈的抗争。通常以下的这个或那个因素极大地强化了与母亲或姐姐的自然竞争：性发育和性意识早熟；阻碍自信的早期威胁；父母间的婚姻冲突，迫使女儿站在其中一边；来自母亲方面的公开或遮蔽的拒绝；父亲对小女孩表现出的过分亲切的态度，从有意选中她到公然的性亲近。纲要式地概括这一事实，我们发现这一恶性圈已经形成：嫉妒和抗

争母亲或姐姐；敌意冲动在幻想中产生；内疚和害怕被打击、惩罚 防御性敌对 增强了的恐惧和内疚。

正如我所说的，来自这些根源的内疚和恐惧最坚定地稳固在手淫幻想之中，然而它们并不局限在这些幻想之中，而是多多少少蔓延到所有的性欲望和性关系方面，被带人与男人的性关系中，被内疚和忧虑的气氛包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应对与男人的关系不满意这一事实负责。

还有其他原因造成这一结果，更加直接地与对男人的态度有关。我只简要地提一下，因为它们与本文中强调的观点没有多大关系。她们对男人愤怒，可能从陈旧的失望中流露出来。导致复仇的隐蔽愿望。而且，在其他不讨人喜欢的感觉基础之上，她们预感到男人的拒绝，并以敌对回敬他们。因为女性角色充满了冲突，她们与此相背离，这样她们就发展男性奋斗，把竞争倾向带入与男人的关系之中，现在不是跟女人，而是跟男人在男性领域竞争。如果这种男性角色对她们非常值得向往的话，她们就会发展对男人的强烈嫉妒，倾向于藐视他们的能力。

带有这种结构的女孩进入青春期时会发生什么呢？青春期的力比多紧张增加；性欲变得更加苛求，必然地面对内疚障碍和恐惧的反应。实际可能发生的性经历又强化了这些。对害怕被手淫而毁的女孩来说，这时月经的来潮在情感上意味着是一个明确的证据，证明这种损害实际已经降

临了。有关月经的理智知识也无济于事，因为理解是浮在表面水平上的，而恐惧是深层的，所以两者结合不到一起。情形正变得敏感起来，欲望和诱惑很强烈，恐惧也很强烈。

我们似乎不能长久地忍受生活在有意识的焦虑之中。病人说：“我宁愿死也不愿受焦虑的真正打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致命的需求迫使我们去寻找保护手段，也就是说我们自动地以如此的方法努力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以使我们要么避免焦虑，要么建立反对焦虑的保护。

就讨论中四组都存在的基本冲突而言，它们代表了阻止焦虑的种种方法。事实是，由于类型的差异，她们选择的方法不同。虽然它们有阻止同种焦虑的共同目标，但发展了相反的性格和相反的趋势。第一组的女孩通过完全回避与女人的竞争、几乎完全躲避女性角色，从而保护自己对抗恐惧。她的竞争刺激从原来的土壤中被斩草除根并移植到一些心理领域，为获得最好的性格、最高的理想，或为成为最优秀的学生而竞争，至今已从为男人而竞争中消除，她的恐惧也极大地减弱。同时为完善所作的努力帮助她克服内疚感。

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当激进，具有极大的暂时优势。多年来她也许感到很满意，如果最终她与男人接触，尤其如果她结婚的话，相反的一面才会出现。那时人们可能观察到知足和自信突然崩溃了，一个自满、快乐、能干、独立的女孩

改变成为不满的女人，深受低劣感觉的困惑，易于压抑，强忍着不去积极分担婚姻的责任，性冷淡，不是以可亲可爱的态度，而是以竞争的态度对待丈夫。

第二组的女孩不放弃与其他女人竞争的态度，对其他女人清醒的抵抗驱使她们一有机会就打败她们，其结果与第一组相反，她有自由浮动的焦虑，她防止焦虑的方法是紧紧依偎于男人。先前提到的女孩从战场上撤退，而后者寻求朋友结盟。不知足地渴望男人的羡慕，无论如何这并不表示她们体质上性满足的需要较大。实际上她们如果进入实际性关系的话，也被证实为性冷淡。一旦她们不能有一个或几个男朋友时，男人对她们起到增强信心的作用这一事实就变得显而易见了；那时她们的焦虑浮到了表面，她们觉得孤独、不安全，失落。赢得男人的羡慕也使她们害怕自己不“正常”的担忧减轻，这种害怕正如我前面所说是害怕被手淫而毁的结果。就允许她们与男人有满意关系的性行为而言，则存在着更多的内疚与恐惧，所以，只有恢复征服男人也许能达到增强信心的目的。^①

第四组，即潜在同性恋，设法通过过度弥补对女人的破坏性敌意来解决问题。“我不恨你 我爱你。”人们会把这一变化描述成完整的、盲目的拒绝仇视。她们对此获得多大

《精神分析杂志》上将发表的论文《过高重视爱情》对这类女人身上运行的机制做了更确切的描述。编者注：见本书中的《过高重视爱情》。

成功取决于个人因素。她们梦中通常表示出对在意识上感到有好感的女孩极端的暴力和残酷。和女孩关系的失败把她们推进绝望之中，常常引她们靠近自杀，这一点表示出她们的敌对行为转向了自己。

像第一组一样，她们完全回避女性角色，不同的是她们更肯定地发展成为男人的虚构。与男人在非性的关系层面上没有冲突，而且，第一组完全从性欲中撤退，而这些女孩只从异性爱的兴趣中撤退。

第三组努力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根本上与其他组不同。所有其他组女孩的目的是通过情感上紧紧仰赖于什么来使自己放心——依附于成就、男人或女人，而她们的主要方法是阻碍情感生活的发展，从而减少恐惧。“不要介入情感，那么你就不会受伤害。”这一分开原则可能是最有效、最持久的焦虑防护，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似乎是很高的。通常这意味着活力、自发性的冲淡、可利用能量的大大降低。

精神动力学的复杂情结导致了表面简单的结果，熟悉这点的人不会对这四类动力学揭示的个性变化陈述产生误解。其用意不在于“解释”如同性恋或分离等现象，而在于只从一个观点出发，把它们看作是对类似潜在冲突的不同解决方法或伪解决方法的代表。选择哪种方法不取决于女孩的自由意志力，犹如“选择”这一术语所指的那样，而严格决定于相关的童年事件以及女孩对童年事件的反应。环境

影响可能如此地迫不得已，以致只有一种方法可行，那么人们遇上的类型可能是纯粹的、轮廓画得很清楚的形式。其他人在青春期或青春期以后，可能会逼迫放弃一种方法，去尝试另一种。人们会进一步发现解决问题的不同努力在同步进行，如迷恋男孩的女孩会表现出分离倾向，虽然决不以第三组明显的方式，或许在第一组和第四组之间有不能感觉到的转移。假如我们已理解了明确类型中呈现的种种态度的基本功能，那么情形中的变化和典型倾向的混合就不会给我们的理解造成任何困难。

还有几句关于预防法和治疗的话：我希望即使从这一粗略轮廓中也能很明显地看出，青春期所作的预防措施来得太晚了，如关于月经的明智启发。启发是在智慧水平上被接受的，达不到深层阻碍的早期恐惧。预防法只有从生命的最早日子开始才能有效。我想人们用这种方法形成其目标是理所当然的：在勇气和耐力方面训练孩子，而不是使他们充满恐惧。然而，所有这些形式也许是误导而不是有助，因为它们的价值完全依赖于从中推论出的特别而确切的含义，这一点应详细探讨。

关于治疗：性质不严重的困难可以通过有利的生活环境加以治疗。我怀疑这种清晰的个性变化，是否对用不太灵敏的仪器工作的精神治疗家来说，比心理分析家更易接近，因为与任何单一的神经质症状相反，这些障碍在整个个

性中表现出一个不确定的基础。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忘记，生活也许是更好的精神治疗家。

对爱的神经质需求^①

我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对爱的神经质需求。也许我无需给你们介绍这方面的新观察，因为你们熟悉临床资料，这些资料以种种方式被多次描述过。这一主题广泛而复杂，所以我必须把自己局限在几个要点上。我将尽量简要地描绘相关的现象，而在讨论它们的意义时则将相对明确和详细。

据我的理解，“神经质”这一术语在这种关系中不是指情景神经症，而是指性格神经症，它始于童年早期，而且整个个性多多少少被包围其中。

在谈论对爱的神经质需求时，我是指以意识的不同形式和程度在当今几乎每个神经症中所发现的现象，这些神经症表现出更多的被爱、被尊重、被认识、被帮助、被劝告、

^① 1936年12月23日在德国心理分析评论会上所作的演讲，载《女性心理治疗中心》第10期（1937），第69—82页，译文再版经卡伦·霍尔奈基金会版权允许。

被支持的神经质需求，以及对这些需求的挫折增强的敏感性。

正常的与神经质的爱的需求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把一个特定文化中通常的东西称为正常。我们都想被爱，且喜欢被爱，它丰富我们的生活，给我们以幸福感。在那个程度上的爱的需求——或更确切地说是被爱的需求——不是神经质现象。在神经质中，爱的需求被增强了。如果一个服务员或报纸小贩对他不像往常那么友好，他的情绪就会被破坏，在晚会上大家都不友好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我不必提供更多的例子，因为这些现象人们都知道。正常的和神经质的爱的需求的差异也许可以系统地陈述如下：

对一个健康人来说，被他所尊敬和依靠的人所爱、礼待和尊重是很重要的，而爱的神经质需求是强迫性的、不加选择的。

这些反映在精神分析中能够被观察得最清楚，因为在病人和心理治疗师关系中有一个特性使它区别于其他人和人的关系。在分析中医生相对缺乏情感介入，病人自由联想，这使人们观察这些反应比在日常生活中观察更加容易。无论神经症怎么不同，我们都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到，接受精神分析的人是多么愿意为获得心理治疗师的接受而奉献，对可能引起心理治疗师不愉快的任何事是多么敏感。

在对爱的神经质需求的所有表现中，我想强调我们文化中非常普遍的一种，这就是对爱的过分重视，尤其指这样一类神经质女人，只要没有人献身于她们、爱她们或以某种方式照顾她们的话，她们就感到不高兴、不安全、沮丧。我还指那些结婚的愿望具有强迫性质的女人，即使她们自己绝对不能恋爱，与男人的关系极其糟糕，但是，她们只盯住生活中的一点不放——结婚，就像被施过催眠术一样。这样的女人是无法发展她们的创造潜力和才能的。

对爱的神经质需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无法满足，表现为极端的妒忌：“你必须只爱我一个人！”我们能在许多婚姻、恋爱事件和友谊中观察到这种现象。我这儿理解的妒忌不是基于理性因素上的反应，而是要求只爱她们以及永不满足。

对爱的神经质需求不知足的另一个表现是无条件的爱的需求，表达为“不管我的举止如何，你都必须爱我”。尤其在分析开始时，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时我们也许会有一种印象，病人以挑逗的行为示威，但不是出于敌对的意图，而是祈求“即使我表现得可憎，你仍然愿意接受我么”？这些病人对心理治疗师的声音的细微差异也会表现出不高兴，似乎在说：“你看，毕竟你受不了我了。”无条件爱的需求也表现在要求被爱而不必任何付出，不必奉献，似乎是说：“爱上一个能够给予回报的人很简单，但让我们看看你

是否爱我，你是否得不到任何回报还爱我。”病人得付心理治疗师费用，甚至这一事实对她来说也证明了医生的主要用意不是帮助；否则他从治疗病人中得不到任何好处。这一点甚至发展到在性生活中，她觉得“你爱我只是为了从我这儿得到性满足”。对方必须在道德价值、声誉、金钱、时间等方面作出奉献，以此来证明他的真正爱，缺乏这种绝对要求的任何东西都被看作是拒绝。

在观察爱的神经质需求的不知足时，我自问：神经质的人所渴望得到的是否是真正的柔情，或者他实际上不是出于物质利益？爱的要求也许只是一个幌子，它掩盖的隐蔽愿望是想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什么 比如恩惠、时间、金钱、礼物等的奉献？

这个问题不能用一般的观点来回答。真正热望得到爱、尊敬、帮助等的人和似乎对爱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只想索取所能得到的一切的神经症病人之间有极大的个别差异，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各种转移和细微变化。

在这一点上，下面的陈述也许很合适。那些有意识地完全否认爱的人会说：“有关爱的这番话全是废话，给我一些实在的东西吧！”这些人在生活早期深受痛苦，确信没有爱这种玩意儿，爱在他们的生活中完全被损坏了。对这些个人的分析似乎证实了我的估计的正确性。如果接受足够长的分析，他们就开始相信仁爱、友谊和柔情的真正存在。

然后像通讯软管或尺度系统一样，他们不知足的愿望和物质渴求会消失，想被他人爱的诚实愿望出现在显著的地位，起先很微妙，然后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在有些病例中能清楚地观察到，不知足的爱的愿望和一般的贪图之间的联系。当这些表现出不知足的神经质迹象的人发展爱的关系时，当后来这些关系因内在原因而破裂时，他们就开始无法满足地吃，体重增加二十磅或更多。当他们又开始新的爱的关系时，这些多余的体重就会消失。这种循环可能反复进行多次。

爱的神经质需求的另一迹象是对拒绝的极端敏感，这种情况在患歇斯底里症者中常出现。他们认为各种事情都是拒绝，并以强烈的仇视作出反应。我的一个病人有只猫，有时对他爱的表示没有反应。一次他一气之下把猫向墙扔去。不管何种形式，这是由拒绝引发的愤怒的典型例子。

对真正的或想象的拒绝的反应不总是很明显，更经常的是被隐藏起来。在分析中，隐藏的仇恨可表现为缺乏成效，怀疑分析的价值或表现出对分析的其他形式的抵制。病人变得抵抗是因为他们把解释看作拒绝。我们相信在给予他一些现实的顿悟时，他却视之为批评和蔑视，其他什么也不是。

我们发现有的病人坚定不移地相信（虽是无意识的），没有爱这玩意儿，这些病人通常在童年经受过严重的失望，

使生活中的爱、柔情和友谊曾一度或全部被毁灭。这一信念同时起着防护他们不经受实际拒绝的经历的作用。这儿有一例：在我的咨询室里有一幅我女儿的雕刻。一个病人有一次问我——她承认早就想问我这个问题了——我是否喜欢这幅雕塑，我说：“我喜欢，因为它象征着我女儿。”这个病人被我的回答震惊了，因为——未意识到——爱和柔情对她来说只是她从不相信的空话。

这些病人通过先建立起的假设——他们不可能被爱——来保护自己不遭受拒绝，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则以过分补偿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不遭受失望。他们把实际拒绝扭曲成尊敬的表达。最近我有与三个病人打交道的经历：一个病人抱着半心半意的态度申请一个职位，被告知那一工作不适合他——美国典型说不能的礼貌方法。他却把这一拒绝理解为是说他做这一工作好过头了。另一个病人想像会诊后我会送她到窗口，后来她承认非常害怕被我拒绝。第三个病人是我不将其尊重为人类的很少几个人中的一个（原文如此——译者），他做的梦清楚地表示，他确信我看不起他，可同时他又成功地有意识地说服了他自己，我非常喜欢他。

如果我们意识到这种爱的神经质需求是多么大，神经质的人愿意接受多少牺牲品，为了被爱、被尊敬，为了得到仁爱、忠告和帮助，会在无理性的行为上走多远的话，我们

必须问问自己，为什么对他来说得到这些东西如此困难呢？

因为他不能成功地得到所需求的爱的程度和尺度。其原因之一是他的爱的要求无法满足——很少有例外——什么东西都未曾满足过。如果我们更深入一些探讨，就会意识到暗含在以上原因中的另一个原因，这就是神经质的人没有能力去爱。

给爱下定义是很困难的。这儿我们可以满足于以很普通的非科学术语把它描绘成自发地献身于人民、事业或思想的能力，而不是以自我中心的方式把什么都留给自己。神经质的人一般做不到这点，因为他自己曾被虐待过，因而在生活早期就习得了焦虑，抱有许多潜在和公开的敌意。这些敌意在发展过程中大大增强，但是出于恐惧，他一次又一次地压抑它们，结果，不是由于恐惧就是由于敌意，他不能奉献自我，不能自我牺牲。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不能真正为别人着想，几乎不考虑另一个人能给予或想给予多少爱、时间和帮助。所以如果某人有时需要独自一人呆一会儿，或对其他目标或在其他人身上花点儿时间或投入点儿兴趣的话，他就视其为伤害性的拒绝。

神经质的人一般意识不到自己无法去爱，不知道他不能爱，然而，意识有各种程度。有些神经质患者公开地说，“不 我不能爱。”可更普通的是神经质患者生活在错觉之中，以为自己是个大情人，有特别强的献身能力，他向我们

保证，“对我来说为别人得到东西是太容易了，但我不能为自己这样做。”这不是出于如他所信的对他人母亲般的照顾态度，而是由于其他因素。造成这样的原因也许是，他渴望得到权力，或害怕除非对别人有用否则将不被别人接受。而且，他天生具有深深压抑，有意识地不去为自己渴求什么，不去追求幸福。由于以上提到的原因，神经质患者偶尔能为别人做事，这一事实加上这些禁忌，加强了他的错觉，以为他能恋爱，并且实际上他确实深深地恋爱着。他抱住这种自我欺骗不放，因为它有使自己的爱的要求合理化的重要功能。如果他意识到自己基本上不关心他人的话，要求从别人那儿得到那么多的爱是不能维持的。

这些想法帮助我们理解“大情人”的错觉，这是一个我今天不能深入谈论的问题。

我们开始讨论的是，为什么神经质患者如此难获得他所热望的柔情、帮助、爱等的原因。至此我们已经发现了两个原因：一是他的不知足，二是不能爱。第三个原因是对拒绝的巨大恐惧。这种恐惧能大到阻止他通过问题或甚至友好的手势去靠近别人的程度，因为他生活在别人会拒绝他的不断恐惧之中，出于害怕拒绝，他甚至不敢赠送礼物。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真正的或想像的拒绝在这类神经质患者身上产生强烈的敌对。拒绝的恐惧和对拒绝的敌对反应使他越来越退缩。在不太严重的病例中，仁爱 and 友谊

也许使神经质患者短时间内感觉好一些，而较严重的神经质患者不能接受任何程度的人类温暖，我们可把他们比作双手被绑在背后的挨饿的人，他们确信自己不能被爱——不可动摇地确信。这儿有一例：我的一个病人想在一家宾馆前面停车，门卫前来帮助他。但是当我的病人看到门卫向他走来时变得很害怕，心想：“噢，我的上帝，我肯定把车停错地方了！”还有，如果一个女孩很友好，他会把她的友好解释为讥讽。你们都知道当你向这样的病人诚实地恭维时——例如说他很聪明——他会确信你这样做是出于治疗的考虑，而不是真诚地这样认为。这种不信任多多少少可能是有意识的。

在处理精神分裂症的病例中友好可能产生严重程度的焦虑。一位对精神分裂症有很多经验的朋友告诉我，一个病人偶尔要求他额外治疗，我的朋友就会作出恼怒的表情，查看他的预约手册，最后抱怨地说：“好吧，如果非得这样的话，那就来吧。”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意识到友好在这些人身上会造成焦虑。这些反应也经常在神经症中出现。

请不要把爱和性混淆起来。一位女病人曾经告诉我：“对于性，不管是什么，我都不恐惧，但我极害怕爱。”事实上她几乎不能发出“爱”字，她尽了一切力量与人保持内心的距离。她很容易进入性关系，甚至于完全达到性高潮。然而，她在情感上与男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带着一种像谈论汽

车时所采用的客观性来谈论他们。

任何形式的这种对爱的恐惧都值得详细讨论。扼要地说，这些人用完全封闭自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抵制生活的众多恐惧和基本焦虑，用克制自己的方式来保持安全感。

部分问题是对依赖的恐惧。这些人实际上依赖于别人的柔情，像呼吸需要氧气一样需要柔情，所以，进入令人痛苦的依赖关系的危险确实是很大的。他们更害怕任何形式的依赖，因为他们相信其他人对他们是敌对的。

我们能够经常观察到同样一个人在生活的一个阶段里是如何完全无助地表现出依赖性，而在另一阶段里又是如何全力避开与依赖有一点点相似的任何东西。一个少女在进入分析以前有过多少带点性特征的多次恋爱事件，都以极大的失望告终。那时她变得极度不高兴，陷入痛苦之中，觉得她只能为某个特别的男人活着，似乎她的整个生活没有他就毫无意义了。实际上，她与这些男人完全没有关系，对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真正的感情。几次这种经历以后，她的态度转向了对立面，也就是过度急于拒绝任何可能的依赖。为了避免来自这一原因的危险，她把自己的感情全部封闭起来。她现在所渴望的就是把男人掌握在自己权力之中。有感情或表达感情对她来说成了弱点，所以是卑鄙下贱的。下面的例子是这种恐惧的一个表现：她在芝加哥开始与我一起进行精神分析，后来我迁移到纽约，她没有

理由不跟我一起去，因为在那儿她的工作也不受影响。然而，由于我的缘故而去纽约这一事实困惑着她，以致她三个月不断地困惑我，抱怨纽约这地方是多么讨厌。其动机是：不要让步，不为其他任何人做任何事，因为这已经意味着依赖，所以是危险的。

这些是神经质患者取得成就十分困难的最重要的原因。无论如何，我想简单提一下向他们敞开着的取得成就的道路。我这儿指的是一些你们都熟悉的因素。神经质患者努力获取成就的主要手段是：吸引对他自己的爱的注意力 恳求同情 威胁。

第一个手段的意思可表达为：“我这么爱你，所以你也必须爱我。”采取的形式可不同，但基本姿态是一样的。在爱的关系中这是非常普遍的态度。

你们对恳求同情也很熟悉，其先决条件是完全信赖爱和确信他人身上无不具有一种基本敌意。在这些条件下，神经质患者感到，只有通过强调他的无助、软弱和不幸，他才能取得结果。

最后的办法由威胁组成。一句柏林俗语表达得很好：“爱我，要不然我就杀了你。”在精神分析以及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态度。有公开威胁伤害自己或别人的；有威胁自杀的；有威胁破坏名誉的，等等。然而，他们也可能是掩饰的——如以生病的形式——当爱的愿望无法满足

时。完全无意识的威胁可以用数不清的方式表达出来，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可见到：恋爱事件、婚姻以及医生与病人的关系。

怎么来理解带有紧张、强迫和不知足的对爱的神经质需求呢？有几个可能的解释。可以认为它仅仅是幼儿的特点，但我不这样想。与成人相比，孩子确实更需要支持、帮助、保护和温暖——费罗恩兹就这一主题写了一些好文章。的确如此，因为孩子比大人无助。一个健康的小孩成长在受宽待、受欢迎、有实际温暖的环境里——这样的孩子在爱的需求上不会不知足，摔倒时他会去妈妈那儿得到安慰。可是被系在母亲围裙带上的孩子已经是神经质了。

人们也许还会认为爱的神经质需求是“母亲依恋”的表示，这一点似乎被梦所证实，这些梦直接地或象征性地表示想吸母乳和回到子宫的欲望。这些人的早期历史确实表明没得到母亲足够的爱和温暖，或在童年就已经被类似的强迫和母亲系在一起了。似乎在第一个情况中，爱的神经质需求是坚持渴望母爱的表示，孩子在生活的早期没有得到自如的母爱。但是这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如此固执地抱住爱的要求不放，而不去寻找其他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如完全回避别人。在第二种情况中，人们会认为它是依恋母亲的直接重复。可是，这一解释仅仅把问题不加澄清地扔回到早期阶段。首先，这些孩子为什么需要过分地依

恋母亲，这还有待于解释。这个问题在两种情况中都没有得到解答。是什么动力因素使童年习得的态度保持到后来的生活中？是什么动力因素使这一幼儿态度不可能被放弃？

在许多病例中很明显的解释是，爱的神经质需求是特别强烈的自我陶醉性格的表现。正如我前面指出的，这些人实际上不能爱别人，他们确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我相信人们使用“自我陶醉”一词时应该非常小心。在自我怜爱和建立在焦虑基础上的自我中心之间是有很大差异的。在我的印象中，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关系恰恰不好，他们通常视他们自己为最坏的敌人，总是坦白地鄙视他们自己。如我后面要说明的，为了觉得相当的安全，为了提高被扰乱的自尊，他们需要被爱。

另一个解释是害怕失去爱，弗洛伊德把这看作是女性心理的特别之处。失去爱的恐惧在这些病例中确实很大。然而我要问，这一现象本身是否不需要解释了呢？我想，只有当我们知道一个人对被爱给予多少重视的时候，这一点才能被理解。

最后我必须问一问，增长的爱的需求是否实际上是力比多现象？弗洛伊德一定会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对他来说柔情本身是目的被压抑的性欲望。虽然在我看来，这一观念至少可以说未被证实。人种学研究似乎表示柔和与性感

之间的联系是相对晚些的文化习得。如果人们认为爱的神经质要求是一个基本的性现象，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它也出现在性生活满意的神经质患者身上。而且，这一观念必然引导我们不仅把柔情欲望视为性现象，而且把劝告、保护和辨认的愿望都视为性现象。

如果强调爱的神经质需求的不满足性，那么整个现象用力比多理论的术语可代表“口腔性爱依恋”或“回归”的表示。这一观念的先决条件是愿意把复杂的心理现象降低为生理因素。我相信这一假设不仅站不住脚，而且使对心理现象的理解变得更加困难。

这些解释是确实的，但它们都面临这一事实：其重点只放在现象的一个特别方面，即不是放在柔情的欲望上，就是放在不满足、依赖或自我中心上，这就使人们很难看到现象的全面。我在精神分析情景中的观察显示出，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因素仅仅是一个现象的不同显示和表达。我想如果把它看作保护自己不受焦虑困惑的方法之一的话，我们就能理解整个现象了。实际上，这些人受难于增长的基本焦虑，他们的整个一生表明，对爱的无止境的追求只是缓解焦虑的又一尝试。

对精神分析情景的观察清楚地指出，当病人被某一特殊焦虑施加压力时，对爱的需求就出现增加势头，当理解了这一联系时，对爱的需求就消失了。既然焦虑在分析中必

然被激起，所以病人一次次地设法仰赖心理治疗师是可理解的。例如：我们可以察觉到，一个在压抑对分析师的敌意的压力下充满焦虑的病人，开始寻求心理治疗师的友谊或特别在这一情景下的爱。我相信，被叫做“肯定的转移”和被解释为重复原来对父亲或母亲的依恋的一大部分内容，在现实中是寻求保险和保护不受焦虑骚扰的欲望，其座右铭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如果把不加区别地选择人以及这一欲望的强迫性和不满足性看作是这种保险需求的表达方式的话，两者就可理解了。我认为如果能认识到这些联系、揭示它们的一切细节的话，分析中的病人如此容易陷进的大量依赖是可以被避免的。假如把病人的爱的需求分析为保护自己不受焦虑骚扰的尝试，你就能更快地到达真正焦虑问题的核心，这是我的经验。

爱的神经质需求常常以对心理治疗师的性诱惑形式出现，病人要么用行为要么用梦来表达他对心理治疗师的爱，并渴望某种性参与。在一些病例中爱的需求主要或全部表现在性领域。为了理解这一现象，人们应该记住性欲望不一定表示真正的性需求，但是性欲也可以代表与另一个人接触的形式。我的经验表明，爱的神经质需求越容易采取性形式，那么越多的与别人的情感关系就被扰乱。当性幻想、梦等出现在分析的早期时，我视之为一个信号，即这个人充满了焦虑，与其他人的关系基本上很差。在这种病例

中，性欲是少数几个中的一个，或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与别人沟通的桥梁，对心理治疗师的性欲被解释为焦虑基础之上的接触需要时很快就消失了；这打开了通往解决焦虑的道路，意味着焦虑被缓解。

这种联系帮助我们理解某些增强的性需求的出现。下面我简要地陈述一下这个问题：神经质要求以性的术语表达出来的人将容易从一个又一个性关系开始，好像受强迫似的，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只能这样，因为他们与别人的关系被扰乱得太厉害了，以致不能在不同的平面上处理它。这些人很难容忍性禁戒也是可以理解的。至此所说的有异性爱倾向者的一切，对同性恋或两性爱者来说也是真实的，大量以同性恋倾向出现或被解释为同性恋倾向的情况，事实上是爱的神经质需求的表现。

最后，焦虑和爱的增长需求之间的联系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俄狄浦斯情结现象。事实上，爱的神经质需求的所有表现都能在弗洛伊德所描绘的俄狄浦斯情结中找到：依恋于父母一方，对爱的需求不满足，妒忌，对拒绝的敏感以及拒绝后产生的强烈仇恨。正如你们所知，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情结看作是基本上由生理遗传决定的现象。然而，我们与成人病人的经验使我们想知道，有多少童年反应——弗洛伊德对此作过仔细观察——是由焦虑以我们在后来生活中看到的同样方法引起的。人种学的观察使得俄狄

浦斯情结作为生理决定的现象显得可疑——鲍姆和其他人已经提出了这一事实。那些和母亲或父亲有特别强的牵连的神经质患者，他们的童年史显示了很多这样的因素，我们知道这些因素在孩子身上引起焦虑。基本上，下列因素似乎在这些病例中联合起作用——敌意的觉醒，它们因为同时存在的恐吓和同时存在的自尊下降而表达出来。我不能在这点上详细谈论为什么压抑的敌意容易引起焦虑的原因，用最一般的方法可以这么说，孩子身上引起焦虑是因为他感觉到表达他的敌意冲动将彻头彻尾地威胁他的生存安全。

这最后的评述不是想否认俄狄浦斯情结的存在和重要性，我只是想问一下，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在多大范围上是由神经质父母的影响造成的。

最后我想简单说一说，我说的增强的基本焦虑是指什么？在“生物焦虑”意义上这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现象，在神经症中这一焦虑增强了，可以被简单地描述为在敌对和过分强权的世界中无助的感觉。个人大多意识不到这样的焦虑，他只意识到一系列带有不同内容的焦虑：害怕暴风雨、害怕街道、害怕羞愧、害怕感染恶习、害怕考试、害怕铁路等等。当然，为什么一个人有这样或那样的特殊恐惧，严格取决于每个具体病例。可是，如果我们更深地观察，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恐惧都从潜在的增强的基本焦虑中衍生。

有不同的办法保护自己不受这种基本焦虑的骚扰。在我们的文化中下面的办法最普遍。首先是爱的神经质需求 遵循的座右铭是“如果你爱我 你就不会伤害我”。第二是顺从——“如果我让步，总是做人们期待的事，决不要求什么 决不抵制——那么没人会伤害我。”第三个办法阿德勒，特别是库恩凯尔已经描述过了，这就是强迫努力去夺取权力、成功和财产 其座右铭是：“如果我是强者、更成功者，那么你就不能伤害我。”第四种办法包括情感上从人们身边退缩，为的是安全和独立。这一策略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努力完全压抑这种情感，以至于不会受伤害。另一个办法是强迫积聚财产，在这个情况中不是附属于权欲，而是附属于独立于别人的愿望。

人们经常发现神经质患者并非仅仅选择其中一种办法，而是努力用不同的、常常是相反的手段取得镇定焦虑的目的，这就把他引入了不可解决的冲突之中。在我们的文化中最重要神经质冲突发生在以下两者之间：在一切环境中成为第一的强迫而不顾别人的愿望，同时被每个人所爱的需求。^①

这个讲座基于作者的《当代的神经质人格》一书，纽约，W.W. 诺顿出版社，1937年。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女性心理学

作者 = [美] 卡伦 · 霍尔奈著 奚卫霖
译

页数 = 3 1 4

S S 号 = 1 1 0 8 1 4 0 3

出版日期 = 2 0 0 0 年 0 8 月 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鸣谢
前言
目录
正文

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

逃离女性身份——男女对女性身上男性气质情结的看法

被抑制的女性情结——性冷淡问题的精神分析

一夫一妻制理想的问题

月经前的紧张

两性之间的不信任

婚姻的问题

害怕女人——观察男女对异性恐惧的具体差别

拒绝阴道——对女性生殖器焦虑问题的贡献

女性机能紊乱的心理因素

母亲冲突

过高重视爱情——对当今一种普通的女性类型的研究

女性受虐狂问题

女性青春期的个性变化

对爱的神经质需求

